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九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 北京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九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3  $\frac{1}{2}$  · 插頁 7 · 字数 547,000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566 定价（四）2.30元

## 目 录

弗·恩格斯。給奧·倍倍尔的信 .....	3—10
卡·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 .....	11—35
給威·白拉克的信 .....	13—14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	15—35
一 .....	15
二 .....	26
三 .....	28
四 .....	29
弗·恩格斯。給紐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	36—38
弗·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紀念会上的演說 .....	39—40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魯士燒酒 .....	41—59
一 .....	43—53
二 .....	54—59
弗·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	61—106
一 .....	64—67
二 .....	68—71
三 .....	72—75
四 .....	76—78
五 .....	79—82

六	83—87
七	88—91
八	92—96
九	97—100
十	101—103
十一	104—106
弗·恩格斯。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給恩·比尼亚米的信	107—109
弗·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	110—114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	115—125
卡·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	126—131
弗·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32—134
弗·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135—158
一	137—140
二	141—144
三	145—149
四	150—154
五	155—158
卡·馬克思。布赫尔先生	159—160
卡·馬克思。*答布赫尔的“說明”	161—162
卡·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163—169
弗·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 状况	170—171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編者加的。——譯者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奧·倍倍尔、 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	172—190
一、同卡·希尔施的談判 .....	172
二、給报纸拟定的方針 .....	178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	182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	191—200
一、关稅率 .....	191
二、国有铁路 .....	196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201—247
一 .....	205—218
二 .....	219—227
三 .....	228—247
卡·馬克思。关于“哲学的貧困” .....	248—249
卡·馬克思。工人調查表 .....	250—258
一 .....	250
二 .....	252
三 .....	253
四 .....	256
卡·馬克思。*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	259—263
卡·馬克思。*法国工人党綱领导言 .....	264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內瓦一八三〇年 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会 .....	265—267
卡·馬克思。給維·伊·查苏利奇的信 .....	268—269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倫敦举行 的巴黎公社紀念大会主席 (1881年3月21日) .....	270—271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給“每日新聞”編輯的信 .....272
- 弗·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 .....273—276
- 弗·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 .....277—279
- 弗·恩格斯。工联 .....280—286
- 一 .....280
- 二 .....283
- 弗·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約 .....287—291
- 弗·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議会 .....292—295
- 弗·恩格斯。美国的食品和土地問題 .....296—298
- 弗·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資理論 .....299—303
- 弗·恩格斯。工人党 .....304—307
- 弗·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308—310
- 弗·恩格斯。棉花和铁 .....311—314
- 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階級 .....315—318
- 弗·恩格斯。燕妮·馬克思(馮·威斯特华倫) .....319—321
- 弗·恩格斯。在燕妮·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322—324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 俄文第二版序言 .....325—326
- 弗·恩格斯。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327—336
- 弗·恩格斯。論美国資本的积聚 .....337—339
- 弗·恩格斯。布雷的牧师 .....340—344
-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德文本初版序言 .....345—347
- 弗·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謠的 .....348—350
- 弗·恩格斯。馬尔克 .....351—369



弗·恩格斯。燕妮·龙格(馬克思).....	370—371
弗·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悼詞草稿.....	372—373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的葬儀.....	374—379
弗·恩格斯。卡尔·馬克思的逝世.....	380—388
一 .....	380
二 .....	383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弗·恩格斯。对一頁“公社史”的意見(1870年10月30日 梯也尔先生的停战).....	391—395
卡·馬克思。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 .....	396—429
卡·馬克思。給維·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	430—452
初稿 .....	430—441
二稿 .....	442—446
三稿 .....	447—452
卡·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 发展的扎記 .....	453—477
I [准备改革的] 过程.....	453
II [編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	456
III 地方自治机关 .....	463
IV 俄国 .....	471
弗·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	478—538
凱撒和塔西佗 .....	478
和羅馬的最初战斗 .....	493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	509
注釋:各日耳曼部落 .....	52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	539—599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	539
区制度和軍事制度 .....	552
注釋：法兰克方言 .....	564
注釋 .....	603—66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664—696
人名索引 .....	697—724
期刊索引 .....	725—727
地名索引 .....	728—740
度量衡和貨幣名称表 .....	741
譯后記 .....	742—745

## 插 图

卡·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的第一頁 .....	12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的第一頁 .....	173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頁 .....	203
卡·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頁 .....	261
弗·恩格斯譯的詩“布雷的牧师”，引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他的文章 .....	340—341
弗·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住图 .....	531
弗·恩格斯“法兰克方言”一文中的日耳曼方言图 .....	580—581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5年3月—1883年5月



---

## 弗·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的信<sup>1</sup>

1875年3月18—28日于倫敦

親愛的倍倍爾：

我已經接到您2月23日的來信，並且為您身體這樣健康而高興。

您問我，我們對合併這件事採取什麼態度？可惜我們的處境和您完全一樣。無論是李卜克內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給我們一點消息，因此，我們所知道的也只是報紙上所登載的那些，而直到大約八天前收到綱領草案時為止，報紙上並沒有登載什麼。這個草案的確使我們吃驚不小。

我們黨經常地向拉薩爾派伸出手來，建議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萊維爾們、哈賽爾曼們和特耳克們的無禮拒絕，因而就連每個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既然這些先生們現在自己來謀求和解，那他們一定是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了。但是，考慮到這些人的盡人皆知的本性，我們就有責任利用這種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證，使這些人不能利用我們的黨在工人輿論中重新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地位。我們應當以極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態度對待他們，能否達到合併，這取決於他們有多少誠意放棄他們的宗派口號和他們的“國家幫助”，並基本上接

受 1869 年的爱森納赫綱領<sup>2</sup>或这个綱領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們的党在理論方面，即在对綱領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絕對没有什么要向拉薩尔派学习的**，而拉薩尔派倒是应当向我們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薩尔派，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即使不完全放棄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許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屬的过渡措施。綱領草案证明，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比拉薩尔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誠实的人”<sup>①</sup> 又一次受到了不誠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騙。

第一，接受了拉薩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錯誤的說法：对工人階級說来，其他一切階級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場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經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們，同人民党<sup>3</sup>携手合作了这許多年呢？“人民国家报”<sup>4</sup>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sup>5</sup>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內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綱領中列入了整整七項簡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綱領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項要求中沒有一項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sup>6</sup>。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則在目前实际上已經完全被抛

---

① 人們把爱森納赫派称为“誠实的人”。——編者注

棄，而且是被五年來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一直極其光榮地實行這一原則的人們所拋棄。德國工人之所以處於歐洲運動的先導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戰爭期間採取了真正國際主義的態度；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做得這樣好。現在，在國外，當各國政府極力鎮壓在某一個組織內實現這一原則的任何企圖而各國工人到處都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卻打算拋棄這個原則！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究竟還剩下什麼東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對歐洲工人在今後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進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對未來的“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的希望，是對和平同盟<sup>7</sup>中的資產者的“歐洲聯邦”的希望！

當然根本沒有必要談國際本身。但是，至少不應當比1869年的綱領後退一步，而大体上應當這樣說：雖然德國工人黨首先是在它所處的國境之內進行活動（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特別是沒有權利講錯誤的話），但是它意識到自己和各國工人的團結一致，並且經常準備着，像過去一樣地繼續履行由這種團結一致所帶來的義務。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認為自己是國際的一部分，這種義務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罷工時進行援助並阻止工賊活動，設法使德國工人通過黨的機關報刊了解國外的運動的情況，進行反對迫於目前的或正在爆發的王朝戰爭的宣傳，在這種戰爭期間實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範地實行過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一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而所以如此，是因為根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太多了（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是非常複雜的，隨着

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sup>8</sup>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sup>9</sup>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sup>10</sup>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沒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



級組織，它靠這種組織和資本進行經常的鬥爭，使自己受到訓練，就是最殘酷的反動勢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樣）現在也決不可能摧毀它。既然這一組織在德國也獲得了這種重要性，我們認為，在綱領里提到這種組織，並且盡可能在黨的組織中給它一個位置，那是絕對必要的。

這就是我們的人為了討好拉薩爾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對方做了些什麼讓步呢？那就是在綱領中列入一堆相當混亂的**純民主主義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純粹的時髦貨，例如“人民立法”，這種制度存在於瑞士，如果它還能帶來點什麼東西的話，那末帶來的害處要比好處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來**管理**”，這還有點意義。同樣沒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個公民負責。至於在任何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中都會列入而在这里看起來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學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和後來的“共產黨宣言”<sup>11</sup>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

“国家”一詞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經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現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經有了闡述这一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連文字也写得干癟无力的綱領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綱領，如果它被通过，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們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們將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請您想想，在国外人們是要我們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負責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們替“民主周报”創辦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說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話負責<sup>12</sup>。在人們的想像中，我們是在这里指揮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內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說干涉过的話，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論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綱領形成一个轉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們拒絕替承认这个綱領的政党承担任何責任。

一般說來，一個政黨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實際行動那樣重要。但是，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因此，新的綱領無論如何不應當像這個草案那樣比愛森納赫綱領還倒退一步。總還得想一想，其他國家的工人對這個綱領將會說些什麼；整個德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向拉薩爾主義的這種投降將會造成什麼印象。

同時我深信，在這種基礎上的合併連一年也保持不了。難道我們黨的優秀分子會願意不斷地重複拉薩爾關於鐵的工資規律和國家幫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詞句嗎？我想看看譬如您在那種情況下的態度！而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的聽眾就會向他們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薩爾派會死抱住綱領的這些條文不放，就像猶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sup>①</sup>不可一樣。分裂是一定會發生的；但是到那時我們已經恢復哈賽爾曼、哈森克萊維爾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誠實的”名聲；分裂以後，我們將被削弱，而拉薩爾派將會增強；我們的黨將喪失它的政治純潔性，並且再也不可能奮不顧身地起來反對它自己在一個時期內寫在自己旗幟上的拉薩爾詞句；如果拉薩爾派以後又說：他們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黨，我們的人是資產者，那末，他們是可以拿這個綱領來證明的。綱領中的一切社會主義措施都是他們的，而我們的黨除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麼東西也沒有添進去，**這個黨在同一个綱領中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成“反動的一幫”中的一部分！**

我把這封信擱下來，是因為您在4月1日慶祝俾斯麥生辰那一天才會被釋放，而我不願意讓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傳送時

---

①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場。——編者注

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 41 号。

写于 1875 年 3 月 18—28 日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  
第 2 卷（1911 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 2 卷译出

卡·馬克思  
—  
哥达綱領批判<sup>13</sup>

卡·馬克思写于 1875 年 4 月—5 月初

載于 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  
第 18 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第 2 卷譯出



## 給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倫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綱領的下列批評意見，請您閱后轉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經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給我規定的工作時間。所以，写这么多張紙，对我來說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內的朋友們——而这些意見就是为他們写的——以后不致誤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驟，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簡短的声明，声明的內容是：我們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干，我們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見解——一种完全荒謬的見解，仿佛我們在这里秘密地領導所謂爱森納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綱領等等負責，甚至要为李卜克內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驟負責。

撇开这一点不談，我的义务也不容許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拋棄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綱領。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綱領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許这样做——超过爱森納赫綱領，那就干脆締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則性

綱領（應該是把這件事情推遲到由較長時間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時候再做），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一些可供人們用以判定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

拉薩爾派的領袖們之所以跑來靠攏我們，是因為他們為形勢所迫。如果一開始就向他們聲明決不會拿原則來做買賣，那末他們就只好滿足於一個行動綱領或共同行動的組織計劃了。可是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允許他們拿着全權委託書來出席，並且自己承認他們的這種全權委託書有效，就是說，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們無條件投降。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在召開妥協的代表大會以前就召開了代表大會，而自己的黨卻只是在事後才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人們顯然是想杜絕一切批評，不讓自己的黨有一個深思的機會。大家知道，合併這一事實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滿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為這種一時的成功不是用過高的代價換來的，那他就錯了。

此外，即使這個綱領沒有把拉薩爾的信條奉為神聖，也是完全不適宜的。

我將在最近把“資本論”法文版的最後幾冊寄給您。排印工作因法國政府禁止而耽擱了很久。在本星期內或下星期初本書可以印完。前六冊您已經收到沒有？請把伯恩哈特·貝克爾的地址也告訴我，我也要給他寄最後幾冊<sup>14</sup>去。

“人民國家報”出版社有一種特別的習氣。例如到現在為止連一本新版的“科倫共產黨人案件”<sup>15</sup>也沒有給我寄來。

致衷心的問候

您的 卡尔·馬克思



---

##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

### —

1. “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於社会一切成員。”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財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儿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話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資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綱領不应当容許这种资产阶级的說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說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談。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資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財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創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

所承认。首先要滿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維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滿足各种私有財產<sup>①</sup>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財產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們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說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換个說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論点无可爭辯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創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創造財富，也不能創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論点也是同样无可爭辯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貧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財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現時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規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談論“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現今的資本主义社会中最終創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鏟除这个社会禍害<sup>②</sup>。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薩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談“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現。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譯者注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是：历史禍害。——譯者注

2.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資料為資本家階級所壟斷。由此造成的工人階級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

這段從國際章程中抄來的話，經過這番“修訂”就變成荒謬的了。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資料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所壟斷（地產的壟斷甚至是資本壟斷的基礎）。無論是前一個或者後一個壟斷者階級，國際章程在有關條文中都沒有提到。它談到的是“**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生活源泉”這一補充語充分表明，勞動資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這種修訂，是因為拉薩爾由於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僅僅攻擊了資本家階級，而沒有攻擊土地所有者。在英國，資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廠所在的那塊土地的所有者。

3. “勞動的解放要求把勞動資料提高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要求集體調節總勞動並公平分配勞動所得。”

“把勞動資料提高為社會的公共財產”（！），應當是說把它們“變為社會的公共財產”。這不過是順便提一句罷了。

什麼是“**勞動所得**”呢？是勞動的產品呢，還是產品的價值？如果是後者，那末，是產品的總價值呢，或者只是勞動新添加在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

“勞動所得”是拉薩爾為了代替明確的經濟概念而提出的一個模糊觀念。

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产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

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調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嗎？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嗎？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語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們必須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設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資料是公共財產，总劳动是由集体調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們則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於社会一切成員”。

“屬於社会一切成員”？也屬於不劳动的成員嗎？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屬於社会中劳动的成員嗎？那么社会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薩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們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語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現在从它里面應該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費掉的生产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險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現有的資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論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則無論如何是不能計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費資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sup>①</sup>的一般管理費用。**

和現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縮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設施等。**

和現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現在属于所謂官办济貧事业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尔的影响下偏狹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間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經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間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員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謀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語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語現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資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換自己的产品；耗費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現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現为它們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屬性，因为这时和資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譯者注

我們这里所說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經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給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時間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張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這張证书从社会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費資料。他以一种形式給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領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調节商品交換（就它是等价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間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換。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权，虽然原則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价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場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資產階級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較长的時間；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時間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來說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階級差別，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sup>①</sup>不同等的个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认<sup>①</sup>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來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們，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讲的这个場合，把他們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經結婚，另一个則沒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較多，另一个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經過长久的陣痛剛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級阶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

---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譯者注



后；在劳动已經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权的狹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經有一些意思，而現在已变成陈詞濫調的見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們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慣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廢話，来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党而現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則表現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資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則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費資料的現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財產，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車呢？

4.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sup>16</sup>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障地的封建主和中等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薩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飾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結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語毫不相干。这純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絕對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馬拉<sup>17</sup> 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徑之一。

5.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現代民族国家的範圍內**进行活动，同时意識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導致的結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薩尔以最狹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須在国内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国範圍內的斗争。但是，“現代民族国家的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經濟上又处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而在政治上則处在“国家体系的範圍內”。任何一个商人人都知道，德国的貿易同时就是对外貿易，而俾斯麦先生的偉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結为什么呢？就是意識到它的意图所導致的結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統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

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連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經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綱領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貿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貿易派也說，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貿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滿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貿易的意識。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絕對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創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績，但是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已經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繼續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悅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綱領中放棄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sup>18</sup>。

##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則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爭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铁的工資規律——和——任何形式的剝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薩尔的“铁的工資規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沒掉，竟胡說什么“廢除工資制度（应当說：雇佣劳动制度）連同铁的工資規律”。如果我廢除了雇佣劳动，那

末我当然也廢除了它的規律，不管这些規律是“铁的”还是海綿的。但是拉薩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繞着这个所謂規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薩尔派已經获得胜利，“工資制度連同铁的工資規律”都应当被廢除掉，而不是不連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資規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偉大的規律”<sup>①</sup>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詞以外，沒有一样东西是拉薩尔的。“铁的”这个詞是虔誠的信徒們借以互相識別的一个標記。但是，如果我接受帶有拉薩尔印記因而是拉薩尔意义下的規律，那末我就不得不連同他的論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論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薩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揚的）馬尔薩斯的人口論<sup>19</sup>。但是，如果这个理論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廢除了一百次，也还廢除不了这个規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規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經濟学家們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薩尔对这个規律的錯誤了解不談，真正令人气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薩尔死后，在我們党內，这样一种科学見解已經給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資不是它表面上呈現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資的全部资产階級見解以及对这种見解的全部批評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資本家（因而也为他們

---

① 引自歌德的詩“神妙的”。——編者注

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差。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话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薩尔的“铁的工資規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現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薩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說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sup>20</sup>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綱領，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現存的合作社，那末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創設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 四

現在我們來談民主的一節。

##### A. “國家的自由基礎”。

首先，照第二節的說法，德國工人黨力求爭取“自由國家”。

自由國家是個什麼東西呢？

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國，“國家”差不多是和俄國一樣地“自由”。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

德國工人黨——至少是當它接受了這個綱領的時候——表明：它對社會主義思想領會得多么膚淺；它不把現存社會（對任何未來的社會也是一樣）當做現存國家的基礎（或者不把未來社會當做未來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做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本質。

而且在綱領中還荒謬地濫用了“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等字眼，甚至更荒謬地誤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個國家！

“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历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發展了。“現代國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却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極重要的共同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代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名詞联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但是，這個綱領既沒談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也沒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

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陳旧的<sup>①</sup>、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所有這些要求凡不屬於空想的，都已經**實現了**。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國等等。這類“未來的國家”就是**現代的國家**，雖然它是存在於德意志帝國的“範圍”以外。

但是他們忘記了一點。既然德國工人黨明確地聲明，它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內，就是說，是在自己的國家即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進行活動，——否則，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沒有意義了，因為人們只要求他們所沒有的東西——那末，它就不應該忘記主要的一點，這就是這一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

①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這裡沒有：陳旧的。——譯者注

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們沒有勇氣<sup>①</sup>——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謹慎——像法国工人綱領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侖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誠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杂着封建殘余、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响、按官僚制度組織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軍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們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爭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階級斗爭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連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許而为邏輯所不容許的範圍內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們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話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經濟基础：实行統一的累进所得税……”。賦稅是政府机器的經濟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經實現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階級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說，以資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財政改革派——以格萊斯頓的弟弟为首的資產者們——提出和这个綱領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sup>①</sup>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們不能。”——譯者注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費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們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談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費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費用而已。順便指出，A. 項第 5 条所要求的“免費訴訟”也是如此。刑事訴訟到处都是免費的；而民事訴訟几乎只涉及财产糾紛，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們应当用人民的金錢来打官司嗎？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論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視察員来监督这些法律規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内（他們会说，他們談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們已經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綱領，尽管滿是民主的喧囂，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

薩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順信仰，或者說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說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魯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进行“文化斗争”<sup>21</sup>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記住他們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sup>①</sup>，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說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們不願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現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綱領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談一談。

##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沒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間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經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則，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別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門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說明。

**“禁止童工”**！这里絕對必須指出**年龄界限**。

---

<sup>①</sup>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一样。”——譯者注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話——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時間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預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魯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視察員只有經過法庭才能撤換；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視察員的失职行为；視察員必須是医生出身。

5. “調整監獄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綱領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無論如何应该明白說出，工人們完全不願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別是不願意使他們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 “有效的責任法。”

应该說明，“有效的”責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順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設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規定遭到破坏时，責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

---

弗·恩格斯  
給紐約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信

1875年8月13日于倫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公民們：

6月4日和施佩耶尔書記的信一起寄給我（21日收到）的通告<sup>22</sup>，已根据指示发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做了下面这些事：

（1）此地的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sup>23</sup>已同拉薩尔派合并，并且在接受会員——約120名——方面表现出过多的自由主义，因而只有在希望立即公布机密通知的情况时，才适合把这些通告給它，——所以，我把通告轉給了列斯納和弗兰克尔。他們两人都同意我的意見：这个通告的内容不宜于在协会中正式宣布，只应当把它告訴有关的人，并且要秘密地进行，以利于通告中所說的事情。看来这里不会派德国工人去費拉得尔菲亚，因此，这对实际結果不会有絲毫影响。

（2）当我收到通告的时候，我們的馬德里的朋友梅薩（現住巴黎）正好在这里。他热烈贊同这件事情；我把通告翻譯給他听了，

他認識在巴黎掌管筹集的款項(为了派遣工人去費拉得尔菲亚)的委员会的委員,所以,凭他那众所周知的毅力,他大概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他还要把通告轉寄到西班牙去。

(3)我无法把通告寄到比利时去,因为整个比利时的国际是站在同盟分子一边的,而让**后者**知道我們的計劃——这对我們不利。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我沒有任何人的通訊地址。洛迪的“人民报”<sup>24</sup>几乎是参加了同盟,它会立刻把这全部經過公布出去的。

(4)指示中沒有提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总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許多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沒有在那里采取**任何**步驟,以免妨碍那里已經进行的工作。

(5)凡是看过通告的人,都对它表示完全贊同,一般的看法是,在所有的建議中,召开代表會議的建議是唯一切合实际的。但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我們觉得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地的协会,我已經談过。英国所有其他的支部都已停止活动,其中的优秀人物多半都已离开。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国际直接被禁止,根本談不上表决。德国还从来沒有对这样的問題进行过表决,而在同拉薩尔派合并以后,同国际保持的本来就很微弱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想要把这个建議变成决定,美国的票数就足以支持它了,况且,正如我們根据可靠材料知道的,同盟分子今年也不会(也許永远再也不会)召开代表大会。

(6)是不是可以在展覽会快开幕的时候,在欧洲的党报上刊登一則簡訊,內容大致这样:“打算参观費拉得尔菲亚的展覽会的社会主义工人,請到某某地址去同費拉得尔菲亚的党内同志建立联系”;或者成立“給工人社会主义者安置住处和保护他們免受欺詐的委员会”并公布它的地址?特别是后一种办法看来不会有什

么毛病，但只要几封私人信件就足以使人对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得到应有的了解。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75年8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  
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  
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

## 弗·恩格斯

###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 紀念会上的演說<sup>25</sup>

公民們：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敗。就拿 1848 年革命來說。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廣闊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普魯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領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尼古拉皇帝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說：“去备馬吧，先生們！”他立即动員了军队，并在波兰集結了军队，以便在适当时机調遣军队过境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本身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一个决战场。5月15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国民議會，去迫使議會为波兰的独立而战。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萊茵报”<sup>26</sup>上要求普魯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們。可見，在法国和德国，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則，革命就必定灭亡。但是，法国的拉馬丁、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沙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階級大臣康普豪森根本不打算粉碎俄国的力量，他們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做他

們抵禦威脅到自己头上的革命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功还没有威胁到战胜了維也納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魯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棄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誰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誰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說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們現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发表于 1876 年 1 月 22 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 1876 年 2 月 15 日“前进报”  
(倫敦)第 27 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前进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  
普鲁士烧酒<sup>27</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2 月  
载于 1876 年 2 月 25、27 日和  
3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第 23、  
24 和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

—

2月4日，馮·卡尔多尔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精”課以重稅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質問。他提請議員先生們注意（見“科倫日报”<sup>23</sup>报道）以下一点：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貧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馬鈴薯，达到了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馬鈴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許多酿酒厂，它們以生产酒精作为农村副业。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約有居民1000人，現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由于馬鈴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則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馬鈴薯的必要的銷售市場。其次，酿酒厂使馬鈴薯变成价格昂貴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飼料的殘渣，土地变得更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稅比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們国家每年从酒精稅得到的收入大約为3600万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

近来，普魯士的容克們想必是十分大胆的了，他們居然敢让全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或 vulgo〔俗称〕酿酒业。

在上一世紀，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燒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的。誠然，那时人們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燒酒中含的杂醇油（这一点我們下面还要談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曉；但是人們凭着經驗知道，燒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消失，不那样使人酒醉和損害健康。当时生产燒酒的小資产者条件，以及更多注意质量而不大注意数量的尙未发展起来的需求，

使得几乎各地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燒酒中最有害的成分經過逐漸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紀末，我們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閔斯德、烏尔利希施坦、諾特豪森等地看到比較发达的酿酒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酒”。

到本世紀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較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者的副业，特別是在汉諾威和不倫瑞克两地。他們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燒酒的消費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經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使喝燒酒的嗜好广为傳播。于是，在1814年締結和約以后，酿酒业越来越普遍，在下萊茵，在普魯士薩克森、勃兰登堡和魯日伊策深深地扎了根，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即作为大农业主的副业出現了。

然而，成为酿酒业轉折点的是，人們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可以用馬鈴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現已最終地从城市轉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資产者日益被生产馬鈴薯劣等燒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燒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馬鈴薯燒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饒的粮食产区轉移到貧瘠的馬鈴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轉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魯士。

这一轉折点是在1816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現的。尽管以后連續两年取得了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輸出，粮价仍然很貴，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在1813年，每一奧克斯霍夫特<sup>①</sup>燒酒只值39塔勒，而到1817年

則賣 70 塔勒。馬鈴薯代替糧食之后，到 1823 年每一奧克斯霍夫特燒酒只值 14 到 17 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經因戰爭和為國捐獻而似乎弄得傾家蕩產的易北河以東的窮容克們，從哪里取得一筆資金使他們所負擔的抵押債務變成有利可圖的燒酒廠呢？誠然，1816—1819 年的有利行情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一筆收入，由於地價普遍提高，給他們的信貸增加了；但是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愛國的容克們得到的比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國家援助，其次，這裡還要補充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情況。大家知道，1811 年在普魯士，農民賦役的贖免以及農民和莊園主之間的各种糾紛，由法律作了這樣的調節，即實物貢賦變成了貨幣貢賦，而貨幣貢賦又資本化了，贖免的辦法或者是用現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農民的部分土地割讓給莊園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現金，一部分割讓土地。1816—1819 年的高昂的糧價使農民不能儘快地贖免，因此這項法律一直是一紙空文。從 1819 年起，辦理贖免手續在勃蘭登堡進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亞進行得較慢，在波茲南和普魯士則進行得更慢。用這種辦法從農民身上剝奪來的錢——誠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權利（因為賦役是違背權利而強加給農民的）——沒有按照貴族的舊習慣立即揮霍掉，而主要用來建立釀酒企業。在上述其餘三省中，釀酒業的普及程度取決於農民繳的贖金有多少用於這項事業。可見，普魯士容克們的燒酒工業完全是靠從農民身上剝奪來的錢建立的。燒酒工業蓬勃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從 1825 年開始。過了兩年，到 1827 年，普魯士生產的燒酒為 12 500 萬夸脫，即平均每

① 德國的舊液量單位，平均等於 225 升。——編者注

人 10.5 夸脱，总值为 1 500 万塔勒；相反地，15 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 1 800 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淹没在普鲁士马铃薯的劣等烧酒的洪流之中。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sup>①</sup>（180 夸脱）的售价为 14 塔勒，就是说，一夸脱为 2 格罗申 4 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的錢，现在只要花 15 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业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斐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 9 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乌培河谷，那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种生产排挤着另一种生产，因此，一部分工人经常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糊口，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时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冷凝，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

---

<sup>①</sup> 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 150 升。——编者注



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馬鈴薯酿造的一切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醇油，即由高級醇（一种成分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氢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丙醇，異丁醇，而首先是戊醇）。所有这些醇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飲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宾茨教授經過多次試驗后证明，我国酒精飲料的发酵作用，正如人所共知的醉后不舒服或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現象等不良后果一样，与其說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說主要应当归咎于高級醇，即杂醇油。这些高級醇不仅有較大的发酵作用和有害作用，而且决定发酵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經驗，而是根据亲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燒酒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飲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飲料相比，新酿造的、未淨化过的馬鈴薯燒酒含的杂醇油最多，有害的成分最大。不言而喻，这种飲料如果飲得非常多，它对于貝尔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剛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異常大。发酵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过节，最后总是喜气洋洋的，只是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誠然这时也常常动起«Kneif»（刀子，英語是 knife），現在每逢过节，人們就纵酒狂飲，結果总是发生毆斗，鬧得非动刀子不可，因刀伤致死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現象归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論，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現象归咎于酒館里的狂飲。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濫的普魯士劣等燒酒，这种燒酒产生了自然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人驅入暗牢。

廉价燒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續了許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

漸緩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風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燒酒比起以往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階級的切身需要，而燒酒的质量虽然有所改进，仍然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貝尔格区一样。庸夫俗子們对工人中間日益发展的纵酒狂飲的現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沒有像 1825—1835 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問題：德国北部工人們在 1830 年事件期間也沒有激发起积极性，这种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燒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們。一些重大的、特別順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魯士燒酒危害的邦內。这并不是燒酒拯救普魯士邦的唯一事例。

唯一导致更带毀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个部門,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鴉片生产。

当时,燒酒生产急遽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澤地—摩尔根—摩尔根<sup>①</sup>地种起了馬鈴薯。这一生产部門不以造福祖国为滿足,还力图使旧普魯士的美好的劣等燒酒行銷国外。普通燒酒經過再一次加工,去掉其中一部分水分,人們把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含水的、未淨化的酒精叫做«Sprit»,这是从拉丁語 Spiritus 譯成的普魯士語。高級醇具有比乙醇更高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溫度計的 78.5°就沸騰,而伯丙醇的沸点相当于 97°,異丁醇的沸点相当于 109°,戊醇的沸点相当于 132°。所以应当說,即使經過細心的蒸餾,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要成分,以及部分異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餾时所去掉的,最多只

---

① 普魯士的旧面积单位,約等于 1/4 公頃。——譯者注

是戊醇和異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餾法把上述三种低級醇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分餾法才能脫去。加之农村燒酒企业中的蒸餾法相当簡陋。因此，毫不奇怪，四十年代初生产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易判断出来，因为純粹的或只含水份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些沒有进口稅擋路的国家；連施特廷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在汉堡和不来梅，絕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糖酒。这种燒酒在西印度有一部分是用含糖份最多的甘蔗酿造的，而絕大部分是用制糖时剩下的殘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飲料，是当时能与馬鈴薯燒酒相竞争的唯—酒類。为了制造“精美”而又廉价的糖酒，人們把大約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糖酒、三四桶廉价而粗劣的勃比斯糖酒和两三桶普魯士馬鈴薯酒精摻和在一起，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一般說来是能造出所需要的酒的。这种“毒藥”——我亲自听到过伪造这种糖酒的商人們把这种混合酒称为“毒藥”——經過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經過施特廷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糖酒喝掉，一部分則用走私的办法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糖酒。他們以其秉賦的天才立即发现普魯士馬鈴薯燒酒有着十分惊人的前途。他們竭尽全力試制其他各种飲料，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在非普魯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一些葡萄酒門徑的人，都不願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誰都知道，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鉛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

馬鈴薯酒精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飲料的基础。继糖酒之后又出现了白兰地，这种酒需要比較精細地加工。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特温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在許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是違犯刑法的，因而人們不敢問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是无限自由的貿易巢穴，“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風行。

然而伪造酒类的壟断权沒有持續多久。1848年革命以后，当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絕對統治被整个資產階級的短暫統治取代时，法国的工业家和商人开始懂得，普魯士馬鈴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異常神奇的力量。他們开始在本国伪造白兰地，而不再把真貨运往国外；尤其是人們用普魯士馬鈴薯酒精的烈性混合物改善了专供国内消費的白兰地（为了簡便起見，我把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費的唯一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結果到拿破侖王朝崩潰时，我們看到，在法国早先几乎沒有酗酒現象，由于普魯士陈燒酒的德行，現在这种現象大为流行了。

几年来葡萄的收成空前不好，1860年的通商条約又为法国打开向英国輸出葡萄酒的門戶，这对事业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来提高濃度。因此，人們将这种酒同普魯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习惯于喝濃葡萄酒，現在大量出口的純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人說来太淡而无味了。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比普魯士酒精更好的

一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濃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該地变成“精美的波尔多酒”），同时也成为利用普魯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紅葡萄酒的消費（任何一个資产者都不願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达到十分巨大的規模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葡萄酒資源都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利伏諾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掺有普魯士酒精而能够經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輸出又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現在对于他們已經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現在他們不喝葡萄酒而喝燒酒，这种燒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魯士馬鈴薯酒精。然而，馮·卡尔多尔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說，在意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滿意。

無論到哪里，我們都可以看到普魯士酒精。普魯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們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伪造。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創伤<sup>29</sup>一样，普魯士酒精使工人階級失去了葡萄酒而得到伪造的燒酒！馬鈴薯酒精之于普魯士，一如铁和棉織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場上是代表普魯士的商品。因此，社会主义最时髦的信徒以及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贊揚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自然联系”，并郑重其事地宣称：

“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說对它可能估計过高，不如說可能估計不足！”<sup>30</sup>

不言而喻，anch' io son' pittore（正如科累卓說的，我也是写生画家<sup>31</sup>），普魯士語的意思就是：“我也是酿酒者。”

然而，普魯士馬鈴薯燒酒的奇妙功績还远不止于此。

馮·卡尔多尔夫先生說：“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約有居民1 000人，現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 000人。”

一般說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所說的每平方英里有居民1 000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大概有过这样的時候。但是，如果不算薩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业部門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茲南（尽管政府百般努力，波茲南的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末我国有三个省，即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魯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为2 415平方英里。1817年总人口为3 479 825人，即每平方英里1 441人；1871年总人口为7 432 407人，即每平方英里3 078人。我們完全同意馮·卡尔多尔夫先生的說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結果或間接結果。如果我們这里也算上阿耳特馬尔克、經營农业的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屬波茲南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同样增加了），那末我們面前呈現的是真正的燒酒区，同时也是普魯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現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前，酿酒业是以現代普魯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現的。沒有酿酒业，普魯士的容克們就会灭亡；他們的一部分領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貴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級的基础。沒有酿酒业，普魯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里只有2 000人的地区，在资产階級工业发展到

足以在这方面取得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馬鈴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經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魯士，竟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燒酒厂的地步。在現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能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地主阶级，他們的小儿子們成为选拔軍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們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們来补充軍隊中大量“基干团队”。从馮·德·哥尔茨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动群众的状况，他們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大都完全遭受地主的年契、实物租、住宅条件以及領地上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頒布后，这种权力只是改变了形式<sup>32</sup>）的奴役。简单說来，普魯士能够逐渐消化 1815 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領土，在 1848 年镇压柏林革命，在 1849 年尽管爆发了萊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 1866 年对奥地利作战，在 1871 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魯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

## 二

我們回过头来談一談帝国国会。参加討論的主要有馮·卡尔多尔夫先生、馮·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代表克吕格尔。这次討論使人觉得，我們对普魯士馬鈴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十分不公正的。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魯士酒精，而在于俄国酒精。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抱怨說，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燒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明确強調指出的，这种燒酒不是用馬鈴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普魯士酒精的声誉受到損害”。人們向德尔布吕克先生指出，“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現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燒酒那样，用俄国燒酒制造出沒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对此預先說明：“先生們，当然，这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魯士馬鈴薯酒精，而在于俄国粮食酒精。普魯士馬鈴薯酒精“沒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精又无法做得沒有气味，可見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魯士酒精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魯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損害。由此看来，我們是以欺騙手法和对帝国明显的敌意来誹謗普魯士的“不含杂醇油的”酒精。讓我們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燒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燒酒脫去杂醇油。因此，近来出卖的酒精一般說来含的杂醇油較少。但是，我們这里談到的两种酒精之間的差別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毫不費力地**完全**



脫去杂醇油，用馬鈴薯酿造的酒精要脫去杂醇油則困难得多，而在大規模生产中实际上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馬鈴薯燒酒做的最純淨的酒精塗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馬鈴薯酒精。

“科倫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燒酒的討論，几天以后，又在新聞栏里（2月8日第一版）引述了萊茵区一位爱喝酒的人的一段很刺耳的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精美的葡萄酒里面也掺有的馬鈴薯酒精。誠然，酒后令人討厭的头痛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經太晚了。馬鈴薯酒精含有杂醇油，它那种难聞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流行的一种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魯士的酿酒者，克呂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場上比普魯士馬鈴薯酒精貴4个馬克。2月7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100升为35馬克；因此，俄国酒精的价格比似乎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魯士酒精貴12%！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請再看一看这种被誹謗的、“沒有气味的”、唯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貴的普魯士酒精，这种在批发貿易中每升只值35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吧！如果把討論和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里把誰当成傻瓜呢？

普魯士杂醇油的良好影响是包罗甚广的，因为它同馬鈴薯酒精一起掺入各种飲料。从摩塞尔和萊茵区的味酸而淡的劣等葡萄酒（这种酒加上馬鈴薯糖和馬鈴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別

尔葡萄酒和尼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萊斯頓通商条約簽訂以來充斥英國并在那里被稱為“格萊斯頓”的劣等紅葡萄酒,到印度、中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資產階級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檳酒、波爾特溫酒和馬德腊酒,沒有一種飲料不摻有普魯士的雜醇油。凡是栽種葡萄以及倉庫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這些飲料的生產就日益繁榮,那里的生產者就對馬鈴薯酒精高唱贊歌。可是消費者呢?消費者根據“令人討厭的頭痛”知道普魯士劣等燒酒的功德何在,并竭力避免領教。正如馮·卡爾多爾夫所說的,在意大利,通商条約是這樣實施的:對普魯士酒精課以過高的關稅。由於關稅高,就不可能向比利時、美國、英國輸出酒精了。在法國,海關官員在酒精桶上貼上紅色簽條,以表明這是普魯士出品的,——法國海關官員確實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眾的事情!一句話,事態的發展竟使馮·卡爾多爾夫先生絕望地大聲疾呼:

“先生們,如果你們想像一下德國酒精工業的狀況,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各國都在戰戰兢兢地規避我國的酒精!”

當然羅!全世界都已逐漸知道這種酒精的良好影響,而擺脫“令人討厭的頭痛”的唯一辦法就是根本不让這種劣等燒酒進口。

此外,來自東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陰霾正在侵襲受到排擠的燒酒容克們。在俄國的偉大盟友,即維護一切舊制度反對現時的破壞要求的最后堡壘和最后屏障,現在也開始生產和出口燒酒,恰恰是糧食燒酒,而且他們的售價同普魯士容克們的馬鈴薯燒酒一樣便宜。這種俄國燒酒的生產和出口逐年在增加,如果說在此以前,俄國燒酒在漢堡被釀成酒精,那末現在,正如德爾布呂克先生告訴我們的,“在俄國的許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設幾個裝備有最優等的機器、對俄國燒酒進行加工的企业”,于是他向容克先生

們提出警告：俄国的竞争将一年比一年厉害。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馮·卡尔多尔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的議員，本应更正确地确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場。亚尔薩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以及 50 亿空前浩大的軍事賠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敌人的必然同盟者，加以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人家尊重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害怕自己，而不是爱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二者取其一：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潰，或者是……充当俄国外交的忠順奴僕，保证与俄国結成同盟（既然可以指望它）。由于不能下决心采取前一种做法，結果势必采取后一种做法。普魯士，随之还有整个帝国，又像 1815 年和 1850 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圣同盟正像 1815 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飾物。这些荣耀体面的胜利的結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馬車上的第五个輪子。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更多地注意国外（那里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发生的事件，而更少地注意帝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輕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是无足輕重的）里的演說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沒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馮·卡尔多尔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飲酒，而且連做酒都使他神志不清了。要知道，連那些比馮·卡尔多尔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开始作出在他們自己看来也根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釋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燒酒容克們万分恐惧。在俄罗斯中部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可以像普魯士得到馬鈴薯一样廉价地得到粮食。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

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貴族也像普魯士容克們一样，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农民贖免徭役的錢投資于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場，既然粮食燒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馬鈴薯燒酒优越，这些酿酒企业已經迅速普及起来，目前就可以預見到，总有一天这些企业的产品会从市場上把普魯士馬鈴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資本主义生产，它的規律对容克們來說，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情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同盟崩潰的日子，光荣的普魯士燒酒工业从世界市場上消失的日子，以及在最好的情况下劣等燒酒充斥国内市場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魯士容克們失去燒酒盃，只剩下世系紋章盃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下軍盃的时候，普魯士的末日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談，撇开新战争或变革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談，单是俄国燒酒竞争就必然使普魯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維持在目前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每平方英里有 3 000 个农奴的容克們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魯士国家的基础——招募軍官、軍士和絕對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現时的普魯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魯士的軍国主义制度也将崩潰，而沒有軍国主义制度，普魯士就等于零。那时，东部各省由于人口稀少，由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半封建状态以及城市文化和普及教育不发达，在德国将占其应有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紀式国家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由于它們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水平較高，也将占其

应有的地位。而东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較少依賴农业和較少容許封建生产方式的其他工业部門,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軍隊不交給普魯士邦,而交給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魯士的杂醇毒一劳永逸地最終消灭。而普魯士容克們和“最終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魯士邦只好用一位詩人的詩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  
生活中必然毁灭<sup>①</sup>。

---

---

<sup>①</sup> 席勒“希腊之神”。——編者注



弗·恩格斯  
—  
威廉·沃尔弗<sup>33</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6—11 月

载于 1876 年 7 月 1、8、22 和 29 日，9 月 30 日，10 月 7、14、21 和 28 日，11 月 4 和 25 日“新世界”杂志第 27、28、30、31、40、41、42、43、44、45 和 47 各期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6 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校对过





---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大約是 1846 年 4 月底的事情。當時馬克思和我住在布魯塞爾的一個郊區，我們正好一起在寫一本書<sup>34</sup>，有人告訴我們說，一位德國來的先生想同我們談話。我們看到了一個身材矮小、但很健壯的人；他的面容說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堅定；一付德國東部農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國東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於違反出版法而被追緝，幸而沒有關進普魯士的監獄。第一眼看到他，我們並沒有料想到，這個外表並不出眾的人，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人物。沒過幾天，我們就同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誠摯的友誼，而且我們相信，我們交結的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學校里受到良好培養的才智，他那豐富的幽默，他對艱深理論問題的清楚理解，他對人民群眾的一切壓迫者的強烈憎恨，他那剛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現了出來。但是，只有在鬥爭中，在勝利和失敗的時候，在順利和不利的時刻，經過多年的共同活動和友好交往，我們才能充分認識到他那堅韌不拔的性格，他那無可懷疑的絕對忠誠，他那對敵、對友、對己都同樣嚴格的、始終如一的責任感。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誕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襲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馬”(即小飯店，波兰語叫做科尔奇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魯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別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圍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剝削和虐待农民的憤恨。这种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蕩，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們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克服多少障碍啊！經濟上的困难就不用說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沒有他們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襲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廢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稅、徭役、領主裁判所和領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襲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繼續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們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願讓他們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謀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費。在大

学的时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語文課，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讀死书的語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羅馬的偉大詩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們的作品成了他終生喜爱的讀物。

当联邦議会<sup>35</sup>和奥地利、普魯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經沉寂下去的对蠱惑者<sup>36</sup>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監獄被提到另一个監獄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談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別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見了难友們，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讀到罗伊特的“獄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sup>37</sup>給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現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蠱惑者無論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順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經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經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終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魯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絕納稅，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別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蠱惑者們一起經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問室的是所謂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殘廢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燒酒或者几文酒錢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終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維持生活。可是他作这

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穌呀，請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給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閃电一般傳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誠的人”<sup>①</sup> 恼怒異常。书报檢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沒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訴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魯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連忠順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順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 年底或 1846 年初，給沃尔弗加上了違反出版法的罪名，但違法的情节十分輕微，所以現在我們誰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sup>38</sup>。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魯士的監獄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險而前往梅克倫堡<sup>②</sup>。他在梅克倫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順利前往倫敦为止。在倫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沒住多久，很快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到了布魯塞尔。

① 即虔誠主义者。——編者注

② 根据維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第 2 册第 141 頁）<sup>39</sup>，沃尔弗于 1846 年因“違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監禁三个月。（恩格斯在 1886 年版上加的注）

## 二

在布魯塞爾，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訊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訊社是在情况許可的範圍內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編輯后供給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魯塞爾报”<sup>40</sup>由我們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給这个报写稿。在我們当时創办的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协会<sup>41</sup>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評論。这些評論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統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別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評論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題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評論，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魯塞爾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們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廣場上。廣場四周的許多啤酒店和燒酒店挤滿了人。人們高喊：«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馬賽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靜，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預备兵和休假人員。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願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奧波特国王說，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

望領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傳开，使人們安靜了下来，連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剛一調集起来，大部分軍隊剛一集結在布魯塞尔周圍(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傳說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廣場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靜靜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毆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沒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議会和柏林議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爭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們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無論是在科倫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們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說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別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沒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倫出版，馬克思任主編。不久，沃尔弗也来科倫担任編輯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懇态度，他那一貫的过分认真的負責态度对他頗为不利，因为編輯部里尽是些年輕人，他們往往因此多給自己騰出个把钟头的空閑時間，相信“魯普斯<sup>①</sup>一定会設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沒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論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聞”的时事紀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繪了統治者

① 魯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語——lupus)。——編者注

和被統治者的那種閉塞、不開化的狹隘和庸俗。同時，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協會<sup>42</sup>去做時事評論，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愛戴和最有影響的演講人之一。

資產階級在巴黎六月戰鬥之後愈來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維也納、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宮廷權奸同高貴的帝國攝政王<sup>①</sup>狼狽為奸，幕後則是俄國外交在拉綫，指揮這班傀儡們跳動。于是在1848年9月，這些老爺們行動的時刻到了。在俄國直接和間接的壓力下（這些壓力得到了帕麥斯頓勳爵的關懷），第一次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進軍的結果是在馬爾摩簽訂了一個可耻的停戰協定<sup>43</sup>。而法蘭克福議會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這個協定，從而公開地、毫不含糊地背棄了革命。9月18日的法蘭克福起義就是對這一點的回答；這次起義被鎮壓下去了。幾乎在同一時間，柏林發生了制憲協商議會<sup>44</sup>同國王之間的衝突。8月9日，這個會議在極其溫和的、甚至是怯懦的決議中，請求政府採取某種措施，使反动軍官的無耻行為不再表現得那樣公開和蠻橫。9月，制憲協商議會要求執行這個決議，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個將軍為首的公開反動的普富爾內閣（9月19日），而臭名遠揚的弗蘭格爾則被任命為勃蘭登堡軍隊總司令。這是兩個極明顯的暗示：柏林的協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眾普遍憤激起來。科倫也舉行了群眾集會，並派定了安全委員會。政府決定在科倫進行第一次打擊。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許多民主黨人被捕，其中有現任科倫市長，即當時人人皆知的“紅色貝克爾”。群情更加激憤。下午又在原來的集市廣場上舉行群眾大

---

① 約翰大公。——編者注



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圍站着市民自卫团，他們并不敌視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时說，他們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們冲进市場，喊着：“普魯士人来了！”当时約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說，他喊道：“公民們，难道你們見了普魯士人就四散逃跑嗎？”人們回答說：“不！不！”——“那我們就必須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倫街垒事件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場虛惊引起的，沒有遇到抵抗，沒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謹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沒有流血，什么也沒有发生就結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倫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萊茵报”停刊，編輯們被迫出境。

### 三

科倫的戒严沒有繼續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萊茵報”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沒有人来打扰他。同編輯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謀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緝。可是我們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街17号的編輯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編輯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別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別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誰也沒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緝，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說，一切危險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偵查員，偵查員也說，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經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議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費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魯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爭議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魯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棄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

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議會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賦役以来，已經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議會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贖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規定无偿廢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憤懣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沒有最后通过之前，議會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費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魯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須影响他們，向他們說明他們的处境。而沃尔弗則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來說，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沒有誰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細节，特別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sup>①</sup>。

① 在1886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頂峰，下面我还要来談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應該由資產階級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階級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資產階級沒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資產階級处处都不去保卫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階級已經在他們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願，尤其是他們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資產階級，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資產階級。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資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們的财产、他們的安全、他們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資产者为了使得他們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資本，而牺牲了他們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資產階級这个階級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階級——无产階級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現代資產階級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綫胜利的德国資產階級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資產階級放棄戰場的地方，无产階級的政党就要担負起斗争的責

沃尔弗在1848年12月19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評論上述內閣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月29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欽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調节法令”。

沃尔弗說,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貴族、伯爵、男爵等老爷們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搶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3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們的乐土。1821年頒布的徭役贖免法,把封建容克們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贖免的規定和实行,無論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們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8000万的現金、耕地和地租。而贖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1848年革命的憤恨。农民拒絕繼續像馴服的牛馬一样給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絕繼續支付这种不堪忍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稅。因此,地主的錢柜变得可怕地空虛”。

柏林議會担负起了調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險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們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汗来填滿自己的腰包。什么議會不議會,去它的吧!我們觉得怎样有利,就怎样修改法律!——結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現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滿陷坑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3月以前的状

---

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萊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滿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們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結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5月19日,‘新萊茵报’……被封閉了。”这句话(見本卷第99頁)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結束語以外,見本卷第78頁),在1886年版中被删去。——編者注

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嗎? 老爷們需要的是錢。冬天快到了,他們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賭博等等。娱乐用的錢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們想至少再組織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們帶着一种挑衅的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貴族們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飲,可能很快就被可怕的加里西亚場面<sup>45</sup>所打断。”

1月20日刊登了沃尔弗针对同一目的而写的一篇文章。反动派强迫在科尔貝克附近的涅辛的一个村长克倫格耳同一些短工一起联名詢問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給无地的人**。

沃尔弗說:“涅辛的短工們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連觉也睡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嗎? 我們这些短工耕种我們老爷的土地那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5个銀格罗申,而現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嗎? 我們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領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他們难道还要給我們几摩尔根的土地嗎? 不,我們的短工們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們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誰使他們遭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們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們还远得很,仍然为老爷所有,他們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①（利希诺夫斯基）②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掠夺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③，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

① 绰号“施纳普汉斯基”〔«Schnapphanski»〕是来自«Schnapphahn»一词，即“强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

②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③ 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发愁的”。——编者注

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 1810 年 10 月 27 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 38 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 25 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贖取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 18 倍到 20 倍（根据不同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錢，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 1848 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茨南和波美拉尼亚约高 4 倍，比勃兰登堡高 3 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計算，萊茵省現在要繳納的土地稅比按平均計算它所應該繳納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議會提出的法案，萊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罰，再要繳納1800—2200万塔勒的現金，裝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銀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貴族容克老爷們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們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的……”

萊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萊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應該同时想一想：他們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錢来付給容克。現在要拿出1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貴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魯士的貴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魯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給以更有力的回击。“新萊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于是沃尔弗从1849年3月22日起发表了一組文章，題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文中計算了，自从开始贖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貴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現款、財物和地产。“新萊茵报”刊登过許多令人激憤的文章，而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間所发表的8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訂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們要求买个別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沒有萊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貴的地方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編輯部自然是最不会有異議的。



## 五

在1849年3月22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議院刚一組成（1849年2月26日根据欽定的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調整即贖免封建賦役的草案。高貴的老爺們忙了起来。他們想在會議閉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詐一番，以便儲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們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們在柏林三月‘誤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時間，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們現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們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貴族和工业貴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別應該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騎士的榮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繼續閃爍光芒。

去年12月欽定的暫行贖免法頒布之后，我們就立即指出<sup>①</sup>，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爺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謂小百姓，則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給有权勢的人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貴的騎士們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滿意。他們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騎士們的腰包更为愜意的法令。

1848年3、4月間，西里西亚的許多地位显赫的老爺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棄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賦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毀，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楊树的特殊裝飾品，于是他們大笔一揮就放棄了他們的所謂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紙上是随便怎么写都可

---

<sup>①</sup> 見“新世界”第30期〔本卷第74頁。——編者注〕。

以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儈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們便把放棄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們提交給刑事法庭，在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协商議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們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廢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時間白白浪費在調查那些美妙的封建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議会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廢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議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賞賜了一个新的贖免法，但是連这个反动透頂的法令也沒有使老爷們滿意，他們現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騎士老爷們却不問問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資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給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的人’，他們至今一直是大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馬；而且按照后者的計劃，他們今后也还應該是牛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1848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廢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滿意的……經過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經驗之后，这些所謂‘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經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貴族領地的老爷們不應該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贖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財富，而按道理，應該至少交出他們利用先前的贖免法大量掠奪去的那部分財富……現在在农村，人們正在考虑这样一个問題：近三十年来，强盜騎士老爷們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錢究竟有多少。”

計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簡單，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

10 亿法郎即約 3 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道，他們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魯士，剝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錢。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統計，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現金和地租付給老爷們作为贖金的錢，在 8 000 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賦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 16 000 万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約 24 000 万塔勒。

直到現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 24 000 万，‘我們的 24 000 万我們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西亚农民头脑里經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經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愈来愈多的人認識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談到对封建賦役的补偿，那末，农民遭到騎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开花結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欽賜詭計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們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錢攬为已有的，这在 1849 年 3 月 25 日报上刊載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說明。

“这些强盜騎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紀的每一頁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紀騎士的劍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鵝毛笔杆就結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們的‘权利’，即所謂‘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騙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紀的例子來說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貴族的要求組織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規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貴族和他們的代理人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貴族的利益。然

---

而地位显赫的老爷們远远沒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謂‘認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騙…… 在这些字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願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們在对他們和他們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騎士老爷們在最近三十年間，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級的血汗里榨取来的24 000万塔勒的巨款装进了自己祖傳的錢柜。”

## 六

沃尔弗从貴族对农民的直接剝削轉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間接剝削。在間接剝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稅**，在 1849 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 1749 年确定的土地清册征稅。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貴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縮小了，而农民的則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定为 1 塔勒，土地稅則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場是免稅的。从那时起，貴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的荒地。而稅款却仍旧根据 1749 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繳納！因此，在双方稅額不变的情况下，沒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民就負擔了极其沉重的稅款，vulgo〔簡單地說〕，就是受騙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騎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領地的那一部分騎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襲陪臣貴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繳分文的土地稅。

据我們計算，近三十年来，騎士老爷們单是土地稅一項，少繳或根本沒有繳納的，就約有 4 000 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計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搶去的那 24 000 万，总共就是 28 000 万。”（1849 年 3 月 25 日“新萊茵报”）

接着談到等級稅。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 8 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繳納大量的貢賦，每年

要給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繳納 7 銀格罗申 8 分尼的等級稅，全年总計为 3 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闊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鋅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sup>46</sup>、亲俄派、疯狂地仇視民主派的第二議院議員倫納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 24 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繳納最高等級稅 144 塔勒。同拥有 8 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應該繳納 7 000 塔勒的等級稅，20 年就應該繳納 14 万塔勒。这就是說，这 20 年他少繳了 137 120 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倫納德伯爵繳納的等級稅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园丁所繳納的稅款作了比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錢为 10 塔勒，納稅 0.5 塔勒，即他的純收入的 5%，这个女僕每年工錢为 6 塔勒，也要繳納 0.5 塔勒，即她的純收入的  $8\frac{1}{3}\%$ ，作为等級稅。因此，这二十年里，高貴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繳了 237 210 塔勒的等級稅，而同女雇农相比，至少繳了 397 120 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一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應該只限于〈請与 1848 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讀、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許乡下人学算术四則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減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賜福的强盜騎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圍減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現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們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貴族在減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紀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災和其他災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領主老爷馬上就在那里出現，把災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領地。可是，土地稅、房屋稅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們这些老爷們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稅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

或八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負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稅和賦役。你們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們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們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領地尽量扩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減輕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的賦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沒有受到絲毫損失似的……我們也要用你們量我們的尺子来量你們——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們的。

你們由于瘋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黃蜂窩。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黃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損害<sup>①</sup>会很容易地落到你們头上！”（3月27日“新萊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描述了封建賦役的贖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們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員和登記員都归这些委员会管轄。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贖免封建賦役的申請书剛一到达，这些官員就立即在乡村出現，而老爷們馬上就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們和对他們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騎士老爷們在用香檳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檳酒的，所以，領主們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的。”

是的，間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員，但是非常罕見，而且这对农民也沒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說，領地占有者或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員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沒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員和領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間，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騎士們則可以称心如意了。

---

① 俏皮話：«Entschädigung»——“补偿”；«Beschädigung»——“損害”。——編者注

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地窃去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計算除了用厚顏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沒有别的詞可以說明。农民可以提出抗議，可以捶胸頓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錢包的情况如何，別人是根本不考虑的：国庫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稅，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員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闊綽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員的穷小子，利用强盜騎士們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貴族領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決定权操纵在貴族手里，就不用多說了。否則，騎士老爷們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魯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賬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賦役贖免，究竟使他們花了多少錢。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記，当时他們是怎样“破費”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約137塔勒，作为契約費；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不下29塔勒的費用……給强盜騎士們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調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赫的高貴的老爺們的餐桌上来。味道可真不錯！——西里西亚的强盜騎士們一面这样說，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鬍鬚，嘴里嘖嘖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慣常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現在讀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的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謂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老爺們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騙。俄国的贖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論述中，被描繪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賜，是俄国历史上最偉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顏婢膝的历史也把旧普魯士对农民的敲詐勒索描繪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件，連原来作为这一切贖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居次要地位！

## 七

西里西亚貴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4月5日的“新萊茵报”上叙述了：普魯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給强盜騎士們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約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繳納通常都很高的稅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主不准別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給他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棧老板、小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們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繼續征收原来的捐稅，借口說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关；而法院也偏袒貴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們自己也逐漸办起水力磨坊和風力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們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繼續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納稅，他們借口說，这收的是地租，或者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細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費。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沒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須向庄园主繳納40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

了。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額中获得 10% 的过戶稅 [Laudemien]！——風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須向庄园主繳納 53 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們不得不繳納或贖免先前的專營稅，尽管不仅專營本身已經取消，而且就是这个征稅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們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稅仍然是通过贖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繼續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貴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有房无地的放牧者 [Auenhäusler] 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剝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們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階級，他們沒有为老爷服务，既沒有一所小屋子也沒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 [Inlieger]、住戶 [Zuhauseinwohner] 的階級，一句話，就是孤身无家的人 [Inwohner] 的階級，他們一年支付 4—8 塔勒向农民、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間多半是狗窩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 [Auszügler]，即把田产轉交給親屬或者出賣給別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 [«Ausgedinge»]，或者一点不留、隱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而大多数是貧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織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們呢？領主审判权應該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現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廢除，这种制度給予庄园主以审訊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應該負擔其生活費和偵訊費。

而这个老爷則得到領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稅。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則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費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些被捕者沒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們花去的費用，每年向这个階級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轄費”。

沃尔弗說道（4月12日“新萊茵报”）：“在老爷們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滿意了，另一些人征收1.5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則蛮橫无礼到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階級一年付2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錢在首都和休养地大吃大喝，嫖賭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現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6、10、12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須无偿地为老爷做滿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現錢！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衫，最后的一張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沒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沒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他們自己傳統的温和态度，不願意行使这种所謂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腰包。例如，一个貧穷的織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剝削，另一方面，每天賺3—4銀格罗申的工資，除去向国家繳納 $\frac{1}{2}$ 塔勒的等級稅，除去繳納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費以外，还得向老爷繳納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錢真該叫做血汗錢。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貧困、穷苦和殘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帶着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屬的那个房客階級早就把相当于監獄費一百倍的錢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房客繳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 $1\frac{1}{3}$ 塔勒計算）而**沒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繳了40塔勒的現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內。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貴族領地占有者的信用組織）借的1000多塔勒資本的利息。

这些强盜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財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

多。記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盜騎士，拥有 3 块領地，每年向住在他的 3 个村里的房客榨取 240 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錢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 6 000 塔勒資本〈以他的領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許会想，騎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經从他們的由于預收而装得滿滿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訴訟費嗎？这种天真的想法簡直是在污辱騎士的投机行为。我們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許多情况，当时騎士的蛮橫达到这种程度，他們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自己鍾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訴訟費和監獄費，有时付  $\frac{1}{3}$ ，有时  $\frac{1}{2}$ ，而在某些村里甚至达  $\frac{2}{3}$ 。”

##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廢除了；容克老爷們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損失”的办法来贖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賤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鍾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驅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驅兽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調查就完了。除此以外，我們知道这个光輝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許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貴的騎士为了获得真正騎士的快乐，把霰彈打进某个驅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騎士老爷們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們始終記得有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見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經收过的耕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盜騎士們的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飾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迹……然而，鍾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規模打猎时履行驅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驅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規模的打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餓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騎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騎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訓猎狗和驅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驅兽者……有一些騎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僕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窩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我們自己在童年时，曾亲眼見過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輕的强盜騎士最殘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殘廢了，可是这件事誰也沒有哨声。他們都

是些穷人，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訴訟，是需要錢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这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騎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踐踏和毀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們毫不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們带了自己的猎手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馳。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以輕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經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賜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但是所有这种禍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培育的貴重野兽和非貴重野兽……給他們带来的危害比較起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野猪、鹿和駝鹿常常在一夜之間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吃、靠它繳納各种捐稅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錯，受害者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經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經驗对旧普魯士的官僚、法官和訴訟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訴訟案的結果……在經過了无穷尽的函件和傳訊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貴族官司打輸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計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騙……三十年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駝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1 000个以上。我們知道有許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复一年地使它們遭受的損失就达200—300塔勒。”

既然現在貴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損失，上帝賜福的駝鹿、鹿、野猪以及騎士老爷自己30年来使我們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毀坏，必須全部賠償；說一个整数，这就是：至少賠償2 000万塔勒！”

这組文章的結尾(載1849年4月25日“新萊茵报”)是一篇談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

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傳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傳。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沒有歉收，沒有遭水淹，也沒有发生类似的災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庫（国家）和死手<sup>①</sup>手里。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稅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稅收都最不可思議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繳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想自願地繳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資本和信貸的缺少、强盜騎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稅和賦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貸者的魔掌，在他的桎梏下无力地掙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盜騎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內，农民把燒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須給老爷以应有的贊揚：他們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給农民……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紳显貴們的富丽堂皇的宮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財富不可思議地迅速的积累，‘老爷們’每年的巨額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日益貧困。

农村工人的工資极其低微：男人5—6銀格罗申、妇女2.5—3銀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資了。貧困逼得許多人不得不为4个、2个甚至更少的銀格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馬鈴薯和燒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餓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馬鈴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貴，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資不仅沒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們都去吃他們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湯喝，吃兽尸。他們愈来愈沒有气力。燒酒貴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謂‘小酒館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

<sup>①</sup> 即僧侶。——編者注



們为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繳納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燒酒的度数，小酒館老板从前就已經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燒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砒油**在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傳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馬鈴薯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湯、被生樹根弄得很弱，已經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骯髒而有害健康的住房，冬天的寒冷，不是沒有工做、就是沒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設想，这些挨餓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傳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們再也沒有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說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盜騎士不断地剝削他們，榨取了他們的全部脂膏，以致他們的貧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 强盜騎士、官僚階級和上帝賜福的普魯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獎賞，而下面受飢餓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們的主要食物也是馬鈴薯和燒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繳納賦稅，他們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東西…… 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餓、挨打，而一面看到和忍受强盜騎士的奢侈和驕橫、官僚階級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民过去和現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僕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須服劳役的农村臣民和所謂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騎士福音的全部……

强盜騎士为所欲为。任命他們中間的人当县长；他們执行領地的和地区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們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許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魯士的官吏及其普魯士的語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剝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鐐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終必然会达到他們現在已經达到的境地。餓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誰还有能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盜騎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們成群地从这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們看到的，是那些既沒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沒有力气和能力去請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訪

他們的爛草鋪的床。這就是百年来上帝賜福的君主政体同強盜騎士和官僚一起進行的活動的結果。”

和先前一樣，沃尔弗要求騎士對農民賠償，要求無償地廢除一切徭役和貨幣租稅，最後要求分上西里西亞豪紳顯貴們的大地產。只要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政府還存在，這當然辦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亞的居民也將和過去一樣，大批地死于飢餓和斑疹傷寒”，而這也的確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亞的工業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巨大高漲才使得這個地區的一切生活條件發生了變革，才愈來愈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現代資產階級剝削代替了粗暴的封建剝削。

## 九

我們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行了贖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1848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贖免的速度的。我們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贖免的地方。1849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1848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贖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

位的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僕規約规定的。这个規約对封建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僕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僕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僕总規約”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不下于奴僕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封建赋役贖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去一样地受騙?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

产生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問題，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來說，比刊登無論多少談論未来社会組織的詳細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結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問題。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傳來說，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語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經很习惯于用德語，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說波兰話。

現在再来談我們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萊茵报”在用紅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閉了。除了还没有結束的23件关于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魯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編輯，以致他們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倫和普魯士。我們大多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軍隊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議会在帝国宪法問題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頓、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繼續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張布勒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們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sup>47</sup>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滕策尔弄进議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魯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魯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議會由于自己的迟鈍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为最强有力的議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軟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軟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連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結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間。只要議會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領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議會通过一个決議，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軍隊来法兰克福保护議會，那就行了。議會通过这样的決議，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軍隊参加运动，維尔騰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魯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順利地进行活动的軍隊調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結果就不会像1849年6月13日那样，是激进派市僧不战而敗。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軍隊来进行保卫的建議，是我們大家<sup>①</sup>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軍隊甚至不經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議是馬克思和我<sup>②</sup>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論是巴登的領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議員，都是既沒有勇气和毅力，也沒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

① “我們大家”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編者注

② “馬克思和我”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編者注

## 十

議會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說話，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說得不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說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烏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蒼白无力、沒有生气和軟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議會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5月26日提交討論的两个草案，使我們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議員先生們讲出自己的意見。这次发言的速記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們！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讀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軟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剛才还宣讀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順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談。(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連布斯先生也不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說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們，如果你們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話，那末，你們不應該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們講話；你們應該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謂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魯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諾威人。(騷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統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們，在这个議會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們應該對他們說：和你們一样，我們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順便你們应当說清楚，对你們來說，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組織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話，那就應該发表这样的宣言：

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東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870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账单<sup>48</sup>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sup>①</sup>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

① 俏皮话：《verlegnen》——“惊慌失措的”，《verlognen》——“虚假的”。——编者注



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擋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髒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維護这些話，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沒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們！这就是一些垃圾和髒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純洁的东西扔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談烏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内容太軟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憤怒，自己的“髒物”和自己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萊茵报”始終对福格特式的虛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虛伪的伙伴不能繼續耍这种虛伪的把戏。福格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們——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純洁的东西”。遺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馬林根的代表維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絕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說要揍他。虽然論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簡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沒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饒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爭吵以后沒有几天，議會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話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图加特去了。

## 十一

我們快要結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維尔騰堡軍隊解散國民議會的時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环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1851年6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1853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37英镑（750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年6月21日，我不得不在极度 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时就同沃尔弗結識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課，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sup>49</sup>。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們的愛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結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經十分滿意；学生們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藹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愛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絲毫也沒有放棄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們发生冲突，并且結果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們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們的嘴，日常的报刊絕口不提我們，出版者对于我們偶尔提出的請求連賜予拒絕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終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許多年內，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們几乎天天見面，我在那里又經常有机会贊賞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認真負責——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給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題。他把答数同所謂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說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題重算了許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錯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檢查习题解答中是

否还有这样的錯誤：“这种情况我不應該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負責，他还没有活到 55 岁就去世了。1864 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不願意。不管怎样請求，要他把課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他已經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絕對不能工作时，他才間或缺課。但是已經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害，失眠愈来愈經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 1864 年 5 月 9 日去世了。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

---

弗·恩格斯  
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亲爱的比尼亚米：

您的駐柏林通訊員大概已将德国选举的一切詳細情况告訴您了。我們的胜利使德国和外国的资产階級胆战心惊：在倫敦这里，所有的报刊都在議論这件事。这里值得极大注意的，并不是我們爭取到的新选区的数量，虽然值得指出，威廉皇帝、薩克森国王<sup>①</sup>和最小的德国邦君（罗伊斯公爵）都居住在由工人社会党人当代表的选区内，因而代表他們本人的也就是社会党人了。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我們取得多数的选区之外，我們虽是少数，但無論在大城市和乡村也都得到了数量极多的选票。在柏林得了 31 500 票，在汉堡、巴門—愛北斐特、紐倫堡、德勒斯頓各得 11 000 票；在乡村，不仅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薩克森、不倫瑞克，甚至在封建主义的堡垒——梅克倫堡，居于很少数的农业工人也投我們的票。1874 年 1 月 10 日我們得了 35 万票，而在 1877 年 1 月 10 日，得了至少 60 万票。选举的結果可以作为我們計算我們的力量工具；根据营的数目，您現在就可以判断，德国社会主义大軍有多少

---

① 阿尔伯特。——編者注

个軍在选举的日子受到了檢閱。这一点無論对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的社会党，或者对尙未卷入运动的工人，以及对我們的敌人，都有巨大的道义影响。极妙的是，人們每三年一次要在投票上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过。主張放棄选举的先生們是可以随便怎么說的，然而像1月10日选举这样一个事实，要比这些先生們的一切“革命”詞句更有价值。我談到**营和軍**，并不是比喻的說法。投票拥护我們的那些25岁的男人(这是最低的年齡)中至少有一半，也許还要多，都曾在軍隊中服役过两年或三年，他們会很好地使用針发枪和綫膛炮。現在編入了預备役。只要再有几年繼續获得这样的成就，那末無論是預备役兵或是**后备軍**<sup>50</sup>(占战时全部軍隊的 $\frac{3}{4}$ )都将会投票拥护我們，这样我們就能瓦解全部軍事机构，并使任何进攻战都不可能发生。

有人会說，那末为什么你們不使用这些力量現在就来进行革命呢？因为，我們取得的不过是60万票对550万票，并且这些选票又分散在各个区域，我們显然会被打敗的，举行考虑欠周的起义，采取輕率的行动，我們自己就会把运动葬送掉，而这个运动只要繼續不长的時間就可以使我們得到有把握的胜利。显然，我們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魯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部軍隊，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鎮压愈厉害，掀起的波浪就愈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壩冲毀。您知道，柏林发生了什么事？上月10日傍晚，一大群人(警方自己估計約22 000人)挤滿了社会党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附近所有的街道。由于我們党的組織和紀律极好，委员会最先得得到关于选举最后結果的消息。选举結果一宣布，整个人群齐声发出了欢呼，向誰？向当选的人？不是，向“我們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王国檢察官特森多尔夫”！这个人在反对社会

党人的訴訟中一向是出类拔萃的，而他的暴力行为却使支持我們的人加倍增长了。

这就是我們的人对所有暴力手段的回答，他們不仅不顾这些，而且甚至向它們挑战，把它們当做最好的鼓动手段。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写于 1877 年 2 月 13 日

原文是意大利文

載于 1877 年 2 月 26 日

俄文譯自“人民报”

“人民报”第 7 号

Erste Jahrgang  
1877  
Herausgegeben  
von  
F. Engels  
in  
London  
Verlag  
von  
W. G. L. Buchhändler  
in  
London  
Preis  
1/6  
Pro  
Bogen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 Vorwärts

Central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

Verlag  
W. G. L. Buchhändler  
in  
London  
Preis  
1/6  
Pro  
Bogen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Pro  
Anzahl  
der  
Bände  
1/6

Nr. 32.

Freitag, 16. März.

1877.

## 弗·恩格斯 意大利的情况

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终于也建立了巩固的基础，预期会迅速而胜利地发展起来。但是，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已经发生的转折，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

意大利的运动的产生同巴枯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师、医生、著作家、店员等等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了解内情的秘密的巴枯宁同盟的盟员，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使巴枯宁的宗派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确切的材料，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sup>51</sup>（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这本小册子中，有详细的叙述。

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是最顺利不过的了。巴枯宁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词句到处都博得了预期的掌声，连那些在过去革命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也随波逐流了。



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用巴枯宁自己的話來說，是“欧洲最革命的国家”<sup>52</sup>。所谓的革命，就是大发空論而无实效。英国的、其次法国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与此相反，在这里，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到指責，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包含着承认“国家”，而“国家”是一切禍害的体现。于是，不准建立工人党；不准进行爭取任何抵御剝削的保护措施，如爭取正常的工作日、限制女工和童工劳动；而主要的是，不准参加任何选举。代替这一切的是要为了未来的革命而进行鼓动、組織和秘密工作，一旦革命从天上掉下来，就立刻应当在沒有任何临时政府、完全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或类似国家的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同盟暗中指揮的）来进行……“但是請不要問怎么样！”<sup>①</sup>

我們上面已經說过，当运动还幼稚的时候，这一切都很順利。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处于世界交往以外，它們只知道外国人来訪这种交往形式。这些城市供应四周农民手工业品，并作为向更大范围出售农产品的中介。此外，住在那里的还有靠自己地租生活的貴族地主。最后，很多外国人把錢送到那里去。在这些城市中，反对派人数不多，很不开展，而且还混杂着很多沒有經常或固定职业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来往和温和的气候造成的。低声談論匕首和毒药的极端的革命詞句，在这里最先找到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在北部，也有工业城市。只要运动在**这些城市**的真正的无产階級群众中間扎了根，这种劣质的食粮就再也不能滿足需要了，**这些工人**再也不要那些不得志的

---

① 引自海涅的組詩“青春的苦恼”中“抒情詩”篇第八首詩。——編者注

年輕資產者保護了，按照巴枯寧的說法，這種資產者是因為他們“升官發財的門路被堵塞”才投靠社會主義的。

結果正是這樣。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對於禁止任何政治活動，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談和陰謀活動界限的真正的活動，日益強烈地表示不滿。關於德國人在1874年選舉中的勝利和他們所達到的把德國社會黨人聯合起來的結果，在意大利也並不是一無所聞。經歷過舊的共和運動的、不得已服從了“無政府主義的”空喊的人們，開始愈來愈經常地利用各種機會來強調必須進行政治鬥爭並在“人民報”上反映出已經覺醒的對派立場。這家週報在創辦後的頭幾年主張共和，不久便歸附了社會主義運動，尽可能地同“無政府主義的”宗派主義疏遠。正當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羣眾終於成長起來而超過了自己的惹人厭煩的領導人、創造了真正的運動以代替虛構的運動的時候，他們發現“人民報”是願意偶爾登載暗示必須進行政治鬥爭這種異端邪說的報紙。

如果巴枯寧還活著的話，他就會採取他慣用的方法來同這種異端邪說鬥爭。他就會硬說那些替“人民報”撰稿的人具有“權威主義”、權力欲、虛榮心等等，對他們進行各種各樣卑鄙的人身攻擊，並通過該同盟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機關報不斷地重複這種攻擊。然後他會說，所有這些罪過都只是那個致命的原罪的必然結果，這個原罪就是：荒謬地承認政治活動，因為進行政治活動就得承認國家，而國家則是權威主義和霸權的體現，因此誰力爭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活動，也就一定堅決地為自己力爭政治權力，可見，他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因此，大家都來指責他吧！這種從已故的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那里借來的方法，巴枯寧是精通的，但是被他濫用了，用得過於單調。但是，這畢竟是一種至少可以得

到短时间的成功的唯一方法。

但是巴枯宁死了，于是秘密地主宰世界的工作轉到了瑞士紐沙特尔的詹姆斯·吉約姆先生的手里。死板的学究占据了那位飽經世故的世俗人物的位置，并且把瑞士加尔文教派的狂热带到了无政府主义学說中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恪守真正的信仰，而紐沙特尔的那位眼光狹小的教員无论如何应被奉为这一信仰的教皇。“汝拉联合会簡报”<sup>53</sup>（該联合会显然連 200 个會員也不到，而瑞士工人联合会拥有 5 000 名會員）被宣布为这一宗派的正式机关报并毫不客气地“譴責”起信念动摇的人来了。但是，組織在上意大利联合会中的倫巴第工人，已經不再喜欢听这种教訓了。而去年秋天“汝拉簡报”竟敢直接地命令“人民报”辞退不合吉約姆先生的心意的巴黎記者的时候，它們的友誼从此就結束了。簡报繼續指責“人民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抱有異端邪說。但是他們現在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們知道，在宣揚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隱藏着一些阴謀家独断专行地指揮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

“短短四行毫无恶意的注釋引起了‘汝拉簡报’的注意，它把事情說成这样，似乎我們对它大发雷霆，其实它只是使我們觉得好笑。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嫉忌心四处活动，大肆誹謗，乞求別人對我們和我們的朋友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憤怒也好。誰要是上他們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爭吵和挑拨离間**的手法是人們十分熟悉的了，它的耶穌会教徒的（洛約拉的）詭計已不能再欺騙什麼人了。”（1877 年 1 月 21 日“人民报”）

2 月 26 日的報紙把这些人叫做“某些狹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在米兰，这些老爷已經完全被人认清，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德国 1 月 10 日的选举和与此有关的比利时运动的轉折，即放棄旧的节制政策而代之以爭取普选权和工厂法的鼓动，把剩下的

事情一并完成了。2月17日和18日在米兰举行了上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的決議沒有对国际的意大利会员中的巴枯宁主义集团采取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敌視态度。決議甚至表示准备参加在布魯塞尔召开的、试图把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种派別联合起来的代表大会。但是，決議同时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对意大利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三点：

(1)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所以也要采取政治手段，来保证运动的成功；

(2)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組織成为不依賴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和

(3)上意大利联合会在自治的条件下和在国际的最初章程的基础上，认为自己是这个偉大的联合組織的成員，不依賴于其他一切意大利組織，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繼續证明自己是讲团結的。

总之，提出了政治斗争、組織政党和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上意大利联合会作出了上述決議，从而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派而同偉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場。这个联合会分布的地区是意大利工业最发达的部分——倫巴第、皮蒙特、威尼斯，所以不要多久它就会获得成就的。一旦采用了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經驗檢驗过的那些明智的鼓动手段，相形之下，巴枯宁主义巫医的空談很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軟弱无力，而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自己破产的资产者的地位而产生领导工人运动志向的人加在他們肩上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3月6日  
和14日之間

載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前进报”

##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

第一个給社会主义、因而也給現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經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終生轉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萊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領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澤曼先生等人，在科倫创办了“萊茵报”<sup>54</sup>，由于馬克思对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該报的主笔。“萊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經過檢查的，但檢查机关对它也沒有办法<sup>①</sup>。“萊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載必要的文章；先是給檢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萊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額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費的話，那末德国的书报檢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館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萊茵报”是孤軍作战。它把檢查官

① 第一个对“萊茵报”进行檢查的是警察顧問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倫日报”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薩克森国王約翰)譯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說“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

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馮·威斯特华倫的妹妹結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sup>55</sup>，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諷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騰出時間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內閣下令把马克思驅逐出法国<sup>56</sup>。亚历山大·馮·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魯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貧困”一书，即对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同时，他在布魯塞尔創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組織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謀性的团体，現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傳組織，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組織。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領導成員，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領導成員，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

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个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

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sup>57</sup>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时有 8 000 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sup>①</sup>；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 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1849 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 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 5 月 19 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sup>58</sup>的尝试（1850 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 年 12 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年纽约出版；第 2 版于 1869 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

① 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



发行)。1853 年間他写了“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发行,其后在波士頓发行,最近又在萊比錫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在科倫被判罪以后,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內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館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經濟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紐約每日論壇报”<sup>59</sup> 写稿,該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經常刊載了由他署名的通訊,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許多論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論。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細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頓勛爵的激烈論文,在倫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經濟学的最初成果,就是 1859 年問世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的价值論,包括貨幣学說在內。在意大利战争期間,馬克思在倫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sup>60</sup> 上既反对当时塗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魯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魚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侖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侖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張德国保持中立,甚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謠言誣蔑馬克思,而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 年倫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目,并且根据內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 年在土伊勒里宮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員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 年 8 月付給他 4 万法郎。”<sup>61</sup>

最后,1867 年在汉堡出版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

卷”，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經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現存社会、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問世，現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願：創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無論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資产階級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說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階級欢欣鼓舞，使无产階級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圣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躪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議創造了条件，建議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駐在地設在倫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內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編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記憶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敗，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許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則就必然要失敗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現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虛荣心，他們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須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

又正是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齷齪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負任何責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滿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許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責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絕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謂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間从未間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結的觉悟，即使沒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紐帶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做他的理論工作，因而他的“資本論”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許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們只能談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見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終原因，应当到人們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沒有人发問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紀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爭取社会和政治的統治同封建貴族所作的斗争。而馬克思則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紛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統治，即旧的

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是由于什麼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當時存在的物質的、可以實際感覺到的條件，即各該時代社會借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的經濟，這種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費品都是自己生產而幾乎沒有交換關係，并由好戰的貴族保護它們不受外敵侵害，使它們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聯繫。當城市產生，而獨立的手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的商業流轉也隨之產生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就發展起來了，這種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同樣作為一個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着十五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發現，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地區，從而也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經具有工廠性質的工場手工業所排擠，而工場手工業又被大工業所排擠，這種大工業是由于前一世紀的各種發明，特別是由于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排斥落后國家里的舊式手工勞動，而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里，建設起現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雖然它在長時期內還未能取得政權，政權仍然操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王權手里，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起——它把政權也奪到手了，于是它對於無產階級和小農說來就成了統治階級。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段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歷史學專家卻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一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而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同樣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生活的經

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sup>62</sup>——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

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

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8年不伦瑞克发行的  
“人民历书”丛刊

俄文译自“人民历书”丛刊

## 卡·馬克思 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sup>63</sup>

編輯先生：

“卡尔·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sup>①</sup>，显然是一个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論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結論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一版补遺<sup>64</sup>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sup>②</sup>的論战性的意見。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責难呢？这就是：他不是俄国而是在普魯士的政府顧問哈克斯特豪森的书<sup>65</sup>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說，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須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論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評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們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經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sup>③</sup>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資本論”德文本第二版的跋<sup>66</sup>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經引证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編者注

② 亚·伊·赫尔岑。——編者注

③ 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話，在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轉述的。——編者注







过——我曾經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一位偉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評家”<sup>①</sup>。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問題：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学家們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毀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資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贊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論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偉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測”，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說。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經濟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資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結論：如果俄国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給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資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資本主义經濟制度从封建主义經濟制度內部产生出来的途徑。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們的生产資料分离，从而把他們变成雇佣工人(現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資料占有者变成資本家的历

---

<sup>①</sup> 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編者注

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資本家階級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們傳統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分离并把他們突然投到劳动市場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剝夺。这种剝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經歷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資本論”法文版第 315 頁<sup>67</sup>）。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結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种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給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經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轉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論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資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詳細闡明。

那末，我的批評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經在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資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評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資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經濟形态。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这样做，会給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給我过多的侮辱。讓我們举个例子来

看看。

在“資本論”里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分离的运动，不僅蘊含着大地產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蘊含着大貨幣資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現了占有所創造出的全部財富的人。結果怎样呢？羅馬的无产者並沒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們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貧民”〕更受人輕視，和他們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資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現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論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論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  
左右

发表于1886年日內瓦出版的  
“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弗·恩格斯

### \*德国、法国、美国和 俄国的工人运动

倫敦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波瀾壯闊地发展。現在那里共有 62 种社会主义期刊，其中 46 种是名副其实的报纸，1 种是杂志，15 种是工会机关刊物。此外，在瑞士用德文出版的有 4 种报纸和 1 种杂志；奥地利有 3 种；匈牙利有 1 种；美国有 6 种。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数如下：

德 国——	62	}	= 75
奥 地 利——	3		
匈 牙 利——	1		
瑞 士——	3		
美 国——	6		

可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定期出版物以机关刊物来算，比用所有其他文字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和还要多。在上述数字中，我还没有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计算在内，而指的只是公认的党的机关刊物。

在謀刺俾斯麦<sup>68</sup>一事发生以后，有一个资产者写信給我說：“整个（资产阶级的）德国都为俾斯麦没有被刺而感到高兴。”我回

答他說：我們對此也感到滿意，因為他對我們很效勞，即使為了這一點也要報答他。你們知道，我是對的，因為要是沒有迫害和苦難，要是沒有軍國主義和不斷增加的捐稅，我們就不會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

雖然法國的危機<sup>69</sup>只產生了很不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是我認為，這個危機造成這樣一種形勢，即使得法國社會主義者有可能通過報刊、會議和工會來進行活動以及組成**工人黨**，——而這些就是我們在1871年大屠殺以後的今天所能爭得的一切。此外，法國具有兩大成就，即農民轉向共和國方面以及共和國軍隊的組成，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杜克羅、巴特比及其同伙的政變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士兵堅決拒絕與人民為敵。

由於鐵路干綫全體人員的流血的罷工<sup>70</sup>，美國的工人問題被提上了日程。這是美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因此，美國創立**工人黨**的事業有了大踏步的發展。在這個國家里，事態發展得很快，我們應當注視這種發展進程，才不至於對不久將會出現的某些重大成就感到突然。

我認為，俄國這個國家，在最近的將來會起最重要的作用。由於所謂解放農奴而形成的狀況，早在戰爭以前就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次大改革進行得如此巧妙，使貴族和農民最後都破產了。隨後又實行了另一項改革，這一改革似乎是為了讓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對自由的條件下選舉行政機關，但是改革的結果只是增加了本來就不堪忍受的捐稅。

由於各省徑直負擔自己的管理費用，國家現在的開支就比較少了，但是收的稅還是那麼多；因此就另設新的捐稅來彌補省和地方的開支。後來還實行了普遍義務兵役制，這又等於新設了一項

比其他捐稅更重的捐稅，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龐大的軍隊。

結果，財政崩潰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国库由于广泛参与了1871—1873年时期的騙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財政危机。这一危机于1874年在維也納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当时的形势就是，在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sup>71</sup>爆发以后，由于到处借不到外債，而內債又不能滿足需要，只好动用銀行的数百万款子(准备金)和发行紙币；結果紙币日益貶值，它的比价很快地——只过了一两年——就跌到了最低限度。总的說来，我們已經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論战争的結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經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預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宮廷，从沒落的和 *frondeuse* [因不滿而反抗的] 貴族中間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連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場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龐大后备軍；它在1798年、1805年、1815年、1830年、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軍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轉变！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1月12日

摘要載于1878年1月22日

“人民报”第3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sup>72</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 2 月中—  
3 月中

载于 1878 年 3 月 3、10、17、24 和  
31 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 THE LABOR STANDARD.

Devoted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ust be achiev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VOL. III.—No. 13.

NEW YORK, SUNDAY, MARCH 3rd, 1878.

Price 3 Cents

—

去年充滿了許許多多的事件，是歐洲工人階級收獲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組織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sup>73</sup>威胁的統一，实际上已經恢复。工人階級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們发生了什么样的轉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經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統計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組織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們。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階級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並沒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轉到工人階級手中。柏林、德勒斯頓、薩克森的整个整个的

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紐倫堡、萊比錫、不倫瑞克，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萊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薩尔布呂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

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sup>74</sup>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

---

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們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讀者都会記得，巴黎公社失敗以后，紧接着就在偉大的工人組織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禍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們不擇任何手段，力图在他們只占区区少数的組織中占据統治地位。他們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階級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們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們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階級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們不容許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們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們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統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們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張放棄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組織，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階級的人，以欧洲工人階級的名义宣傳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

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sup>75</sup>；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



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sup>①</sup> 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

---

<sup>①</sup> 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

---

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須再談一点。

西班牙在 1868 年和 1872 年間，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 3 万名以上繳納会費的會員。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現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緒激昂的結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結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 1873 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繼續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絲毫生机，我們也就不能不得出結論說，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階級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縫代表英国人民<sup>76</sup>差不多。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蕩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談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組織来进行。这些工人在 1872 年依然忠于国际<sup>77</sup>，現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謀。

在葡萄牙，运动始終沒有受“无政府主义的”傳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們在 1877 年 1 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

代表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議报”<sup>78</sup>。但是,他們也受到針對他們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結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縛。尽管如此,他們还在繼續斗争,并且現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會議將使他們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階級正在对偉大的全世界爭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貢獻。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資產階級立法的限制。借口鎮压盜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盜匪組織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別法律,賦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員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監視,不經审判、偵訊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轉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轉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領導权的資產階級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經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現。无产階級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許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罰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敗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說,但是这个派別放棄了任何領導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馬志尼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一起逐漸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階級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階級活动的重心也轉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語的地

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語、一半讲佛来米語的布魯塞尔。在这段期間,运动受到蒲魯东学說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說也規定不干預政治,特別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預鎮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經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話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漸漸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来米語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們以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沒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時間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紗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魯东主义空論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虛无縹緲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們的反抗沒有成功,并且逐漸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階級綱領中的一項,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語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現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們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語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組織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納会費的會員。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組織,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資产階級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傳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逐漸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年,这两个团体結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組織瑞士工人政党;它們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

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現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現在它們組織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滿。“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瘋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說这是真正背叛了他們所謂的“革命”。但是，既然他們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沒有軍队的司令部，所以，他們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綱領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論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統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綱領的措詞本身並沒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約在 1870 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們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結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間順利地傳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議會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現象，而沒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領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經費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緒。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現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暫的和虛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結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縮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

設法給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維也納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爾維亞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爾維亞文的周报<sup>79</sup>；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該报就干脆被封閉了。

可見，在欧洲各地，不論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順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間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經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創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們，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內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內部紛爭，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現在这些人可以驕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偉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 四

我們的讀者一定已經發覺，前三篇文章幾乎沒有提到歐洲最重要國家之一的法國。現在來談談是什麼原因。在以前談到過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的活動（雖然它實質上是政治活動），同总的政治，即所謂官方政治並沒有密切的聯繫。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國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為政治力量。如果說這些國家中的某些國家的正式政黨——保守黨人、自由黨人或激進派不得不重視它，這只是因為從它的迅速發展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無產階級政黨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變得相當的強大，足以使人感覺到它的影響。但是，法國的情況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來就一直就是國家中的一種力量。幾乎九十幾年來，他們都是進步的戰鬥大軍。在法國歷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機中，他們都走上街頭，用一切可以武裝的東西把自己武裝起來，築起街壘，投入戰鬥。他們的勝利或失敗決定了法國以後多年的命運。從1789年到1830年，資產階級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鬥爭決定的；正是他們在1848年贏得了共和國，而同時他們卻誤以為這個共和國就意味着勞動解放，在當年的六月失敗中，他們得到了嚴酷的教訓；他們在街壘中反抗路易-拿破侖1851年的 coup d'état [政變]，結果再次失敗；1870年9月，他們鏟除了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連碰也不敢碰的沒落帝國。1871年3月，梯也爾企圖奪去他們用來保衛巴黎免受外國進犯的武器，使得他



們被迫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們遭到血腥的镇压。

可見，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鋒，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較閉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這種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們便无法評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論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統治，在此期間，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結社的权利被剝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組織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議會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別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許多年內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統治不再出現，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爭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爭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目前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統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

三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5月16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

謀本来也許会破坏这一切；但是，軍隊十分明确的立場使陰謀家不能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軍官中，特別在下級軍官中有許多共和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絕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改組軍隊的第一个結果——改組軍隊廢除了雇人頂替的做法，而把軍隊变成了各个階級的年輕人的真正代表<sup>80</sup>。这样一来，就沒有必要用武力鎮压陰謀，因为它已經自行破产了。而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因为工人階級在1871年的血腥屠杀以后还过于虛弱，并且在沒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絲毫不願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濫用自己的主要財富，濫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階級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階級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烏有。本世紀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給路易-拿破侖的600万張选票廢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魯士入侵，动搖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轉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說明，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說明，城市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們的土地已經抵押給高利貸者；他們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訴訟費；公证人、辯護士、法警、拍賣官吏是經常出現在他們門口的威胁。他們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活几乎是同样地沒有保障。如果說，这些农民現在正在离开波拿巴主义而轉向共和国，那他們就是以此表明，他們已

經不再把改善境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侖經常向他們許諾但从不付諸實現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經失灵。法国农民終於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貧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貧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們已开始思考，他們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們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絲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階級，即同城市工人階級結成联盟。

可見，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終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組織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們还可以同以前敌視他們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暫時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領導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階級的最后胜利。

## 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說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縛在土地上的、必須为他們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無論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沒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則因为把土地让給农民，部分地也因放棄在此以前屬於他們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應該得到贖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錢来付給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預这件事情。一部分贖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轉交一部分給地主；其余部分的贖金則以政府的債券支付，債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則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連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債券卖光以后把錢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現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們的領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們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蕪。至于說到农民，他們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領地中最坏的土地，是沼澤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屬於农民的和由于他

們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轉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們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貸給他們作贖金的債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們征收的賦稅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剝夺了他們的这些权利；如果他們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們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錢。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負債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贊揚和歌頌的偉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絕對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來加速这个革命。貪污之風滲透到官場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設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傳統的貪污風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貪污之風在每个公共机关簡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結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財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慘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簽訂，結果，除了簽訂新的借款以外，就沒有別的钱來支付旧債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統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緩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審法庭，而由貴族、城市資產者和农民按照規定选出的代議机关，准許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輕佻地献媚。但是，輿論对政府的善良意願估計錯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審員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辯护。地方和省的會議<sup>①</sup>一致声称：政府用它

<sup>①</sup> 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會議。——編者注

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sup>81</sup>，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之下拯救出

来，而对俄国人民則說，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羈絆，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經過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敗以后，現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結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現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間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滿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經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終結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換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龐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軍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魯士統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魯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現在的俄国政府在它們中間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們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



## 卡·馬克思 布赫爾先生

致“每日新聞”<sup>82</sup>編輯

先生,据路透社报道:

“大使館參贊布赫爾先生被任命为會議的档案保管秘书。”

这位“布赫爾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倫敦期間出色地充当了臭名昭彰的戴維·烏尔卡尔特先生的热烈拥护者,并在柏林“国民报”<sup>83</sup>上每周都替后者的反俄理論鼓吹的那个洛塔爾·布赫爾?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薩爾的狂热信徒,以致被后者当做自己的遺囑执行人,而将每年的收入遺留給他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遺贈給他的那个洛塔爾·布赫爾?在拉薩爾死后不久,洛塔爾·布赫爾就到普魯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館的參贊,并成为俾斯麥所信賴的代办。

他曾**天真地**給我写过一封信,約我(自然是征得他的主子的同意)为普魯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sup>84</sup>撰写有关金融問題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向我保证,我完全有自由对現時金融市場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見。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在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驅”<sup>85</sup>的国际机关刊物上不时看到关于

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繳納会費的公告时，总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沒有弄錯人，如果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鉴于赫德尔和諾比林的謀刺案而想对會議提出对付社会主义傳播的国际措施这一消息还有几分是真实的——那末，布赫尔先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他可以十分有权威地向會議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織、活动和学說同这些謀刺案根本沒有关系，就像同“大选帝侯号”<sup>86</sup>的沉沒或同柏林會議的召开沒有关系一样；在德国进行的搜捕所引起的恐慌，以及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掀起的一片尘埃，純粹是为竞选鼓动服务的，以便使这届帝国国会最終通过俾斯麦公爵早已拟定的方案来解决一个离奇的問題，即如何把現代国家的全部財政資源分給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的風暴摧毀的旧的政治制度。

閣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馬克思

6月12日于倫敦

載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聞”  
第10030号和1878年6月21日  
“前进报”第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每日新聞”，并  
根据“前进报”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答布赫尔的“說明”

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他在6月20日写的“說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給“每日新聞”的信<sup>①</sup>。布赫尔先生宣称，要糾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須写3 000行文字。然而要一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30行文字就足够了。

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企图誘使我給“国家通报”撰稿，这恰恰是普魯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馮·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話說：

“至于內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讀者的圈子是 *haute finance* [金融貴族]，而不是考虑編輯部，我建議來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內在的含意。”

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說，他

“問过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談起过。”

同一封信接着說：

---

<sup>①</sup> 見本卷第159頁。——編者注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場(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場,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們問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說,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們就請我写信給您。”

可見,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經說得很明白,他是受別的什么人的委托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說:

“任何人,甚至連‘国家通报’的編輯,都絲毫不知道这次的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給“每日新聞”的信中只說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写信給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給他的回答。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說得平淡无奇,就来給我作“补充”,他捏造說:

“馬克思先生回答說,他不会給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这样庸俗地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以下一段总结性的話里,他这封信的“內在的含意”“不仅”說得明白,而且十分突出: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蛻換好多次壳;所以,誰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須联合在政府的周圍。”

卡尔·馬克思

6月27日于倫敦

載于1878年6月29日“法蘭克福報和商報”第180号;1878年7月2日“福斯報”第152号;1878年7月5日“前進報”第7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

卡·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  
国际工人协会史<sup>87</sup>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見今年7月的“十九世紀”<sup>88</sup>)应当做几点說明,因为人們可能会发生錯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經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員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資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談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sup>①</sup>,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倫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願让“一位名叫卡尔·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現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倫敦“代表大会”上<sup>89</sup>。豪威耳硬說,在那次会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紛爭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沒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倫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

---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編者注

員會一起商討应于 1866 年 9 月在日內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議程。这次代表會議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會議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會議通过我們所提出的議程，当这个議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馬丁在給“世紀报”的一封信里<sup>90</sup>作了如下說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項議程的那种远大的見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經濟观点，将贏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們的一致贊同。”

順便說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項議程是这样写的：

“必須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則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sup>①</sup>

昂利·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評述的：

“我們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語，对波兰來說，意思是很簡單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經为 1863 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階級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會議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倫，現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議員，另

---

① 法文本的記錄刊印的不是：“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昂利·馬丁在文章中也是这样引用的）。德文本是：“在社会—民主基础上”。英文本是：“在民主基础上”。——編者注

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議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評述的那一項。

总委员会的議程没有一个字談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見，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討論題目交給他們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們自己放棄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話——1865年的倫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談来結束。他說：

“在就廢除奴隶制問題而写給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創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統的’一語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給美国人民的，而是給他們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sup>91</sup>。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創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統的”一語，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說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創建的同盟<sup>92</sup>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論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請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經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見“所謂国际內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頁<sup>93</sup>）。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讀物”（《Christian Reader》）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絕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驅使，而是出于純粹世俗的理由。在創辦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sup>94</sup>时，他曾貪婪地追求編輯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釣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滿起来，勁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識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問題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綴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謂克呂澤烈將軍在芬尼亚社社員起义时出現在倫敦的說法，并宣称，这位將軍在牛津街拉脫本廣場的“布萊克-霍斯”住所里會見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計劃”告訴他們。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呂澤烈沒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計劃”报告給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謹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顛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蕩的穿硬麻布衣服的<sup>①</sup>好汉嗎？

---

①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場（福斯泰夫在叙述他与一伙坏蛋短兵相接的虛构故事时，每次重复总要增加对方的人数，他津津有味地虛构，把对方描繪成一会儿是穿硬麻布衣服的人，一会儿是穿肯达耳呢上衣的人）。——編者注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sup>95</sup>，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sup>96</sup>。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sic!>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议会<sup>97</sup>的调查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杀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sup>98</sup>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

所要求的那樣正統)甚至认为,那种曾經摧毀羅馬帝國勢力的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結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滿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錢袋滿滿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維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沒有减損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员会的空預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組織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見西班牙外交大臣給西班牙各駐外使节的通令)。請您合情合理地說一下,为什么羅馬教皇和他的主教們詛咒国际,法国地主議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奧、德两国皇帝在薩尔茨堡会見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軍征討威胁它<sup>99</sup>,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簡單的办法,在它面前揮动总委员会的可悲的預算,来驅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諒地认为:“貧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錢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島国“庸人”的高尙观点出发,告訴“十九世紀”月刊的“有教養的讀者”說:国际已經“失敗”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

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  
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  
期(第10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  
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俄国的状况

3月21日于倫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結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結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結社和集会自由。这是連續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組織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

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軍国主义統治，不断增加賦稅，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魯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傳統，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罵、侮辱資產階級（其实它也不該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徑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們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們会知道怎么办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間的斗争非常尖銳，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繼續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彈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謀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們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聞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

軍隊、甚至宮廷人士中間出現大規模的陰謀活动，全国輿論由于战后外交失敗而感到屈辱，國庫空虛，信用紊亂，銀行家不得到國民議会的保证就拒絕貸款，最后，还有貧困。这就是俄国的总結。

弗·恩格斯写于1879年3月21日

載于1879年3月30日“人民报”

第12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譯自“人民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給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sup>100</sup>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sup>101</sup>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內西沒有把我最近給他的信給你看，而这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內西已經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經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談的問題。

### 一、同卡·希尔施的談判

李卜克內西問希尔施是否願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創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編輯。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經費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經費，由誰来提供經費。这首先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个来月就一命嗚呼；其次是为了了解由誰掌握錢袋，也就是說，归根到底由誰来指导报纸的方針。李卜克內西回答希尔施說：“一切安排就緒，其余情况待由苏黎世再通知”（李卜克內西7月28日給

London, den 15. April 1845

(5X15)

Die Besetzung des Briefes, welche  
 ich Ihnen durch die Post übergeben  
 habe, ist diejenige, die ich Ihnen  
 am 15. April 1845 geschrieben habe.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I. Die Besetzung des Briefes, welche  
 ich Ihnen durch die Post übergeben  
 habe, ist diejenige, die ich Ihnen  
 am 15. April 1845 geschrieben habe.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und ich habe Ihnen  
 nur einen Brief an Sie geschrieben.

7 (20/2)





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7月24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同**我們**”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sup>102</sup>編輯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要紧要的。”

关于經費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詢問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志負責弥补亏损？錢数多少，期限多长？編輯的薪水問題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維持报纸一年的經費”。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說，如果有亏损，就用自願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經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設想給报纸拟定方針的意見（这一点下面談）引起了異議，并接到一項規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別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說，要承担責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議。”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是，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問題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說他必須在設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編輯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員是誰，都沒有告訴过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憤慨，他宁願同萊比錫派商議。他8月2日給李卜克內西的信，您該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把这封信轉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願意在下述情況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說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編輯部提出書面意見，由萊比錫**監察委员会**来作出決定。

然而，李卜克內西 7 月 28 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經費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內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細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內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經費的事仍旧沒有提，而是保证說，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編輯委员会，它只負責管理和財務。李卜克內西 8 月 14 日給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們說服希尔施接受。直到 8 月 20 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对我說：

“他〈赫希柏格〉在編輯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 8 月 11 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設于苏黎世的三人团应当以編輯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莱比錫三人团同意之下挑选編輯……据我所知，上述決議还指出，第二項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負政治責任，又負財務責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持，就休想担任編輯。”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編輯同苏黎世派的地位的情况。他們是編輯委员会；他們还負有政治責任；沒有他們的支持，誰也不能担任編輯。簡單說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三人团商談。

但是，李卜克內西在給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話，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說：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說，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想的那樣，是編輯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對我們負报纸財務責任的管理委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討論編輯問題（附帶說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們没有权力监督你。”

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萊比錫委員會的一个委員，而且是**唯一**參加商談的委員堅持說，希爾施应当服從蘇黎世人的業務領導，萊比錫委員會的另一個委員則根本否認這一點。在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見以前，希爾施應不應當作出決定呢？希爾施有權要求了解對他提出了條件的上述決議，對這一點人們絲毫沒有考慮過，甚至萊比錫派也根本沒有想到親自去確實了解一下這些決議。不然，怎麼會產生這種分歧呢？

即使萊比錫派在授予蘇黎世派以全權的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但是蘇黎世派對於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 8 月 14 日向希爾施寫道：

“假如當時您沒有來信說，在類似的情況下〈如凱澤爾事件〉仍然要採取同樣的行動，即有可能再發表類似的書面言論，那我們就不會對此多費唇舌。但是鑒於您提出的聲明，我們應當對新報紙如何刊載文章的問題保留決定權。”

7 月 26 日，也就是在蘇黎世的一次會議確定了蘇黎世三人團的全權以後很久，希爾施在給伯恩施坦的信里好像談過這一點。但是，在蘇黎世人們十分醉心於他們官僚式的獨攬大權，在後來答復希爾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權力，即刊載文章的決定權。

編輯委員會已經成了檢查委員會。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爾施從他那里才知道這兩個委員會成員的名字。

這樣，同希爾施的談判破裂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1）由於萊比錫派方面和蘇黎世派方面都堅決拒絕告訴他稍微確切的情況，沒有說明報紙的經費基礎如何，報紙能否至少維持一年。只是從我這裡（根據您告訴我的情況），他才知道定下來的

款項。因此，根据以前的說法（党和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結論，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或者是报纸現在已經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給經費；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賴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現在还远沒有排除。800馬克——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这一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团体在上半年補助“自由周报”<sup>103</sup>的經費（40英鎊）。

（2）由于李卜克內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錯誤的）：苏黎世派根本沒有在业务上監督編輯部的权利，結果发生了一場意見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派不仅要監督，而且要亲自檢查报纸，給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絕了，我們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們听说<sup>①</sup>，萊比錫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員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要萊比錫的三人之間意見一致，就能很快地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轉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階級思想的編輯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談。

## 二、給报纸拟定的方針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訴希尔施說，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編輯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

希尔施回答說，他认为报纸的方針，总的說来，应当和“灯笼”

---

① 在原稿旁边用鉛筆注明：“从赫希柏格那里”。——編者注

的方針相同，也就是說，在瑞士要避免訴訟，而在德國則不應該过于畏首畏尾。他問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還說：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請您相信，如果再出現類似的違反紀律的事情，我將對他採取完全相同的態度。”

伯恩施坦儼然以新的官方的檢查大員的姿態對此回答說：

“至于報紙的方針，在監督委員會看來，‘燈籠’不能作為榜樣。我們認為，報紙與其說應當熱中于政治激進主義，不如說應當採取原則的社會主義的方針。諸如攻擊凱澤爾這樣一些會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責的事情，無論如何應當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對凱澤爾說成是“一種失策”，施拉姆則認為十分危險，因此要對希爾施實行檢查。

希爾施再次寫信給赫希柏格說，類似凱澤爾事件的情況，

“如果有正式的黨的機關報存在，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議員可能不會如此放肆地無視它的明確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寫道：

“指示”新報紙“……採取不偏不倚的方針，盡量不過問以往發生的一切分歧”；該報不應當是“擴大的‘燈籠’”，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責之處至多是，他採取过于溫和的方針，在我們不能打着旗幟前進的時候，如果這還算是一種指責的話。”

但是，這個凱澤爾事件，這個好像是希爾施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凱澤爾是社會民主黨議員中唯一在帝國國會里發言並投票贊成保護關稅的人。希爾施譴責他違反黨的紀律，因為他：

- (1) 投票贊成黨綱明確要求加以廢除的間接稅；
- (2) 同意撥款給俾斯麥，從而違反了我們黨的策略的基本原

則：“不給这个政府一文錢”。

就这两点來說，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凱澤尔一方面踐踏了議員們根据代表大会的決議會宣誓遵守的党綱，另一方面又踐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則，竟投票贊成撥款給俾斯麦，以酬謝反社会党人法，那末我們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給凱澤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們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対抨击凱澤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現在赫希柏格告訴我，“党团”曾准許凱澤尔那样行动，这就使人认为他是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完全归咎于凱澤尔，現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績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凱澤尔的卑鄙言論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議會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會議变成絕對正确的會議、把党团決議变成不容違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嗎？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決議掩飾凱澤尔的議員們造成的。既然那些比任何人更应当遵守党紀的人通过了这样的決議，十分严重地違犯了党的紀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們竟然相信，不是凱澤尔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議員們的決議違犯党紀，而是希尔施違犯党紀，因为他不顾这个決議——他也不知道这个決議——抨击了凱澤尔。

其次，毫无疑問，党在保护关稅問題上，也和以前实际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經濟問題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問題上一样，采取了

不明确、不果斷的立場。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由于黨的機關報，特別是“前進報”<sup>104</sup> 寧願討論未來的社會制度的結構，而不去認真地討論這些問題。在反社會黨人法實施以後，保護關稅問題突然成了現實問題，對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沒有一個人能為明確而正確的判斷提供條件，如了解德國工業的情況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選民中間，保護關稅的情緒還不可能絕迹，這一點也是要考慮到的。擺脫這種混亂的唯一途徑是從純粹政治方面來討論問題（像“燈籠”所做的那樣），但是它沒有被堅決地採取；因此黨不可能不在這些討論中一開始就表現出猶豫不決、態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後由于凱澤爾并同凱澤爾一起大出其丑。

對凱澤爾的抨擊成了以種種調子教訓希爾施的借口，說什麼新的報紙決不應當仿效“燈籠”的越軌行動，新的報紙與其說應當熱中于政治激進主義，不如說應當採取原則的社會主義的方針，切忌偏激。在這裡，菲勒克絲毫不比伯恩施坦少賣力氣；菲勒克之所以認為伯恩施坦是最合適的人，正是因為他過於溫和，因為“我們現在不能打着旗幟前進”。

然而，到國外來不是為了打着旗幟前進，那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在國外，沒有什麼東西阻礙這樣做。在瑞士沒有德國的出版法、結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國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會黨人法以前就不能講的話，在瑞士可以講，而且也有**義務**講。因為在那裡我們不僅面對德國，而且面對歐洲，我們有義務在瑞士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向歐洲公開闡述德國黨的道路和目標。誰在瑞士還願意受德國法律的約束，那只是證明，他同德國的這些法律很相稱，他實際上說不出在非常法頒布以前德國不允許說的話。編輯

委員可能暫時回不了德國，對於這種可能性無須再作估計。誰不作好這種準備，誰就不能擔任這樣突出的光榮的崗位。

不僅如此。德國黨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為非法，正是因為它在德國是唯一強大的反對黨。如果黨在國外的機關報上對俾斯麥表示感謝，放棄這個唯一強大的反對黨的作用，俯首聽命，馴順地挨打，那只是證明，它該挨打。1830年以來，德國僑民在國外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燈籠”無疑是最溫和的刊物之一。要是連“燈籠”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報紙只會在國外的同志面前損害德國黨的名譽。

### 三、蘇黎世三人團的宣言

這時我們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鑑”，里面載有“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sup>105</sup>一文。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對我所說的，正是蘇黎世委員會的三個委員寫的。這是他們對過去的運動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報紙的真正綱領，因為報紙的方針是由他們決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薩爾認為有巨大政治意義的運動，即他不僅號召工人參加、而且號召一切誠實的民主派參加的、應當由獨立的科學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愛精神的人領導的運動，在約翰·巴·施韋澤的領導下，已墮落為產業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鬥爭。”

我不去考察，這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事實。在這裡，專對施韋澤提出的譴責是在於：施韋澤使這裡被看做資產階級民主博愛運動的拉薩爾主義墮落為產業工人爭取自身



利益的片面斗争<sup>①</sup>；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地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地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

---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到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片面这一点，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编者注

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須拋棄粗魯的无产階級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風度”（第 85 頁）。那时，一些領袖的“有失体統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階級的态度”（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統的态度，在可以譴責他們的東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輕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階級中出現許許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須首先爭取过来……以促使宣傳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績”。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視爭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謂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傳”。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須把全权委托书給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問題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

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階級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們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階級，而要通过大力宣傳把它爭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爭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們中对我們怀有善意的分子，我們就千万不要吓唬他們。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們作出了一个令人寬慰的发现：

“正是在現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決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以卵击石，不

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們永远不容許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爭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非常沒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sup>106</sup>，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賴”（第 88 頁）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魯的和沒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們硬說他們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們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評現存制度和建議改变現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靜、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种步子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第 88 頁）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絲一毫的恐惧，必須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們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間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結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馴順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棄了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願地許下諾言，說它願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許的範圍內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經成为多余的法律！

“請大家不要誤解我們”，我們并不想“放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綱領，但是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來達到某些最近的目标，達到在開始考慮實現較遠的任務以前無論如何必需達到的目标，那末我們的工作就夠做許多年了。”

這樣，“現在被我們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資產者、小資產者和工人，就會大批地來投靠我們。

綱領不应当**放棄**，只是實現要**延緩**——無定期地延緩。人們接受這個綱領，但是真正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為了遺留給兒孫們。而暫時“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種瑣瑣碎碎的事情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可憐的補綴，為的是讓人看起來畢竟還在做一點什麼工作，而同時又不致吓倒資產階級。在這裡，我真要頌揚“共產主義者”米凱爾了，他為了證實他堅信幾百年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崩潰，就極力從事投機事業，盡力促進1873年的崩潰，從而**確實**為準備現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另一種違背良好的風度的情形，就是對於“只是時代產物”的“濫設企業者的過分的攻擊”；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罵施特魯斯堡及其同類人物”。遺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時代的產物”，而如果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對任何人的攻擊都應當中止，一切論戰、一切鬥爭我們都應當放棄；我們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敵人的腳踢，因為我們是聰明人，知道這些敵人“只是時代的產物”，他們不能不這樣行動。我們不應當加上利息償還他們的腳踢，反而應當憐憫那些可憐蟲。

同樣，擁護巴黎公社的行動也有一個害處：

“使那些否則會對我們表示友好的人離開了我們，並且無論如何是加強

了**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怨恨**”。其次，黨“對於十月法律<sup>107</sup>的施行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因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資產階級的怨恨**”。

這就是蘇黎世三個檢查官的綱領。這個綱領沒有任何可以使人發生誤會的地方，至少對我們這些從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這些言辭的人來說是如此。這是些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滿懷恐懼地聲明，無產階級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動，可能“走得太遠”。不是採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對政府和資產階級作鬥爭，而是企圖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是猛烈地反抗從上面來的迫害，而是逆來順受，並且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一切歷史地必然發生的衝突都被解釋為誤會，而一切爭論都以大体上我們完全一致這樣的斷語來結束。1848年以資產階級民主派面目出現的人，現在同樣可以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正如當時民主共和國對前者來說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一樣，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對后者來說也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對當前的政治實踐是絕對沒有意義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協和大談其博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也是如此。在紙上是承認這種鬥爭的，因為要否認它簡直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實際上是在抹殺、沖淡和削弱它。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是工人黨，它不應當招致資產階級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應當首先在資產階級中間大力進行宣傳；黨不應當把那些能吓跑資產者並且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人所不能實現的遠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神來實現這樣一些小資產階級的補補綴綴的改良，這些改良會鞏固舊的社會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終的大崩潰變成一個逐步實現的和尽可能和平進行的瓦解過程。正是這些人在忙個不停的幌子下不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還企圖阻止任何事情發生，只有空談除

外；正是这些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那末这些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愉快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sup>108</sup>，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

多少观点。他們什么也沒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們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則就是拿自己沒有学会的东西教給別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階級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經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滿脑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資產階級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組成社会民主小資產階級党，那末他們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們可以同他們进行談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結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們是冒牌貨。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們，那末我們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响党的領導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个時間問題。而且这个時間看来是已經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队伍中，我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党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說党簡直是受到了閹割，再沒有无产階級的銳气了。

至于我們，那末，根据我們的全部过去，摆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視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认为它是現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階級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国际时，我們明确地規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階級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开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

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資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們的观点的立場，如果它将是資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遺憾，我們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結束我們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現出来的和你們的团結一致。但是事情也許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在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5名委員和白拉克写的……

我們不反对让苏黎世派也看看这封信。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9年9月17—18日

第一次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

“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譯的



# L'ÉGALITÉ

ORGANE COLLECTIVISTE REVOLUTIONNAIRE

PARAISANT LE MERCREDI

<p>ABONNEMENTS 1 an 6 fr.   6 mois 3 fr.   3 mois 1 fr. 50 Pour l'étranger le port en sus</p>	<p>BUREAUX 128, RUE ROYALE A SAINT-CLOUD Bureaux de vente : 11, rue du Croissant</p>	<p>PRIX DU NUMERO : 10 centimes Pour toute la France</p>
---	--	--

##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sup>109</sup>

### 一、关稅率

在討論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揚的法律时，俾斯麦先生說，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鎮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爭辯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現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謀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議<sup>110</sup>。他說，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 17 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經济学方面的內行。这很像一个人說，只要他吃了 17 年馬鈴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諾言。他賜給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項措施是以关稅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場。

在 1848 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沒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見。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 1848 年和 1849 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敗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 年以后沒有到过萊茵普魯士、威斯特伐里亚、薩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 1864 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輪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橫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漸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緩的德国人曾經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不算特別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沒有津貼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貿易的稅率。

順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沒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紀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說来，他們曾經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资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織机的占有者等等。現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資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誰說无产阶级，誰就是說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 1848 年街垒战中爭得的自由还殘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 1848 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傳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密組織的德国社会主义，現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从 1863 年起，拉薩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 1870 年的战争，1871 年的和約和几十亿賠款。如

果說法国絕沒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賠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賠款而差一点毀灭。暴发戶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戶）乱花賠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們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édit Mobilier<sup>111</sup>的好日子又重現了。人們濫設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銀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謂对貿易、交通綫、消費資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飾交易所强盜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轉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貝列拉和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見過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賭棍在柏林以布萊希勒德和汉澤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現。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倫敦和紐約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終造成了普遍的崩潰。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維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綫崩潰。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資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們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潰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經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場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談），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規模的生产沒有消費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緣。作为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們就請求政府帮助；他們請求实行保护关税制

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税率。这一在1879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187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sup>112</sup>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纱、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可能不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

前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費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125 000 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詐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

国的市僧（其实他們也是活該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嗎？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們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 1 000 公斤）鋼軌。經過长期商談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 1 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絕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問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說：世界上誰能經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灣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 1 万吨貝氏鋼。誰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誰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說，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門也仿效它們，它們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瘋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貿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組織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說，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們不是說得很对嗎？

## 二、国有铁路

从 1869 年到 1873 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

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 Crédit Mobilier 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 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 1873 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 20%，这样就能增加纯收入，从而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 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

不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 92 600 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 3 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



路联合的各綫)的股票 12 000 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緣,它預期要保证騙子們得到大量的利潤,但几乎沒有任何可能让股东們得到絲毫的收入。如果我們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 1 600 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綫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綫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錢已經不知去向了。而殘廢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驕傲。

由普魯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綫,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談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魯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給股东們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綫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們知道以后它們的股票不断上漲,而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綫的股票在 1878 年 12 月是按 103 和 108 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綫被国家买下了。現在它們的股票的市价分別为 148 和 158。正因为这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們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漲价首先給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經紀人带来了好处。在 1879 年春天还是相当沉悶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棄自己的宝貴的股票以前,利用它們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們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經紀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們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則必須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

它便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sup>113</sup>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2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0年3月3日和24日  
“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7号和  
第10号

俄文译自“平等报”

弗·恩格斯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up>114</sup>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3月  
上半月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  
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3、4和5期，并于1880年在巴黎出  
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  
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  
德文版译出



**Bibliothèque de la REVUE SOCIALISTE**

**I.**

---

---

# **SOCIALISME UTOPIQUE**

**ET**

#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

**FRÉDÉRIC ENGELS**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

**Prix: 50 centimes**



**PARIS**

**DERVEAUX LIBRAIRE-ÉDITEUR**

**32, Rue d'Angoulême, 32**

**1880**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的法文第一版的扉页



---

現代社会主义,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对統治于現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間、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階級对立和統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紀法国偉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則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說一样,它必須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經濟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們头脑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辯护或者放棄存在的权利。思維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說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sup>①</sup>,最初,这句话的意

---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現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須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圍繞着太阳旋轉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薩哥拉第一个說,Nûs 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才認識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維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籠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諧。”(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

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sup>116</sup> 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这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

---

頁<sup>115</sup>)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



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sup>117</sup>，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sup>118</sup>，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

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種僥幸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五百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我們已經看到為革命作了準備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如何求助於理性，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要求無情地鏟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恒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正好在那時發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現在，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就發現新制度不論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於腐敗的督政府<sup>119</sup>，最後則托庇於拿破侖的專制統治。早先許下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並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並沒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決，反而由於緩和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於減弱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現在已經實現的脫離封建桎梏的“財產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是把他們的被大資本和大地產的强大競爭所壓垮的小財產出賣給這些大財主的自由，於是這種“自由”對小資產者和小農說來就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自由；工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現金交易，如卡萊爾所說的，日益成為社會的唯一紐帶。犯罪的次數

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經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爱”<sup>120</sup>在竞争的詭計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賄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錢代替了刀劍，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約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諷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紀的轉換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門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論基础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負了新拉納克的管理工作<sup>121</sup>。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間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間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間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間夺得了統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們只是以此

证明了他們的統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階級的胚胎从这些无財產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級，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創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階級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还隱藏在不发达的經濟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維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傳，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詳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經确定，我們就不再談論現在已經完全屬於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这些現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严謹的思維方式优越于这种“瘋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們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見的。

圣西門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 30 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从事**生产和貿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閑**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級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資產階級**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資產階級**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沒收后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

軍用品欺騙了国家。正是这些騙子的統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瀕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侖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門的头脑中,第三等級和特权等級之間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閑者”之間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閑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貿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銀行家。游手好閑者失去了精神領導和政治統治的能力,这已經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終证实了。至于无財產者沒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門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經驗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誰来領導和統治呢?按照圣西門的意見,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們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紐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級森严的“新基督教”結合起来,而这种紐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宗教观点的統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資產者,厂主、商人、銀行家。这些資產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經濟特权的地位。至于銀行家,那末正是他們应当担負起通过調节信用来調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見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剛剛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門特別強調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貧穷的階級”(«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

圣西門在日內瓦书信中已經提出这样一个論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无財產的群众的

統治。

他向他們高聲說道：“看吧，當你們的伙伴在統治法國的時候，那里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飢荒！”<sup>122</sup>

但是，了解到法國革命是階級鬥爭，並且不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而且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說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說政治將完全為經濟所包容<sup>123</sup>。雖然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但是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這種思想，即最近紛紛議論的“廢除國家”的思想，已經明白地表達出來了。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優越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時，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以及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sup>124</sup>。在1815年向法國人宣傳要重滑鐵盧戰役<sup>125</sup>的勝利者建立同盟，這確實既要有勇氣又要有歷史遠見。

如果說，我們在聖西門那里看到了天才的遠大眼光，由於他有這種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一切並非嚴格地是經濟的思想都以萌芽狀態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們在傅立葉那里就看到了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但並不因此顯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葉就資產階級所說的話，就他們在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和以往的啟蒙學者關於只為理性所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約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

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sup>126</sup>。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sup>127</sup>。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sup>128</sup>。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sup>129</sup>，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風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減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場手工业变成了現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資產階級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場手工业时代的迟緩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飈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資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們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們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經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习惯的約束、宗法制从屬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時間、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時間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轉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階級大批地墮落了。这时有一个 29 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現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說，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渾水摸魚和大发橫財的一片混乱。欧文則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論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領導一个有 500 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試行了这个理論，并且获得了成效。从 1800 到 1829 年間，他以股东兼經理的身分領導了苏格兰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



了使他名聞全欧的成效。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 2 500 人, 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 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 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 在这里, 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絕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 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 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創辦了幼儿园。孩子們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 他們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父母簡直很难把他們領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 13—14 小时, 而在新拉納克只劳动 10 小时半。当棉紡織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 4 个月的时候, 歇工的工人还繼續領取全部工資。虽然如此, 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 而且直到最后都給企业主們带来大量的利潤。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条件, 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 他說,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环境, 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 更不用說自由發揮其才能了。

“可是, 这 2 500 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給社会生产的实际財富, 仅仅半世紀前还需要 60 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問自己: 这 2 500 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 60 万人所应当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額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 他們除了領取 5% 的股息以外, 还得到 30 万英鎊 (600 万馬克) 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 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这些由机器創造的新財富, 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

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sup>①</sup>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sup>131</sup>。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

<sup>①</sup> 摘自“头脑中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sup>130</sup>。

敗而变得一貧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sup>132</sup>。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sup>133</sup>。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經在實踐上证明，無論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劳动市場，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換<sup>134</sup>；这种市場必然要遭到失敗，但是充分預示了晚得多的蒲魯东的交換銀行<sup>135</sup>，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並沒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見解曾經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紀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現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見解，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來說，社会主义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現，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于時間、空間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絕對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創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創始人那里，絕對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識水平和思維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絕對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使它

---

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倫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統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較温和的批評意見、經濟理論和各学派創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組成的色調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鋒利的稜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 二

这时,和十八世紀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現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頂峰。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复了辯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辯证論者,他們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证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辯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諾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謂形而上学的思維方式;十八世紀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們也能够写出辯证法的杰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sup>136</sup>和卢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們来簡略地談談这两种思維方法的实质。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織起来的画面,其中沒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細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們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轉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轉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

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sup>137</sup>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以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

的研究对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sup>138</sup>。在他們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別的东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样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範圍內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侶，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会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維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們互相間的联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了它們的运动；因为它只見树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說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較精确的研究时，我們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宮內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謀杀的合理界限，結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現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給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間，它的机体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长或短的一段時間，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別的东西。在进行較精确的考察时，我們也发现，某种对立

的两极，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对立，它們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結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場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們把这种个别場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地，对辯证法來說，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辯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們的联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运动、它們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自然界是檢驗辯证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檢驗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辯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圓圈运动，而是經歷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內，都是延續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辯证地思維的自然科学家到現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現在統治于理論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样感到絕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經达到的成果和傳統的形而上学思維方式之間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繪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证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間、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



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sup>139</sup>。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要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

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細节上也有許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虛构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來說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謂絕對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頂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自己是这个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包罗万象的、最終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認識的体系是和辯证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紀的純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籠統地拋棄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規律。無論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狹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說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現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規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現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

辯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門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識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学說——形式邏輯和辯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認識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經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間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資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說完全是撒謊。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論表現(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現)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經濟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屬因素順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們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时代的經濟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

会經濟結構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來說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辯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現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驅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經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現在已經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階級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間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階級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經濟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辯证法和現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現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說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拋棄掉。它愈是义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階級的剝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剝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問題是在于：一方面說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說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隱藏着的性质。这已經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經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場上所具有的全

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sup>①</sup>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

---

<sup>①</sup>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sup>①</sup>,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生产关系,并加了一个脚注:“在‘反杜林论’中是:生产力。”——译者注

成現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紀起經過简单协作、工場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編中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sup>140</sup>。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資料从个人的生产資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資料，就不能把它們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紡紗机、机动織布机和蒸汽錘代替了紡車、手工織布机和手工鍛錘；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資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現在工厂所出产的紗、布、金屬制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們当中沒有一個人能够說：“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計劃地逐漸产生的社会內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滿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紀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們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滲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計劃的分工中間，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組織起来的有計劃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現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場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計劃的組織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個的部門中遭到失敗，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



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

有形式<sup>①</sup>。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

---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

木材和燃料；妇女紡麻，紡羊毛等等。以交換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換是有限的，市場是狹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絕的，地方内部是团結的；农村中有馬尔克<sup>①</sup>，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現，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規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縛已經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經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經表現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組織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結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門被采用，就不容許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場地变成了戰場。偉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銷售市場扩大了許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場手工业的轉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間；地方性的斗争已經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商业战争<sup>141</sup>。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在产业和产业之間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間，生存問題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敗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

<sup>①</sup> 見书末的附录。[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馬尔克”。見本卷第351—369頁。——編者注]

現为人类发展的頂点。社会化生产和資本主义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組織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間的对立。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現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誠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漸縮小；运动宁可說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終。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終結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資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說，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資本在經營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軍（我早在 1845 年就这样称呼他們<sup>①</sup>），这支后备軍在工业开足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潰又被拋到街头，这支后备軍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对資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絆脚石，是把工資抑制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成了資本用来对付工人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資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資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

<sup>①</sup>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第 109 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 頁。——編者注〕

役工人的工具<sup>142</sup>。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省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sup>143</sup>；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sup>144</sup>。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機器的已經達到最高程度的改進的可能性，怎樣由於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而變成一種迫使各個工業資本家不斷改進自己的機器、不斷提高機器的生產能力的強制性法令。對資本家來說，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的單純的實際可能性也變成了同樣的強制性法令。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阻力的、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阻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和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和深方面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屬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 *crise pléthorique* 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sup>145</sup>。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觉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危机期间这种集中是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

力下失灵了。它已經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資料全部变成資本；生产資料閑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軍也不得不閑置起来。生产資料、生活資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財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貧困和匱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变为資本。因为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資料要不先变为資本，变为剝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具有資本屬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資料和工人之間。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結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資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繼續駕御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資本的那种屬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資本屬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內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無論信用无限膨脹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資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潰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資料推向如像我們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資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規模就很大，它們排斥任何其他的資本主义經營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門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調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們規定應該生产的总产量，在他們中間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預先規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們就趋向于更加集



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門变为一个唯一的龐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壟断；例如还在 1890 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 48 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轉到了一个唯一的、統一领导的、拥有 12 000 万馬克資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轉为壟断，而資本主义社会的无計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計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資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剝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剝削。

無論在任何情况下，無論有或者沒有托拉斯，資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終究不得不<sup>①</sup>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轉化

---

① 我說“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經濟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現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經濟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現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墮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說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会主义的創始人了。如果說，比利时政府出于純粹日常的政治和財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說，俾斯麦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職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議會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魯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無論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sup>146</sup>、皇家陶磁厂，甚至陆軍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議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設施了。

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工具，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工具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

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僕。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資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

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sup>147</sup>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

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的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平等、正義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因而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擺脫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狡詐和欺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但是，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所

以，階級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階級对生产資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統治、教育壟断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經濟、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現在已經达到了。资产階級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對他們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們的經濟破产則有規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屬於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費是因为缺乏消費者这种荒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資料的擴張力撑破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生产資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資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現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費和破坏，这种浪費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侶，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頂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費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資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們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現了**①。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現代生产資料即使在資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擴張力。根据吉芬的計算<sup>148</sup>，大不列顛和爱尔兰的全部財富約計如下：

1814年……22亿英鎊 = 440亿馬克  
 1865年……61亿英鎊 = 1 220亿馬克  
 1875年……85亿英鎊 = 1 700亿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資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

---

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sup>149</sup>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 45 500 万马克。

这时它本身已經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場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說来是沒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們变为商品。生产已經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別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終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規律日益显露出来，它們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組織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須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僱：**产生了产业后备軍**。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須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規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場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結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資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許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經暴露出自己无能繼續管理自己的社会



生产力。

(d)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 后来由托拉斯占有, 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 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 矛盾的解决: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 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 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 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 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 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 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 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

## 卡·馬克思 关于“哲学的貧困”<sup>150</sup>

卡尔·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是在1847年，即在蒲魯东的“經濟矛盾”<sup>151</sup>（副标题为“貧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問世的。我們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貧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該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經過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論，在“資本論”中得到了發揮。所以，閱讀“哲学的貧困”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門，因为像拉薩尔那样的現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馬克思同意把他的著作重新登載在我們的机关报上，这就是表示同情我們。

关于这次同蒲魯东論战的明显的傾向性，还要說几句话。一方面，蒲魯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經濟学家，如杜諾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經濟学家杂志”<sup>152</sup>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們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謾罵抨击那些作为現代社会主义的先驅而受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給力求闡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須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經濟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識到这一点的蒲魯东。

然而，蒲魯东逝世以后，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sup>153</sup>上的文章中，对这位战士的偉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

卡·馬克思写于1880年3月底

載于1880年4月7日“平等报”  
第2种专刊第12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平等报”校对过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卡·馬克思 工人調查表<sup>154</sup>

—

- (1) 你在哪一個工業部門工作？
- (2) 你工作的企業屬於誰，屬於私人資本家，還是屬於股份公司？私人企業主或公司經理姓什麼。
- (3) 請說明有多少職工。
- (4) 請說明他們的性別和年齡。
- (5) 招收的童工(男孩和女孩)最小是幾歲？
- (6) 請說明監工和不是一般雇員的**其他職員**有多少。
- (7) 有沒有學徒？有多少？
- (8) 除了固定的和經常有工作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節還從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 (9) 你的老板的企業是全部或主要為當地定戶生產的呢，還是為整個國內市場或為了向其他國家出口而生產的？
- (10) 你在什麼地方工作，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 (11) 如果你工作的企業在农村，那末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生活的主要來源？還是作為從事農業的補充收入，還是兩者相結合呢？
- (12) 干活是完全用手工方式，還是主要用手工方式，還是用機器？

(13)請講一下你工作的企业的分工情况。

(14)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15)請說明生产各个过程的工作場所的数目。談談你所从事的那部分生产过程,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从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經的緊張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的观点来談。

(16)請談談工作場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划給每个工人的地方),通風,温度,粉刷,厕所,一般卫生,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17)政府或地方机关对工作場所的卫生状况有沒有某种监督?

(18)在你的企业里有沒有引起工人特殊疾病的特別有害的因素?

(19)工作場所是不是摆滿了机器?

(20)有沒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傳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21)請讲讲在你工作以来发生过的造成工人殘廢或死亡的最严重的不幸事故。

(22)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請說明你的企业主为保证通風、防止爆炸和其他危險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23)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門,在铁路或其他特別危險的生产部門工作,請說明你的企业主有沒有采取防护措施?

(24)你的工作場所使用的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設備?

(25)在工作場所內外有沒有足够的消防器材?

(26)企业主**根据法律**是不是必須付給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或他

的家庭以撫恤金？

(27) 如果不是，那末企业主是不是用某种方式給那些为他发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賠償？

(28) 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某种医疗設施？

(29) 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請談談你的工作場所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机器？你是不是利用你妻子和孩子們的劳动以及其他輔助工人（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企业主”干活？你怎样同他們联系，是直接联系还是經過中間人？

## 二

(1) 請說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2) 請說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3) 在一个工作日內有哪些休息時間？

(4) 有没有規定一定的吃飯時間，或吃飯是不定时的。<sup>①</sup>

(5) 在吃飯時間干不干活？

(6) 如果用蒸汽，請說明实际的开关時間。

(7) 开不开夜工？

(8) 請說明童工和 16 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時間。

(9) 在一个工作日內，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換班？

(10) 政府有没有通过控制童工劳动的**法令**？企业主是不是严格遵守这些法令？

(11) 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門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設立学

① 沙·龙格对調查表的这一項作了下述补充：“在哪里吃飯，室內还是室外？”

——編者注

校？如果有，那末一天中哪些時間孩子們是在學校度過的？他們學習些什麼？

(12) 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采用怎样的换班制度，是不是由一班工人换另一班工人？

(13) 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日通常延长多久？

(14) 机器是专门雇工人来擦拭的呢，还是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在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15) 采用哪些规则和处分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午休后准时上工？

(16) 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后回家要花多少时间？

### 三

(1) 你的老板规定了怎样的雇佣制度？你是按日、按周、按月雇佣的呢，还是按其他办法雇佣的？

(2) 规定解雇或离职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

(3) 如果由于企业主的过错而违反了合同，是不是追究他的责任，什么责任？

(4) 要是工人违反合同，会遭到怎样的处罚？

(5) 要是使用学徒劳动，那末和他们订的合同有哪些条件？

(6) 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7) 你的企业主要是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呢，还是通常相当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末在其他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8) 你的工资是怎么计算的？是计时还是计件？

(9) 如果是計時，那末怎樣同你結算？是按鐘點還是按整個工作日？

(10) 加班是不是補發工資？

(11) 如果你的工資是計件的，請說明是怎么計算的？如果你工作的生產部門里完成的工作是用尺量或過磅計算的（如煤礦），那末，你的老板或他的幫手是不是用欺詐手段剝奪你的部分工資？

(12) 如果你的工資是計件的，那有沒有拿產品質量作為欺詐的借口，來克扣工資呢？

(13) 不論是計時工資還是計件工資，你**過多長時間**領工資？換句話說，在你領取已經完成的工作的工資以前，你給老板的貸款有多長時間？什麼時候發工資：一星期以後，一個月以後，或還要長？

(14) 你是不是感到：這樣拖延發工資，就迫使你經常跑當舖，付出高額利息，同時使你失去你所需要的物品，或者迫使你向小鋪老板借錢，變成他們的債戶，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5) 工資是由“老板”直接發給，還是經過中間人或“包工頭”等等？

(16) 如果工資是經過“包工頭”或其他中間人付給的，請列舉你的合同條件。

(17) 請說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資有多少。

(18) 請說明和你在同一工場工作的女工和童工在上述時間內的規定工資。

(19) 請說明最近一個月內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資。

(20) 請說明最近一個月內最高和最低的計件工資。



(21)請說明在上述時間內你的實際工資；如果你有家，也請說明你妻子和孩子的工資。

(22)工資是付給現金，還是一部分付給別的東西？

(23)如果你向你的企業主租房，請說明有哪些條件。企業主是不是從你的工資中扣除房租？

(24)請說明下列日用必需品的價格<sup>①</sup>：

(a)房租和租房條件；有幾個房間；多少人住；房屋修繕和保險；家具購置和修理；寄宿；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b)食品：麵包、肉類、蔬菜（馬鈴薯等）；乳製品、雞蛋、魚；黃油、植物油、脂肪；糖、鹽、調味香料；咖啡、茶葉、菊苣；啤酒、西得爾酒、葡萄酒等；煙草；

(c)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衛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d)其他開支：如郵資，還債和付給當舖的保管費；孩子在校學習的各種開支，學費，買報，買書等等。交給互助會、罷工基金會、各種聯合會、工會等等的會費；

(e)和你從事的職業有關的開支（如有這種開支）；

(f)捐稅。

(25)請盡量算出你每周和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也請算出家庭的收入）以及每周和一年的支出。

(26)根據你個人的經驗，你是不是覺得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如房租、食品價格等等）比工資提高得更快？

(27)請說明你所記得的歷次工資變動情況。

(28)請介紹一下在蕭條或危機時期工資降低的情況。

---

① 由此以下至第 25 項馬克思是用法文寫的，以後仍用英文。——編者注

(29)請提供在所謂繁榮時期工資提高的情況。

(30)請介紹一下產品式樣改變以及局部或普遍的危機所造成的生產停頓的情況。

(31)請對照地談談你生產的產品價格或你提供的服務的價格改變情況和工資同時改變或不變的情況。

(32)在你工作以來是不是有過由於採用機器或其他改進而解僱工人的情況？

(33)由於機器生產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

(34)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時候有過由於生產改進而提高工資的情況？

(35)你是不是知道，有哪個普通工人在年滿 50 歲時可以脫離工作而靠他做僱傭工人時掙的錢過活？

(36)在你的生產部門里一個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少年？

#### 四

(1)在你的行業中有沒有工會？它們是怎樣活動的？

(2)在你工作以來你們行業的工人舉行過幾次罷工？

(3)這些罷工的時間有多長？

(4)是局部罷工還是總罷工？

(5)罷工的目的是不是提高工資，或是反對降低工資的做法？或是關於工作日的長短，或是由於其他原因？

(6)罷工的結果怎樣？

(7)你們行業的工人是不是支持其他行業工人的罷工？

(8)請談談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僱傭工人而規定的規章以及違反規章的處分。<sup>①</sup>

(9)企业主有沒有結成联合会,以便強迫工人接受降低工資、延長工作日、干涉罷工,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工人階級?

(10)在你工作以來,你是不是知道有政府方面濫用國家權力來幫助老板反對工人的情況?

(11)在你工作以來,這個政府是不是曾經幫助過工人反對企业主的勒索和非法的欺詐手段?

(12)這個政府是不是要求不顧老板的利益貫徹執行工廠法(如果有這樣的工廠法)? 工廠視察員(如果有這樣的視察員)是不是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

(13)在你的企業或你的行業中有沒有對不幸事故——疾病、死亡、短期喪失勞動力、年老等等進行互助的團體?

(14)加入這些團體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 這些團體的基金是不是完全受工人監督?

(15)如果繳納會費是強迫的並且是受企业主監督的,企业主是不是從工資中扣除這些會費? 他是不是支付這筆款項的利息? 被解僱或辭職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所交的錢?

(16)在你的生產部門有沒有工人合作企業? 它們是怎樣管理的? 它們是不是也像資本家那樣從外面僱用僱傭工人?

(17)在你的生產部門里有沒有這樣一種企業,在這種企業中,付給工人的報酬一部分是工資,另一部分則是所謂分紅? 請把這些工人的總收入和沒有所謂分紅的工人的收入作一比較。這種制

---

<sup>①</sup> 在手稿上刪去了下列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廠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權、審判權和行政權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編者注

度下的工人有些什么义务？是不是容許他們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許他們做老板的忠实奴僕？

(18)在你的生产部門里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一般的体力、智力和精神状况怎样？

卡·馬克思起草于1880年4月上半月  
載于1880年4月20日“社会主义評論”  
杂志第4期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导言<sup>155</sup>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几頁早先曾作为三篇論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評論”<sup>156</sup>上，它們是从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sup>157</sup>中抽出来譯成法文的<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現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引起了注意。“大綱”中已經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則。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階級状况”（1845），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魯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

---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导言的正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它們經作者校閱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資本主义生产的經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讀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做了一些补充。”——

編者注

报的撰稿人<sup>158</sup>。

在他旅居布魯塞尔时，他和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們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魯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設在倫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請，他們参加了这个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謀而不得不从法国逃出以后所創立的組織。从那时起，同盟就放棄了秘密組織的普通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还必需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倫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譯成欧洲的一切文字<sup>①</sup>。

同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魯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組織，参加这个組織的有资产階級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工人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萊茵报”的編輯之一，这家报纸是由馬克思在科倫創办的，于1849年5月被普魯士政府禁止。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願部队指揮官維利希的副官完成了反对普魯士人的巴登进军<sup>159</sup>（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倫敦做“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的撰稿人，这个刊物是由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

---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現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現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階級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結束資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階級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鮮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階級斗争的理論。”——編者注

de la guerre des pays allemands, qui fut, 19 ans après, repris à Leipzig  
comme brochure et parus par trois éditions.

Après la reprise du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Allemagne, Engels contribua au  
Volksrecht et au Vorwärts <sup>deux</sup> périod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ont la plupart  
a été réimprimée sous forme de pamphlets, tels que le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l'impôt de vente dans le Reichstag allemand, la question des  
habitations, l'immigration cantonale en Espagne etc.

En 1870, après avoir quitté Manchester pour Londres, Engels entra dans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où il fut chargé de la correspondance  
avec l'Espagne, le Portugal et l'Italie.

De série de denses articles qu'il contribuait au Vorwärts, sous le <sup>titre</sup> intitulé  
Bien-être des travailleurs de la société, après réponse aux questions

théoriques nouvelles de W. G. Dühring sur les sciences en général et les sociétés  
en particulier furent <sup>écrites</sup> et eurent un grand succès parmi les  
socialistes allemands. Vous devez dans le prochain prospectus d'envoi  
le plus typique de la partie doctrinale de ce livre, qui forme ce qu'on  
peut appeler une introduction aux sciences sociales scientifiques.

Cher Lafargue

Voilà le fruit de ma consultation (d'hier soir) avec Engels. Veuillez les  
prouver, laissez les choses en l'état.

Tout à vous

Karl Marx,

卡·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导言的最后一頁





“德国农民战争”，19年后在萊比錫印成小册子出版并連續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做了“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論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論俄国社会問題”、“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魯士燒酒”、“論住宅問題”、“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倫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負責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联系。

他寄給“前进报”并諷刺地題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組論文，是对杜林先生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謂新理論的駁斥。这些論文已經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們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論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門。

卡·馬克思写于1880年5月4—5日  
左右

載于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  
1880年版本校对过

## 卡·馬克思

### \*法国工人党綱領导言<sup>160</sup>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 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 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馬克思起草于 1880 年 5 月初

載于 1880 年 6 月 30 日“平等报”

第 2 种专刊第 2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平等报”

---

---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日內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 五十周年紀念大会<sup>161</sup>

公民們：

波兰人在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成立的偉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頓并肩战斗。1794年，当法国革命好不容易地抵抗同盟的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褲汉”军队，帮助他們去粉碎封建的欧洲。最后在1830年，当尼古拉皇帝和普魯士国王<sup>①</sup>蓄意重新进攻法国以實現其复兴正統王朝的計劃时，你們今天所紀念的波兰革命擋住了他們的道路。“秩序籠罩了华沙”。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殘的爱国战士們的同情和欽佩，人們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对其本身說来是多么不幸的起义——經常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子在各地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时候，从未停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編者注

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掩飾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本身就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魯士和奥地利的軍事专制，消灭蒙古人对現代社会的統治！

从 1830 年法国和英国的資产階級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来，无产階級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 1840 年，英国的有产階級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階級的第一个战斗組織宪章派。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柯夫，于 1846 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sup>162</sup>。从那时起，波兰就失去了有产者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1847 年，在倫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階級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sup>163</sup>，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結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們表示贊同代表大会的決議。

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德国、羅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大軍都有很多波兰人。他們無論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揮官，都表現得出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趋向被淹沒在六月日子的血泊中，然而 1848 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記这一点——的熊熊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1863 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議，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創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間也有巴黎公社的忠实保卫者。公社失敗以后，只要是波兰人，就会被凡尔賽軍事法庭下令枪杀。

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爭取无产階級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大都是无产階級的国际战士。

現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間发展起来的时候,願它得到宣傳界、革命报刊的支持,願它和我們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誼!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員

签名: 卡尔·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弗·列斯納

1880年11月27日于倫敦

載于“紀念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  
国际大会的报告文集”1881年  
日内瓦版

原文是波兰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卡·馬克思  
給維·伊·查苏利奇的信<sup>164</sup>

1881年3月8日于倫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經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遺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問題不能給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簡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曾經答应給圣彼得堡委员会<sup>165</sup>就同一題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誤解所謂我的理論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資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說：

“因此，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資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剝夺。这种剝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經歷着同样的运动。”（“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sup>166</sup>

可見，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經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頁）<sup>167</sup>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問題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

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則是要把他們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須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襲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馬克思

卡·馬克思写于 1881 年 3 月 8 日

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1924 年俄文版第 1 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倫敦舉行的  
巴黎公社紀念大會主席

(1881年3月21日)

公民：

非常遺憾，我們不得不通知您，我們無法出席你們的大會<sup>168</sup>。

當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衛者所策劃的殘酷的大屠殺而陷於失敗的時候，勝利者決沒有想到，為時還不到十年，在遙遠的彼得堡居然會發生這樣一個事件<sup>169</sup>，它經過鬥爭，也許是長期而激烈的鬥爭，最終肯定要導致俄國公社的建立。

他們也沒有想到，在普魯士國王<sup>①</sup>由於包圍巴黎而迫使當權的資產階級去武裝人民、從而給公社的建立作了準備以後過了十年，這同一個普魯士國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會黨人包圍起來，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嚴才能保住他的王位<sup>170</sup>。

另一方面，大陸上的各國政府在公社失敗以後採取了迫害手段來迫使國際工人協會放棄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組織，它們以為它們能夠用法令和非常法來摧毀偉大的國際工人運動，可是它們決沒有想到，過了十年，這同一個國際工人運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

① 威廉一世。——編者注



為強大，它不但席卷了歐洲的工人階級，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階級；為了共同利益、反對共同敵人的共同鬥爭，將把工人們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規模更大的自發的國際，這個國際將愈來愈超過協會的任何外在形式。

總之，舊世界的當權者們認為已經徹底消滅的公社，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們可以和你們一起高呼：公社萬歲！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寫于

1881年3月21日

第一次載于1933年11月7日

“真理報”第308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接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給“每日新聞”編輯的信

閣下：

在今天的“每日新聞”上，一篇題為“追問‘自由’周报”的文章寫道，刊載關於俄國皇帝<sup>①</sup>之死的文章的那一期周报，“還有幾處暗示了秘密襲擊市長官邸的罪犯”。雖然上面提到的文章同那篇關於彼得堡事件的文章毫無關係，可是因為這種看法可以從同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相反的意義上去解釋，而且由於該報編輯莫斯特先生目前不能親自在報刊上為自己辯護，所以我們請求您把下面一段逐字逐句按上述那期“自由”周报譯出的全部有關“秘密襲擊市長官邸”的話刊登出來。

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

“星期三晚上，不知‘何許人’把一只裝有約十五磅重火藥的箱子放在西蒂區市長官邸前面。它的一端已點燃，但是有個警察‘偶然’發覺了這東西，他十分勇敢，一下就把火撲滅了。我們不明白，這種爆炸可以達到什麼目的。看來，國際警察無論如何都知道要怎樣在這件事上撈一筆資本。第二天晚上，有人在議會中向政府提出質問，問政府打算採取什麼措施來對付在倫敦長住下來的一幫社會主義分子。但是，內務大臣並不認為需要採取什麼措施，只是以聳聳肩來回答。這就是國際警察的一切努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獎賞。”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寫于  
1881年3月31日  
載于1881年4月1日“每日新聞”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並根據  
“每日新聞”校對過

① 亞歷山大二世。——編者注

---

弗·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資<sup>171</sup>

这句话，成了近 50 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 1824 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sup>172</sup> 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 50 年前甚至 30 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期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資，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資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續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額。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資額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數額，有时低于这个數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數額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數。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損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給資本家，也就是說，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給多少就給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資本家給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許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讓我們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問題。根据政治經濟学家的說法，工資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應該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資本家不能同工人談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資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資生活；因此，必須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時間、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沒有公平的起点。飢餓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來說，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sup>①</sup>从工

---

① 英文原文为«hands»(指的是“劳动力”，“工人”)。——編者注

作崗位上排擠出去。而排擠的速度，比國內的工廠吸收和雇用這些被排擠的“幫手”的速度要快得多。這些被排擠的“幫手”，形成一支真正的產業後備軍，供資本利用。如果營業不好，他們就會挨餓、行乞、偷盜或者進習藝所。如果營業好，他們可以隨時被用來擴大生產。除非這支後備軍中的最後一個男人、女人或兒童都找到工作（這只有在瘋狂的過度生產時期才辦得到），否則這支後備軍的競爭總是會把工資壓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會加強資本在與勞動的鬥爭中的力量。在與資本的競賽中，勞動不僅處於不利地位，而且還要拖着釘在腳上的鐵球。但是，根據資本家的政治經濟學，這是公平的。

但是我們要問，資本用來支付這筆極其公平的工資的錢，究竟是从哪儿來的呢？當然是從資本中來的。但是資本並不產生價值。除土地以外，勞動是財富的唯一來源，資本本身不過是積累起來的勞動產品而已。所以勞動工資是由勞動支付的，工人的報酬是从他自己的產品中支取的。按照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平，工人的工資應該相當於他的勞動產品。但是按照政治經濟學，這並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勞動的產品落到了資本家手里，工人從中得到的僅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這種不平常的“公平”的競賽結果就是，勞動者的勞動產品不可避免地積累在不勞動者手里，並變成他們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產這些產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關於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講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資的公平是完全一樣的。但這一點需要留到以後去談。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已經很清楚，這個老口號是過時了，今天已經不大適用了。政治經濟學的公平，既然忠實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會的規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邊的、偏在資本

一边的公平。因此,我們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資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1—2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81年5月7日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1号

## 弗·恩格斯

# 雇佣劳动制度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們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这个历来推崇的口号，并得出結論說：在目前的社會条件下，最公平的工資必然相当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資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滿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延續他的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經濟学的規律，或者換句話說，这是目前社会經濟組織的規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sup>173</sup>在內，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階級，即一方面是資本家，全部生产資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壟断者，另一方面是工人，被剝夺了一切生产資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組織存在，工資規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鍛造鎖鏈，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的、却被資本家所壟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为了反对这一規律已經斗争了将近六十年——而結果怎样呢？他們有沒有把工人階級从資本——工人階級亲手生产的东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他們有沒有使哪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們自己的生产資料即他們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

他們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他們不仅沒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沒有试图这样做。

我們决不是說，工联沒有做到这一点，就沒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階級同資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額等于在某一国家內按照該国一般的生活水平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維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額。对于不同階层的工人來說，这种生活水平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資額和縮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偉大功績，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倫敦东头，有許多行业，它們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掙的工資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組織，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們的工資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沒有組織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須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他們的生活水平逐漸降低，他們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資生活，于是他們的工資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們自己不得不认为够用的那个水平。

因此，工資規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內并不是毫无伸縮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蕭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資額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結果而变动。工資在一切場合，都是由討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討价还价中，誰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誰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資本家討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敗，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結成一个强有力的組織，在工人中間募集基金，使他們在必要时能够同他們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



談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們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經濟制度來說,可以說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資。

工資規律並沒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在这些斗争的压力下實現的。如果沒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連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規則应得的也得不到。資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場价值。这要证据嗎?請看看付給大工联会員的工資,再看看倫敦东头这个永久貧困的深淵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資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階級經濟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資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階級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滿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資。資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資),因为他是劳动資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階級在成为一切劳动資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們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15—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5 月 21 日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 3 号

## 弗·恩格斯

### 工 联

#### —

在本报上一号，我們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談到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資經濟規律的实现。我們現在再回到这个題目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們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釋都懂得，不論个别资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資。大卫·李嘉图曾經无可反駁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費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潤。既然，在每一个个别場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資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潤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資，就等于說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潤。

我們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暫時增加利潤，但它們并不改变一般規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談了。

既然工資額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經濟規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資呢？工資的經濟規律是存在的，而且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們看到，它是有伸縮性的，这种伸縮性表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資水平或者直接降低，使該行业的工人逐漸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間接降低，即

增加每天的劳动時間(或同一時間內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資。

每个个别資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資以增加自己利潤的利己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資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們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潤，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資。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資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資額施加的压力，由于資本家之間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潤多少的問題，現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經常不断的压力，是沒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沒有組織起来的行业中，工資有不断下降的趨勢，而工作時間有不断增加的趨勢。这个过程緩慢地然而确实是地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們逐漸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資愈来愈接近絕對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絕對不可能生活和延續他的后代了。

大約在本世紀初，曾經暫時出現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資，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資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資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工匠、剪絨工、手搖紡紗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現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慢慢餓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漸漸又排挤了那些工資优厚的工人，人們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1815年普遍和約的締結，恢复了經常的貿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

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1824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sup>174</sup>。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

棉紡廠主們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來了，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怎樣在對他們有利的时候組織罷工，而且組織得不比任何工聯差，甚至還要好。

這樣，工聯活動的結果是：工資規律違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實現；任何組織完善的行業的工人，都能獲得至少接近於他們被雇主僱用的勞動力的全部價值；在國家法令的幫助下，工作時間至少不過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於使勞動力過早地耗盡。但是，這是工聯在目前的組織情形下能夠希望達到的極限，就是這些也只有經常地鬥爭、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達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營業波動，可以一下子把已經爭取到的一切破壞，於是鬥爭又得重新開始。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從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階級還是照舊，還是我們的先輩憲章派直言不諱的僱傭奴隸階級。難道這一切努力、自我犧牲和苦難的最後結局應該是這樣的嗎？難道這將永遠是不列顛工人的最高目的嗎？還是英國工人階級最後應當努力突破這個惡性循環，從徹底廢除僱傭勞動制度的運動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們將考察工聯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者的作用。

## 二

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就工聯在幫助調節工資額並保證工人在和資本作鬥爭時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我們的論題不只限於這一方面。

我們談到了工人反對資本的鬥爭。不管資本的辯護士怎樣加以否認，這種鬥爭確實是存在的。只要減少工資仍舊是增加利潤的最可靠、最簡便的方法，而且，只要僱傭勞動制度本身仍舊存在，

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sup>175</sup>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 100 万到 200 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

府，不論輝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都必須加以重視。

这些强有力的組織，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的傳統，直到現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調节工資、工作時間以及要求廢除公开敌視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經讲过的那样，它們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們能够希望的一样。但是它們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統治階級對它們的力量比它們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願地向它們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戶主选举法<sup>176</sup>至少使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沒有預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們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嗎？如果工人沒有在管理他們的規模巨大的工联組織方面证明他們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嗎？

这项措施为工人階級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階級在倫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們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資本斗爭，即把本階級的人派到議會里去。在这里，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說，工联忘記了自己作为工人階級的先进部队的責任。这个新武器在它們手里已經有十年多了，但是它們几乎从来也沒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們不应当忘記，如果它們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階級的前列，它們就不能保持它們現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階級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議會，却还是永远滿足于让資本家或資本家的办事員如律師、編輯等等来代表它，这是違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許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階級正在意識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錯誤的道路，意識到当前这个專門为了增加工資、减少工作時間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識到禍

根不是工資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認識在工人階級中普遍地傳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們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階級唯一組織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們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

所以，有組織的工联必須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階級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議會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階級也很快就会了解，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議會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廢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須要有組織，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組織，而是整个工人階級的組織。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組織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顛工人階級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20 日  
左右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5 月 28 日  
和 6 月 4 日“劳动旗帜报”(倫敦)  
第 4 号和第 5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 弗·恩格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6月9日，星期四，在下院里，蒙克先生(格罗斯特)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说：

“同法国签订的任何通商条约，如果不是以进一步减低关税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那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接着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查·迪耳克爵士代表政府用外交礼节所要求的方式表示了温和的抗拒。詹·阿·巴尔福先生(塔姆沃思)主张用报复关税来迫使外国采用较低的关税。斯拉格先生(曼彻斯特)主张甚至不用任何条约，让法国人自己去发现我们同他们的贸易对于双方有什么价值。伊林沃思先生(布莱得弗德)对于通过通商条约达到自由贸易表示失望。麦基佛先生(柏肯海德)声称：现在的自由贸易制度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它只是由自由的进口和有限制的出口构成的。决议案以77票对49票通过了。这一失败既不会伤害格莱斯顿先生的感情，也不会损害他的地位。

这次辩论是一连串翻来复去的抱怨的鲜明例子，抱怨愚蠢的外国人以及同样愚蠢的殖民地臣民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自由贸易的普遍好处及其去除一切经济弊病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sup>177</sup>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这种预言说：自

由貿易一旦在英国建立起来,就会使国家得益非淺,以致其他国家也必然会照样仿效,并向英国的商品开放自己的港口。然而,这些自由貿易信徒們的甜言蜜語依然是曠野里的呼叫。不仅欧洲大陆和美洲整个說来都提高了它們的保护关稅,甚至不列顛的殖民地,一旦获得了自治,就跟着仿效;印度剛被置于国王管轄之下<sup>178</sup>,那里就規定对棉紡織品抽 5% 的关稅,以鼓励本地工业。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对曼彻斯特学派來說,是一个无法知道的秘密。其实,这是显而易見的。

約在上一世紀中叶,英国是棉紡織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紡織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紡織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紡織工业的革命。大不列顛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現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侖战争,約有 25 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場和欧洲某些市場上获得了实际的壟断地位。当 1815 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經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們前面了。

但是和平的恢复,很快地促使其他国家也走英国的道路。法国靠保护关稅这道万里长城的庇护,也采用蒸汽进行生产。德国也这样做了,虽然它的关稅在当时远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內)都公平。別的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同时,不列顛的土地貴族为

了提高地租,实施了谷物法<sup>179</sup>,因而提高了粮食价格,同时也提高了工资金额。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约到1830年,英国竭力想成为“世界工厂”。反谷物法同盟<sup>180</sup>所抱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在当时,并不隐讳取消谷物法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能使不列颠的厂主们抵抗那些邪恶的或愚昧的外国人用以威胁他们的一切竞争。英国由于在机器方面的巨大进步、由于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世界,而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是天意,你若反对,就是完全违反天意。最多可以让法国供应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一些不能用机器制造的、而且是开明的厂主根本不加理会的嗜好品和时髦品。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富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他们对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帮手们”说:“伙计们,好日子就要来到了,再稍等一会儿吧。”当然,“帮手们”一直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当“帮手们”等待的时候,那些邪恶而愚昧的外国人却没有等待。他们看不出这种制度的美好,在这种制度下,英国所保持的工业上的暂时优势,会成为使它能永远壟断全世界工业的手段,并且使其他各国都降为英国的单纯的农业附庸,换句话说,就是降到爱尔兰的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因此他们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于民族的迫切需要,并用高额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

他們看来好像是保障自己不淪于爱尔兰所处的那种經濟地位的唯一手段。

我們的意思并不是說，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都是对的。相反地，法国如果大踏步地走向自由貿易，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德国这样的工业是在自由貿易之下达到今天的状况的，而俾斯麦的新的保护关税法不会損害別人，只会損害德国的工业家本身。但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絕對必要的，这就是美国。

美国正处在推广工业已成为全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充分证明：在发明節約劳动力的机器方面，走在前列的已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代替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輸入英国，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工业部門。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精力最旺盛的人民，它的煤田和英国相比，英国的煤田就显得几乎等于零，它的铁和其他金屬也很丰富。这样一个国家，經過二十年左右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能使它的工业馬上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那末能否設想它会让自己年輕的正在成长的工业去同早就建立的英国工业进行长期的持久的竞争呢？但是，曼彻斯特学派說，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只会害它自己。正如一个人多出車費坐一小时行駛 50 英里的特別快車，而不坐一小时行駛 12 英里的旧的减价列車，只是害了自己一样。

毫無疑問，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織品在印度和中国跟英国的棉織品竞争，并逐漸在这两个主要市場上爭得地盘；美国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內）和英国貨展开竞争。使佛来米的工場手工业轉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轉移到英国的这种无

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在几个大陆国家中遇到强大的竞争者。

英国工业壟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如果“开明的”资产阶级以为隐瞒这点对它有利的話，就让工人阶级大胆地正视这一事实吧！因为这件事对他們的利害关系甚至超过那些“上等人”。这些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依然是世界的銀行家和放債人，正如在他們以前的威尼斯人和荷兰人在沒落的时期那样。但是，当英国巨大的对外貿易开始每年縮减而不是增长时，“帮手們”将会怎样呢？如果把铁船制造业从太晤士河移到克萊德河，就足以使倫敦东头陷于长期的貧困。那末，当英国所有的主要行业都真正移到大西洋彼岸时，对英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結果将会作出一件大事，即粉碎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鏈条的最后一环。这一环就是他們为該国的壟断所进行的共同工作。这一壟断一旦被消灭，英国工人阶级将被迫謀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結束雇佣劳动制度。我們希望他們不会一直等到那个时候。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6 月 18 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 7 号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 弗·恩格斯

### 两个模范地方議會

我們答应过我們的讀者介紹英国工人运动和外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有时我們有机会报道了某些关于美国的新事物。目前有可能向讀者介紹法国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很重要，值得在我們報紙的社論中加以討論。

在法国，公开投票的方法沒有像英国仍然采用的那么繁多。在那里，議會选举和地方机关选举的投票方法沒有什么区别，通常都采用投小球的办法进行公开普遍的表决。法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該党通过了一項決議，决定不仅在議會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而且在一切地方机关选举时也提出工人候选人。这样，今年1月9日在法国举行的最近一次地方議會选举中，年輕的工人党在很多的工业城市和一系列的村鎮里，特别是在那些有矿場的地区获得了胜利。它不仅使某些候选人当选，而且在有些地区爭取到了議會中的多数，并且还有一个議會（下面就会看到）完全是由工人組成的。

在“劳动旗帜报”創辦前不久，在和比利时交界的魯貝城发生了一次工厂工人罢工。政府立刻把軍隊开到了該城，同时借口維持秩序（其实秩序絲毫沒有受到威胁），試图挑起罢工者采取一些好让軍隊的干涉找到借口的行动。但是工人們却沉住了气，这里

主要是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議會的活动帮助他們頂住了一切挑釁。引起罢工的原因曾在議會中报告过，并且經過了詳細的討論。結果，議會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决定撥款 50 000 法郎或 2 000 英鎊支援罢工者**。后来只是由于省长反对，这笔款項才沒有支付。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議會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議會的任何决定的执行。然而城市自治机关的这项决定給予罢工者道义上的重大支持，对工人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

6月8日，法国中部（阿利埃省）科芒特里的采矿公司解雇了152名拒絕服从新实行的令人憤慨的作息制度的工人。于是全体矿工約1600人就宣布罢工，对最近逐漸实行不利于工人的作息制度的做法表示抗議。这时市議會也立刻站在工人方面。在6月12日（这天还是星期天）的會議上做出了几項決議，內容如下：

一、鉴于社会有責任保证那些以自己的劳动保证整个社会生存的人的生活，又鉴于国家当局拒絕履行这项职责，——市鎮承担这项职责；本議會决定：提供由富有公民担保的借款25 000法郎（1 000英鎊）；此款系用来支援由于自己的152名伙伴被不公道地解雇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矿工。

一致通过，只有地方长官反对。

二、鉴于国家把寶貴的国民財富——科芒特里的矿場卖给股份公司，从而也把在那里就业的工人交给这个公司任意处置；因而国家应当注意使公司对矿工們的压迫至少不要达到威胁他們生存的地步；国家提供軍隊供公司在罢工期間使用，这样就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还站在公司方面；

本議会有責任保卫工人階級的利益，为此特向专区区长提出如下要求：

（1）迅速召回軍隊，因为毫无理由地把軍隊派遣来此，是一种直接的挑釁行为；

（2）要求并責成公司經理取消引起罢工的措施。

一致通过。

在第三項決議中（也是一致通过的），議會考虑到市鎮的經費有限，对发放債款可能不够，因此宣布为罢工工人在社会上募捐，并請求法国所有的城市自治机关也来資助罢工工人。

因此，在这里我們看到工人不仅参加議會，而且还参加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的惊人的效果。如果英国工人也能得到自己的市議會的支持，那末英国罢工的結局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然而現在充斥于英国市議會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的全是企业主及其直接和間接的代理人（律师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小店主而已。

一旦发生罢工或同盟歇业，地方当局立刻用自己的全部道义权力和物质权力来維護业主，反对工人；由工人掏錢供养的警察也被用来干法国军队所干的事，即挑撥工人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加以陷害。

以执行济貧法为己任的当局，对那些在它們看来不論怎样都得做工的人，照例拒絕給予任何帮助。这也是应当預料到的事。在工人们容忍其代表参加地方管理机关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看来，罢工簡直就是反对現存社会制度的暴动，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踐踏。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还同意把企业主及其代表选入地方自治机关，那末每当发生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地方机关总是会用它全部的巨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支持企业主。

我們希望，法国这两个市議會的活动能使許多人睜开眼睛。难道要永远让人說，而且也對英国工人說，“这些事在法国进行得比較好”嗎？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組織，长期以来享有政治自由，又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經驗，因此它比之大陆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具有很多优越条件。可是德国人在国会中已有了 12 个工人代表，而且像法国那样，工人在許多市議會中占多数。的确，在英国，工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工人阶级却占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的多数。因此只要願意，这个潜在的多数就会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变成工人人口集中的一切地区中的力量。如果工人能在議會中、在市議會中、在地方济貧委员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們将給那些經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下半月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6 月 25 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 8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 美国的食品和土地問題

从 1837 年秋天以来，我們对于金融恐慌和商业危机从紐約輸入到英国来已經习以为常了。每十年重复一次的工业危机，每两次中至少有一次是在美国爆发的。但是，美国还是能够推翻英国农业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彻底改变大地主同租佃者之間的古老的封建关系，消灭英国的地租，并使英国的农田荒蕪——这就是对十九世紀最后 25 年的展望。

現在还是这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現在正在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进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沒有任何旧土地能和它竞争。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伏，沒有陡峭的崗巒阻隔，完全和第三紀海底慢慢淤积起来的状况一样，沒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一犁就可以播种，可以連續收获二三十次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規模耕作的土地，并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規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往往拿他們的大农場来和大陆上自耕农的小农户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大草原上那些占地 4 万英亩甚至更大的农場，是由訓練、指揮和組織得像兵士一样的人、馬和工具的正規軍来耕作的，比起这样的

农場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場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具，使他們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場主都不能和它竞争，至少在他必須繳納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請看 1879 年，那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情形。那一年西欧各地收成都不好，在英国年景也很坏。然而，由于美国的谷物，谷物价格差不多沒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場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場主开始騷动起来，大地主感到恐慌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現在是由在美国的生产費用加上運費决定的。而且，随着大草原上新耕地的开垦，这种情况将一年比一年更明显。而开垦所需要的农业工人的大軍，是我們自己从欧洲送去的移民。

以前，农場主和大地主总还能得到一种安慰：如果谷物无利可图，肉类会有利可图的。耕地变成了牧场，万事又如意了。但是，現在那条出路也被截断了。美国肉类和美国家畜的输出量在日益增加。不仅如此。至少还有两个大的出产家畜的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它們的大量过剩的、現在无法銷售的肉类运往欧洲，特别是运往英国。从科学的現状和它实际应用上的突飞猛进来看，我們可以肯定，最晚再过几年，澳洲和南美的牛肉和羊肉，就会保藏得很妥善地大量运过来。英国农場主的兴旺，英国大地主长卷的地租清单，那时将怎样呢？种植鵝莓、草莓这一类东西倒很不錯，不过，市場上已經充滿这一类东西了。沒有疑問，英国工人还能更多地消費这样可口的食品——但是，要先增加他們的工資。

几乎不需要說明，这种新的美国农业竞争的影响在欧洲大陆上也感受到了。那些大多是負債累累的小自耕农也受到同样深重

的影响，他们不像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农场主那样缴纳地租，而是支付利息和诉讼费。这是美国这种竞争的特殊影响，它不仅使大地产成为无用，而且也使小地产成为无用，因为它使两者都无利可图了。

也许有人会說，这种耗尽地力的制度，如像目前在美国西部所实行的那样，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还会好转的。当然，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足以使这一过程继续到下一世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类似的有利条件。有整个南俄的大草原，商人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买了土地，并作了同样的事情。有阿根廷共和国广大的草原，还有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土地，都同样适合于这种现代大农业和廉价生产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在它灭亡以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扼杀两次。

那末，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将怎样呢？结局将是而且一定是：我们就只好实行土地国有，并在国家监督下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耕种。到了那时，而且也只有到了那时，才会使耕种者和国家从农业经营中获得利益，不管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谷物和肉类价格怎样。如果那时大地主真要到美国去的话（他们似乎有这种倾向），我们就祝他们一路平安。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6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 弗·恩格斯

###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資理論

在另一栏里，我們发表了約·諾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指責我們在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社論<sup>①</sup>中的一些論点的。当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社論栏变成爭論历史事实或經濟理論問題的場所，但是，我們还是願意对这个人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站在官方政党的立場上，但显然还是真誠的。

我們說，廢除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資金額”，諾布尔先生反駁說，这是反谷物法同盟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保护关税論者的謬論”，并引了理查·科布頓的演說和同盟总会一篇宣言中的一些話作证明。

我們所討論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个厂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論的內容。把它归結为最簡短和最一般公认的說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說法），就是这样：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我国同外国的貿易，将直接增加我国的輸入，外国主顾将购买我国的工业品作为向我国輸入的交换，从而也将增加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因此，对我国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

---

<sup>①</sup> 見本卷第287—291頁。——編者注

需求也将增加，那末工資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理論，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們，这些淺薄的經濟学家，最后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論断：工資的漲落不是和利潤成反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粮食貴工資就低，粮食賤工資就高。这样，在谷物關稅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危机，就被該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純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廢除这些可恨的法規，它就必然会消失。他們宣称，谷物法是不列顛厂主和那些渴望他們的产品的、因缺乏不列顛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間的唯一巨大障碍。所以，在諾布尔先生所引证的一段話里，科布頓真的提出，1839年到1842年的营业蕭条和工資下降，是这几年来粮食过于昂貴的結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有規則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营业蕭条的一种正常現象，这种現象由于歉收，由于貪婪的地主制定法律来进行愚蠢的干涉而更延长并加剧了。

这就是科布頓的正式理論，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淺薄的經濟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篤信他的理論的，就像諾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盟的大部分人是老练的实业家，他們比科布頓更加关心做生意，并且一般說来在这方面比他更成功。对这些人來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們的“帮手們”面前，这种正式理論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当实业家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是不对顾客說真話的，如果諾布尔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避开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只要稍微追問一下，工資因谷物自由貿易的結果而必然提高意味着什么，就足以看出，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費品的工資的提高，很可能工資金

額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資嗎？当你进一步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时就往往会发现：工資金額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减少了的金額却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貿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馬上会有人告訴你，那主要是指望上述后一种可能：工資金額随着粮食等等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后者的下降足以抵偿工資的这种降低并有剩余。不仅如此，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掩飾他們的意見，他們說，要求廉价的粮食，只是为了降低工資金額，从而給外国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慣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慣于不总是把他們的話当做真話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們过去讲过的話，現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論，我們过去只字未提过。从經濟学來說，那是一种“謬論”，而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达到其自私目的的借口，虽然同盟的某些領袖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論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諾布尔先生引证了科布頓的話，說工人階級因看到小麦价格有跌到 25 先令一夸特的希望而“滿意地搓手”。工人階級当时并不小看廉价的粮食；但是，他們对于科布頓及其同伙的办法是太“滿意了”，以致过去几年中，他們使同盟在整个北方連召集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不可能。在 1843 年，作者曾經“滿意地”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贊成人民宪章的修正案而几乎使會議无法开下去。在这以后，規定了同盟的一切會議都要“凭票入場”，而这个票就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从那时起，“宪章派的搗乱”停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他們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他們所假装

的那樣是代表工人的。

末了，再簡單談一談同盟的工資理論。商品的平均價格等於商品的生产費用，供求的作用在於使它回到它所圍繞着擺動的那個標準。如果一切商品都是這樣，那末勞動（或者更確切些說，勞動力）這種商品也是這樣。因此工資額是由工人日常必需消費的那些商品的價格決定的。換句話說，如果其他一切情況保持不變，工資是隨着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而漲落的。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規律，所有的培倫涅特·湯普遜、科布頓和布萊特之流，都永遠反對不了這個規律。但其他一切情況並不是始終不變的，所以這個規律的作用，實際上因其他經濟規律同時發生的作用而變更；因此它看來是模糊不清的，有時甚至必須費一些力氣才能探索到。反谷物法同盟時期以來的這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經濟學家以此為借口，說什麼首先是勞動，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沒有真正確定的價值，只有一個上下波動的價格，這種價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調節，而同生產費用無關；並且說，要提高價格，包括提高工資在內，除增加需求外，沒有別的方法。這樣一來，就排除了工資額和食品價格之間的令人不愉快的聯繫，並且可以按照肤淺而可笑的理論來大膽地宣布：糧食貴工資就低；糧食賤工資就高。

也許諾布尔先生要問，在今天糧食賤的時候，工資是否一般地與1847年以前糧食因重稅而昂貴時一樣高，或者甚至更高呢？這要經過長時間的調查才能回答。不過有一點是怎麼都可以肯定的：哪一個工業部門生意興隆，同時工人有堅強的組織保衛自己，那里工人的工資一般都沒有下降，有時或許還提高了。這不過是證明從前付給這些人的工資低了。哪一個工業部門生意慘淡，或者那



---

里的工人沒有在工联中坚强地組織起来,他們的工資就一定下降,往往降到挨餓的地步。你們亲自到倫敦东头去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7 月 9 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 10 号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 弗·恩格斯 工人党

朋友和同情者多么經常地警告我們：“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來說，他們的意見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工人的机关，按政党的当前意义來說，必須既不是輝格党，也不是托利党，既不是保守党，也不是自由党，或者甚至不是激进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都只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代表在大地主、資本家和小商人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見。如果他們代表工人階級，那他們肯定是不正确的代表。工人階級有它本身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他們怎样維護他們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和縮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看到。但是，他們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給托利党、輝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階級的人物。差不多有 25 年，英国工人階級好像是甘願充当“偉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組織得最好的工人階級不相称的。在其他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已經存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 10 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取了臭名昭彰的鎮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們将在另一栏里談到<sup>①</sup>。

---

<sup>①</sup> 見本卷第 308—310 頁。——編者注

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工人党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在上星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6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席。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仿效德国人的榜样。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党，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资格太高，它们目前还没有派遣代表参加立法机关的机会。在法国，工人党目前正在大力组织中。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地方议会里取得了多数，在今年10月的普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得到几席。甚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是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末，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務，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要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到圣斯提芬<sup>①</sup>去是很容易的，在那里，输入新鲜的血液确实是极其必要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

---

① 指英国议会，因为有一个时期下院在圣斯提芬教堂召开。——译者注

让爱尔兰土地法案<sup>181</sup>像目前这样愈来愈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話<sup>①</sup>，即赔偿爱尔兰大地主的法案；也不可能抗拒如重新分配議席、使行贿真正受到懲罰、使选举費用由国庫支付（像英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情形那样）等等的要求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党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階級的开明人士（他們在英国不像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样多）可以加入这个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誠以后，可以在議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場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可是任何民主的政党，無論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階級的性质，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拋棄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騙。

这在英国比在外国甚至更符合实际。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即宪章派的政党瓦解以来，激进党人的欺騙不幸是够多的了。是的，但是宪章派毕竟瓦解了，而且毫无成就。真是这样嗎？在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財產資格限制，現在已經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戶主选举法的形式下至少是已經接近實現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見諸实现，因为这是現政府答应的一項改革。所以，宪章运动瓦解的結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綱領的一半。既然，仅仅对于一个过去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回忆，就能导致这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末，一个有四五十个議会代表支持的工人党的实际存在，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来呢？我們生活在一个人人必須照顾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階級却让大地主、資

<sup>①</sup> 俏皮話：«bill», «bull»。——譯者注

本家、小商人等阶级及其走狗——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顾它的利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是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它是有力量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那末，为什么不作这种努力呢？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中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3日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

## 弗·恩格斯

###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于俾斯麦及其爪牙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对自己的臣民敢于这样滥施暴行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得很。但是这一次被迫害的是工人，而且是以这一名称自豪的工人，所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界代表就隐瞒真相，并且从他们那么顽固地保持沉默来看，他们好像几乎是赞成这种暴行的。的确，工人能过问政治吗？让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去管好了！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攻击俾斯麦的非常法及其执行的方式，同时又要拥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手段<sup>182</sup>，那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痛的地方，它是碰不得的。我们很难期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由于现在政府在爱尔兰的行动，英国在欧洲和美洲的道义上的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普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前一次普选中，它得到了50多万张选票，而在上一次普选中，它的候选人得到了60多万张选票。柏林选出了两名代表，爱北斐特—巴门选出了一名，布勒斯劳、德勒斯顿各选出一名；尽管政府同自由的、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都结成了同盟，尽管两次谋杀皇帝事件

掀起了一片叫囂声，其他政党都異口同声地說这應該由工人党負責，工人党还是贏得了 10 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項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工人的报纸有 50 多家被查封，他們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他們的基金被沒收，他們的集会被警察驅散，而达到頂点的是下令規定可以“宣布”整个城市和地区“戒严”，正如在爱尔兰一样。但是，甚至英国的高压法<sup>183</sup> 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宣布戒严的”地区，警察有权把他认为有进行社会主义宣傳的“相当嫌疑”的任何人驅逐出境。柏林自然馬上就宣布戒严，于是有成百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就有成千入）被驅逐出境。因为普魯士警察总是驅逐有家眷的人，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驅逐不是什么严重的处罰，但是对于当家的人來說，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不是家破人亡，也是长期受折磨。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會議員，于是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驅逐的大約有 100 人，另外还有他們的家屬 300 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內筹妥了他們的旅費和其他急需。現在，萊比錫也宣布了戒严，唯一的借口是，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摧毀党的組織。第一天被驅逐的就有 33 人，大部分是有家眷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 3 名都是德国国會議員。也許狄龙先生会給他們去一封賀信，因为他們的处境还不像他自己的那样坏<sup>184</sup>。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并被剝夺了其他德国人表面上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該党的每个党员为所欲为了。在搜查違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們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們本身，警察可以随时加以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監獄里呆上几个月才

被釋放。警察發明了刑法典中所沒有的新罪名，而濫用刑法典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警察經常可以找到受賄的或狂妄透頂的長官和審判官來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升官晉級就是以這種代價得來的！下列的驚人數字可以表明所有這一切造成了怎樣的結果。從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內，單單在普魯士，因叛國罪、叛逆罪、侮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獄的就不下1108人，因政治誹謗罪、侮辱俾斯麥或誣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獄的不下10094人。11202個政治犯，這甚至超過了福斯特先生在愛爾蘭的豐功偉績哩！

俾斯麥用他的這一切高壓手段得到了什麼呢？正如福斯特先生在愛爾蘭所得到的那樣。社會民主黨也像愛爾蘭土地同盟<sup>185</sup>那樣蓬勃發展，擁有堅強的組織。幾天以前舉行了曼海姆市議會選舉。工人階級的政黨提出了16名候選人，他們以幾乎是三比一的多數全體當選。此外，代表德勒斯頓的德國國會議員倍倍爾，作為萊比錫選區的議員候選人，參加了薩克森議會競選。倍倍爾本人是一個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說他是德國最優秀的演說家，那也是最優秀的演說家之一。為了阻撓他當選，政府驅逐了他的整個競選委員會。結果怎樣呢？結果是，雖然選舉權受到了限制，倍倍爾還是以絕大多數票當選了。可見，俾斯麥的高壓手段對他絲毫沒有用處，相反，卻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剝奪了自衛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總有一天會採取非法手段的，沒有人能指責他們。格萊斯頓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是經常宣揚這種學說的嗎？而他們現在在愛爾蘭又是怎樣做的呢？

弗·恩格斯寫於1881年7月中  
作為社論載於1881年7月23日  
“勞動旗幟報”（倫敦）第12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勞動旗幟報”



## 弗·恩格斯 棉花和铁

棉花和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最重要的原料。哪个国家在棉織品和铁制品生产方面占首位，一般也就在工业国中居于首位。由于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只要情况不改变，英国总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

这样，人們滿可以认为英国棉紡織业和制铁业工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好，以为英国在市場上占了統治地位，生产这两类商品的行业該总是很兴旺的，至少在这两个工业部門，在鼓吹自由貿易的时期所許諾的千年王国一定是实现了。不幸！我們都知道，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如果工人的状况沒有变得更坏，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好些，那完全是由于他們自己的努力，由于坚强的組織和艰苦的罢工斗争。我們知道，在1874年前后短暫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后，棉紡織业和制铁业完全衰落了。工厂关闭，炼铁炉停火，繼續生产的，一般也是縮短了开工時間。这种衰落时期以前也有过，平均每十年重复一次；它們延續下去，直到被新的繁荣时期所接替，如此不断地循环。

但是，目前这个萧条时期，特别是在棉紡織业和制铁业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它持續的时间比一般的延长了几年。曾經有过几次复苏的尝试，有过几次向上的突进，但是全都无效。即使真正破

产的时期已经度过，营业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市场依旧不能吸收全部产品。

这里的原因是，在我们目前这种不仅利用机器生产工业品，而且生产机器本身的制度下，生产能够极其迅速地增加。如果工厂主想在一个繁荣时期内增加棉织品的纺织机械和漂白、印染设备，以便多生产 50% 的商品，并把生铁和各种铁制品的全部产量增加一倍，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实际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已经比过去扩大生产的时期大大增加了，其结果就是持续的生产过剩、持续的营业萧条。企业主有条件等待，至少能够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工人却只得忍受痛苦，因为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贫困，随时有进习艺所的可能。

这就是无限制竞争的光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科布顿、布莱特之流许诺的千年王国的实现！这就是劳动人民的遭遇，只要他们像在过去 25 年所做的那样，把帝国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的“天然领袖”，交给托马斯·卡莱尔所谓的那些负有指挥本国工业大军<sup>186</sup>的使命的“工业将领”。确实是工业将领！同他们相比，1870 年路易-拿破仑的将军们都是天才了。所有这些所谓的工业将领都相互斗争，各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们的邻居在做什么，最后他们都大吃一惊地发现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后果。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调节生产，他们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而联合起来，那就是降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不顾一切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他们就剥夺了他们的工人比较好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的繁荣的时期所给予他们的，也是工人经过长期的衰落之后，为了把自己的收入提高到平均的水平所应该享受的。工厂主作为一个阶级，再也没有

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连生产过程本身都没有能力管理，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英国工人的最大敌人是他们亲手造成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这虽然是事实，但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事实应当考虑。不只是英国的工厂主在扩大自己的生产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现有的统计材料还不允许我们把各先进国家的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分别地加以比较。但是在整个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格尔博士在他的《Das Zeitalter des Dampfs》（“蒸汽时代” 1881 年柏林版）<sup>187</sup>一书中提供的材料来作一个比较表。根据他的计算，这些工业部门在下列国家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总马力（1 马力等于在 1 秒钟内将 75 公斤重量提到 1 公尺高所需的力）：

	纺织工业	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
英国 1871 年.....	515 800	1 077 000 马力
德国 1875 年.....	128 125	456 436 // //
法国 .....	約 100 000	185 000 // //
美国 .....	// 93 000	370 000 // //

由此可见，英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国所使用的总的蒸汽动力，在纺织工业方面是英国的五分之三，而在采矿和金属工业方面几乎同它相等。既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它们的产量加在一起，不久就会超过英国，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再看下面这个表格，它表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蒸汽马力（机车和轮机除外）：

大不列颠.....	約 2 000 000 马力
美国.....	// 1 987 000 // //
德国.....	// 1 321 000 // //
法国.....	// 492 000 // //

这个表格更清楚地表明，英国在使用蒸汽的工业方面所保留的壟断是多么微不足道，自由貿易对于保持英国工业的优势是多么不頂用。請不要說，外国工业的这种进展是人为的，是保护关稅政策造成的。德国工业的巨大扩展，全部是在最自由的自由貿易制度下完成的。如果美国主要由于极端不合理的国内消費稅制而被迫采取一种与其說是真正的、不如說是表面的保护关稅政策，那末，廢除这些消費稅法令就足以让它在自由市場上竞争了。

这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說 25 年的絕对統治給这个国家造成的处境。我們认为，其結果就是要求曼彻斯特和北明翰的紳士們迅速让位，让工人阶级在以后的 25 年中来干。他們一定不会管理得更差。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 1881 年 7 月 30 日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 13 号

---

## 弗·恩格斯

###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常常有人問：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經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們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們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統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沒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謂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沒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总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末現在，这三个阶级的存在，都有什么必要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是经济上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它那种灭絕居民的倾向，簡直已經成为禍害了。把人民驅往大洋彼岸或置于饥饿的境地，而以羊或鹿来代替他們，这就是爱

尔兰和苏格兰的大地主們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肉食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地产可以退守的土地贵族将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掉。这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曾在1831年改革了议会<sup>188</sup>、废除了谷物法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呢?这个创立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当然,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

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继续以股息的形式，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

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或者实际上被接替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玛门<sup>①</sup>庙里赌个痛快。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的，可是却假装说钱是挣来的。可是他们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来源也许可以，但决不是结果。强行封闭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

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存在的这种真实情况，也在一切大工商企业中日益成为愈来愈真实的情况了。成立公司即变大的私人企业为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西蒂区的曼彻斯特大货棧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郎卡郡的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丹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代替了。不过有

---

① 财神之意。——译者注

一点不一样：手織机工人注定会慢慢餓死，而被代替的資本家却会慢慢脹死。但有一点他們一般說來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不知道对自己該怎么办才好。

因此，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的社会的經濟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資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所有关于“老板的眼光”及其創造的奇迹的廢話，当企业达到一定規模时，就成了純粹的胡說。想像一下倫敦和西北铁路的“老板的眼光”吧！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領工資的雇員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資本家再也不能要求取得他的利潤作为“进行領導的工資”了，因为他什么也沒有領導。当資本的辯护人向我們大放厥詞的时候，我們要記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們的前一号周报<sup>①</sup>里，我們已經試图說明：資本家階級已經变得沒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們一方面扩大生产，以便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場，而另一方面，却愈来愈无力抵禦外国的竞争。由此，我們看到，我們不仅能够不要資本家階級干預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們的干預愈来愈成为一种禍害了。

我們再一次向他們說：“走开！給工人階級来干的机会吧！”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8月1—2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論載于1881年8月6日

俄文譯自“劳动旗帜报”

“劳动旗帜报”(倫敦)第14号

<sup>①</sup> 見本卷第311—314頁。——編者注



## 弗·恩格斯 燕妮·馬克思(馮·威斯特华倫)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今年12月2日，卡尔·馬克思的夫人受疾病长期折磨以后在倫敦逝世了。

她出生于薩尔茨維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調到特利尔城任政府顧問，在那里和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样，两个天賦很高的孩子日益亲近起来。当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們两人已經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連結在一起了。

1843年，在馬克思主編过一段时期的旧“萊茵报”被查封以后，他們就結婚了。从此以后，燕妮·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熾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間。

这对新婚夫妇好像自願出境一样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願出境就变成真正的驅逐出境了。甚至在那里，馬克思也受到普魯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馮·洪堡竟卑鄙地为驅逐馬克思的命令而奔走。馬克思一家不得不搬到布魯塞尔。

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魯塞尔也随着动蕩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馬克思，而且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

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驅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重加干涉，便搬到倫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馬克思說来是真正的驅逐出境，她經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死去了。但是，政府勾結着資產階級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对他的丈夫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們用最卑鄙最下流的誹謗来誣蔑馬克思，所有报纸都不登載他的文章，他失去了自卫的一切手段，他在敌人面前突然陷于手无寸铁的境地，他和他的夫人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視。这使她蒙受了很深的創伤。这种情况繼續了很長時間。

但这并不是沒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階級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成立了。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便是先进战士中間的最先进者。补偿她所經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終於看到，曾經落在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蜚語已經烟消云散了，他那曾經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反动党派百般扼杀的学說，現在已經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語言广为傳播了。她生前終於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連的无产階級运动，已經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摧毀着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滿胜利的信心，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sup>189</sup>中光輝地显示了源源不竭的生命力。

这位具有极其敏銳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

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1881年12月4日于倫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弗·恩格斯 在燕妮·馬克思墓前的讲话

朋友們：

我們現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薩尔茨維德爾。她的父亲馮·威斯特華倫男爵在特利爾城時和馬克思一家很親近；兩家的孩子在一塊兒長大。當馬克思進大學的時候，他和自己未來的妻子已經知道他們的生命將永遠連結在一起了。

1843年，在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會舞台擔任舊“萊茵報”的主編，以及該報被普魯士政府查封以後，他們就結婚了。從此以後，她不僅和丈夫共患難、同辛勞、同鬥爭，而且以高度的自覺和熾烈的熱情積極投身其中。

這對新婚夫婦動身前往巴黎；自願的出境很快變成了被迫的出境。甚至在巴黎，馬克思也受到普魯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須遺憾地指出，像亞·洪堡這樣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魯士政府合作，慫恿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馬克思逐出了法國。馬克思到了布魯塞爾。二月革命爆發了。布魯塞爾也隨着動蕩不安，比利時警察局不僅逮捕了馬克思，而且毫無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監禁起來。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驅逐開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後來由於法國政府的干涉，便搬到倫敦。這次驅逐

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驅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驅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謂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誣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載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們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視，——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繼續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沒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經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經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誣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經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說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語言公开地胜利地傳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滿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輝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現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偉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沒有記載。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們將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見（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見）而感到遺憾。

我用不着說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們都知道而且永

---

远不会忘記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別人幸福視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弗·恩格斯发表于1881年12月5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1881年12月11日“平等报”

俄文譯自“平等报”

第3种专刊第1号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sup>190</sup>

巴枯宁翻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sup>191</sup>，由“钟声”<sup>192</sup>印刷所刊印問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譯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聞。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沒有說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龐大后备軍；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給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銷售市場。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現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規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資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壟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征服下去；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話般的資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現在来看看俄国吧！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連欧洲的資產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們对付剛剛开始觉醒的无产階級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領。現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錮在加特契納<sup>193</sup>，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資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試問：俄国公社<sup>①</sup>，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級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須先經歷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經歷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階級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 年 1 月 21 日于倫敦

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82 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譯出

① 在原稿中，公社一詞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語。——編者注



---

## 弗·恩格斯

### 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sup>194</sup>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經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遺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們，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們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問題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問題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們簡單談談這個問題的目前情况和鮑威尔对解决這個問題的貢獻。

从中世紀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紀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內，都是騙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說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滿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sup>195</sup>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騙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侶的欺詐。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滿着虔誠的狂热，但在其創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騙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鮑威尔在批判新約<sup>196</sup>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

方面表現出了可觀的成績。但這只是肯定了一般現象，却沒有說明這裡所要談的具體情況。

對於一種征服羅馬世界帝國、統治文明人類的絕大多數達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簡單地說它是騙子手湊集而成的無稽之談，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根據宗教借以產生和取得統治地位的历史條件，去說明它的起源和發展，才能解決問題。對基督教更是這樣。這裡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羅馬帝國的民眾，在一切宗教中特別愛好這種還是奴隸和被壓迫者所宣揚的無稽之談，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認為接受這種妄誕無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躍而為羅馬世界專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這個問題方面，布魯諾·鮑威爾的貢獻比任何人大得多。維耳克單純從語言方面考證了的福音書的時間順序和相互關係<sup>197</sup>，鮑威爾又根據它們的內容無可辯駁地加以証實了，儘管反動時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學家從1849年起竭力反對這樣做。按照施特勞斯含糊的神話論<sup>198</sup>，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書的記述當做历史的記述，鮑威爾徹底揭露了這種理論的非科學性。既然福音書的全部內容，幾乎絕對沒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實，那就可以說明連耶穌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實有其人也成問題，這樣，鮑威爾就掃清了解決下述問題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種體系的那些觀念和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而且是怎樣取得世界統治地位的。

鮑威爾畢生從事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還以高齡活着的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親，而羅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說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傳到現在的許多著作，實際上是諷喻體的唯理論的猶太

傳說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調和,已經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邏各斯(这个詞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間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獻給神的懺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轉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視有錢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視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規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謂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規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凱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揚,他凱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願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sup>199</sup>!

由此可見,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輪廓已經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邏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贖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說里去的,我們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創立宗教的人,必須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煩瑣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現在也是这样),我們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傳。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終形式(尤其是伊壁鳩魯学派),发展为无神論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則发展为一神論和灵魂不死說。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

的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維<sup>①</sup>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創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說。这样，一神論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現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們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創立基督教，并且一經創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羅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約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約記述的諷喻式的哲理解釋。这是鮑威尔沒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讀一讀所謂約翰启示录<sup>201</sup>，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謂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預言却很多。教义和倫理学是在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謂使徒行傳已經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訓誡方面是这样。鮑威尔已經证明，使徒行傳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襲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統的基督徒也已經看到了，不过他們硬說塞涅卡抄襲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約。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穌的福音傳說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間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

① 艾瓦德已經证明<sup>200</sup>，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維(Jahweh)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輔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Adonai)一字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讀成耶和華(Jehovah)。可見，这个字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語法錯誤，因为这在希伯來語中簡直是不可能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統治地位的原因，鮑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說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話来代替事实。所以，我們与其逐条研討鮑威尔的見解，倒不如談談我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鮑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羅馬的占領，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政治秩序，其次也間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羅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間的簡單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級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羅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說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貪財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庫而課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煩苛的賦稅，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羅馬法官根据羅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羅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蕩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間，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淪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漸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階級：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釋放的奴隶(見佩特罗尼烏斯<sup>202</sup>)、大地主、高利貸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貸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沒有财产的自由人，他們在羅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階級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沒有

权利。特别从提比利烏斯到尼祿这一时期，判处有錢的羅馬人死刑以沒收他們的財產，是一种常見的現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軍隊，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羅馬的农民軍隊；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現狀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軍事統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純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現狀的可能表示絕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頹廢。剩下的少数具有貴族气派和貴族思想的古羅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們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們沉溺于聚財和斗富、誹謗和傾軋之中。沒有財產的自由人，在羅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則境况困苦。他們必須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競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們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們也許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則是大地主的債務奴僕。这一階級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sup>①</sup>。最后是奴隶，他們沒有权利，沒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敗，也证明他們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們中間，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們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們不是單純賺錢謀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錢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

<sup>①</sup> 按照法耳梅賴耶尔<sup>203</sup>的研究，直到九世紀，迈納（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他們处境順利，他們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談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祿宮廷中的头号陰謀家，不可能不阿諛奉承。他让尼祿賞賜金錢、田庄、花园、宮室。当他宣揚福音中貧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祿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請皇帝收回一切賞賜，說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滿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揮动諷刺的鞭子，鞭笞他們那些蛻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則对新秩序贊賞不已，因为一切等級差别的取消，使他們得以全面制定他們心爱的私法，因而他們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羅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們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們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們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襲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結構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毀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潰。本民族神可以容許異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現象），但不能容許他們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羅馬，只損害了羅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簡直想說伏尔泰主义）在羅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羅馬帝国的奴役，是用絕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賴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現狀不堪忍受，未来也許更加可怕。沒有任何出路。悲观絕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脫——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

只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



分。連基督教也必須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謂約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傳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撥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鳴。人們抱怨时代的敗坏、普遍的物质貧乏和道德淪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識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墮落,罪在于你,在于你們大家,在于你和你們自己內心的墮落!哪里会有人說这是不对的呢? *Mea culpa* [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議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員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贖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褻瀆的神怒气冰釋。那末,一位中間調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贖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們在普遍墮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識。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創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墮落世界获取內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現世的宗教。

結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預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創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創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創始人,他們之間进行着一种可說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

---

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4 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2 年 5 月 4 日和 11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9 号和  
第 20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译出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論美国資本的积聚

不久以前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資本积聚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在进行**。根据这项统计资料，**紐約的万德比尔特先生是富翁中最大的富翁**。这位铁路、土地、工厂等等的大王的财产约有**3亿美元**（1美元等于4馬克25分尼）。按美国人的说法，他“值”3亿。他握有美国公債券（Bonds）6 500万美元，紐約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股票5 000万美元，以及其他铁路公司股票5 000万美元。此外，他在紐約和国内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地产。英国报纸还十分赞赏地说，万德比尔特先生能够买下任何路特希尔德这样的家族的产业，而仍旧不失为世界上最富的人。

万德比尔特一家积攒这份巨大产业……大约才花了三十年！“白厅评论”<sup>204</sup>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也是这样。

在大富翁名单上，继万德比尔特以后的是：

**杰伊·古耳德**，他也是一个出名的铁路骗子，拥有1亿美元；**麦凱**，銀矿主，争取“协议的复本位制”鼓动的组织者，拥有5 000万；**克罗克**，拥有5 000万；**約翰·洛克菲勒**，煤油冒险家，但不是煤油纵火犯<sup>①</sup>，拥有4 000万；**科·波·欣丁頓**，拥有2 000万；**达·**

<sup>①</sup> 俏皮話：《Petroleumritter》，《Petroleur》。——編者注

奧·米尔斯, 拥有 2 000 万; 参議員費尔, 拥有 3 000 万; 前州长斯坦福, 拥有 4 000 万; 拉塞尔·賽治, 拥有 1 500 万; 詹·罗·基恩, 拥有 1 500 万; 賽·琼·提耳登, 拥有 1 500 万; 爱·丹·摩尔根, 拥有 1 000 万; 賽米尔·斯隆, 拥有 1 000 万; 加里逊, 拥有 1 000 万; 賽勒斯·威·菲尔德, 拥有 1 000 万; 休·賈奇·朱厄特, 拥有 500 万; 悉尼·狄龙, 拥有 500 万; 戴維·道斯, 拥有 500 万; 霍賽·德·納瓦罗, 拥有 500 万; 約翰·約·加勒特, 拥有 500 万; 威·巴·阿斯特, 拥有 500 万。

其实这个名单还很不完全。美国金融巨头的人数还要多得多。而且, 由于向美国大量移民, 財富的这种惊人积累与日俱增。这种移民直接和間接都首先有利于資本巨头。所以說直接有利, 是因为移民促使地价迅速上漲。說間接有利, 是因为大量的移民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現在, 在我們美国的兄弟报纸登載的关于罢工的无数报道中, 我們发现反对**降低工資**的罢工的百分比愈来愈高, 而大多数要求提高工資的罢工实质上也具有这种性质, 因为这种罢工不是由于物价狂漲, 就是由于沒有像通常那样在春季提高工資而引起的。

因此, 現在欧洲每年向美国移民的潮流, 只是促使那里的資本主义經濟及其一切后果发展到极点, 因而那里早晚势必发生严重的破产。那时移民的潮流就会停止, 甚至可能倒流, 也就是說, 会出现这样的时刻, 那时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工人将面临抉擇: 餓死或者革命! 而一旦出現这种抉擇, 那末, 別了, 你們这些神圣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国的寵臣們!

这个时刻比大多数人所能想像的更近。移民在那里已难于找到工作, 快要到来的营业危机的征兆已看得愈来愈清楚, 在决定性

的时刻只要有最微小的事情做导火綫,就会发生破产!

所以,尽管我們和“紐約人民报”<sup>205</sup>一起为德国的侨民們悲伤,尽管我們相信德国的侨民首先引起美国工人境况的大大恶化,尽管我們和上述报纸一起希望德国工人集中全部注意力来专门改善自己在德国的境况,我們仍旧不能同意該报的悲观主义。我們毕竟应当重視环境,而由于我們的反对者的近視和貪婪,环境愈来愈排除采取真正改革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应当看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不顾任何懦夫而使人們对事变的革命进程做好精神准备。

这一冲突的证明就是:一方面資本大規模积聚,另一方面群众日益貧困。結局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5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82 年 5 月 18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1 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 弗·恩格斯 布雷的牧师

查理国王掌当朝，  
忠贞之士能找到，  
我为教会去卖命，  
俸銀填滿我腰包。  
我开导我的羊群：  
当皇上由老天排定，  
誰敢違命欺国君，  
打入地獄受苦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誰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詹姆斯南坐称王，  
羅馬教备受荣光，  
必須要一反过去，  
停止对天主教的誹謗。  
什么羅馬教会和教派，

## Feuilleton.

### Der Vikar von Bray.

Aus dem Englischen von Friedrich Engels.

Zu König Karls Zeit, da noch war  
Loyalität zu finden,  
Diem' ich der Hochkirch ganz und gar  
Und so erwarb ich Virunden.  
Der König ist von Gott gesetzt —  
So lehrt' ich meine Schale —  
Und wer ihm tragt, ihn gar verlegt,  
Den trifft die Höllestrafe.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f'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y will ich Vikar sein.

Jakob nahm auf dem Throne Platz,  
Das Papstthum kam zu Ehren:  
Da gatt's, die Katholikenhay  
Ins Gegentheil zu lehren.  
Für mich auch, fand ich, paßten schon  
Roms Kirch' und Priesterorden;  
Kam nicht die Revolution,  
Wär' ich Jesuit geworden.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f'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y will ich Vikar sein.

Als König Wilhelm kam, der Held,  
Und rettete die Freiheit,  
Hab' ich mein Segel umgestellt  
Nach dieses Windes Neuheit.

Der Knechtsgehorsam vor'ger Zeit,  
Der war jetzt bald erledigt:  
Der Tyrannie gebt Widerstreit!  
So wurde nun gepredigt.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ß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n will ich Bizar sein.

Als Anna wurde Königin,  
Der Landeskirche Stürze,  
Das hatte einen andern Sinn,  
Und da ward ich ein Tory.  
Für unsrer Kirch' Integrität,  
Da galt es jetzt zu eifern,  
Und Mäßigung und Varität  
Als südhast zu begeistern.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ß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n will ich Bizar sein.

Als König Georg bracht' in's Land  
Gemäßigte Politik, mein Herr,  
Hab' nochmals ich den Rock gewandt,  
Und so ward ich ein Whig, mein Herr.  
Das war es, was mir Freunden gab  
Und Günst bei dem Regenten;  
Auch schwor ich fast alltäglich ab,  
So Papst wie Prätendenten.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ß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n will ich Bizar sein.

Hannovers hoher Dynastie —  
Mit Anschluß von Papisten —  
Der schwör' ich Treu, so lange sie  
Sich an dem Thron kann fristen.  
Denn meine Treu wankt nimmermehr  
Veränd'ring ausgenommen —  
Und Georg sei mein Fürst und Herr,  
Bis andre Zeiten kommen.  
Denn dieses gilt und hat Bestand,  
Bis an mein End' soll's wahr sein:  
Daß wer auch König sei im Land,  
In Bran will ich Bizar sein.



我和他們也都合得来，  
如果不会鬧革命，  
我要加入耶穌会。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誰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威廉跑来当国王，  
拯救自由英名揚，  
我赶紧扯起帆篷，  
順着那新的風向。  
我这样进行鼓动：  
快去同暴政交鋒，  
現在得赶快結束，  
过去奴隶般的服从。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誰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安登基做了女王，  
国教又受到荣光，  
这件事情不寻常，  
我成了一个托利党。

为了教会的完整，  
我要大家去斗争，  
我把软弱和容忍，  
看做是一种罪证。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乔治上台当国王，  
温和政治他标榜，  
我又摇身变一变，  
变成一个辉格党。  
变来变去大沾光，  
又能得宠于摄政王，  
我几乎天天发誓，  
反对窥位者和教皇。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除了信教皇的人妖，  
我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sup>①</sup>

上面举出的这首民歌，也许是一百六十多年来在英国一直受人欢迎的唯一的一首政治民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它那出色的调子，这个调子直到今天还到处为人传唱。其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照例前进了。这位威风凛凛的独特的牧师，只是在每次更换帝王的时候才改换自己的假面具。可是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sup>②</sup>，骑在我国许多政治上的布雷牧师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他越来越频繁地把全部政治信条彻底翻转过来。昨天主张贸易自由，今天主张保护关税；昨天主张经营自由，今天主张强制统一；昨天主张文化斗争，今天却扛着飘扬的旗帜向卡诺萨<sup>③</sup>行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① 弗·恩格斯自英文译成德文。——编者注

② 指俾斯麦。——编者注

③ 1077年1月，被开除教籍和黜位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堡卡诺萨向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屈膝投降，哀求恕罪。此处即投降的意思。——译者注

Omnia in majorem Dei gloriam (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 用德国话来說, 这就是: 一切为了收更多的稅, 拉更多的壮丁。而可怜的小牧师們則應該唯命是从, 應該像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 每次重新“跳过障碍”, 而且往往得不到半点补偿。我們那位坚强的老牧师, 以何等的輕蔑神气俯視着自己这些渺小的继承人, ——他毕竟是以那种帮助他經過一切政治風浪保住了自己陣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自豪的呵!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9 月初

載于 1882 年 9 月 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7 号

署名: 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譯出

---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本初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 187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 1880 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up>206</sup>。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 1882 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sup>207</sup>。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up>208</sup>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

拉薩尔已經根本不在他的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避免使用外國字，而且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因此訴苦。從那時以來，我們的工人已經更多地和更經常地閱讀報紙，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國字。我只限於刪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國字。對於必要的外國字，我沒有附上所謂解釋性的譯文。這些必要的外國字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通用的術語，它們如果可以翻譯，那就不是必要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歪曲這些術語的意義；它不能說明，反而會造成混亂。在這裡，口頭的解釋會有更大的幫助。

內容却剛剛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說：對德國工人來說困難是不多的。總的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對於工人，較之“有教養的”資產者，困難要少得多，因為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條件。至於說到我在這裡加上的許多說明，那末我實際上與其說是考慮到工人，不如說是考慮到“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先生馮·艾內恩、樞密顧問先生亨利希·馮·濟貝耳以及特賴奇克之流的人物，他們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驅使，總是一再地表明他們的驚人的無知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巨大的誤解。如果唐·吉訶德挺着長矛同風車搏鬥，那末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們不能容許桑科·判扎做這類事情。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說，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国家，即產生於德國<sup>①</sup>。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

<sup>①</sup> “於德國”是筆誤，應當說“於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國的辯證法，但是同時也必需有英國和法國的發展了的經濟關係和

現代的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上的特別应用，只有借助于辯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說，德国資产階級的教師們已經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們所創立的辯证法的記憶淹沒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經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們不得不引用現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辯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們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們不仅继承了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驕傲。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倫敦

載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譯出

---

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經濟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現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諷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sup>209</sup>）。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經濟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辯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結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專屬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 弗·恩格斯 品特是怎样造謠的<sup>210</sup>

俾斯麦公爵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它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除了一些穿制服的和穿制服的奴僕（他们称达赖喇嘛的粪便和其他排泄物为天賜的甘露，并在需要的时候，准备把它吞下去），大家都知道，这家报纸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

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齷齪的勾当，那末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

这家由于名声太坏和只会胡说八道、甚至在议会选举运动中都不能利用的“正直的”报纸，最近特别热中于诬蔑社会民主党，散布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的谎言。

它用最荒诞的方式歪曲报道法国著名的事件<sup>211</sup>，用最触目惊心的色彩涂抹画面，叫人看了毛骨悚然。而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向战栗的人类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天知道还是些什么人；法兰西共和国注定要灭亡，因为它没有力量保卫自己免受上述恶魔的侵扰，——要知道，只有以俾斯麦之流为首的宫



相的君主国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正是“北德报”，最无耻地把維也納“謀財害命”的案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并給社会民主党捏造罪名，进行最卑鄙的告密<sup>212</sup>。

两个星期以前，当奧地利檢察机关以真正蠢貨的厚顏无耻把蹂躪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說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詭計的时候，“北德总汇报”是为这种多么愚蠢又多么卑鄙的举动而欢呼的唯一报纸，并随声附和这个白痴檢察官，虽然“北德总汇报”从它最接近的人那里，或者根据自己亲身的經驗，都很清楚地知道，所謂“反犹太人的运动”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最坚决的反对，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尽管这个运动受到“北德总汇报”老板最热心的支持，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場，它还是垮台了。

我們在“北德报”的一篇相当长的述評里发现了撒謊的最新成就，該述評报道說，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有效期的問題似乎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热烈的爭論”<sup>213</sup>。

似乎“李卜克內西派”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繼續有效，对党是有利的，而其他(派別?)认为这只是“說大話”的政策，因而加以反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內的爭論自然是采取最粗暴的斗争手段”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讀者知道，这些謊話究竟值几文錢。在社会民主党內既沒有“北德报”所理解的“派別”，也沒有对任何問題，尤其是对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問題发生“爭論”。

我們是一些出色的“现实政治家”，不会为还没有生下的鸡蛋而操心，我們对这个問題抱绝对“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要廢除，那末，我們知道，这絕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我們仍然和現在一样；如果这个法令不廢除，我們更会和現在一样。但

是，反社会党人法給了党不可估量的帮助，它巩固了党，教会了党很多东西，总之，在教育的意义对党起了极好的影响，而順便說說，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确实，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的可能性問題，在党的机关报上，也只有在那里討論过。但是，这是純理論的討論，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实质决定了这一点。試問，采取“如此粗暴的手段”的那种“爭論”到底在哪里呢？沒有說过一句話可以为“北德报”的声明作辯护的。显然，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还不懂得撒謊家的职业必須遵守的規則，撒謊也应当近乎情理，就是說謊話也需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真理，不然，它就无法存在。

順便說說，“北德报”現在不得不傾听“自由通訊”的話了，它說“北德报”发表那篇述評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希望保存反社会党人法，这就是廢除这一法令的理由，要想出比这更好的理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了解这一点，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的智力是無論如何都显得不够的。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0月底

載于1882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  
馬 尔 克<sup>214</sup>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作为附录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遗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可是，它完全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格·路·毛勒才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意义<sup>215</sup>。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日耳曼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他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使有近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地区里定居下来，但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像凯撒<sup>216</sup>所明白指出的那样，以部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一些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又按村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为 *huntari*，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为 *heradh*），几个百

戶构成一个区[Gau]。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沒有留用的土地,都归百戶支配。沒有分配給百戶的土地,都归区管轄。如果还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大多面积大),則归全民族直接掌管。例如,我們在瑞典,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社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bys almänningar)。此外,还有百戶公有地(härads)、区公有地或州(lands)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 konungs almänningar〔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連王有地在內,都可以統称为 almänningar 或 Allmenden,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划分来看,無論如何是屬於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經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过,那也是很快就消灭了的。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极其广闊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們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統一的馬尔克公社。因此,我們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範圍內,到处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戶或区这种較大的馬尔克团体。最后,为了管理归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領土以內的下級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統一大馬尔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王国征服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的时候,馬尔克公社的重心似乎在区里,而区的範圍就是馬尔克公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說明,在法兰克王国划分行政区域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馬尔克作为司法区重新出現。不过,此后不久,古老的大馬尔克就开始分裂。但是,在十三世紀和十四世紀的“帝国法”<sup>217</sup>里还規定,一个馬尔克通常包括6个到12个村。

在凱撒时代，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人，即苏維汇部落，还没有定居下来，他們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我們按同其他民族的类比可以推測，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一些包括若干具有近亲关系的家庭的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給他們的、年年更換的土地，并把产品分配給各个家庭。但苏維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凱撒之后 150 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給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換。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們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特山脉的所謂农户公社 [Gehöferschaften] 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 3 年、6 年、9 年或 12 年，总要把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 [«Gewanne»]。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給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員，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說，在每一块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土地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現在，这块土地，由于分遗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經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土地，仍旧是一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这块土地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等等的大小。沒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紀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萊茵普法尔茨的所謂抽签分地制中。此后，它的耕地变成了各个社員的私有财产。农户公社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周期分配，变交替的占有为私有，对它們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 40 年内，大多数的甚

至是全部的农户公社都消失了，变成了小农的普通村落，不过森林和牧场还是共同利用。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是住宅地。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开始于游牧民族的篷车，经过定居农民的木屋，然后逐渐变为一种对于家宅和园地的完全所有权。这在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自由的日耳曼人的住处，大概在那时就已从马尔克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了马尔克公职人员不能进去的地方，成了逃亡者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看到，这在后世的马尔克章程里，部分在五到八世纪制定的“民族法”<sup>218</sup>里，就已有了记载。因为，住所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

在塔西佗以后四五百年，我们也在“民族法”中看到，耕地是世袭的，它虽然还不是个别农民绝对的自由地产，但农民有权加以处理，出卖或者用其他方式加以转让。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日耳曼尼亚本土除了上述耕地完全共有的闭塞的村以外，还有另一种村，在这种村里，不单是宅地，就是耕地，也从公有财产中，从马尔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袭财产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贝尔格区的狭谷里，或者在威斯特伐里亚那样的窄狭、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这些地方的村，现在还是这样，是由分散的孤立的庭院构成的，每个庭院的四周是归它所有的耕地。耕地的重分，在这里不太可能进行。所以留给马尔克的，只有周围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后来，当可以处理家宅和园



地、把它們轉让給第三者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园地的所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願望，可能使許多实行耕地公社占有制的村停止了通常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員的各块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轉让的产业。

第二，征服的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羅馬的領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还是羅馬式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的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占有形式完全廢除。至少在旧日的羅馬領土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說明耕地和草地的世襲私人占有制同羅馬法之間的关系，那就是，一直保留到我們这个时代的耕地公社所有制残余，恰恰存在于莱茵河左岸，即存在于被征服的但是**彻底日耳曼化了**的地区。当法兰克人五世紀在这里住下的时候，耕地公社所有制大概还保留在他們中間，否則我們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农户公社和抽签分地制了。不过在这里，私有制也很快就不可抵擋地渗进来了，因为我們看到，六世紀“里普利安法”<sup>219</sup>在談論耕地的时候，只提到这种私有制。在日耳曼尼亚內地，我已經說过，耕地不久也变成了私产。

如果日耳曼的征服者实行了耕地和草地的私有制，也就是說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棄了重新分配的办法（如此而已），那末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到处推行他們日耳曼人的馬尔克制度，連同森林和牧場的公共占有制，以及馬尔克对已分土地的最高統治权。这样做的，不仅有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的盎格魯撒克逊人，而且还有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法兰西南部 and 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及倫巴德人。不过，在最后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里，据悉差不多只有在高山地区，馬尔克制度的痕迹才保存到今天。

馬尔克制度放棄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以后所采取的形态，我們不仅在五到八世紀的古代“民族法”里，而且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維亞中世紀的法律书籍里，在十三到十七世紀的許多日耳曼的馬尔克章程(即所謂判例)里和法兰西北部的习惯法(coûtumes)里都可以碰到。

馬尔克公社虽然放棄了在各个社員中間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条也沒有放棄。这些权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轉交給个人，只是为了把它用作耕地和草地，而并无其他目的。除此以外，单个的占有者是沒有任何权利的。所以，地下发现的財宝，如果埋藏的地方深到犁头所不及，那就不屬於他，而首先屬於公社。关于采矿等权利，情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权利，以后都被地主和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搶夺去了。

但是耕地和草地的利用，还是要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調整，其形式如下。凡是实行三圃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村的全部耕地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輪換地第一年用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一个社員在这三块土地上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份，以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損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輪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必須在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等。

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間又成为公共財產，供整个公社当牧場使用。而其他两块土地，在收获以后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成为公共財產，被当做公共牧場使用。草地在秋天割草以后，也是如此。在所有用作放牧的田地上，占有者必須把籬笆拆去。这种

所謂强制放牧办法，当然要求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由个人决定，而要求它成为大家共同的时间并由公社或习惯作出规定。

其他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以外的一切土地，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所有、共同利用。这里有森林、牧场、荒地、沼泽、河流、池塘、湖泊、道路、猎场和渔场。每一个社员从被分配的马尔克耕地中分到的一份，当初都是大小相等的，与此相类似，他们利用“公共马尔克”的权利也是相等的。这种利用方法，由全体社员决定。当一向耕种的土地不够使用，需要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一块土地来耕种的时候，耕地的分配方法也是如此。公共马尔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牲畜和采摘橡实来喂猪。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地，它就提供泥炭。关于牧场、木材的利用等等的规定，构成了从各个不同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马尔克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些章程都是在那古老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开始成为争论对象的时候写下来的。仍然保留下来的公有森林，是这些古老的、没有被分割的马尔克的可怜残余。还有另一种残余至少存在于德国西部和南部，这就是在人民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做有害的事，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主意，用他那臭名昭彰的关于采集浆果的法令<sup>220</sup>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

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如有必要）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纷争。这是古老的但是

小規模的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而所謂民众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大規模的馬尔克集会罢了。也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推举公职人員，也檢查公职人員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还是宣判。主席只能提出問題，判決由到会的全体社員決定。

馬尔克制度，在古代，在那些沒有酋长的日耳曼部落里，几乎是唯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貴族（他們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或在其后不久，沒落下去了）以及一切随馬尔克制度自然产生的东西，很容易适应于这种制度，正如克尔特人的氏族貴族，在十七世紀还适应于爱尔兰的土地公社一样。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經扎下了深根，我們在我們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脚印。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戶、区和全部落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不单是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屬於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行政区制度形成以后，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馬尔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面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經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貧穷了的自由人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員法庭<sup>①</sup>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絲毫也沒有触动馬尔克法庭。恰恰相反，它們仍然是中世紀領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領主也仅

---

① 这种陪审員法庭，不能跟俾斯麦—萊昂哈特的陪审員法庭<sup>221</sup>混为一談。在后一种陪审員法庭里，判決是由陪审員和律師共同做出的。在古代的陪审員法庭里，根本沒有律師，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沒有表決权，判決是由陪审員独立做出的。

仅是个提問題的人，判決者則是臣僕自己。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村馬尔克的馬尔克制度；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說，只要它用濠沟和牆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最后，中世紀无数并不以地产共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社团的規章，尤其是自由行会的規章，都是模仿馬尔克制度的。人們把赋予行会經營某一行业的特权，和一个公共的馬尔克完全同等看待。在行会里，也跟在馬尔克里一样，总是用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員完全同等地或者尽可能同等地享用公共的收益。

馬尔克制度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极不同領域和对各种各样要求所表现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在同日益发展的大土地所有制度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馬尔克制度是在日耳曼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候产生的，那时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亚洲带来的、几乎被遺忘了的农艺刚开始复苏。馬尔克制度在整个中世紀时代，都是在和土地貴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生存下来的。但是馬尔克制度当时还是非常需要的，在貴族把农民土地攫为己有的地方，受奴役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馬尔克制度（虽然由于地主的侵犯已大为削弱）。关于这一点，我們到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只要公共馬尔克仍然存在，馬尔克制度就能适应千变万化的耕地占有关系；在馬尔克不再是自由的馬尔克以后，馬尔克制度同样能适应公共馬尔克中各种极不同的所有权。馬尔克制度所以沒落，是因为貴族和僧侶在地方当局的乐意支持下，差不多夺去了全部农民土地（不管是分配了的或沒有分配的）。但是，馬尔克制度在經濟上显得落伍，作为农业經營方式已失去了生命力，这事实

上是由于近百年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农艺成为一门科学，并采用了全新的經營方式。

馬尔克制度的崩潰，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們，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屬於全体人民的辽阔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們当作礼物，慷慨地贈送給他們的廷臣、將軍、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就构成了后世貴族和教会的大地产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紀，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連綿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其通常結果是土地被沒收，这就使大批农民傾家蕩产，所以，早在墨洛温时代，就有很多自由人沒有土地。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毀了自由农民的主力。当初，每一个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不但要負責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6个月之內，自己維持軍中的生活。毫不奇怪，早在查理时代，在5个人中間，事实上連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人也不大能找到了。在他的后继者的混乱統治下，农民的自由更加急速地趋于消亡。一方面，諾曼人的侵扰、国王們的永无穷期的战争和豪族巨室之間的私斗，逼迫自由农民一个跟着一个地去寻找保护主。另一方面，这些豪族和教堂的貪得无厌，也加速了这种过程。他們用欺詐、諾言、威胁、暴力，把愈来愈多的农民和农民土地，置于自己权力控制之下。不論在前一种場合或后一种場合，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繳納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給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繳納代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在西法兰克王国<sup>222</sup>，一般說，在萊茵河西岸，这是通常現象。反之，在

萊茵河东岸，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他們大多数是散居的，只有少数集聚成一些自由的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十到十二世紀，貴族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一个庄园主（不論是教会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块农民土地，他同时也就在馬尔克內取得了与这块土地有关的种种权利。这些新的地主，因此就变成了馬尔克社員。他們同其他自由的和依附的社員，甚至同他們自己的农奴，原先在馬尔克內只是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他們不管农民的頑强抵抗，在馬尔克中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特权，甚至往往迫使整个馬尔克服从他們地主的統治。不管怎样，旧的馬尔克公社仍然繼續存在下去，虽然是在地主监护之下。

弗里西安人、尼德兰人、薩克森人和萊茵—法兰克尼亚人向勃兰登堡及西里西亚的移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时馬尔克制度对于耕作，甚至对于大規模的土地占有，还是多么必要。这些人从十二世紀起就在地主的土地上，以村的形式定居下来，而且正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馬尔克法律进行的，——既然在地主的庄园上还保留着这种法律。每个人都分到了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場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馬尔克比較少。所有这些都是世襲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須世世代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但这种赋役很輕，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德国任何地方都要好些。因此，当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們仍很安靜。他們这种对切身事业的背棄行为，使他們后来受到了严重的懲罰。

一般說來，大約在十三世紀中葉，發生了一種有利于農民的決定性的轉變。十字軍遠征為此作好了準備。許多出征的地主，干脆讓他們的農民獲得了自由。其他一些地主不在人世了，數以百計的貴族世家消滅了，他們的農民也往往得到了自由。還有一層，隨着地主需要的增加，支配農民的賦役遠比支配他們的人身重要得多。包含着古代奴隸制的許多成分的中世紀初期的農奴制，它給予地主的權利，逐漸失去了價值。農奴制慢慢衰弱下去，農奴的地位日益接近于普通依附農民的地位。農業的經營完全墨守舊法，所以莊園主要想增加他們的收入，只有開墾新土地和建立新村。但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只有同移民好好商量，不管他們是莊園里的依附農民還是外來農民。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農民的賦役多半很輕，並且到處都有嚴格的規定，他們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僧侶的領地里。最後，新吸引來的移民的優越地位，又影響到附近依附農民的處境，他們在整個德國北部，儘管還繼續為莊園主提供賦役，但卻獲得了他們的人身自由。只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魯士農民还是不自由的。但是這一切不能保持多久。

到了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城市迅速勃興和富裕起來。尤其是在德國南部和萊茵河畔，城市美術工藝和奢侈品得到了繁榮發展。城市貴族的豪華生活，使粗食粗衣、陳設簡陋的土容克不能安眠。但是，從哪兒去弄到這些好東西呢？攔路行劫越來越危險，越來越勞而無功。可是要去購買，就要有錢。錢卻只有農民能夠供給。於是，就對農民開始了新的壓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來越熱衷於再度將自由農民變成依附農民，將依附農民變成農奴，把公有的馬爾克土地變成地主的土地。在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貴族



得到了羅馬法學家的助力。這些法學家把羅馬法的條文，應用到大半他們不了解的日耳曼關係中去，製造了極度的混亂，但是他們善於這樣製造混亂，就是使地主永遠從中得到便宜，農民總是吃虧。教會中的大主教做法更加簡單：他們偽造文件，從中縮小農民的權利，擴大農民的義務。為了抵抗君主、貴族和教士們的這種掠奪行為，從十五世紀末葉起，農民經常發動單獨的起義，到了1525年，偉大的農民戰爭席卷了士瓦本、巴伐利亞、法蘭克尼亞，一直泛濫到亞爾薩斯、普法爾茨、萊茵高和紹林吉亞。經過了艱苦的鬥爭，農民遭受了失敗。從那時起，在日耳曼農民中間，農奴制度重新又取得了普遍的優勢。在爆發戰爭的地方，一切還保留着的農民權利，現在都遭到了無恥的踐踏，他們的公有地變成了地主的土地，他們自己也變成了農奴。德國北部處境較優的農民，保持了安靜，為了對他們這樣一種行為表示獎勵，就使他們受到了同樣的壓迫，不過做得比較慢一點罷了。日耳曼農民的農奴制，在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西里西亞，開始實行之於十六世紀中葉，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開始實行之於十六世紀末葉，並且日益普遍地強加到農民身上。

這種新的暴力行動，也還有它的經濟原因。在宗教改革時代的戰爭中，只有德意志的邦君擴大了權力。貴族們進行搶劫這一高貴行業，已經過時了。如果他們不甘心沒落，就必須從他們的地產里榨取更多的收益。不過，唯一的方法是仿效大一點的地主、特別是寺院的榜樣，自己至少負責經營一部分土地。過去這只是一種例外，現在卻成爲一種必要。但是，這種新的經營方法遇到了障礙，幾乎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分給了納租的農民。只有在自由的或依附的納租農民變成十足的農奴以後，老爺們才能獲得行動的自

由。一部分农民，正如专门术语所说的被“肃清”（«gelegt»），这就是说，不是被撵走，便是沦为只有一间草屋和一小块园地的无地农民（Kotsassen），他们的份地，合并成一个大规模的地主田庄，由新的无地农民和留下来的农民以徭役劳动进行耕种。这样，不仅有大批农民干脆被赶走，而且留下来的农民所负担的徭役也日益大量地增加。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宣告开始的。

不过这种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相当缓慢的。开始了三十年战争<sup>223</sup>。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軍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唯一的主人。邦君们恰巧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因此使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安排得最有利于恢复他们已经破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的庄园合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屬、农民的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

抵抗，即使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小过失和小纠纷的唯一法官，甚至在农民和地主本人争讼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地主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这时受到最大的屈辱。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也精疲力尽，失去任何自救的能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

这种外援终于来了。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在德国和德国农民头上也出现了美好时代的曙光。革命军一占领莱茵河左岸，那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各种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地立即消失了。莱茵河左岸的农民从此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在革命时期起草的、被拿破仑篡改了的 Code civil<sup>224</sup>。这部法典很适合他们的新情况，他们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带在口袋里。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需要长期等待。不错，普鲁士在耶拿<sup>225</sup>遭到应有的失败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业已废除，而且根据法律，所谓贖免农民的其他赋役也有了可能。不过，这大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其他的邦中做得更少。直到1830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开始至少在巴登和靠近法国的其他几个小国里实行这种贖免。当1848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的贖免还远没有完成，在巴伐利亚境内，还根本没有开始！现在，事情自然进行得快一些。这一次亲身谋反的农民的徭役劳动，当然丧失了一切价值。

贖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

不担负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不仅如此。在清算的时候，派来办理此事的官吏，当然差不多总是站在老爷一边，他们在老爷那里居住和吃喝，所以农民所吃的亏，甚至大大超过了法律条文的规定。

由于三次法国革命和一次德国革命，我们终于又有了自由的农民。但是，我们今天的自由农民，和古代的自由马尔克社员相比，差得多远啊！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小得多。除了少数大大缩小了的、荒蕪的公有森林以外，没有分割的马尔克已经消失了。但对小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肥，没有粪肥就没有合理的耕作。收税官和紧跟在他后面的吓人的法警，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马尔克社员没有听说过的。还有那些从事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者，他们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而现在农民的田产，却一块块地落到他们的魔爪中去。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經營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經營方式。正同机械的紡織业排斥了手紡車与手織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經濟，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它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

因为，处在目前經營形式下的全欧洲农业，已经受到了美洲大规模谷物生产这个占有优势的敌手的威胁。美洲的土地天然适于耕种，天然具有长期的肥力，购买它又花不了几文錢，同这样的土地，不管是我国負債的小农，或者是我国同样債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經營方式，在美洲的竞

爭下失敗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經營的情况下，才可能繼續存在。

这就是我国农民的前景。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階級的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們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們願意懂得怎样**做**①。

---

但是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員得到大規模經營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們提供資金去經營（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資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經營大工业。

經營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換句話說，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沒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結城市，必須使他們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規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經營，才能對他們有利。

这究竟怎样組織呢？德国农民們，好好地想一想吧。能够帮助你們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

① 下面几段文字是弗·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馬尔克”的单行本时所做的补充，該书題名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現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編者注

## 弗·恩格斯 燕妮·龙格(馬克思)

1月11日，卡尔·馬克思的长女、約八年前同前巴黎公社委員、現任“正义报”<sup>226</sup>編委沙尔·龙格結婚的燕妮，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去世了。

她生于1844年5月1日。她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同这个运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她拘謹得几乎可以被看成胆小，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个男子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剛毅。

当爱尔兰的报刊揭露了1866年和后来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員在監獄中所受到的虐待，而英国报刊閉口不談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当格萊斯頓內閣違背在选举时所作的諾言，拒絕赦免犯人而且絲毫不改善他們的处境的时候，燕妮·馬克思就設法触痛一下篤信宗教的格萊斯頓先生。她在罗什弗尔的“馬賽曲报”<sup>227</sup>上刊登了两篇文章，以鮮明的笔調描述了自由的英国是怎样对待政治犯的。她的文章发生了作用。巴黎大报的揭露是难以忍受的。几个星期以后，奥頓諾凡-罗薩和其他大多数人都被釋放并启程到美国去了。

1871年夏天，她同最小的妹妹到波尔多看望妹夫拉法格。拉法格、他的妻子、他的有病的孩子和这两位姑娘从那里前往比利牛

斯山脉巴涅尔-德-呂雄矿泉。一天清晨,有一位先生来見拉法格,对他說:“我是警官,但我是共和派;我奉命要逮捕你。已經查明,你是負責波尔多同巴黎公社的聯絡的。你現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越过国境。”

拉法格和妻子及孩子順利地翻越山路到了西班牙。警察局为此向两位姑娘进行报复,逮捕了她們。燕妮的口袋里有一封在巴黎附近牺牲的公社領袖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搜出,它将成为她們二人到新喀里多尼亚島<sup>228</sup>旅行的一份最有效的护照。在单独留在室内的瞬刻,她打开了一本旧的、复盖着灰尘的登記簿,把这封信夹在中間,再把它合上。这封信可能現在还在那里。两位姑娘被带进省长办公室,这位省长,高貴的凱腊特里伯爵、老波拿巴主义者,对她們严加审問。但是这位前外交官的狡猾和前騎兵軍官的粗暴,碰到燕妮的鎮靜的理智都失敗了。凱腊特里对于“这一家的妇女們显然都具有的毅力”說了些狠毒的話,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間。在同巴黎通了无数次电报以后,他終于只好釋放了这两位姑娘,她們在拘押时受到了真正普魯士式的待遇。

燕妮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人。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

1883年1月13日于倫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83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馬克思墓前悼詞草稿

就在 15 个月以前，我們中間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圍，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貴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們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丈夫的遺体放在里面。

卡尔·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們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規律。馬克思則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規律，这是一个淺显易懂的規律，几乎只要略加說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們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資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階級划分的規律；按照这一規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暫時大致还没有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規律，这个社会最終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看到这些成果，特別沉痛地感到，正当他的工作高度展开的时候我們失去了他，不管他做了多么多的工作，他还留下了更多沒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沒有完全陷进科学。沒有一個人能像馬克思那样，对任何領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悅。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淵博的知



識，特別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領域的知識，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階級摆脱現代資本主义經濟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活动的最杰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从1864年到1872年一直被公认为該协会的領袖。从表面迹象来看，这个协会已不再存在；但是欧美一切文明国家工人同盟的兄弟联系永久地确立了，并且没有任何表面的形式上的同盟联系，它也会一直繼續存在下去。

凡是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許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但是他对誣蔑几乎并不在意。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忍受誣蔑，这个人就是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驕傲地看到，在西伯利亚矿井、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他有千百万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經濟理論已被全世界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无可爭辯的基础，他还有許多敌人，但是个人的敌人恐怕連一个也没有<sup>①</sup>。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7日

原文是英文

載于1883年3月20日“正义报”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并根据“正义报”校对过

---

① 在“正义报”(1883年3月20日)上，这篇題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讲话”的法譯文，末尾还有下面一段話：“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現在我无法來說明，也用不着說明，因为你們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別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別了，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編者注

##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的葬仪

3月17日，星期六，在海格特公墓，馬克思被安葬在15个月以前安葬他的夫人的同一个墓穴里。

在墓地上，哥·雷姆克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和发行部，代表倫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馬克思的灵柩献了两只系着紅帶的花圈。

随后，弗·恩格斯用英語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們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靜地睡着了——但已經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規律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即历来为繁茂蕪杂的意識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簡單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資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經濟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們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因而，也必須由这个基础来解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馬克思还发现了現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規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該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經是幸福的了。但是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領域（甚至在数学領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領域他都不是肤淺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悅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經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馬賽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資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賴有他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現代无产階級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頑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見的。最早的‘萊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sup>229</sup>，‘德意志—布魯塞尔报’（1847年），‘新萊茵报’（1848—1849年），‘紐約每日論壇报’（1852—1861年），以及許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魯塞尔和倫敦各組織中的工作，最后是創立偉大的国际工人协

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說，协会的这位創始人即使別的什么也沒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各国政府——無論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驅逐他；資产者——無論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紛紛爭先恐后地誹謗他，詛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們当做蛛絲一样輕輕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給予答复。現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說：他可能有过許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接着，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讀了收到的以下几篇法文挽詞。

##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給 卡尔·馬克思的挽詞

“謹代表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向当代最杰出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致最后的永別的敬意。一位最偉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剝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曲折变化的殘酷的斗争，而且在社会革命原則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决不終止这一斗争，現在，我們在这位热烈同情我們斗争願望的人物的墓前，表示深切的哀悼。俄罗斯語言是最先翻譯‘資本論’这部現代社会主义福音书的語言。俄国大学生最先听到偉大思想家(我們現在已經失去了)的理論以贊許的口吻所做的介紹。甚至那些在具体組織問題上和國際工人协会的奠基者有分歧意見的人，也总是不得不敬佩他那包羅万象的知識，敬佩他那深刻揭示現代資本的本质、揭示社会各經濟形态的进化过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同这种进化的依賴关系的高度洞察能力。甚至那些廁身

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最凶恶的反对者，也不能不听从馬克思和他的終生的友人弗·恩格斯<sup>①</sup> 35年前共同提出的偉大革命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馬克思的逝世将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响的人感到悲痛。

請允許我补充一句，他的逝世将使那些在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了解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像爱戴挚友一样爱戴他的人感到更大的悲痛。

彼·拉甫罗夫

1883年3月15日于巴黎”

## 二、唁 电

“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对思想家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的唯物史观以及他对資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創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現代共产主义运动。巴黎联合会对馬克思的为人深表尊敬，对他的学說表示完全贊同。

書記 萊 宾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 三、唁 电

“惊悉偉大的社会主义者，我們共同的导师不幸逝世，我謹以个人和西班牙工人党(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馬克思的友人和女儿致以深切的哀悼。

霍賽·梅薩-伊-列奧姆帕特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接着，李卜克內西用德語发表了演說：

---

<sup>①</sup> 恩格斯在把挽詞譯成德文时去掉了自己的姓。——編者注

“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和忠实的朋友的爱戴和感激，我从德国来到这里。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最老的朋友和战友刚才说，卡尔·马克思是本世纪最遭嫉恨的人。不错，他是最遭嫉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嫉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最爱戴他的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因为他们已经觉悟到本身的地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他们。我们对马克思的逝世感到不胜悲痛。他的爱同他的恨是一样地伟大。他的恨是由爱产生的。他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还有伟大的心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不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党委托我表达它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因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缔造**）的感情。

说漂亮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他是科学上的革命家，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他登上了科学的最高峰，是为了从那里走向人民，使科学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自然科学把我们**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天上的神尽管被科学消灭了，但它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向人民揭示的**社会科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能消灭**人间的偶像和权贵**，只要这些人活着，他们就不会让神死去。

科学不仅属于**德国**。科学没有任何界限，尤其没有**民族界限**。因此，‘资本论’的作者自然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反抗敌人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

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地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

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

学說將日益發揚光大！

我們不會耽于悲痛，而會照着已故的偉大戰士那樣去行動；我們要盡全力來早日實現他的教導和他的志向，這就是我們對他的最好的紀念。

敬愛的永生的朋友！我們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進，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這就是我們在你的靈前的誓言！”

除上述幾個人之外，參加葬儀的還有馬克思的另一個女婿保爾·拉法格、1852年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中被判處五年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納、共產主義者同盟老盟員格·羅赫納。此外，代表自然科學界的是兩個第一流的著名人士：動物學教授雷伊·朗凱斯特和化學教授肖萊馬；他們倆人都是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會員。

弗·恩格斯寫於1883年3月18日  
左右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會民主黨人報”

載於1883年3月22日“社會民主  
黨人報”第13號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的逝世

---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聞”編輯部轉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倫敦‘每日新聞’編輯部。敬請轉告‘英国工人階級狀況’的作者、已故的卡尔·馬克思的摯友恩格斯先生，請他代购花圈一个献在‘資本論’的不朽作者的灵柩前。題詞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論的維護者及实际的爭取者。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敬挽’

請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沒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們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給他的124法郎50生丁（相当于4英鎊18先令9辨士）。这笔錢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說，敖德薩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們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馬克思的墓前。



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錢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錢給莫斯科和敖德薩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sup>230</sup>。制作題簽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誤了一些時間，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錢的花費情况。

我們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佐林根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給卡尔·馬克思。佐林根刀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們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紅綢带，不知被哪个瀆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訴也无济于事，但也許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sup>231</sup>

“希望为紀念卡尔·馬克思筹集一笔以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別基金，以便幫助偉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們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錢現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議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贊同，所以我在这里說明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駁斥报纸上的謠言，我想简单地談一談我們偉大的理論家和領袖患病和逝世的經過。

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經過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臟病已經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經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別厉害的是接連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沒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說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異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

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威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11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

西) 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 月間又发现了肺膿腫。15 个月来他已經服用过各种药品, 現在, 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經失去效用, 只能使他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說来还是比较順利地在好轉。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 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時間), 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 他很不好, 看来要完了。他們告訴我, 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 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湯。在馬克思家 40 年、从小撫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蘅·德穆特, 上楼到他的房間去, 但立刻轉回来說: “快去看一看, 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已經睡着了, 但是已經长眠不醒了。卡尔·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 沒有比这样的死再安祥的了。

現在, 在結束本文的时候, 談一个好消息:

“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是否适宜于发表, 我还不能断定, ——手稿有大开紙 1 000 多頁。但是, “資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 已在 1867—1870 年整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經开始, 并有大量評論性的摘录材料, 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 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遺囑执行人。

1883 年 4 月 28 日于倫敦

## 二

收到阿尔让台**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贈送的、題詞写在紅色

綢帶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順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紅色綢帶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薩**贈送的三个花圈已經做好。为了不使綢帶被偷，我們不得已把綢帶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綢帶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場大雨把**爱尔福特**的花結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沒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 1 英鎊 1 先令 8 辨士，共值 3 英鎊 5 先令。因此，汇給我的 4 英鎊 18 先令 9 辨士，剩下了 1 英鎊 13 先令 9 辨士，我把这些錢寄給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贈送者的意見处理。

这位偉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資本、著作資本甚至金錢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屬於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談了。

**紐約中央劳动联合会**<sup>232</sup> 書記**菲力浦·范-派頓**写給我的信（今年 4 月 2 日）說：

“不久以前举行了紀念**卡尔·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別在这次游行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約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們当着大庭广众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的通俗化工作，而**馬克思**贊揚了莫斯特所作的宣傳。——我們对**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評價很高，我們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能否談談你的看法：**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問題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的荒唐胡謔已經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贊同这种策略，我們是很不愉快的。”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譯成德文<sup>233</sup>：

“你在4月2日問我，卡尔·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約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簡短而明确的。

馬克思和我从1845年<sup>234</sup>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組織逐漸消亡。这个組織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經濟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們同时又始終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組織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資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結束部分<sup>235</sup>就可以讀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顛倒过来了。他們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廢除国家政治組織**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現成的組織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剛剛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資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經濟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敗，結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謬論的第一天起，馬克思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說明嗎？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内部历史就說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

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馬克思是他們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就是馬克思。如果你們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們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訴你們。

現在談一下約翰·莫斯特。

誰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馬克思有过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騙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謊。在倫敦‘自由’周报第一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馬克思或我那里去弯过一两次。我們沒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沒有在哪里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們甚至干脆不訂他的报纸，因为上面‘簡直毫无内容’。我們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他曾經求教过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視。

莫斯特在德国的時候，就发表了对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通俗’說明<sup>236</sup>。当时曾請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們确信，如果我們不願意从头到尾改写該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謬論，沒有任何别的更好的办法。馬克思容許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下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約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訂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願意，你們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談了美国，下面談意大利。

大約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輕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阿基尔·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sup>237</sup>寄給了馬克思，并且附

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倫敦，到我那里去了两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經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sup>238</sup>中責备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見。

現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选”<sup>239</sup>上写了一篇关于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清样寄給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譯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語言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說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評，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說。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馬克思的傳略。但是，誹謗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沒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許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責过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馬克思讀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說，他的引文是正确的，如果說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現在您是怎样引用馬克思的話，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說‘剩餘价值’的地方說‘利潤’——而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誤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倫敦向您口头解釋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誰，是誰有意篡改引文。

但是这些还远远比不上您的‘坚决而深刻的信念……认为自觉的詭辯支配着整个学說’（馬克思的学說）；馬克思‘不惜作出虛假的結論，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結論是虛假的’；他‘常常是一个願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現存制度的詭辯者’，用拉馬丁的話來說，他

‘玩弄謊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贊揚。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間，这一类話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贊語，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編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們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們认为这种說法是有損名誉的指責，因为我們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們把它奉还给那些說这种話的人，他們臆造这种說法只能敗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責任是告訴讀者，支配着馬克思的全部学說的这个所謂的‘自觉的詭辯’，究竟表現在哪里。但是我的寻找是徒劳的。Nagott!（很有力的倫巴第用語：根本沒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設想，像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經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沒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馬克思借以迴避科学論据的狡猾詭計’。这个第二卷現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終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潤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譯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暂时就写这些。

1883年5月12日于倫敦

弗·恩格斯写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 and 第21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



## 弗·恩格斯 对一页“公社史”<sup>240</sup>的意见

(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sup>241</sup>)

除非参加九月四日事件的人极端愚蠢和虚伪透顶，才会把这一停战消息称为“好消息”。对于普鲁士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麦茨的投降刚刚使普鲁士军队的6个军（12万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只有像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人才看不到：这支新军队必然抵达法国中部以后，任何想使巴黎解围的试图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当时不是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刻，而是在军事上作最大努力的时刻。要做到这一点，总共只剩下15天的时间，但这是极其宝贵的15天，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封锁巴黎，除3个步兵师以外，德国人必须动用全部军队。他们没有任何后备队，因为这3个师占领奥尔良和夏龙以后，就受到卢瓦尔军团的牵制，而不能起后备队的作用了。在西部、北部和东部，只有一支骑兵部队担负这一地区的警戒和巡逻，但是没有能力抵挡步兵的进攻，守住这一地区。

到10月底，包围巴黎的德军战线，在对付城市的这一边已经大大巩固了。但是任何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都可能在开阔地打得

普魯士人措手不及。只要出現 5 萬人，即使像當時法國所擁有的那樣年輕的軍隊，也能突破封鎖并恢復巴黎同全國的聯繫。這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本來應當迅速採取行動，可是卻出現了如下情況。

巴黎政府同意了停戰（10 月 30 日），這次停戰儘管時間很短，仍然給為了封鎖而疲于種種作業和夜間值勤的德軍以喘息時機。

從自己方面來說，奧雷耳·德·帕拉丹於 11 月 2 日把自己的軍團集結在維埃爾宗，打算開往博讓西，在那里橫渡盧瓦爾河，插入占據夏托登的普魯士人（第二十二師）和駐在奧爾良的巴伐利亞人的中間。從維埃爾宗到博讓西約 45 公里，兩天之內完全可以到達。但是，據德國的資料（“……軍事思想和見解”<sup>242</sup> 等等）所載，甘必大天真地以為，用火車運送 4 萬人的軍團可以像運送普通旅客一樣迅速。于是他命令將軍：不得步行，而用火車把他的軍團從維埃爾宗調往圖爾，再從圖爾調往博讓西。將軍提出異議，甘必大則堅持己見。結果，盧瓦爾軍團不是走了兩天，也不是走了 45 公里，而是沿着鐵路旅行了 180 公里，費了五天時間，並且不能避開敵人的偵察。該軍團一直到 7 日才在博讓西重新集結，準備行動。但是已經失去了三天寶貴的時間，敵人已經對這次調動有了戒備。

這是怎樣的日子啊！11 月 3 日，在這最緊要的一天里，普魯士整整一個旅的騎兵在十支人數眾多的自由射手<sup>243</sup> 隊伍的進攻下，不得不放棄曼特，退往韋爾。另一方面，法國各兵種的大量兵力從庫爾維耳朝沙特爾方向調動時暴露了目標。如果盧瓦爾軍團不是坐火車遊逛，而是在 4 日就發動進攻（它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它

插入巴伐利亚人和普魯士第二十二師的中間（这是容易做到的）；如果它能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向巴黎推进，那末，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說，巴黎是会解圍的。

毛奇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危險，因此他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拿破侖在曼都亞所采取的行動<sup>244</sup>，即取消封鎖，放棄配置在維拉庫布勒的圍城炮兵纵列，集結自己的軍隊以便在開闊地行動，直到取得胜利以后，即从麦茨調来軍隊以后，再恢复封鎖。凡尔賽大本营已經把行李装上車子，整装待发，只待套馬启程了（据目击者瑞士上校埃尔拉赫<sup>245</sup> 所說）。

如果普魯士人被迫取消对巴黎的封鎖，这就可能引起欧洲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光荣的和平。無論如何，这一事实一定会首先对欧洲、其次特别是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最后也会对德国人产生相反的道义影响。至于这一事实的物质后果！巴黎至少可以有15—20天的時間，利用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各条铁路調集粮食，儲存起来，这就等于延长一两个月的防守時間。还可以贏得同样多的時間在外省組織軍隊。这些軍隊抗击敌人时就不会再是紀律松弛、缺乏訓練、缺乏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状况了。要使法国重获胜利的希望，就只有贏得時間。这种机会在11月3日和4日是出現过的，但是我們看到，这种机会被错过了。

讓我們再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巴黎甚至沒有打算出击。在一星期內，从西面向巴黎靠攏的兵力沒有作过任何进攻的嘗試。这是不奇怪的。这些兵力大概相当薄弱。甘必大責成凱腊特里先生組織西方軍团的命令是10月22日发出的。

只有卢瓦尔軍团在11月7日才在博让西附近作好战斗准备。一直到9日奥雷耳才向庫耳米埃的巴伐利亚人发起攻击。巴伐利

亞人一看到从沙特尔方面向他們靠攏的普魯士第二十二师必然會撤退，他們就退往土里，第二天，即 11 月 10 日，他們就和这个师在土里會合。奧雷耳就按兵不动了。同时，从麦茨开来的 3 个軍共 6 万人，以强行軍从塞納河方面逼近。从麦茨乘火車来的另外两个普魯士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經到达巴黎。現在毛奇有可能把普魯士第十七师調往土里，該师于 12 日到达土里。这样一来，德国的 4 个师，約 35 000 人就作好了同卢瓦尔軍团作战的准备。卢瓦尔軍团再也不使他們感到不安了。

然而在 11 月 14 日，大批法軍从德勒开往格丹，距凡尔賽只有两天路程。毛奇在这一方向暂时只有自己的騎兵部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偵察，来弄清这支先遣队后面还有多少兵力。当天他又打算放棄凡尔賽并取消封鎖(勃魯美<sup>246</sup>)。

但是这一次解决問題已經不以天計算，而是以小时計算了。从麦茨最先調来的一个軍（第九軍）当天就抵达楓丹白露。第三軍定于 16 日和 18 日抵达奈木尔，而第十軍定于 19 日抵达云納河岸茹瓦尼。毛奇把第十七师派往郎布耶，把第二十二师派往沙特尔，把巴伐利亚人派往奧諾，即穿到卢瓦尔軍团（他給卢瓦尔軍团让出通向巴黎的道路）和从西部威胁凡尔賽的軍隊的中間。这一次奧雷耳按兵不动倒救了自己。如果他开进摆在他面前的缺口，那就会被准备向他的两翼襲击的两路德軍所击潰。11 月 19 日普魯士第二軍团的 3 个軍連同在云納河的后备队占領了楓丹白露和奈木尔。11 月 20 日，曼托伊費尔指揮的第一軍团集結在从貢比臬到努瓦荣的瓦慈河一綫；从麦茨調来的軍隊从北部和南部加强了对巴黎的封鎖。于是，解除这一封鎖的最后机会也丧失了，因为特罗胥、甘必大和奧雷耳彼此都犯了錯誤。他們的錯誤，

---

可以說几乎像普魯士队伍那种大受贊揚的准确行动一样，相互加深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2月初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卡·馬克思 評阿·瓦格納的 “政治經濟学教科书”

(第二版)第一卷(1879)<sup>247</sup>

(1)瓦格納先生的概念——“社会-法的概念”(第2頁)。并且“同洛貝尔图斯、朗格和謝夫萊的观点相一致”(第2頁)。在“叙述的基本論点”上他“引证”洛貝尔图斯和謝夫萊的話。甚至在談到作为許多民族中間的“不合法的占有方法”的海盜行为时，瓦格納先生說，它只有在“有了真正的 *jus gentium* [国际法] 的前提”(第18頁，注釋3)下，才是一种搶劫行为。

他研究的首先是“經濟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个人的經濟自由的范围”(第2頁)。

“滿足需要的願望”“不是作为而且也不应当作为純自然力发生作用，但是，它也和人的任何願望一样，受理智和良心的指导。因此，由此产生的任何行动都是負責的，并且总是服从于道德的判断，誠然<！>，这种道德判断本身正在經受历史的变动。”(第9頁)

在“劳动”(第9頁，第2节)这一节中，瓦格納先生沒有把各种劳动的具体性质和这一切具体劳动所共有的劳动力的消耗区别开来(第9、10頁)。

“甚至为了获得地租收入而单是管管财产，以及为了滿足需要而使用已



經獲得的收入，也必須經常進行屬於**勞動概念**範圍內的活動。”（第 10 頁，注釋 6）

按照瓦格納的意見，**歷史-法的範疇**就是“**社會的範疇**”（第 13 頁，注釋 6）。

“**位置的自然壟斷**，特別是在城市的（！倫敦西蒂區的位置的自然壟斷！）條件下以及在氣候對一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的影響下，其次，**土壤特有的肥力的自然壟斷**，例如在有特別好的葡萄園的情況下以及在不同的國家比較的情況下，例如把**熱帶產品**銷售到溫帶國家（“例如某些國家（南歐、熱帶國家）對某種自然壟斷的產品抽**出口稅**時深信，這些關稅將轉嫁給外國的消費者”（第 15 頁，注釋 11）。如果瓦格納先生由此推出南歐國家的出口稅，那就表明，他對這些關稅的“**歷史**”一無所知）<sup>①</sup>，——將使**來自自然的**（至少是部分的）自由的財物成為**純經濟財物**，獲得這種財物要付出很高的報酬。”（第 15 頁）

**經常交換（銷售）財物的領域**就是它們的**市場**（第 21 頁）。

**經濟財物**包括“對人和物（*res incorporales*）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客體上完整地體現出來，是依賴於抽象概念的：（a）在完全自由交換中是顧客、商號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人的活動而形成的對別人有利的關係，可以在得到**補償的條件**下出讓和獲得；（b）在一定的法對流通的限制的基礎上生產**專有權、地役權、專利權、壟斷權、特許權**等等”（第 22、23 頁）。

瓦格納先生把“**服務**”列入“**經濟財物**”（第 23 頁，注釋 2 和第 28 頁）。他這樣做實質上是出於他的一種願望，即把樞密顧問瓦格納說成是“**生產工作者**”，因為他說，

“對於評價按**職業**提供**個人服務**的一切階級，即僕人，自由職業的以及國家的代表來說，回答是有決定意義的。只有在服務也算作**經濟財物**的情況下，上述階級在**經濟意義上**才是**生產的**”（第 24 頁）。

① 手稿中用的方括號，在本版中都改為大括號。——編者注

下面这段話很能說明瓦格納及其同伙的思維方法：

勞的意見是：要根据“**財產和經濟財物的定义**”来决定“**服务**是否也包括在它們之中”<sup>248</sup>。对于这一点，瓦格納回答說：應該对“**財產**”“**事先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把服务列入經濟財物**”（第28頁）。

但是“**决定性的論据**”据說是，

“**滿足需要的資料不能仅仅包括物方面的財物，因为需要不仅涉及这些，而且还涉及个人的服务**”

（即国家的**服务**，例如**法的保护等**）（第28頁）。

**財產：**

（1）**純經濟地……“在某一个时期內現有的經濟財物的儲存”**，作为用来**滿足需要的实际基金**，是“**自在的財產**”，“**人民的或国家的財產总和的一部分**”。

（2）“**作为历史-法的概念……——某一个人占有的或所有的經濟財物的儲存**”。“**財產的占有**”（第32頁）。这是“**所有权的历史-法的相对概念**。所有权指的只是对其他人來說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专有权**。这些权利的**范围是变动着的**”{即是历史的}（第34頁）。“**每一种財產在第二个意义上來說，都是个体財產，是某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財產。**”（同上）

**公共財產，**

“**包括官定的公共經濟的財產，即特別是国家的、州的、区的財產**。这种財產規定作为**公用**（道路、河流等等），这种財產的所有权屬於作为**社会**（人民、当地的居民等等）的法律上的**代表**——国家等等；或者这是**国家和公社的本来意义上的財產**，即要么是**服务于管理目的的、即为了执行国家职能的財產**，要么是**服务于財政的、即国家用来获得收入也就是获得为执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資金的財產**”（第35頁）。

**資本, capitale, κεφάλειον** [基本的東西] 一詞翻譯过来的——

用來表示不同于利息(τόκος)的債款。在中世紀,資本, *caput pecuniae*, 是表示某種基本的、本質的、原來的東西(第 37 頁)。德語用的是 *Hauptgeld* [本錢] 一詞(第 37 頁)。

“資本——用於製造的基金, 用於製造的財物儲存; 用於製造的流動資金的儲存。”與此相反的是“消費儲存: 在某一個方面總合起來的流動消費資金的總額”(第 38 頁, 注釋 2)。

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第 38 頁, 2(a)和 2(b))。

價值。按照瓦格納先生的意見, 馬克思的價值學說是“他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基石”(第 45 頁)。我從來沒有創造過“社會主義體系”, 所以這只不過是瓦格納、謝夫萊 *tutti quanti* [之流] 臆造出來的東西。

又說: 馬克思似乎

“在勞動內, 發現了只有他在这里所說的那種交換價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 而在社会必要劳动時間內, 發現了交換價值量的尺度, 等等”。

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過“交換價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 而是說, 諸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只有在至少存在兩個交換價值的情況下才存在)代表一種它們共有的、“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們的自然形式無關}的東西, 即“價值”。我們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因此, 在商品的交換關係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 也就是商品的價值。研究的進程會使我們再來把交換價值當做價值的必然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來考察, 但現在, 我們應該首先**不管這種形式**來考察價值。”(第 13 頁)<sup>249</sup>

可見, 我並沒有說“交換價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就是劳动”; 而且我以專門的一節詳細地考察了**價值形式**, 即交換價值的發展, 因此, 把這一“形式”歸結為“共同的社会实体”, 歸結為劳动, 是令人

奇怪的。瓦格納先生还忘記了，对我來說，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換价值”，而是**商品**。

又說：

“但是这个理論〈馬克思的〉与其說是一般价值理論，不如說是来自李嘉图的費用理論。”(第45頁)

瓦格納先生从“資本論”和季別尔的著作<sup>250</sup>（如果他懂俄文的話）中應該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間的差別，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論和貨幣的本质之間的任何联系。

如果瓦格納先生說，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論”，那末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說的一般价值理論，是指在“价值”这个詞上卖弄聰明，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們那样傳統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它们两者都有“价值”这一共同的詞。但是，如果他又說，这是“費用理論”，那末这句话或者归結为一个同义反复：商品作为价值，只代表某种社会的**东西**——劳动，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在我看来，是由**商品所包含等等的劳动時間的量**来决定的，因而是由生产一物所化的标准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等等；而瓦格納先生证明相反的看法，他的办法是断言这种价值理論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納先生关于“一般价值理論”的观点。或者他肯定**錯誤的东西**：李嘉图（随斯密之后）把价值和生产費用混淆在一起；我已經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和“資本論”的注釋中明确地指出，**价值和生产价格**（它只是在貨幣上表現出生产費用）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它們不相符合？这一点我沒有对瓦格納先生說过。

此外，我“处置太随意”，因为我把

“這些費用歸結為狹義上的所謂勞動消耗。但是為此必須事先提出證據，表明沒有私人資本家為建立和運用資本而進行的活動作媒介，生產過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這種證據迄今為止還沒有過”（第45頁）。

瓦格納先生不應當要**我**來提出這類未來的證據，恰恰相反，他應該先證明，**社會的生產過程**（更不必說生產過程一般），**在私人資本家出現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內，**是不存在的**。此外，瓦格納能說的只是：關於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簡言之，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馬克思的說明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錯誤在於，把這種經濟看做是暫時的，而相反地，亞里士多德的錯誤在於把奴隸制經濟看做不是暫時的。

“只要這類證據還沒有（換句話說，只要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着），**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也（瞧，這裡露出了馬腳）是價值的‘構成’因素，而不是像社會主義者所想的那樣，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第45、46頁）

什麼叫“對工人的剝取”，剝取他的皮，等等，無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論述中，“資本家的利潤”事實上不是“僅僅對工人的剝取或‘掠奪’”。相反地，我把資本家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的職能執行者，並且非常詳細地指出，他不僅“剝取”或“掠奪”，而且迫使進行**剩餘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幫助創造屬於剝取的東西；其次，我詳細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價物交換的商品交換情況下**，資本家只要付給工人以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就完全有權利，也就是符合於這種生產方式的權利，獲得**剩餘價值**。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使“資本家的利潤”成為價值的“構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個不是由資本家的勞動“構成的”價值中，包含他“有權”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說並不侵犯符合於商品交換的權利。

“这一理論过于片面地注意仅仅一个决定价值的因素{(1)同义反复。这一理論是錯誤的,因为瓦格納的“一般价值理論”同它不相一致,因此,他的“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教授的薪水就证明这一点;(2)瓦格納先生把价值偷換成当时的“市場价格”或与价值相背离的商品价格,而后者是某种与价值很不相同的东西},費用,而沒有注意另一个因素,即有用性、效用、需要因素”{也就是說,这一理論沒有把“价值”同使用价值混淆在一起,而这种混淆是多么合乎像瓦格納这类天生的混乱者的願望}。“它不仅不符合現時流通中交換价值的形成……”{他指的是价格形成,而这絕對不改变价值的决定,当然,在現时的流通中确实存在着交換价值的形成,这是任何一个濫設企业者、商品伪造者等等都知道的,价格形成同价值形成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却敏銳地注視着已經“形成的”价值。此外,例如在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我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真正被偿付,而实际上这种情形并不存在。謝夫萊先生在“資本主义等等”<sup>251</sup>中认为,这是“慷慨行为”或諸如此类等等。但这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然而,正如謝夫萊在‘精髓’<sup>252</sup>,特别是在‘社会机体’<sup>253</sup>中出色地也許是最終地(!)证明的那樣,它也甚至不符合在馬克思所假設的社会国家里必然要建立的那些条件。”

{这样,謝夫萊先生如此喜欢用我的名义“建立的”社会国家,就变成“馬克思的”社会国家(而不是謝夫萊在假設中偷偷塞給馬克思的社会国家了)}。

“这一点可以拿粮食等等为例来加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对粮食的需求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甚至在‘社会限定价格’的制度內,由于收成好坏的影响,粮食的交換价值也必然不能仅仅根据費用而要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調整。”

{每一句話都是胡說。首先，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過“**社会限定价格**”，并且在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資產階級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价值理論应用于那决不是由我而是由謝夫萊先生以我的名义設計的“**社会国家**”。其次，如果粮食价格因歉收而提高，那末，第一，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一定量的劳动**实現在較少的产品上**；第二，粮食的**出售价格**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这同我的价值理論有什么关系呢？粮食在什么程度上按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其他的商品也就在什么程度上以实物形式或貨幣形式按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即使在它們本身的貨幣价格不下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价值總額仍然不变，即使这个价值總額的貨幣表現增长了，按瓦格納先生的看法，即“**交换价值**”總額增长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假定其他商品总和的**价格下跌**抵消不了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的上漲**，即它的价格余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貨幣的交换价值 *pro tanto* [相应地] 跌到它們的价值以下；如果把貨幣也算在商品里，一切商品的价值總額不仅依然不变，而且甚至在貨幣表現上也不变。再其次，由于歉收造成粮食价格提高到超过其价值的程度，在“**社会国家**”里比在現在的粮食囤积商手里无论如何要小。“**社会国家**”事先就这样来組織生产，使年粮食供应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受收成好坏的影响。生产量、供应和需求得到合理的調节。最后，假設謝夫萊的关于“**社会限定价格**”的幻想實現的話，那是否能证实或者推翻我的价值理論呢？不能，就像在海船上或者在要塞里或者在法国革命时期等等，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这种措施同价值毫无关系，用来当做“**社会国家**”的可怕的东西)不可能破坏“**資本主义(資產階級)国家的**”**价值規律**，因而也不可能破坏价值理論一样！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胡說！}

同是这位瓦格納贊同地引证劳的話說：

“为了避免誤解，必須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按照德語的用法，这應該是指使用价值。**”<sup>254</sup>（第46頁）

**价值概念的推論**（第46頁及以下各頁）。

按照瓦格納先生的意見，从**价值概念**中，應該首先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得出**交換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者；仔細地研究一下他的最新版“**基础**”一书中的这些**煩瑣的言論**，是很有意思的。

“人的自然願望，是要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財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价值，而价值是計量的。”（第46頁）而在第12頁上我們讀到：“一切用来滿足需要的資料，都叫做財物。”

如果我們現在把第一句話中的“財物”一詞，代之以瓦格納强加于它的邏輯內容，那末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話將是这样：

“‘人的’自然願望，是要清楚地認識和了解‘用来滿足他的需要的内部和外部的資料’对他的需要的关系”。這句話我們可以稍微簡化一下，省略“内部的資料等等”，就像剛才瓦格納先生在后面一句話中用“或”来处理的那样。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疇，那末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論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納先生就是这样假設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沒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說話，——那末出发点是，應該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資料的过程，已經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



性质。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論**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話中就已經混淆不清了。

**第一：**由于在后面一句話中，“用来滿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資料”或“外部的財物”变为“外界物”，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就成为这样：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滿足他的需要的資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們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論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們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說，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們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这一屬性，就銘記在他們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論上”把能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們的需要和人們借以获得滿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們就对这些根据經驗已經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給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們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經常相互之間和同这些物之間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須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語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經驗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滿足已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語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設）的需要服务的。人們只是給予这些物以專門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們已經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滿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們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

来握有它們，从而也保持对它們的占有；他們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財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們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們有用；他們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見：人們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滿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資料，如此等等；然后人們也在語言上把它們叫做它們在实际經驗中对人們來說已經是这样的东西，即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料，使人們得到“滿足”的物。如果說，人們不仅在實踐中把这类物当做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語言上把它們叫做“滿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滿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滿意的状态}，——如果說，“按照德語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賦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們对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sup>①</sup>，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屬概念<sup>②</sup>。

一位德国的政治經濟学教授的“自然願望”是，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經濟学范疇，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經濟学中俗語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語的用法”改称为“价

① 俏皮話：《Wert》是“价值”，也是“原子价”。——編者注

② 在手稿上刪去了下列字句：“但是瓦格納先生的这种演繹法还更妙，因为他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人們’。这个非常簡單的‘演繹法’，瓦格納先生是这样来表現的：‘一个人的’（应讀做：一个德国政治經濟学教授的）‘自然願望’是，使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外界物不仅是滿足人类需要的資料，而且在口头上加以承认，因而也就成为这样的資料）……”。——編者注

值”。而一經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詞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詞就行了。

的确，劳（見第 88 頁）只是告訴我們說，“必須〈对一位德国的学究教授來說〉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并且天真地补充說，“按照德語的用法，这應該是指使用价值”。{在化学中，一个元素的一个原子同其他元素的原子相化合的数目，叫做該元素的原子价。但是原子的化合的重量叫做各种元素的当量，等价量，如此等等。因而，必須首先給“价值一般”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如此等等。}

如果人把物当做“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它們当做“財物”来对待，——瓦格納这样证明。他賦予物以“財物”的屬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納先生把它改称为“賦予价值”而有絲毫的改变。在下面的話中，他的迟鈍的脑子一下子“明白”了：

“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价值，而价值是計量的。”

我們对瓦格納先生从价值的估价（为了“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問題，他自己把“估价”用括号补充为“价值的估价”）中得出价值这一点已經可以不談了。“人”具有把財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自然願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納先生有可能履行諾言，得出“价值概念一般”。难怪瓦格納偷偷地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財物”。他的出发点是：人把成为滿足他的需要的資料的“外界物”当做“財物”来“对待”。因而，他对这些物进行估价，正是通过把它們当做“財物”来对待。而对这种估价的“描写”，我們在前面就已經見過，

例如：

“人作为具有需要的生物，同他周圍的外部世界处在經常的接触中，并且認識到，在外部世界存在着他的生活和福利的許多条件。”(第8頁)

这无非就是指他“对外界物进行估价”，因为这些外界物滿足他这个“具有需要的生物”，是滿足他的需要的資料，因此，正如我們后来所听到的，他把这些外界物当做“財物”来对待。

現在我們可以(尤其是在我們感觉到，教授的“自然願望”是要得出**价值概念一般**时)把賦予“外界物”以“財物”屬性，称为“賦予**价值**”。也許还可以說：人在把滿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当做“財物”来对待时，对它們进行“估价”，賦予它們以“价格”，这样从“人”的活动方式中就得出“**价格一般**”的概念，并且 ready cut [現成地]給了德国教授。凡是教授本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迫使“人”去做，但是，“人”自己其实也无非是这个当教授的人，这个当教授的人认为，当他把世界列入抽象的标题时，他就了解世界了。但是，由于外界物被“賦予**价值**”在这里仅仅是外界物被賦予“財物”屬性的另一种說法，所以我們决不能用这种办法，就像瓦格納用欺騙办法想使人相信的那样，賦予“財物”本身以“**价值**”，当做一个不同于它們“作为財物的存在”的規定。这里只是用“**价值**”一詞代替了“財物”一詞。{可見，这里还可以用“**价格**”一詞。同样可以用“**財宝**”一詞，因为“人”在給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財物”的印記时，对它們“进行估价”，因此把它們当做“**財宝**”来对待。由此我們看到，瓦格納先生怎样用魔法，从“人的自然願望”(它使教授获得自己的有限的概念世界)中立刻能得出**价值、价格、財宝**这三个經濟范疇。}但是瓦格納先生有一个模糊的願望：想摆脱自己的同义反复的迷宮，并且用狡猾的办法来证明“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由此就得出这

样的空話：“因此，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價值”等等。由于瓦格納先生把給“外界物”打上財物的印記，即把它們（在觀念上）標明為和確定為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同樣叫做“賦予這些物以價值”，所以他就不能說賦予“財物”本身以價值，正如不能說賦予外界物的“價值”以“價值”一樣。但是他利用“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價值”這些詞來玩弄 salto mortale<sup>①</sup>。瓦格納應該說：給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財物”的印記同樣可以叫做：“賦予”這些物以“價值”；瓦格納正是用這種辦法得出“價值概念一般”的。內容並不因為這種說法的改變而改變。這始終只是在觀念上標明或確定作為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的外界物；所以，事實上只是認識和承認一定的外界物是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但是，人本身事實上苦於“概念上的需要”）。

但是瓦格納先生想使我們或他自己相信，他並沒有給予同樣內容的東西以兩個名稱，而是相反地，從“財物”的規定上升到與它不同的、更為成熟的“價值”的規定，而他達到這一點的辦法只是，用“或”“財物”來代替“外界物”，——可是這個過程又為他用“或”“外界物”來代替“財物”“弄模糊”了。他的這種混亂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迷惑了他的讀者。他同樣可以採取下列辦法把這種絕妙“推論”顛倒過來：人在把成為滿足他的需要的資料的外界物，作為這種滿足需要的資料，而從其他的外界物中區別出來並加以標明時，對這些物進行估價，賦予它們以價值或使它們具有“價值”屬性；這同樣可以這樣來表達：他賦予它們以“財物”這個屬性作為特殊的標志，或者把它們當做“財物”來評價和估價。因此，“價值”，或外界物，就被賦予“財物”的概念。這樣，就從“價值”的概念中“推論

<sup>①</sup> 直譯是：驚險的飛躍；這裡是：把戲。——編者注

出”“財物”一般的概念。所有这类推論的目的只是迴避作者不能胜任的任务。

但是，瓦格納先生一口气迫不及待地從財物的“价值”轉到对这一价值的“計量”。

如果不偷运“价值”这个詞，內容也絕對不变。似乎可以这样說：人在給一定的外界物(它如何如何)打上“財物”的印記后，就逐漸在这些“財物”之間进行比較，并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級加以归类，如果願意說的話，也可以說对它們进行“計量”。关于这些財物的真正尺度的发展情况，即它們的量的尺度的发展情况，瓦格納决不应该在这里多談，因为讀者記憶犹新：这里談的并不是关于“价值的計量”一般指什么。

{至于把成为滿足人的需要的資料的外界物标明为、指明为“財物”，同样可以称为“赋予这些物以价值”，——这一点瓦格納不仅可以像勞那样，按照“德語的用法”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拉丁字 *dignitas* (重要性、尊嚴、等級，等等)来证明，这个詞用于物时，也是指“价值”；*dignitas* 来自 *dignus*，而后者来自 *dic*, *point out*, *show*, 标明, 表明；因而，*dignus* 的意思是 *pointed out* [被指出的]，由此也就得出 *digitus*——手指，用手指着物和指明物；希腊語——*δείκνυμι* [我表明]，*δάκτυλος* (手指)；哥特語——*ga-tecta* (*dico*)；德語——*zeigen* [表明]；如果注意到 *δείκνυμι* (或 *δεικνύω*) (使呈現, 表現, 指明)同 *δέχομαι* 具有共同的詞根 *δέκ* (保持, 拿取)，那末我們还可以得出許多进一步的“推論”。}

在瓦格納先生不滿七行的篇幅中，有那么多的陈詞濫調、同义反复的混乱、咬文嚼字以及欺騙伎倆。

所以毫不奇怪，这个蠢汉(*vir obscurus*)在耍了这些把戏以后

还洋洋得意地繼續說道：

“如果像以前做过的那样 {正是瓦格納做的}，从人的需要和**經濟本性**出发，去了解**財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合并到**財物概念**中，那末，爭論得那么多的、而且为許多往往不过是**虛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念**，就很容易〈indeed [的确]〉弄明白 {rather [不如說] “弄糊塗”}。”(第 46 頁)

我們看到，这里是在玩弄**概念**；在 *vir obscurus* 那里，概念的**虛构**的发展歸結为“**合并**”和在一定程度上“**分开**”。

**价值概念的进一步推論：**

**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或广义的**財物价值** = **財物**因……其有用性……而被賦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屬性**，虽然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 {因而以“**客观**”价值作为前提}……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也是具有**价值的財物**，在这里 (!) **財物**和**价值**，各种**財物**和各种**价值**，实质上就成为“**同一的概念**”了(第 46、47 頁)。

瓦格納在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記：“用这种办法〈这样！ 这样！〉推論出来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說了一通，从而“**推論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說来胡說和推論“**实质上**”是同一的**思維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知道，是什么样的**主观情况**把瓦格納先生同过去混乱的“**客观**”**概念**糾纏在一起。他向我們泄露了一个秘密：洛貝尔图斯曾写給他一封信(这封信可以在 1878 年的杜宾根“**杂志**”<sup>255</sup>上讀到)，在这封信里他(洛貝尔图斯)說明了，为什么“**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

“我〈瓦格納〉贊同这个見解，它的重要性我在第一版里已經強調指

出了。”

对于洛貝尔图斯所說的，瓦格納是这样評論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才能把那种通常不合邏輯地把‘价值’‘分割’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做法改变过来，这一点我还在第一版第 35 节中就已经做了”(第 48 頁，注釋 4)，

这位瓦格納还把我列在(第 49 頁，注釋)那些主張“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間。

这一切都是“胡說”。De prime abord [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沒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現代社会所表現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現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因此，我在第二版第 36 頁上写得很清楚：“在本章的开头，我們曾經依照通常的說法，說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說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別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現为这样的二重物”等等<sup>256</sup>。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們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現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

其次，只有对我的“資本論”一窍不通的 *vir obscurus*，才会



做出結論說：既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的一個注釋<sup>257</sup>中，駁斥了德國教授們關於“使用價值”一般的胡說，介紹那些希望知道一點實際的使用價值的讀者去讀“商品學指南”，所以使用價值對他說來就沒有任何作用。當然，使用價值不起其對立物“價值”的作用，除了“價值”一詞在“使用價值”這一名稱里出現以外，價值同使用價值毫無共同之點。根據同樣的理由，他也可以說，“交換價值”被我丟在一邊，因為它只是價值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價值”本身，因為我認為，商品的“價值”既不是它的使用價值，也不是它的交換價值。

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經濟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須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應該談的，我說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說明了使用價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所表現的特征形式，即：“一个物可以有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價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價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價值。”（第15頁）<sup>258</sup> {这就是洛貝爾圖斯的“社会使用價值”的根源。} 因此，使用價值——作为“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例如，在生活資料由社員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滿足公社每个社員、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相反地，洛貝爾圖斯先生却把商品的“社会使用價值”变为“社会使用價值”一般，所以是胡說。}

由上可見，在分析商品时，——因为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使用價值或財物，另一方面表现为“價值”——，像瓦格納和一般德國教授

們所做的那樣，把各種關於不屬於商品界領域的使用價值或財物的庸俗論述，如“國家財物”、“區的財物”等等，或者還有“健康”財物，等等，都“歸併進來”，那純粹是胡說。在國家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者（如經營礦山、森林等等）的地方，它的產品是“商品”，因而具有其他一切商品的特点。

另一方面，這個 *vir obscurus* 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時候，我並不限於考察商品所表現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進一步論證了商品的這種二重存在體現着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有用勞動**，即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和**抽象勞動**，作為**勞動力消耗的勞動**，不管它用何種“有用的”方式消耗（這是以後說明生產過程的基礎）；論證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貨幣形式即**貨幣**的發展中，一種商品的**价值**通過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另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現出來；論證了**剩餘价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着一種與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這是必須指出的——使用價值始終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才予以注意，即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价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

因此，在分析商品時，即使在談它的“使用價值”時，我們也沒有立即聯系到“資本”的定義，當我們還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時候，就談資本的定義，那純粹是荒唐的事。

瓦格納先生對我的論述不滿意（厭惡）的地方就是：我沒有順他的意，沒有按照德國國粹教授的“願望”，把使用價值同價值混淆在一起。德國社會（誠然很晚）正由封建自然經濟，或者至少是由這種經濟占優勢，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但是教授們的一隻腳

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这是很自然的。他們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因此，我們的 *vir obscurus* 甚至沒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經濟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們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語掉弄舌鋒，以言語构成一个系統”<sup>①</sup>）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就这样說道：

“根据洛貝尔图斯和謝夫萊的观点，我把一切价值的使用价值性质提到首要地位，而且更加強調使用价值的估价，因为交换价值的估价对許多极重要的經濟財物甚至根本不能应用{是什么东西迫使他这样应用的呢？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官員觉得自己有責任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例如对国家及其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經濟关系就是如此。”（第49頁，注釋）

{这使我們想起化学这門科学产生以前的古化学家。因为在日常生活（按照北方的习惯）中直截了当地称为奶油的烹调用奶油具有柔軟的特点，他們就把氯化物，如无水氯化鋅、三氯化銻等等也叫做什么什么奶油<sup>②</sup>等等；因而，用这个 *vir obscurus* 的話來說，“他們坚信，所有的氯化物、鋅化物和銻化物都具有奶油的性质。”} 这种无稽之談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因为某些財物，特别是国家（一种財物！）及其“服务”{特别是它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的服务}不是“商品”，所以包含在“商品”本身中的对立的性质{这些性质同样清楚地反映在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上}应当互相混淆！不过，瓦格納及其同伙未必能证明，他們的“服务”，按照其“使用价值”、按照其物的“內容”来“估价”，比按照其“薪金”<sup>③</sup>（用瓦格納的話說是根据

①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場（“浮士德的书斋”）。——編者注

② 在德語中无水氯化鋅是 Zinkbutter，按字面譯是鋅奶油；三氯化銻是 Antimonbutter，按字面譯是銻奶油。——譯者注

③ 俏皮話：《Gehalt》是“內容”，也是“薪金”。——譯者注

“社会限定价格”)即按照其报酬来“估价”,会对他们更有利。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 [*Wert*] 或值 [*Würde*] 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 {indeed [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数量受到度量、衡量等等一样);(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在哥特语里表示 *Wert* 和 *Würde* 的只有一个词——*vairths*, *τιμή*, {*τιμάω* 估价,即评价;确定价格或价值,定价;比喻的意思是:尊重,珍视,着重,特别看待。*Τιμή*——估价,因此是:决定价值或价格,评价,定价。其次:价值的估价,以及价值或价格本身(按希罗多德,柏拉图的使用),按狄摩西尼的使用,*αί τιμαί* 是费用的意思。再次:高的评价,尊敬,尊重,荣誉席,光荣的职位。见罗斯特的希德辞典<sup>259</sup>。}

在哥特语里,价值,价格(根据舒耳采的辞典<sup>260</sup>)是: *vairths* 形容词是 *ἄξιος, ἰκανός*。

在古代北部德意志语里是: *verdhr*——有价值的, *verdhr*——价值,价格;在盎格魯薩克遜語里是: *veordh, vurdh*; 在英語里是: *worth*, 形容词;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 *Wert* 和 *Würde*。

{“在中部高地德意志語里是：*wert*，第二格——*werdes*；形容詞是 *dignus*，以及 *pfennincwert*；*wert*，第二格——*werdes*，價值，意義，貴重；*aestimatio*，一定價值的商品，例如，*pfenwert*，*pennyworth*；*werde*：*meritum*，*aestimatio*，*dignitas*——有價值的質。”（威曼“中部高地德意志語辭典”）261。}

可見，*Wert* 和 *Würde*，無論就詞源來說，或是就意思來說，相互具有密切的聯繫。這一情況之所以模糊起來，是由于在現代高地德意志語中，*Wert* 這個詞的沒有限制的（錯誤的）詞尾變化方式成了通常的現象：*Werth*，*Werthes* 代替 *Werdes*，因為同哥特語中的 *th* 相當的是，高地德意志語中的 *d*，而不是  $th = t$ ，中部高地德意志語里的情況也是這樣（*wert*，第二格 *werdes*）。按照中部高地德意志語的規則，*d* 在詞尾應該變成 *t*，即 *wert* 變為 *werd*，但是第二格為 *werdes*。

但是，所有這一切同“價值”這個經濟範疇毫無共同之點，就像同化學元素的原子價（原子論）或化學的當量或同價（化學元素的化合量）毫無共同之點一樣。

其次，必須注意，——甚至從這些詞的關係來看——由 *Würde* 和 *Wert* 最初的同一起源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就像從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一樣，這個詞是用于物，即用于勞動產品的自然形式，後來被原封不動地直接轉用于價格，即價值的發達形式，亦即交換價值，但這同事實的實質毫無共同之點，正如這個詞仍然被用來表示優越，光榮的職位等等一樣。所以，在這裡，在語言方面，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沒有任何差別。

現在我們來談談這個 *vir obscurus* 常常引用的證人洛貝爾圖斯{他的文章可以在杜賓根“雜誌”上找到}。這個 *vir obscurus* 引

证了洛貝尔图斯下列的話：

**正文第 48 頁：**

“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前一种使用价值与个人及其需要相对立，同某一个社会組織沒有任何关系”——

{这已經是胡說(參看“資本論”第 171 頁<sup>262</sup>)，那里是这样說的，劳动过程，作为創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等等，是“它的”(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共有的”，并且“与它的各种社会形式无关”。{第一，与个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詞，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至于其中哪些使用价值与他“相对立”(在这些人看来，一切都“立着”；一切都有“等級”<sup>①</sup>)，那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阶段，因而也和“某一个社会組織”相适应。如果洛貝尔图斯要說的只是这样一种陈詞濫調，即实际作为使用对象与某个个人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他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同他相对立，那末，这或者是陈腐的同义反复，或者是錯誤的論断，因为即使不談稻子、玉蜀黍、小麦或者肉{肉就不是作为食物与印度教徒相对立}这类物，——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樞密顧問称号或某个勳章的需要，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組織”內才是可能的}。

“后一种使用价值是由許多个别的机体(或个人)組成的社会机体具有的使用价值。”(正文第 48 頁)

漂亮的德語！这里指的是“社会机体的”“使用价值”，还是“社会机体”占有的使用价值{例如原始公社的土地}，还是某个社会机体內的使用价值的一定“社会”形式——例如在商品生产占統治的

① 俏皮話：《steht》——“立着”，《ständisch》——“等級的”。——編者注

地方，在那里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必須是“为别人的使用价值”，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必須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同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是没有什么好說的。

現在来談談瓦格納的浮士德<sup>①</sup>的另一个論点：“交換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历史外壳和附屬物**。如果把**交換价值作为邏輯的对立物**同使用价值相对立，那末就使历史概念同邏輯概念处于邏輯的对立，这在邏輯上是不容許的。”（第48頁，注釋4）瓦格納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說：“这完全正确！”但是究竟誰这样做呢？无疑，洛貝尔图斯是指我，因为据他的助手魯·迈耶尔說，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反駁‘資本論’的手稿”。誰使之处于邏輯的对立呢？是洛貝尔图斯先生，在他看来，無論是“使用价值”或是“交換价值”，就性质來說，两者都仅仅是“概念”。事实上在任何的价目表中，每一种商品都經過这种不合邏輯的过程，它作为**財物或使用价值**，作为棉花、紗、铁、粮食等等不同于其他商品，表现为在质上和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財物”，但同时又表現自己的价格，表现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同一本质**的东西。对使用它的人來說，它表现为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作为**交換价值**，它就表现为同自然形式完全不同的、为它和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只有在洛貝尔图斯和他的同类的德国学究教授們那里才有“邏輯的”对立，他們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爭論，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在这些矯揉造作的詞句背后隱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發

---

① 即洛貝尔图斯。——編者注

現：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說了，什麼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為這並不是在任何狀態下都需要的}；一句話，他在任何狀態下都應該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尋找現成的外界物，並占有它們，或者用在自然界發現的東西進行製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事實上總是把一定的外界物當做“使用價值”，也就是說把它們當做自己使用的對象。因此，按照洛貝爾圖斯的意見，使用價值是一個“邏輯的”概念；從而，由於人需要呼吸，“呼吸”就是一個“邏輯的”概念，而決不是“生理學的”概念。洛貝爾圖斯把“邏輯的”概念和“歷史的”概念對立起來，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膚淺！他把“價值”（經濟學上的，和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對立的）只是理解為它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但是由於後者只是在那樣的地方才出現，在那裡，至少有一部分勞動產品即使用對象成為“商品”，而這並不是一開始就發生的，而只是在社會發展的一定時期即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才發生的，所以交換價值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如果洛貝爾圖斯（下面我將談到，為什麼他看不到這一點）進一步分析商品的交換價值（因為交換價值只是存在於有許多商品、有不同種商品的地方），那末他就會在這個表現形式的背後發現“價值”。如果他再進一步研究價值，那末他就會發現，在這裡，物，“使用價值”，只是當做人類勞動的物化，當做相同的人類勞動力的消耗，因而這個內容表現為物的對象性質，表現為物本身固有的性質，雖然這種對象性不表現在其自然形式上{正是由於這一點，特殊的價值形式就成為必要}。這樣一來，他就會發現，商品的“價值”只是以歷史上發展的形式表現出那種在其他一切歷史社會形式內也存在的、雖然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的東西，這就是作為社會勞動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勞動的社會性。



因此，如果說商品的“價值”只是一切社會形式內都存在的東西的一定的歷史形式，那末，以商品的“使用價值”為特征的“社會使用價值”也是這樣。洛貝爾圖斯先生引用了李嘉圖的價值量的尺度，但是也和李嘉圖一樣，不研究或不了解價值實體本身；例如，他不了解原始公社這個相互聯系的勞動力的共同機體中[勞動過程]的“共同”性，因而也不了解這些勞動力的勞動即勞動力的消耗的“共同”性。

在這個問題上再來談瓦格納的謬論就是多餘的了。

價值量的尺度。這裡瓦格納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認為，遺憾的是，我“排除了”“形成資本的勞動”（第 58 頁，注釋 7）。

“在受社會機構調節的交易中，規定限定價值或限定價格，應該同這種費用因素（他把在生產等等中消耗的勞動量稱為費用）相適應，在過去的行政機關和行會的限定價格中在原則上就是這樣，在任何新的限定價格制度下（指社會主義的（！））也必然會是這樣。但是，在自由交易中，費用不是規定交換價值和價格的唯一基礎，並且在任何可能設想的社會制度下，都不能成為這樣的基礎。因為不管費用怎樣，使用價值和需要是一定會發生波動的，而這種波動對交換價值和價格（合同價格和限定價格）的影響，改變着和一定會改變費用的影響”，等等（第 58、59 頁）。“這個{正是這個！}對社會主義價值學說的非常聰明的修正……是謝夫萊的功勞”〈！〉，他在“社會體”第 3 卷第 278 頁上寫道：“不管社會對需要和生產發生任何影響，務必使所有的需要在質上和量上每次都同生產保持平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費用的社會指標就不可能同時成為使用價值的按比例的社會指標”（第 59 頁，注釋 9）。

這一切只是關於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價值的變動的陳詞濫調，並設想在“馬克思的社會國家里”，他為資產階級社會闡發的價值理論仍然有效，這一點可由瓦格納下面這段話來證明：

“它們〈價格〉將暫時地或多或少背離它們{費用}，它們對使用價值增大的財物來說將提高，對使用價值減少的財物來說將降低。費用只有在長時期

內才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調节者发生作用”，等等(第 59 頁)。

法。下面这一段話足以說明我們的 *vir obscurus* 关于法对經濟的創造性影响的臆想，虽然在这一段話中包含的荒謬观点，他在許多地方宣揚过：

“个体經濟都由某个作为法的和經營的主体的个人来領導，以充当其技术和經濟活动的器官……这不是一种純經濟現象，而同时取决于法的性质。因为法决定，誰被承认是这个个人，因而可以領導某个經濟”，等等(第 65 頁)。

**交通和運輸事业**(第 75—76 頁和第 80 頁，注釋)。

第 82 頁上“解釋{某个經濟的}財物总量(实物的)組成部分的變換”{瓦格納又稱之為“財物變換”，謝夫萊稱之為“社會物質變換”}。{这至少是后者的一个場合：在說明生產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那一段話，是从我这里抄襲去的，那里在分析  $W—G—W$ 〔商品—貨幣—商品〕时，第一次出現了物質變換，而以后形式變換的中斷，也是作為物質變換的中斷來說明的。

瓦格納先生其次談到某个生產部門(在他看來，是某个“个体經濟”)中財物的“內部變換”，這些話一部分應用於它們的“使用價值”，一部分應用於它們的“價值”，這些話也是我在分析  $W—G—W$  的第一階段，即  $W—G$  (如織麻布的人的例子，“資本論”第 85、86、87 頁)時說過的，那里結尾是這樣說的：“所以我們的商品所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係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與人的相互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資本論”第 87 頁)。<sup>263</sup>

通過交易獲得財物的契約。在這裡這個蠢漢 (*vir obscurus*) 完全本末倒置。在他看來，先有法，后有交易；而實際情況却相反：

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時就指出，還在不發達的物物交換情況下，參加交換的個人就已經默認彼此是平等的個人，是他們用來交換的財物的所有者；他們還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財物，相互進行交易的時候，就已經**做到**這一點了。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係**，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這一形式既不構成自己的內容，即交換，也不構成**存在於**這一形式中的**人們的相互關係**，而是相反。與此相反，瓦格納寫道：

“這種獲得{通過交易獲得財物}必須以一定的**法制**為前提，**根據它**〈！〉進行交易”，等等(第84頁)。

**信貸**。瓦格納沒有闡明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就立即把流通過程(只要這一過程是以兩個等價物在W—G中不是同時互相對立的形式來完成的)變為“**信貸交易**”(第85頁及以下各頁)，而且“補充說”，它往往同“**利息**”的支付相聯系；這也是為了把“**給予信任**”，從而把“**信任**”當做“**信用**”的基礎。

關於**普赫塔**等人對“**財產**”的法律概念，根據他們的看法，作為**負數組成部分的債務**，也是財產(第86頁，注釋8)。

**信貸**或者是“**消費信貸**”，或者是“**生產信貸**”(第86頁)。前者在文明的低級階段占主要地位，後者在“**高級**”階段占主要地位。

關於古羅馬**負債的原因**{**貧困的原因**：收成不穩定，兵役，奴隸的競爭}(見耶林“**羅馬法的精神**”第3版第2部第2冊第234頁264)。

按照瓦格納先生的意見，在“**低級階段**”，“**消費信貸**”在“**下層被壓迫**”階級和“**上層揮霍**”階級中間占統治地位。事實上：在英國和美國“**消費信貸**”隨着儲蓄銀行系統的建立而普遍流行！

“特别是生产信贷……表现为以土地私有制和流动资本为基础并允许自由竞争的国民经济的一个经济因素。它同财产的占有相联系，而不是同作为纯经济范畴的财产相联系”，因此，只是“历史-法的范畴。”(！)(第 87 页)

**个体经济和财产对外界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行情影响的依赖。**

(1) **使用价值方面的变化**：随着作为一定自然过程的条件的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改进（葡萄酒、雪茄烟、小提琴，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变坏……分解为自己的物的组成部分，各种意外情形。”与此相适应的是交换价值在这方面的“变化”，“价值提高”或者“价值降低”（第 96、97 页）。见关于柏林的住房租赁合同（第 97 页，注释 2）。

(2) **人对财物属性认识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在好的情况下“财产增加”。{1620 年左右森林的减少已经威胁到炼铁生产的继续存在，当时英国利用煤来炼铁；化学上的发现，如碘（含碘的盐源的利用）。磷钙石做肥料。无烟煤做燃料。煤气照明材料，照相材料。发明染料和药物。古塔波胶。橡胶。植物象牙（用 *Phytelephas macrocarpa* 做的）。杂酚油。蜡烛。利用瀝青、松针（松毛）、高炉的煤气、煤焦油制造苯胺，利用废毛、锯屑，如此等等。}在不好的情况下，有用性减少，因而价值也降低（例如，猪身上发现旋毛虫，染料和植物中发现毒物，等等）（第 97、98 页）。发现土地中的矿物、它的新的有用属性及其新的用途，使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加（第 98 页）。

(3) 行情。

有些外界条件对“用于交易的财物的生产、需求和销售”……从而对它们的“交换价值”，以及对“个别现成的财物的交换价值

有重大影响”，这一切外界“条件”的影响……“完全或者几乎不取决于經營的主体”“或所有者”(第 98 頁)。行情是“自由竞争制度”中的“决定性因素”(第 99 頁)。一个人“通过私有制的原則”获得“其不应获得的东西”，而另一个人則遭到“損失”、“經濟上不应有的亏损”。

关于投机(第 101 頁, 注釋 10)。住宅的价格(第 102 頁, 注釋 11)。煤炭工业和炼铁工业(第 102 頁, 注釋 12)。技术上的許多变化降低工业品如生产工具的价值(第 102、103 頁)。

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民經济中……占优势的是有利于土地占有,特别是城市(在大城市)的土地占有的机会,尽管偶然地有时候和有些地方发生一些偏离和波动”(第 102 頁)。

“因此,行情对土地占有者特別有利。”(第 103 頁)“这些利潤,以及其他大多数和行情相联系的利潤……是与‘投机亏损’相一致的純投机利潤。”(第 103 頁)

“粮食买卖”(第 103 頁, 注釋 15)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必須

“公开承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經濟状况”“实质上是行情的結果”,而这必然“削弱个人在經營上的責任心的意义”(第 105 頁)。

因此,“如果現在的国民經济組織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資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沒有(在說了冗长的廢話以后)任何办法“来消除……{那些由此产生的災禍,如銷售方面的阻碍、危机、解雇工人、减少工資,等等的}原因”,从而消除“这个禍害本身”;至于“征兆”或“禍害的后果”,瓦格納先生认为有可能消除,其办法是征收“行情利潤”“稅”,通过建立“合理的……保險制度”来防止成为行情产物的“經濟上不应有的”“亏损”(第 105 頁)。

这个蠢汉說，如果认为現在的生产方式及其“法的基础”是“不应变化”的，就会得出这个結果；而他的研究比社会主义学說深刻得多，将洞察“事物的本质”。Nous verrons [我們会看到]究竟用什么办法？

形成行情的各个主要因素。

(1)在天气和政治条件(例如耕地由于战争遭到破坏)的影响下，主要食物的收成不稳定。这影响生产者和消費者，第 106 頁。{关于粮食商販，見图克“价格史”<sup>265</sup>；关于希腊——伯克“雅典人的国营經濟”第 1 卷第 1 册第 15 节<sup>266</sup>；关于羅馬——耶林“精神”第 238 頁。在我們的时代，每次价格稍許有些提高，下层階級居民中死亡率就增高，这“无疑地证明，工人階級群众的平均工资很少超过生活上绝对必需的数目”(第 106 頁，注釋 19)。}交通工具的改进{正如我們在注釋 20 中讀到的，“同时”成为“使价格拉平的粮食投机买卖的极重要前提”，土地耕作法的改变{“輪作制”——“栽培不同的产品，它們由于天气的变化受到不同的影响，有利或者不利”}；因此，“同中世紀和古代”相比，在短时期內，粮价的波动較少”。但是現在波动还很大(見注釋 22，第 107 頁；事实見同上)。

(2)技术方面的变化。新的生产方法。貝氏鋼代替铁，等等，第 107 頁(再加上注釋 23)。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

(3)影响人和財物的空間移动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这影响……土地和相对价值低的物品的价值；一系列生产部門必須克服困难采用其他生产方法(第 107 頁)。{再加上注釋 24，同上。交通近便地方的土地的价值由于这里生产的产品銷路好而提高；城市人口便于集中，因此城市和靠近城市的地方的土地价值大大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原料、木料和矿产品便于从目前价格便宜

的地方輸往價格高的地方；因此，前一個地區的有固定收入的居民階層的經濟狀況惡化，相反，那里的生產者，尤其是土地占有者的情況改善。糧食和其他相對價值低的材料便於輸入，就起相反的作用。它有利於輸入地區的消費者，而不利於那里的生產者。必須過渡到其他的生產，例如從農業過渡到畜牧業，英國從四十年代起就是如此，德國由於東歐廉價糧食的競爭也是如此；對於德國的農業主來說，這是困難的（在目前），第一、由於氣候，第二、由於不久前工資急劇提高，農業主不可能像工廠主那樣容易把工資的提高轉移到產品上去，等等。}

（4）趣味的變化、時式等等，這往往是在短時期內很快發生的。

（5）國內交換和國際交換範圍內的**政治變動**（戰爭、革命、等等）；指由於在分工的加強、國際等等交換的發展、信貸因素的影響、現代戰爭的巨大規模等等情況下**信任或者不信任**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第 108 頁）。

（6）**農業、工業和商業政策的變化**（例如：英國穀物法的改革）。

（7）**全體居民的分布狀況和總的經濟狀況的變化**，例如從農業地區移住城市（第 108、109 頁）。

（8）**個別居民階層的社会和經濟狀況的變化**，例如由於保證結社自由等等（第 109 頁）。{法蘭西的 50 億賠款<sup>267</sup>，同上，注釋 29。}

**個體經濟中的費用**。所謂生產“價值”的“勞動”（一切費用都歸結為這種勞動），也應該是指真正廣義的、包括“一切人類有目的的、為獲得收入所必需的活動”的“勞動”，因而尤其應該是指“領導者的精神勞動和資本借以形成和應用的活動”，“因此”酬謝這種活動的“資本的利潤”是“費用的構成因素”。“這個觀點同社會主義的價值和費用理論，同對資本的批評是相矛盾的。”（第 111 頁）

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論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資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第 114 頁，注釋 3)。然而我的論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統治地位的价值規律，“**剩余价值**”归資本家，而不归工人。且不談这类詭辯，只举出下列的陈詞濫調，就可以揭露我們的 viri obscuro 的讲坛社会主义性质：

“**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忽視許多剝削的情形：純收入分配不合理**”和个别企业的生产費用过分地縮减到有損于工人(时而也有損于借貸資本家)而有利于雇主”(同上)。

**英国和法国的国民收入**(第 120 頁， $x-\varphi$ )。

**国家的年度总收入：**

(1) 一年內新生产的財物总和。**本地原料**应该完全列入自己的价值总额；**用本地和外国原料制造的产品**算在{避免原料計算两次}借助工业劳动取得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在**商业和运输业**中流通的原料和半成品算在由此造成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

(2) **国外輸入的貨币和商品**，即一国根据**信貸契約**或該国国民的**国外投資**所产生的**債務的利息**。

(3) 該国**航运**从**对外贸易**和**过境貿易**中因輸入外国的財物而实际所得的**海运利潤**。

(4) **国外汇寄給在該国的外侨的現金或商品**。

(5) **沒有相应的补偿而輸入的财产**，例如，另一国向該国**长期納貢**，**經常移民**和**經常輸入移民的财产**。

(6) **入超的商品和貨币額**，{但这时在第一項应该扣除向国外的輸出}。

(7) **供使用的财产**(如住宅等等)因使用而提供的**价值額**(第



121、122 頁)。

純收入中應該扣除向**外國航運事業**支付運費而輸出的財物(第 123 頁)。**{事情并不那麼簡單：生產價格(國內的)+運費 = 出售價格。如果一國用自己的船隻輸出商品，那外國就支付運費；如果這裡存在的市場價格，等等}**。

“除了長期納貢以外，還應該加上向**國外的外國國民**定期支付的款項(例如：**波斯人對希臘人的賄賂，路易十四時代給外國學者的獎金，聖彼得的迪納里268**)。”(第 123 頁，注釋 9)

為什麼不算德國的公爵們從法國和英國定期獲得的津貼？

見由“**國家和教會的服務**”(第 125 頁，注釋 14)構成的**私人收入**的素樸形式。

從**個體經濟和國民經濟**的觀點來估價價值。

庫爾諾在“**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1838 年版)一書中，把**消毀一部分商品儲備**而後賣其餘的商品叫做“**商業意義上的真正的創造財富**”<sup>269</sup>(第 127 頁，注釋 3)。

關於私人的消費儲備即瓦格納所謂的“**供使用的資本**”的減少，——在現在的文明時期，尤其是在柏林，第 128 頁，注釋 5 和第 129 頁，注釋 8 和 10；**生產企業中的貨幣或自有的流動資本**太少，第 130 頁和同上，注釋 11。

現在**對外貿易**具有比較重大的意義(第 131 頁，注釋 13 和第 132 頁，注釋 3)。

卡·馬克思寫於 1879 年下半年—  
1880 年 11 月

第一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1930 年俄文版第 5 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卡·馬克思  
給維·伊·查苏利奇的  
复信<sup>①</sup> 草稿

初 稿

(1)在分析資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第1栏),并且说过,“这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剝夺。这种剝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sup>270</sup>。

可見,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請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

“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剝夺,——这就是資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頁第2栏)<sup>271</sup>

可見,归根到底这里所說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

---

① 見本卷第268—269頁。——編者注

**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这种理論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論据如下：

回顾一下遙远的过去，我們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見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範圍內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範圍內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資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資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俄国資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問他們：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輪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經過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嗎？同时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紀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額国債，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給轉化为資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現在誰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資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

因素。

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sup>①</sup>。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sup>②</sup>(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什么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sup>272</sup>。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氏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

---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总之,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编者注

② 路·摩尔根。——编者注

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經濟条件，是和現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們在閱讀資產階級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們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們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經濟規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sup>273</sup>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連綿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显然是死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賦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紀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紀时期，成了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說，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們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末，至少由于尤利烏斯·凱撒的叙述，我們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凱撒的时代，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統亲属联合[tribus des confédérations]之間已經每年重分土地，但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員之間进行重分。由此可見，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

亚洲現成地輸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純理論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現在必須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員的血統亲屬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狹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內,房屋及其附屬物——园地,已經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現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員之間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給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結果,而不是生产資料公有化的結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穩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漸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財富的积累)、动产在农业本身

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有关的許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闡述就会离題太远），都是起破坏經濟平等和社会平等作用的因素，并且就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經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屬物**。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不是說，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絕對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 priori*〔先驗地〕說，二种結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3）俄国是在全国范圍內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脫离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經在沒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規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組合**关系，有助于他們从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維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給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sup>①</sup>。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場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

<sup>①</sup>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当然，这必須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因为农民到处都是各种急剧轉变的反对者。”——編者注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sup>274</sup>，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問他們，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輪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經過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問他們，他們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紀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銀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軟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絕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領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一缺点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表會議代替乡<sup>①</sup>——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會議将成为维护他們利益的經濟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 *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現在却相反，不論是在西欧，还是在

---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sup>①</sup>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組合**关系，这便于它从小土地經濟过渡到集体經濟，而且，俄国农民在沒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經營了。

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經濟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經濟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說，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末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的时期，已經过去了。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地力，使土地貧瘠，这种情况使这个时期过去得很快。現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規模組織起来的合作劳动。現在他們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們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們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嗎？

但是，設備、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資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範圍內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資本主义生产在給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資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勢，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規模組織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至于最初的創辦費用（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維持生存并且也必須从“农村公社”

中去寻找它的“复兴的泉源”。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們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資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資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現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結束。

(4)要能发展，首先必須生存，可是“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險境地，显然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要剝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們从他們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請你們試一試超过一定的限度从农民那里夺取他們的农业劳动产品，那末，尽管你們用宪兵和軍隊也不能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羅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拋棄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强征暴斂的借口的財產。

正是从所謂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經濟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財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貸者剝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經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銳，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sup>①</sup>。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資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

<sup>①</sup>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国家靠剝削农民来培植一些最容易接种的資本主义体系的贅生物——交易所、投机买卖、銀行、股份公司、铁路，国家抵补它們的亏空，并用垫款来支付給企业主的利潤，如此等等。”——編者注

門，它們絲毫不發揮農業生產的潛力，却特別有助於不從事生產的中間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奪農產品。這樣，國家就幫助了那些吮吸着“農村公社”本來已經涸竭的血液的新資本主義寄生蟲去發財致富。

……總之，國家對於最能促進和加速對農民（俄國的最雄厚的生產力）進行剝削、並最能使“社會新棟梁”發財致富的一切技術和經濟辦法，是促使它們加速實施的。

（5）破壞性影響的這種結合，只要沒有被強大的反作用擊破，就必然會導致農村公社的滅亡。

但是要問，為什麼從農村公社的現狀中得到好處的所有這些利害關係者（包括在政府監護下的大工業企業），竭力想殺死給他們下金蛋的母雞呢？正因為它們感到“目前這種狀況”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所以感到現在的剝削方式已經不行了。由於農民的困苦狀況，地力已經耗盡而變成貧瘠不堪。豐年和荒年互相交替。最近十年的平均數字表明，農業生產不僅停滯，甚至下降。最後，第一次出現了俄國不僅不能輸出糧食，反而必須輸入糧食的情況。因此，不能浪費時間。必須結束這一切。必須創造一個由比較富裕的少數農民組成的農村中等階級，並把大多數農民干脆都變為無產者。正是為了這一目的，“社會新棟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創傷說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徵兆。

既然“農村公社”的現狀有利於這麼多不同的利害關係者，並且特別有利於在亞歷山大二世政權關懷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新棟梁”，那末，為什麼它們還決意要使公社滅亡呢？為什麼它們的代表人物還把公社所蒙受的創傷說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確鑿證據呢？為什麼它們要殺死下金蛋的母雞呢？

只是因为，根据經濟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題太远），大家都知道，公社的現狀不能繼續維持下去了，并且純粹由于事态的发展，現在的剝削人民群眾的方式已經不行了。因此，必須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社所有制，使比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等階級，而使絕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緣；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給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災禍之中。

正当人們吸着公社的血、蹂躪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貧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僕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創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縮短它的臨終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談的已經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問題，而簡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資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 二 稿

(1)我在“資本論”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資本主义生产轉变是以剝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別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剝夺”(法文版第315頁)。接着我又說：“这种剝夺(剝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經歷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見，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們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341頁上說：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屬於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見，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資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l. c.[同上]，第342頁<sup>275</sup>)，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因此，他們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唯一結論可能就是：俄国要想在自己国内确立資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公社所有制、从剝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而俄国自由派的願望就是这样的<sup>①</sup>；但是，他們的願望是否比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西

<sup>①</sup> 在手稿上刪去了下列字句：“他們想在俄国开始进行資本主义的生产，并且作为彻底的自由派，也想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編者注

方中世紀的行會制度移植到俄國土地上來的願望更有理由呢？<sup>276</sup>

總之，西方對農民的剝奪，使“勞動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變為”資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這究竟仍然是一種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種私有制形式。俄國則相反，它是資本主義所有制代替共產主義所有制的問題。

當然，如果資本主義生產定將在俄國獲得勝利，那末，絕大多數農民即俄國人民定將變成僱傭工人，因而也會遭到剝奪，剝奪的辦法是他們的共產主義所有制先被消滅。但是，不管怎樣，西方的先例在這裡完全不能說明問題。

(2)關於您所講到的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完全不知道。現在和我保持個人聯繫的一些俄國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

(3)從歷史觀點來看，證明俄國土地公社占有制必然解體的唯一鄭重的論據如下：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歐各地存在過，在社會進步過程中，它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俄國，它怎麼能免于同樣的遭遇呢？

首先，在西歐，土地公社占有制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誕生之間隔着一段很長的時間，包括整個一連串的經濟上的革命和進化，而資本主義生產不過是其中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神奇地發展了社會的生產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它同自己所產生的社會生產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歷史今後只是對抗、危機、衝突和災難的歷史。結果，資本主義生產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純粹的暫時性。歐洲和美洲的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鎖，以合作生產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以古代類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

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

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sup>①</sup>

(4)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在这种公社里面，农民已经根据私人所有权占有了他所居住的房屋和作为房屋附属物的菜园。这正是古代形式的第一个破坏

<sup>①</sup>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正在趋于衰落、正在接近它只有成为‘古代’形态的时期，但是这些俄国的崇拜者……”。——编者注



性因素，是較古的类型所沒有的。另一方面，較古的类型都是建立在公社各个社員的血統亲屬关系上的，而俄国公社所屬的类型已經摆脱了这种狹窄的联系。这使它有了較广闊的发展余地。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絕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內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我认为，在俄国，这种最初由幅員辽阔决定的孤立性，一旦摆脱了政府的桎梏是很容易消除的。

現在我来談談問題的实质。无可諱言，俄国公社所屬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內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則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結合，这在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險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員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財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內部各种利益之間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經濟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應該忘記，俄国农民在使用沒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經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們习惯于劳动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們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勢，有利于进行大規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墊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經費。不言而喻，这里所說的只是逐漸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須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

(5)把一切多少帶有理論性的問題撇開不談，那也用不着向您說明，目前威脅着俄國公社生存的危險來自一致反對它的那些強有力的利害關係者。某種在國家幫助下靠犧牲農民哺育起來的資本主義是同公社對立的；它所關心的是公社的毀滅。並且為了地主的利益，創造出一個由比較富裕的農民組成的農村中等階級，而把貧苦農民即農民大眾變為普通的僱傭工人，也就是說，要保證自己獲得廉價的勞動。公社受國家勒索的壓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剝削和高利貸者從內部的破壞，那它怎麼能夠抵抗得住呢！

威脅着俄國公社生命的不是歷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論，而是國家的壓迫，以及滲入公社內部的、也是由國家靠犧牲農民培養起來的資本家的剝削。

### 三 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认真弄清您 2 月 16 日来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必須深入钻研細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現在我很荣幸地写給您的这一簡短的說明，就足以消除因我的所謂理論引起的一切誤解。

一、我在分析資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說：“因此，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資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剝夺。这种剝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經歷着同样的运动。”（“資本論”法文版第 315 頁）

可見，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經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 341 頁）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問題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則是要把他們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們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轉变的必然性，提出贊成或反对这种轉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資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做出这样的結論：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絕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們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們进行迅速剝夺的序幕。

##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郑重的論据如下：

如果您仔細考察西方社会的产生过程，那你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給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內免于同样的遭遇。

我所以注意这一論据，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經驗为根据的**。至于譬如說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誰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們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們有好多种社会結構，这些結構的类型、存在時間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烏斯·凱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尙未出現，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經不存在了。在尤利烏斯·凱撒时代，各集团之間、**各氏族和血統親屬联合之間已經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間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生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繪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們就看不到它了。它在連綿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消灭了；很有可能，它是死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爭辯的事实所证实。零星的这类公社經歷了中世紀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現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至毛勒在研究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成这种“农业公社”。这种耕地是

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的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起来。由于它承襲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紀內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間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新型的公社，也可以說，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談了一些关于日耳曼公社的細节。

現在，我們必須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員的血統亲屬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許有血統亲屬或收养来的亲屬。他們的結構是系譜树的結構。“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沒有血統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屬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較古的公社的經濟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們的房屋虽然已經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換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結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們是处在由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准轉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員之間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員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給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儲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費的需要陸續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統亲屬关系的束縛，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經濟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漸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經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經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經濟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經濟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別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屬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說，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結果呢？絕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則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則，或者是后者

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現在，我們暫且不談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災難，只來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沒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組織形式。土地公有制賦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資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給予它以實現大規模組織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現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資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現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經濟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sup>①</sup>。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做过：他們得到的結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頻繁，災難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詛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絕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創举。这又該怎样呢？这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動蕩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組合，这特別便于他們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并且他們在公社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除沼地积水等集体作业中，已經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完全古代类

---

① 在手稿上刪去了下列字句：“但是，霸占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它对立的。正因为如此，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俄国試图采用与本国整个社会条件如此不合的英国类型的資本主义租佃方法来摆脱它的絕境是徒劳无功的。”——編者注

型的小土地占有制(这是現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隴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經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員並沒有学过地租理論課程,可是他們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們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別和經濟差別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块地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無疑問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時間的浪費。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①

卡·馬克思写于1881年2月底—3月初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1924年俄文版第1卷

---

① 手稿到此中斷。——編者注



卡·馬克思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  
 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記<sup>277</sup>

I<sup>①</sup>

[准备改革的]<sup>②</sup>过程

亚历山大二世在1857年的第一批諭旨中把贖买园地<sup>③</sup>一事說得如此令人愜意。(編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作任何改变)——(斯卡尔金,第117頁下面和第118頁<sup>278</sup>)。就在这位亚历山大統治时期,农民在1848年前后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受了騙(第123頁<sup>279</sup>)。

(1) 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的解放詔书頒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騷动和暴乱;他們认为詔书是虛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鎮压开始了;在“詔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內农奴普遍遭受鞭笞。这一場被捧上了天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現如此奇怪的“序曲”呢?

① 用以标明手稿各个部分的羅馬字是編者加的。——編者注

② 方括号里的字是編者加的。——編者注

③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为了使以下各点条理清楚，除用拉丁字母以外，还用数字标明。

(a)关于編纂委员会及其“自由”(笔记第102頁<sup>280</sup>)。編纂委员会会议于1859年3月4日召开，3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1859年4月15日(所謂吸收平民参加)(第106頁)。1859年5月6、9、13、20日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暂时义务状态的决议；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凱維奇公爵[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农民的人身解放不应该取决于給农民规定的(强制性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条件<sup>281</sup>。紧接着，5月21日的詔令禁止把他們的反对意見列入记录簿(第107、108頁)。委员会宣称：“稍微离开陛下的意志的傾向都是多么有害”(第108頁上面)。1859年1月5日，禁止省貴族委员会吸收公众[参加会议]等等。

1859年1月21日和3月3日，禁止所有的[委员会]刊登[决议]，等等(第106頁)。

最后，皇帝公开許諾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前，将召集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到彼得堡，以便听取不同的意見和进行修改……他們被召到首都以后，却不許集合在一起討論問題。他們为召开全体会议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結果，只是要求他們在印好了的、有关某些細节問題的表上写出书面回答。其中一些敢于討論細节的人，被个别邀請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他們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一些代表上书沙皇，抗議對他們所采取的态度；他們接到了由警察局轉来的正式訓斥。他們当即决定在下一次省貴族会议上提出抗議。通令禁止他們涉及农民解放問題。尽管如此，某些会议还是恭恭敬敬地向沙皇指出，已經到了也要进行其他改革的时候了。在这以后，某些貴族首領受到訓斥，另一些首領被免职。其中有两人被遣

送<sup>①</sup>到边远的省份,另一些人遭到警察局監視。

其实,一切都是 per ordre de Mufti [按照圣旨] 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从一开始就决定給地主尽可能多一些 (而給农民尽可能少一些), 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廢除农奴制; 他打算把必須贖买的范围仅限于农民的园地 (即农民的庭院、菜园和大麻地), 以及耕地使用权 (在已經实行的地方); 他甚至打算給地主保留独特的領主审判权; 他坚持要农民經過 12 年的暂时农奴依附时期等等。見他于 1857 年 11 月 20 日为答复維尔納、柯夫諾、格罗德諾三省貴族委员会的請願而給侍从武官长、三省总督納集莫夫的圣旨 (第 103 頁<sup>282</sup>)。

尽管他在 1856 年 3 月 (1855 年 1 月 29 日征召后备軍以后) 就对省和县的 [貴族] 首領談过廢除农奴制, 但是他并不准备立即着手进行 (!), ——他繼續动摇不定, 从而使地主<sup>②</sup> 能够大大恶化农民的实际状况。見通令, 第 105 頁; 斯卡尔金, 第 110、114 頁。

1857 年 1 月 3 日, 根据兰斯科伊的建議成立了秘密委员会, 由亚历山大任主席, 当他缺席时則由奥尔洛夫公爵代理。当时决定吸收貴族委员会参加工作等 (第 103 頁)。早在 8 月 14、17、18 日的會議上, 委员会就决定只是緩慢而謹慎地改善农民的状况 (同上)。

1858 年 1 月 8 日, “秘密委员会”改为“总委员会”, 另外, 下設

① 特維尔省的貴族翁科夫斯基被流放到維亞得卡, 耶符罗彼烏斯被流放到皮尔姆。——編者注

②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特別委員會”，以便預先審查省委員會的草案。此外，成立了內務部中央統計委員會地方自治<sup>①</sup>科，以便討論帝國以內的土地關係，以及預先審查省委員會的[草案](第103頁)。

### I(2)

4月21日(1858年)，連同蘭斯科伊的通令分發了皇上所批准的省委員會工作綱要等(第105頁)。

以後在1858年10月18日總委員會通過的各項決議中仍然具有同樣的精神；這些決議成了編纂委員會的出發點(第105頁)。

1859年2月17日[成立了]兩個編纂委員會，由羅斯托夫策夫任主席(第105頁)。

1859年4月27日(除編纂委員會外，又成立了財政委員會)(後者的成員都是財政部和內務部的專家和官員)(第105頁)。編纂委員會[工作]的三個時期(第105頁)。(1860年2月6日羅斯托夫策夫去世。)

## II

### [編纂委員會工作的三個時期]

	共計——
第一時期——1859年3月4日—9月5日	一年零 七個月
第二時期——1859年9月5日—1860年3月12日	
第三時期——1860年3月12日—10月10日	

① 這個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寫的。——編者注

虛伪的原則(皇帝的圣旨等等以及总委员会早已宣布过的)。

(a) 贖买应当是双方自願的(园地<sup>①</sup>除外)。

(1859年4月29日罗斯托夫策夫)(第106頁)。同一內容(1859年5月20日)(同上)。

关于贖买的其他材料(第106頁)。

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建議。(由罗斯托夫策夫在委员会會議上提出。1859年5月27日的會議)(第107頁下面)。

从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記事簿中可以看出, 贖买<sup>①</sup>大概是要在政府协助之下进行(第108頁)。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凱維奇公爵在抗議书等等中非常正确地指出: 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議“使农民等級的彻底解

实际情况。

(a) 只对农民是强制性贖买; 地主可以强迫他們贖买。

(見同上, 第108頁下面和第109頁, 戈洛瓦乔夫<sup>283</sup>, 第109頁)。

贖买条件——同上。

地主的<sup>①</sup> 債務为4亿銀卢布。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放”取决于贖买<sup>①</sup>，这是“用反常的办法，迫使自由人違反自己的意志而取得土地所有权”（第108頁）。

1859年2月14日——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議。当时預定，贖买期只是37年（后来为49年），而[贖金]恰恰等于“农民的一般代役租”。

(b) 农奴不應該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費用。

(c) 現行代役租不应当提高。

(d) 农民應該得到足以保证他們的生存以及支付贖金和稅款的份地。

贖买手續的財務方面（戈洛瓦乔夫，第109頁）。

交易所經紀人的收入（同上）。[贖买]証券[价值]下跌；地主在自願贖买的情况下要求农民額外支付（斯卡尔金，第110、117頁）（第123頁<sup>284</sup>）。

(b) 农奴應該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費用（斯卡尔金，第113頁），（同上，第115頁）。揚松，第124頁。揚松，第125頁下面<sup>285</sup>。

(c) 現行代役租在提高（固然是由于份地减少）（第116頁）。

(d) 事实上份地（包括最高份地在內）不能保证农民的生存，而农民仍得暫時依附于地主。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1)

(b) 暂时义务农

1859年5月6、9、13日的會議(第107頁)。当时規定暂时义务农的期限为12年(第107頁)。

贖买开始以前,农民的份地保持現有的数量,“同时有必要的縮减和限制”(第107頁)。贖买<sup>①</sup>时則不同(見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議],第108頁,[标题]为“贖买”)。

暂时义务农的支出(斯卡尔金,第111頁;在非黑土地帶)。

中部和南部地帶的农民宁願担負他們早先极其憎恨的徭役(斯卡尔金,第115頁开头)。

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縛九年的[农民],[在这个期限滿了之后]不能放棄这块土地(斯卡尔金,第117、118頁)。

哪里的农民由于当地原因而特別希望贖买园地<sup>①</sup>,那里的地主对此就橫加阻撓,等等。(斯卡尔金,第118頁第2点)。事实上[个别贖买园地]从来沒有实行过(同上)。因此,地主在头一个九年期滿之前急于进行贖买<sup>①</sup>(見斯卡尔金,第119頁)。

1878年——暂时义务农的人数(揚松,第119頁)。

(2)进行贖买<sup>①</sup>的农民。他們要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縛49年(斯卡尔金,第118和第119頁)。离开[公社]的种种无法办到的条件(同上)。

(c)在亚历山大二世統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人头稅等日盆加重的[負担](戈洛瓦乔夫,第109頁)(斯卡尔金,第111和第

---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112 頁)(第 113 頁下面,第 114 頁开头)。

对追索欠繳稅款有功的官員实行的奖励制(同上)(第 109 頁)。

关于一般人头稅(斯卡尔金,第 112 頁)。

和貴族一样,商人在 1861 年以后可以购置的土地納稅极少,(斯卡尔金,第 112 頁)。

保守分子——反对人头稅(斯卡尔金,第 112 頁)。

同时实行身分证制(同上和第 113 頁)。(自 1863 年起向农村公社交納身分证費,同上。)

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对国家的危險性(斯卡尔金,第 112 頁下面)。

无土地者同样要向公社登記(斯卡尔金,第 113 頁)。

(d)割农民的地。森林、草地、牧場和部分农民土地轉让的結果。农民事实上听凭地主<sup>①</sup>任意支配(斯卡尔金,第 114 頁)。地主的和国家的[土地]出租(斯卡尔金,第 110 頁)。商人、国家土地租佃者等购买这些割地(斯卡尔金,第 110 頁,同上,第 114 頁)。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斯卡尔金,第 110 頁)。

从农民那里割来的土地至少占領地的一半。份地减少而支出增多(斯卡尔金,第 114 頁),以及第 114 頁第 2 点(割地并入地主的領地)。

份地不足(因此必須租地和外出做工)。

份地勉强糊口(甚至在黑土地区)(斯卡尔金,第 111 頁)。划給农民的土地貧瘠而耕种不便(斯卡尔金,第 114 頁)。

---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按照法令<sup>①</sup>：土壤越肥沃，份地就越少(斯卡尔金，同上)。

委员会对最高份地的規定(斯卡尔金，第 116 頁)。国家参議院又予以削減(斯卡尔金，同上)。

揚松，第 124 頁。加之迁移有困难(同上)。

最初預定，份地不足时，由政府用协助迁移的办法补救；后来这一点根本没有实行(第 125 頁)。

(a)由于政府使农民所处的条件，——农民遭受富农<sup>①</sup>和商人的掠夺(斯卡尔金，第 110 頁)。

饥荒(第 113、114 頁下面的脚注)。(和农奴制时期相比)(第 114 頁，引自斯卡尔金，第 205 頁)。

(b)份地負担过重。

参看[关于]北部地带的例子(第 113 頁)；俄国中部和南部的負担也非常重(同上)。

駭人听聞的不合理現象：

(1)在給徭役农民(第 116 頁)規定代役租方面(斯卡尔金，第 115 和第 116 頁)。

[規定代役租时]按每人的俄亩数量而定的递减法(斯卡尔金，第 116 頁)(尤其是在黑土地带)。(份地越少，代役租就越重。)

最低[份額]——份地的三分之一(見斯卡尔金，第 116 頁最后几行)。份地較少的地方，[最初]預定补撥土地，但是国家参議院不允許这样做(斯卡尔金，第 116 頁开头)。

贖买时，根据地区<sup>①</sup>規定代役租(斯卡尔金，第 117 頁)。

代役租普遍提高(揚松，第 125 頁)

---

<sup>①</sup>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2)在規定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方面。

暫時義務農的份地較少(最高份地的 $1/2$ 、 $1/4$ ) (斯卡爾金, 第117、118頁)。

在贖買<sup>①</sup>時的最低份地為[最高份地]的三分之一(斯卡爾金, 第118頁)(見第118頁第2點; 僅僅贖買園地<sup>①</sup>的情況實際上從未有過, 第118頁)。

規定份地, 主要原則(揚松, 第124頁)。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揚松在第125頁談到這一點)。這一情況愈益惡化, 最終為法令<sup>①</sup>[所確認](同上)。

遞減法(揚松, 第125頁)。

(3)純粹農業省份的“孤兒份地”<sup>②</sup>(斯卡爾金, 第115頁)。

(a)贖買<sup>①</sup>時過高代役租的資本化; 因此對土地估價過高(斯卡爾金, 第117頁, 斯摩棱斯克省的例子)。在非黑土地帶(117)。在黑土地帶——同上。

(b)銀行和贖買(第126—130頁)(第132頁最後)。

(c)農民的現狀: (揚松)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接受]遷移條件(揚松, 第143頁)——這些條件等於禁止遷移(見第144頁)。

(α)三圃制的黑土地帶(揚松, 第120頁)。

(β)草原地帶(西部)——赫爾松、塔夫利達、叶加特林諾斯拉夫各省(揚松, 第120頁最後和第121頁開頭)。

(γ)西部各省(斯卡爾金, 第119頁; 揚松, 第121頁, 同上, 第126頁)。

① 這個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寫的。——編者注

② 指農民領取的微不足道的份地, 又稱“乞丐份地”。——譯者注

### III

## 地方自治机关

(用于地方民政管理和軍事管理的)必要开支占[地方自治机关經費的]大部分;这些[地方自治]机关暂时还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工具。国家开支逐年增加。連續不断发行公債只是为了支付以前的公債的利息。

在1862—1868年这一短短時間内,一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42%,即平均每年增加2050万卢布(1862年一般年开支是295532000卢布,1868年是41893万卢布)。拿俄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諾夫哥罗德省为例,就可以看出各省和各县必要开支的增加情况;該省1861年必要的开支是8万卢布,而在1868年是412000卢布。

---

### [农民]解放的真正实质

农民同地主之間进行游击战争。

解放一般說来就是高貴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卖他們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

打算解放农民的風声刚一傳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剝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

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經成为过去了。現在农民在經濟上依附于

他們原先的地主。

## 贖 买

由于政府发行的贖买(兌換)債券的价格下降了 20%，很多地主都不实行“强制性”贖买，而要求农民額外支付，以便补偿这笔損失。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据同地主达成的自願協議支付这笔額外的款項，但是一年半以后，就不再向政府支付贖金。这笔額外費用平均每个納稅人为 27 个卢布。

贖买期是 49 年(而不是 41 年)；当时农民已經怀疑，这个諾言是否会兌現，期滿以后，他們是否不再为他們向政府购买的土地交納代役租<sup>①</sup>。

**在向地主償付[贖买貸款]时扣除債款。**

政府立即扣除了地主欠监护院的債款，对地主說来监护院起着銀行的作用，在借債期滿以前不要任何补偿。

例如，1870 年 4 月 1 日，从靠农民支付的 505 652 107 卢布中扣除了 235 032 183 卢布——地主欠国家信用机关的債務。

## 人头稅的提高

自 1864 年以来，人头稅<sup>①</sup>大約增加了 80%；同时，国家地方自治捐<sup>①</sup>也[增加了]。人头稅增加最多的一年是 1867 年。

从“委员会报告书”<sup>286</sup> 中可以看出：

1862 年：俄国稅收(直接稅和間接稅)总額中，即 29 200 万卢布中，有 76% 即 22 300 万卢布是由貧民階級(农民和手工业者)負

---

<sup>①</sup>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又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各类农民的人头稅、国家农民的代役租<sup>①</sup>以及几乎全部由納稅人<sup>①</sup>繳納的国家地方自治捐<sup>①</sup>都提高了。

1863年:每人的人头稅[增加了]25个戈比。到1867年已經[增加了]50个戈比。自1865年以来,按人分攤<sup>①</sup>的国家地方自治捐<sup>①</sup>每人增加了20个戈比,現在每人平均是98个戈比。

从1862年到1867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sup>①</sup>由25 256 000卢布增加到35 648 000卢布(每人增加1个卢布以上)。1863年7月1日,小市民<sup>①</sup>[负担的]人头稅<sup>①</sup>廢除了,但是,这种人头稅从小市民<sup>①</sup>和农民要[分攤]一份的城市、郊区、小市鎮不动产[稅]中,以及从几乎完全由一些納稅<sup>①</sup>階級担負的小商业執照稅<sup>①</sup>和营业票稅中得到了补偿,而且还綽綽有余。

从1862年到1867年,一般国家开支(不包括特殊开支)由295 532 000卢布增加到398 298 000卢布,即差不多增加了35%,而国債則增加了46 116万卢布,即增加了60%;因此,每年[为新增的債務付息还本]必須支付25 315 000多卢布(1867年的全部国債是1 219 443 000卢布,这笔款額每年要支付73 843 000卢布)。

1874年的国債(轉期的和未列入总帳的債務)已[达]147 150多万卢布。

此外,非轉期債務为120 800多万卢布(=483 300万法郎)。

1867年,納稅阶层所负担的直接稅为11 100万卢布,其中单是各种人头稅(人头稅<sup>①</sup>、国家地方自治捐<sup>①</sup>和国家农民的公共<sup>①</sup>稅<sup>①</sup>)就有6 200多万卢布。而且还不包括贖金,省<sup>①</sup>和县<sup>①</sup>的地方自治捐<sup>①</sup>,以及在那些未設有地方自治<sup>①</sup>机关的省份为維持<sup>①</sup>

<sup>①</sup>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調解<sup>①</sup> 农民<sup>①</sup> 事务<sup>①</sup> 机构<sup>①</sup> 而征收的特別稅<sup>①</sup>。

(斯卡尔金<sup>①</sup>。)

根据揚松(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的統計(“試驗<sup>①</sup>”<sup>287</sup> 1877年版),农民交的直接稅为 17 600 万卢布,即:

6 360 万卢布为人头稅、公共<sup>①</sup> 稅和国家地方自治捐<sup>①</sup>,

3 750 万卢布为代役租<sup>①</sup>,

700 多万卢布为省<sup>①</sup> 和县<sup>①</sup> 的捐稅<sup>①</sup>,

300 多万卢布为沒有实行法令<sup>①</sup> 的那些省份的地方稅<sup>①</sup>,

3 900 多万卢布为贖金;这里还不包括实物貢賦。

此外,还应加上几乎全部的消費稅,酒稅和盐稅(18 000 万)以及前地主农民<sup>①</sup> 的代役租<sup>①</sup> ——

2 500 多万。——总共是 37 200 多万,超过国家預算的 56%。

官家拥有: .....	151 684 185 俄亩	
		(= 165 335 763 公頃)
农民拥有: .....	120 628 246 俄亩	
		(= 131 484 744 公頃)
地主拥有: .....	100 000 000 俄亩	
		(= 109 000 000 公頃)
皇室管理处拥有: .....	7 528 212 俄亩	
		或 8 205 859 公頃。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 (1) 国家农民(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 ..... 9 194 891 人——  
77 297 029 俄亩
- (2) 皇族农民 ..... 862 740 人——  
4 336 454 俄亩
- (3) 各种名称的前地主农奴 ..... 35 149 048 俄亩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在37个省(除了西部各省、貝薩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省)靠政府帮助进行贖买的有4 898 073人(占有地主<sup>①</sup>农民<sup>①</sup>的74.6%),17 109 239 俄亩。

在所有非黑土省份,贖买价格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贖买〕是根据地主的要求〔进行的〕。在純黑土省份則根据农民同地主达成的協議。

屬於第(3)类的,部分是代役租,部分是徭役。

(4) 暂时义务农。1878年1月 = 1 882 696 人,拥有份地6 657 919 俄亩。

据御事室(1870年4月1日)統計:实行贖买的前地主<sup>①</sup>农民为5 830 005 人,拥有20 123 940 俄亩土地。

## 国 債

1867年的国債 = 1 219 443 000 卢布。

比1862年增加了46 116 万。

因此,1862年的国債为758 283 000 卢布。

1869年的国債: 190 750 万卢布。

① 这个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編者注

1878 年的國債：347 400 萬盧布。

---

政府從解放農民中所得到的好處：

(1) 欠政府所保障的那些銀行(後來, 這些銀行全部與國家銀行合併)的債務都轉給了政府, 因此, 農民应当向政府交付利息。

(2) 在編纂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斯克列比茨基。羅斯托夫策夫給皇帝的信: “政府<sup>①</sup>將得到很多在省和國家管理機關中身居高位的候補者”。

(3) 直接向農民徵稅(從前是地主<sup>①</sup> 負擔賦稅), 因而有廣泛的可能提高捐稅。

(4) 結束領地貴族的世襲領地權力。

(5) 由此有廣泛的可能征集新兵(以及普遍改革軍隊)。

(6) 與解放農民有關的所謂地方自治<sup>①</sup> 機關: 國家的負擔現在大部分都轉嫁給省和县(國家直接稅沒有降低, 反而提高了)。

---

根據“稅制修訂委員會”正式公布的第二十二卷的資料(1873 年)以及“農業委員會”發表的“藍皮書”, 我們可以看到:

(1) 37 个省(這裡不包括西部各省)的國家農民和皇族農民所支付的, 占所謂農業純收入的 92.75%, 因而, 他們只有農業收入的 7.25% 用於其他一切需要。

(2) 前地主農奴所支付的, 相當於自己的農業收入的 198.25%, 因而, 他們不僅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入, 而且幾乎連他們從事各種工作(農業的及其他的)所得到的工錢都交給政府了。

---

① 這個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寫的。——編者注



1862 年的預算: 29 200 万卢布。

1878 年的預算: 62 690 万卢布。

1852 年的人头稅約为 1 850 万卢布。1855 年的稅收因克里木战争而减少, 不到 1 500 万卢布。1862 年的稅收总额增加到 2 850 万卢布。1867 年由于賦稅激增, 稅收增加到 4 050 万卢布, 現在則超过 9 450 万卢布。

我們从国家产业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 从 1871 年到 1878 年, 尽管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 但是, 平均产量仍然完全一样(同时, 粮食的出口却大规模地增加, 只是在荒年——大約 5 年发生一次——略有降低, 而在 1880 年这一荒年就完全停止出口)。

就在这段时间, 1877—1878 年的粮食出口比 1871—1872 年大約增加了 86%。在西方人們看到, 随着铁路网的发展, 粮食出口大量增长, 却没有察觉, 这种出口的增长因两个荒年的間隔时间縮短而被抵銷了, 現在荒年每 5 年发生一次, 并在 1880 年达到了最高峰。

### 农奴制廢除后的农民状况

揚松指出黑土地帶(是在三圃制的地区, 而不是在草原区)农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农奴制时期更坏, 并从有关繁殖牲畜(也是在黑土地帶)的官方报告中引用了下列資料:

在喀山省, 牲畜数量大大地减少了(指前农奴的牲畜, 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地主牧場上去放牧); 减少的原因是, 缺乏牧

場<sup>①</sup>，为了納稅而卖掉牲畜，收成不好。在辛比爾斯克省〔牲畜數量〕減少了；較富裕的農民出賣他們不十分需要的牲畜；他們預先出賣牲畜，為的是不至于將來被迫出賣牲畜以〔支付〕因公社連環保而擔負的欠款（有的是個人負擔，有的是共同負擔）。另一個原因是，在有份地<sup>①</sup>的情況下實行割地，主要是割去森林牧場。薩馬拉省、薩拉托夫省、平茲省（這些省的馬匹數量也減少了）也是同樣的情況；梁贊省的牲畜數量由于牧場缺乏而減少了 50%。土拉省由于同樣原因，由于稅吏強迫出賣牲畜以及牲畜病死，馬匹和牲畜都減少了。在庫爾斯克省，由于要〔支付〕欠款而不顧一切地出賣牲畜，由于缺乏牧場以及分家等原因，〔畜牧業〕也〔減少了〕（見第 75 頁）。

### 非黑土地帶（北部各省）

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

在諾夫哥羅德省，根據地方自治機關〔對土地收入〕所作的估計，前國家農民在每俄畝土地的收入方面所支付的費用〔為〕100%（即全部收入）；

前皇族農民·····	161%
前地主農奴·····	180%
暫時義務農·····	210%，

而在份地少、捐稅高的情況下，贖買自己的份地的前農奴的費

<sup>①</sup> 這個詞馬克思是用俄文寫的。——編者注

用則为 275%；

暫時义务农的費用为 565% (“稅务委员会报告书”第 22 卷)。

非黑土地带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連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工业的工錢 { 正像給地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一样 }<sup>①</sup> 不够 [ 农民 ] 弥补亏空；他們只得离乡背井，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烏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細亚去找工作。

( 1 俄亩 = 1.092 公頃。

1 普特 = 40 俄斤 = 16.38 公斤。

1 俄石 = 209.901 升或 0.72 夸特)。

## IV

### 俄 国

( I ) 1877 年的国家收入和支出。

收入 = 54 800 万卢布。

其中：11 700 万是向农民征收的直接稅。

主要間接稅 { 189 676 000 卢布間接稅<sup>②</sup> 主要仍然由农民負担。  
1 000 万卢布間接稅<sup>③</sup> 也是 [ 由农民負担 ]。  
5 200 万卢布是关稅。

支出 = 58 500 万卢布 ( 赤字 = 3 700 万卢布 )。

① 本版中将馬克思用的方括号改为大括号。——編者注

② 酒稅收入。——編者注

③ 盐稅收入。——編者注

其中：11 500 万卢布——用于国債的还本付息。

22 000 万卢布——用于陆海軍。

8 600 万卢布——用于財政部。

---

42 100 万卢布——国家的主要开支。

其次是战争引起的特殊开支。

1864 年的預算为 35 460 万卢布；因此，自 1864 年以来，稅收增加了 55%。

(II)列入国家預算的**铁路基金**；目前铁路是私人的財富；国家的铁路变成了私人公司的財產，但是，建筑铁路的資金不是由这些公司提供的。

政府以**股票和債券**的形式控制一部分資本，为推銷这些股票和債券而发行“**俄国铁路轉期債券**”。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款項构成“**铁路基金**”；政府就用这笔錢支付它所控制的**股票和債券**，此外，还預支铁路有价証券。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发行了138 800 万卢布的**铁路股票和債券**，其中政府控制了72 000 万卢布以及**尼古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債券 57 700 万法郎**，即144 433 000 金卢布，除了政府所預支的証券以外，約占全部資本的52%。

政府从**铁路基金**中支付的：

1877年……8 000 万卢布，但是政府在1878年1月1日以前所支付的**总額 = 554 475 000 卢布以及尼古拉铁路債券 57 700 万法郎**。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政府发行了**五次俄国铁路长期公債**，总額为**6 900 万英鎊**，推銷这些公債就提供了**38 500 万金卢布**；发行两

次尼古拉铁路公債，总額为 57 700 万法郎，而且还有 1866 年的国内有奖公債——推銷这两种公債就提供了 10 765 万。

除了这些补助費以外还有**保证金**。1877 年政府所支付的**保证金总額 = 16 617 000 卢布**。国庫支付这笔款額也像支付**铁路債券**的本息一样。1877 年支付铁路債券本息的总額 = 32 780 万卢布。

国家在铁路方面的投資总共是 139 034 000 卢布。

**铁路基金預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6 000 余万卢布。

**国庫預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 3 780 万卢布。

**铁路欠国庫的債務增加了 3 950 万卢布，等等。**

在 1878 年 1 月以前，欠国庫的全部債務达到 46 990 万卢布。农民的債務 = 3 250 万 = 6.9%。

铁路的債務 = 31 550 万 = 67%，即全部国家收入的 57%。

(III) 銀行。除了政府以外，铁路还得到銀行的支持。

1864 年以前只有政府信用机关。

1864 年 [成立了] 第一个私人信用机关；从那时起，[信用机关]就迅速增加了，把大量款項吸收到定期和不定期的計息往来帳上。这些款需要預付出去，于是就出現了股份公司；居于所有这些公司之首的是铁路公司。

到 1876 年底，(公司的) 全部股票和債券的資本 = 204 300 万卢布。

铁路：占 [上述] 款数的 67.91% = 138 800 万卢布。

到 1863 年底，国家銀行及其分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債券为抵押放款 1 860 万卢布。

到 1876 年底，所有銀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債券为抵押共放款 36 000 万卢布，即增加到 2 007% 以上。

从銀行表报中看不出，这些貸款中有多少錢用于铁路方面。但是丹尼尔逊知道，一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证券是屬於政府的，而其余的股票則作为一家私人信用公司貸款的抵押。

但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铁路企业的收入得不到政府的保证，就不能提供任何利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銀行就来帮助收押这些股票的私人銀行，預支款項或者购买股票。

国家銀行从来不缺乏資金，譬如，国庫不管銀行庫存現金的情况如何，就从銀行提取 [現款]，而銀行則扩大它在世界上收入最大的經營。用这种方式发行的信用券被列入第十八号銀行平衡表 (1879年1月1日平衡表 = 46 785 万加上列入第一号平衡表的信用券 = 720 265 000；因此，这些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券总额 = 118 800 万卢布)。

#### (IV) 铁路的收入。

1877年的铁路統計資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在此以前的几年中，总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1865年.....	2 400 万
1877年.....	19 000 万
1878年.....	22 000 万 (概算)，因此：

每一俄里的总收入增加了 17%；

而每一俄里的純收入却减少了。虽然如此，最近几年的純收入每年还有 4 800—5 200 万卢布；这就是說，假如铁路的全部收入都归国庫的話，那末，铁路的赤字就会大大縮减。但是，全部利潤都装入私人腰包，而赤字的全部重担却落在官家头上。

那末，政府花費这么多錢，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其結果是貿易大为发展，在同一时期內創办的信用銀行和土

地銀行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V) 銀行; 貿易的种类(輸出糧食及其他)。

1864 年国家銀行及其分行的全部(計息)存款和活期存款  
[为] 26 200 万卢布,

其中 4 200 万卓有成效地用于貿易, 即:

<p>2 300 万[用于]期票貼現, 1 800 万——以国家有息証券、股票和 債券等为抵押的貸款。</p>
---

1877 年——全部信用机关有 72 380 万; 增加了 175%。

上述总額中: 36 000 万是以股票、債券和国家有息証券为抵押的  
貸款;

48 930 万是期票貼現。增加了 1 900%。

最重要的貿易部門是糧食貿易; 它的发展特別快。

在 1864 年, 运往欧洲的糧食为 925 万俄石——5 470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 16 490 万卢布。

出口糧食的价值 = 全部出口額的 33% 左右。

在 1877 年, 出口的糧食为 3 050 万俄石 = 26 400 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 = 50 800 万卢布。

糧食的价值 = 全部出口額的 51.8%。

[出口] 糧食的价值增加了 382%。

俄石数量增加了 241%。

同时, [出口] 糧食的价值超过了 1864 年全部出口的价值 1 亿  
卢布。

在 1869 年, 铁路運輸了 14 900 万普特糧食 = 全部貨运量

的 33.4%。

在 1877 年……運輸了 54 780 万普特糧食 = 全部貨運量的 41.28%。

除糧食以外的主要出口項目：

1864 年牲畜[出口]为 1 821 000 卢布

亚麻[“ ”]为 15 985 000 “ ”

大麻[“ ”]为 8 993 000 “ ”

增加的百分数

1877 年牲畜[出口]为 15 724 000 卢布…………… 763%

亚麻[“ ”]为 67 690 000 “ ”…………… 323%

大麻[“ ”]为 16 820 000 “ ”…………… 87%

[1864 年]棉花出口为 21 824 000 卢布；[1877 年]棉花出口为 3 550 万卢布 = 62%。

#### (VI) 土地信用机关

在 1864 年，欠旧土地信用机关的債務是 39 550 万卢布，

其中很大一部分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贖买土地。

#### 俄国地主的抵押債務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除外)

(a) 到 1873 年底，欠旧信用机关的抵押債務…… 99 614 000

(b) 到 1873 年底，土地信用公司放款…………… 102 692 000

(c) 土地信用銀行放款 …………… 63 668 000

(d) 相互信用銀行(?)<sup>①</sup> 放款 …………… 7 182 000

273 156 000 卢布

① 市公立銀行。——編者注



与这种情况相比較, 1877 年欠上述各机关的 [債務]:

以 [字母] 分类 (a) .....	73 393 000	可見, 三年內債務 (不包括农民的債務) 增加了 34%。
(b) .....	163 505 000	
(c) .....	118 322 000	
(d) .....	11 250 000	
366 470 000 卢布		

(VII) 現在我們考察一下全部信用机关(和铁路), 看一看它們到 1876 年底究竟得到了哪些款項以及是怎样分类的。

	(1) 固定資本	%	(2) 計息存款 及其他	(3) 土地信用公 司的抵押品	(4) 債券
信用机关 .....	167 778 800	18.8%	723 790 000		
土地信用机关(到 1877 年底)...	27 753 000	5.6%	6 848 000	460 000 000	
铁路 (到 1877 年 底).....	474 185 000	34.3%			
	669 726 000	25%			915 706 000
	卢布				

丹尼尔逊把 2、3、4 項的各种公司的債務加起来 = 2 006 440 000 卢布, 实际上得到的是 2 106 344 000。

各信用机关的債務与資本比較..... = 81.2 %  
 土地信用机关的..... = 94.4 %  
 铁路的..... = 65.97 %

卡·馬克思写于 1881 年底—1882 年  
 第一次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  
 1952 年俄文版第 12 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 弗·恩格斯 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sup>288</sup>

### 凱撒和塔西佗

日耳曼人决不是他們現在所占据的領土上的最初居住者<sup>①</sup>。在他們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遺迹，发现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层中，这些地层的年代直到現在还不能确切断定，大概处在所謂冰河时代的两个冰期之間。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漸温暖，人类开始出現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亞細亞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現的，有已經絕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獅、洞熊）以及現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馴鹿、馬、鬣狗、獅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极低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鋤或石斧、刮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这大致相当于現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現在为止，所发现的骨骼殘骸，还不允許我們对这些人的身体結構作出結論，但就其分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这些事实来看，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續得很久。

<sup>①</sup> 我在这里主要依据博伊德·道金斯“不列顛的原始人”1880年倫敦版(Boyd Dawkins. «Early Man in Britain». London, 1880)<sup>289</sup>。

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結局怎样，我們不知道。在他們出現过的地方，沒有一个地方，包括印度在內，还保存有什么种族可以作为他們在現代人类中的代表。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的洞穴里，大多只是在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些已經死絕的人类的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中間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这些工具屬于一个較晚的时代，它們的制作精巧得多，它們的材料也复杂得多。这些石器，固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設計和制造上比較合理。此外，还发现有石制的、馴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头和枪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劍和縫針、动物牙齿钻孔后串成的項鏈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們有时看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馴鹿、毛象、原牛、海豹、鯨魚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猎图，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原始雕刻。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和多半来自南方的动物一起出現，而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現的，則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現在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极狐、狼獾、白梟。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他們殘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大概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两种人的工具，不仅个别是相似的，而且整批都是完全一致的。从图画上看，也是如此。这两种人的食物，几乎取自完全相同的动物。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我們对已絕灭的种族所能下的判断來說）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种爱斯基摩人（到現在为止，只能证明他們曾生存在比利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在欧洲土地上也絕迹了。就像美洲的紅种人在前一世紀經過殘酷的歼灭战争以后，将爱斯基摩人驅逐到极北那样，那时在欧洲出現的新种族，大概也逐漸赶走

了这种爱斯基摩人，最后并把他們消灭干净，而没有和他們混合起来。

这个新种族至少在西欧是来自南方。他們大概从非洲进入欧洲，当时这两块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西里还是由陆地連接着的。他們比他們的前人在文化发展阶段上要高得多。他們已經知道耕作。他們有家畜(狗、馬、綿羊、山羊、猪、牛)。他們会用手工制作陶器，他們会紡紗和織布。他們的工具誠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經做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这些工具被称为新石器，以別于前一时期的工具)。斧子装上了柄，因而第一次可以用它来砍伐树木。这样，就有可能将树干挖成小舟，就有可能乘小舟到达由于陆地逐渐下沉这时已經和大陆分离了的不列顛群島。

这种人和他們以前的人截然不同，他們很細心地埋葬他們的死者。因此給我們保存了很多的骨骼和头骨，据此足以推断他們的身体結構。长长的头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高平均約 1.46 米，男子 1.65 米)、低額、鷹鼻、突出的眉骨弓、不很高的顴骨和中度发达的下顎骨，都可证明这种人在今天的最后代表是**巴斯克人**。不仅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連法国、英国和至少全部萊茵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大概都屬於伊比利安种族。在雅利安人<sup>290</sup>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伊比利安人相似的身材短小的黑发种族。这个种族跟巴斯克人亲屬关系的远近問題，现在还很难判断。

微耳和考察这种长头骨的巴斯克人，一直深入到德国北部和丹麦<sup>291</sup>。阿尔卑斯山北坡上最古的新石器时代的木桩建筑物，也是屬於巴斯克人的。另一方面，沙弗豪森則宣称，在萊茵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头骨肯定是芬兰人的，尤其是拉普人<sup>292</sup>的，而在古代史上，斯堪的那維亞的日耳曼人及俄羅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

的北方邻人，却只有芬兰人。这两个身材矮小的黑发种族，一个是从地中海对岸迁来的，一个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种人大概是在日耳曼尼亚相遇了。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的，根本还没有弄清楚。

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其次移入的或许是现在业已绝迹了的斯基台人，他们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米底—波斯部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接着来到的是凯尔特人。关于凯尔特人的迁徙，我们只知道这是发生在黑海北面，而且是通过日耳曼尼亚。他们最前面的集团，进入了法兰西，占领了直到加龙河一带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有海，另一面又有伊比利安人的抵抗，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同时在他们后面，从多瑙河两岸又有其他的凯尔特部落逼迫他们。希罗多德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发源地发现了这些凯尔特人。他们一定老早就迁移到这里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和其他文物证明，凯尔特人在占领这一带土地的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相反，在不列颠，他们一开始出现就已有了青铜工具。由此可见，凯尔特人从征服高卢到移入不列颠，一定经过了相当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凯尔特人跟意大利和马赛发生了贸易关系，才知道了青铜，并且输入了青铜。

在这期间，遭受日耳曼人逼迫的后面的凯尔特部落，愈益加紧向前推进；但前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向东南回流，这种情形我们以后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迁徙时期还会看到。各凯尔特部落

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島和希腊，一部分灭亡了，一部分定居于波河谷地和小亚細亚。在那个时期（-400年至-300年）<sup>①</sup>，在直到加龙河一带的高卢地区，在不列顛和爱尔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两岸，直达美因河和理森山甚至更远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这个部落的人。虽然北日耳曼尼亚的山河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南部少而且不可靠，但是絕不能认为，克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南日耳曼尼亚山区比較崎嶇的道路，而沒有同时利用那条橫貫北日耳曼尼亚大平原的比較便利的道路。

克尔特人的迁徙，只赶走了本地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卢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虽然处于被压迫种族的地位，但当时仍占居民中的多数，并把他們的体型遺傳給現在的居民。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他們新定居的地区，对本地的深色头发的居民进行了統治，这可以从这两个种族都用皂把头发染成黃色这个习惯上看起来。淺色头发是統治种族的标志，因此，凡是由于种族混合而失去这个标志的地方，就必须用皂来补救。

在克尔特人以后迁来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迁徙的时期，我們至少大体上可以比較确实地指出来。这大約在 -400 多年以前已經开始，在凱撒时代还没有完全結束。

皮提亚斯在他 -325 年左右的旅行記中，給我們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最初的一些确实材料<sup>293</sup>。他从馬賽前往琥珀海岸，記載了居住在那里的无疑是日耳曼民族的古頓人和条頓人的情况。但是，这个琥珀海岸究竟在哪里呢？通常当然都只能理解为东普魯士海岸，而如果把古頓人称为这个海岸的邻人，这肯定是不錯

---

① 为了簡便起見，我把公元前的年代用数学上的負号(-)来表示。

的。但是皮提亚斯記載的里程,和这个地方不相符合,它对北德意志海岸和基姆布利半島之間的北海海灣倒很适合。那里恰巧住着也被称为邻人的条頓人。那里,在什列斯維希和日德兰的西面,也有一个琥珀海岸。临克宾今天还經營着相当規模的当地采集的琥珀貿易。此外,皮提亚斯在这样早的时期,就能远航到完全不熟悉的海面,似乎不太可能;在他那本非常詳細的旅行記中,不仅完全没有提到从卡特加特海峽到东普魯士这一段危險的航程,而且根本没有記載这件事情,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应该坚决同意列列韦尔首先发表的意見:如果不是由于只可能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古頓人这一名称,那末皮提亚斯所說的琥珀海岸就应该在北海上去找。弥倫霍夫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认为古頓人是从条頓人一詞錯写而来的<sup>294</sup>。

公元前 180 年左右,无疑是日耳曼人的巴斯泰尔人出現于多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們已在馬其頓国王柏修斯和羅馬人打仗的軍隊中当雇佣兵,即最初的雇佣步兵。这是些野蛮的战士:

“人們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利用畜产品。他們只关心一件事情,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

这是普卢塔克<sup>295</sup>提供給我們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最早报道。一世紀后,我們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巴斯泰尔人。50 年以后,基姆布利人和条頓人侵入了凯尔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凯尔特部落的波伊人击退。于是他們便分做許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打败了一批又一批的羅馬軍隊,最后,馬利烏斯制止住了他們几达 20 年之久的迁徙,消灭了他們那无疑已大为削弱的大軍(条頓人是一 102 年在普罗凡斯的埃克斯被消灭的,基姆布利人則在 -101 年被

歼于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

半世紀以后，凱撒又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来，开始是在上萊茵和阿里奧維斯特的軍隊发生了冲突。阿里奧維斯特这支軍隊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馬可曼尼人和苏維汇人。其后不久，又在下萊茵和烏西佩特人及邓克泰人发生了冲突。这两种人是受到苏維汇人的排挤，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萊茵河的。这两支軍隊都敗于羅馬部队的正規作战，而烏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除此以外还敗于羅馬人的背信行为。狄奧·卡西烏斯說到，在奧古斯都統治的初年，巴斯泰尔人曾經侵入色雷斯；馬可·革拉苏在格布尔河(現在的馬里乍河)打敗了他們。这个历史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的一次迁徙，他們在公元初年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被羅馬的指揮官多米齐烏斯·阿赫諾巴尔布斯把他們移住在“馬可曼尼人的一部分土地上”<sup>296</sup>。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萊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已經巩固起来的羅馬統治，长期地限制了他們的迁移。但是有許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理森山那一边，各民族很久还没有找到最后的住处。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大迁徙，在三百年中被羅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三世紀末，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濫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 568 年，倫巴德人占領意大利时方才結束。这所謂結束，只是指日耳曼人所参加的迁徙而言，不是指斯拉夫人，他們在日耳曼人迁徙以后，还在很长时期繼續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帶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車輛用做住所，并用来裝載



妇女、儿童和少量家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白天进行战斗行军，夜晚宿营在用车子做成的堡垒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由于疲劳、饥饿和疾病，人员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孤注一掷。如果行军成功，活着的这部分人就可以在异乡土地上住下来。如果行军失败，移出的部落就会从地面上消失。不是在战斗的屠杀中死去，便是沦为奴隶。被凯撒挡住其迁徙的海尔维第人及其同盟者，出发时共有 368 000 人，其中有战斗力的 92 000 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下 11 万人，这些人凯撒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破例地把他们放归故乡。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是以 18 万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他们几乎全部在战斗中和溃退中死去了。在这个漫长的迁徙期间，整个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不足为奇的。

凯撒在莱茵河畔所发现的情况，同日耳曼人不稳定的生活方式完全相符。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一条精确界线。比利时—高卢族的梅那普人在莱茵河右岸的威塞尔附近拥有村落和耕地；另一方面，莱茵河左岸的麦士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族的巴达维人占据着，而在伏尔姆斯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着日耳曼族的梵乡人、特里包克人和涅麦特人，他们是从阿里奥维斯特时代起住在这里的呢，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呢，那就不能肯定了。比利时人经常跟日耳曼人作战，到处还有有争执的领土。在美因河和厄尔士山脉以南，那时还没有日耳曼人居住。海尔维第人是在不久以前被苏维汇人从美因河、莱茵河、多瑙河及波希米亚森林之间的地带驱逐出来的，正如波伊人从现在还带着他们的名字的波希米亚 (Boihemum) 被驱逐出来一样。但是，苏

維匯人並沒有占領这块土地，他們把这块土地改变成长达 600 羅馬里(150 德里)<sup>①</sup>的林野，作为他們南面的屏障。凱撒还知道，再往东去，在多瑙河北面住着凯尔特人(沃尔克—特克托扎格人)，即塔西佗后来称为日耳曼族的魁代人。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馬罗博杜斯才率領他的苏維匯族的馬可曼尼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同时，羅馬人却把萊茵河和多瑙河之間这一块地区用堡垒封鎖起来，让高卢人移住。边境墙的那一面，以后大概被赫蒙杜利人占領了。从这里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即日耳曼人是經過喀尔巴阡山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日耳曼尼亚的，直到他們占領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凯尔特人赶过了多瑙河。

根据凱撒的描写，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他們还根本沒有在他們的領土上定居下来。他們的生活主要依靠牧畜，依靠干酪、牛奶和肉，較少依靠粮食。男子主要的职业是打猎和軍事訓練。他們也搞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凱撒报道說，他們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土地<sup>297</sup>。这大概是火耕法，直到現在，在斯堪的那維亚和芬兰北部，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除森林以外，只有沼澤地和泥炭地，这些土地当时还不适于耕作)燒掉，把树根馬馬虎虎地拔一拔，再把这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燒一遍。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地上播种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應該从字面上去理解凱撒关于每年更換耕地的那种說法；通常总在收获两三次以后，才換种新土地。非日耳曼人所有的那种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

---

① 一羅馬里約等于 1.5 公里；一德里(地理里)等于 7.420 公里。——編者注

办法,尤其是强加在日耳曼人身上的这种迅速更換土地的情节,所有这些地方,都反映了羅馬人的想像。对于羅馬人來說,这种土地更換的办法是不能理解的。对于已經定居下来的萊茵河畔的日耳曼人來說,这种土地更換的办法已經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逐漸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但是,对于內地的日耳曼人來說,对于剛剛到达萊茵河畔的苏維汇人來說(这种土地更換的办法主要也适用于他們),这种土地更換的办法仍然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整个民族以当前遇到的抵抗所許可的方向和速度,慢慢向前推进。他們的社会制度也和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苏維汇人分为一百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一千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子都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們再去替換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領了新土地以后,人民大众才带着妻子儿女随同軍隊前去。这比起基姆布利人时代的行軍生活来,已經向定居生活前进了一步。

凱撒不止一次地提到日耳曼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同敌人的交界处,即在同任何異族的交界处,用廣闊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紀后期。为保护北阿尔宾吉亚的薩克森人而防御丹麦人的,有埃德尔河和什萊灣之間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語叫 Jarnw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灣到易北河一帶的薩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語«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凱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問。他們决不是像現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須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們离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也很远。60年以后,

斯特拉本就这样談到过他們：

“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們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移，因为他們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們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們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們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們还有一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們也用車来搬运自己的財物，赶着家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sup>298</sup>

比較語言学证明，他們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識。凱撒指出，他們沒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識。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來說，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

由此可見，日耳曼人向多瑙河、萊茵河和北海之間的新家乡的迁徙，在凱撒时代还没有結束，或者是剛剛結束。在皮提亚斯时代，条頓人，也許还有基姆布利人，可能已經达到了日德兰半島，而日耳曼人的先头部队也許已經达到萊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們到达的任何报道，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和前面的說法一点也不矛盾。只能和經常的迁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和南方的多次进军，最后，凱撒看見他所熟悉的最大一个集团（苏維汇人）当时还处于經常移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只能使我們得出一个結論：我們在这里所看到的，显然只是关于日耳曼人向他們欧洲主要居住地实行大規模迁徙的最后阶段的一些殘缺不全的报道。羅馬人在萊茵河畔和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阻止了这种迁徙，把日耳曼人限制在他們現在占据着的領土上，并且强迫他們定居下来。

此外，根据凱撒的观察，我們的祖先是真正的野蛮人。他們允許商人入境，只不过为了向某个商人出卖战利品，他們自己从商人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們需要什么外国东西呢？他們甚至

喜欢他們那种矮小的駑馬，而不願要漂亮的高卢駿馬。苏維汇人根本不允許把酒运入境內，因为它会使人身体衰弱。在这方面，他們的近亲巴斯泰尔人恐怕要文明一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斯的时候<sup>①</sup>，曾向革拉苏派遣过使节，革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問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陣地和意图的重要情报，以后便使巴斯泰尔人中了埋伏，消灭了他們。还在伊迪西阿維佐谷地会战（公元16年）以前，盖尔馬尼庫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日耳曼人，說他們不戴甲冑，只拿着柳条編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只有他們的先头部队才有真枪，后面的部队只拿着烤硬的尖棍。由此可見，威悉河畔的居民当时未必就知道金屬的加工，而且羅馬人当然也不让商人把武器偷运到日耳曼尼亚去。

凱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給我們一本关于日耳曼人的名著<sup>299</sup>。在这本书里，有許多事情看来已經完全不同了。直到易北河，甚至易北河以东，迁移不定的部落都已安定下来，有了固定的住处。城市当然还完全談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这种村落有的由一些独家院子組成，有的由一些毗連的院子組成；就是在后一場合，每一所房子也是单独建立的，周圍都有一片空地。房屋都是簡陋地用沒有加过工的原木（*materia informi* 在这里应指同 *caementa* 和 *tegulae* 相反的原木）盖起来的，还没有使用粗石和瓦。在斯堪的那維亚北部，現在还有这样的木房，但它們已經不是斯特拉本所說的一天之內就可以建造起来的那种木房了。关于耕作制度，下面再談。日耳曼人已經有了地下倉庫（一种地下室），冬天他們躲在里面御寒，根据普林尼的記載，妇女在里面

① 見本卷第484頁。——譯者注

紡織。耕作当然已經有了比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財富。家畜虽多,但品种不好,馬长得很难看,沒有善跑的駿馬,牛羊都很小,牛沒有角。食品有肉、乳、野苹果,沒有面包。不再經常打猎,猎物从凱撒时代起业已大大减少。衣服也非常原始,大多数人以粗布遮体,也有赤裸着身子的(和卡弗尔—祖魯人差不多),但是最富有的人已經有了合身的服装;也使用毛皮;妇女的衣服和男子一样,但是她們也往往穿着沒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小孩子都光着身体跑来跑去。不知道讀書写字,但是有一处說到,僧侶已經使用借用拉丁字母創制的魯恩文字,把它們刻在木板上。內地的日耳曼人并不重視金銀,羅馬人贈送給国王和外交使节的銀器,像陶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小規模的商业周轉是一种簡單交換。

男人还完全保持着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习俗,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沒有丈夫气的事情,交給妇女、老人和儿童去做。但是,他們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惯:酗酒和賭博,而且是用天真的野蛮人那种毫无节制的方式聚賭,甚至会賭到把本人也輸掉。內地日耳曼人的飲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如果当时已經发明了燒酒,那末世界史恐怕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

在和羅馬領土接界的地区里,可以看出更大的进步:这里喝輸入的葡萄酒,对金錢也比較习惯,他們当然更願意要那些便于进行小規模交換的銀子,同时按照野蛮人的习惯,他們当然也更願意要那些币面上鑄有他們早就熟悉的花紋的硬币。我們下面就会看到,他們这种用心是非常有根据的。同日耳曼人的貿易,只在萊茵河岸进行。只有住在边境墙以外的赫蒙杜利人,才为了进行貿易,早在高卢和勒威亚等地进出。

这样看来,从凱撒到塔西佗这段時間,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

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于古人的报道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有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住得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sup>300</sup>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部落，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维斯拉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维斯拉河对岸弗里希-加弗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贫乏的语言遗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基本部落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只有瓦伦人或瓦林人，根据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属于绍林吉亚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

奇人也應該算入这个部落以內。

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們是后来的法兰克人，他們住在萊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河、济克河、魯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則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們叫做赫米諾南人，就是后来的高地日耳曼人，他們包括赫蒙杜利人(紹林吉亚人)、苏維汇人(土瓦本人和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凱魯斯奇也算在这个部落里面，毫無疑問是一个錯誤。这是普林尼全部記載中唯一的一个明显錯誤。

第五个部落(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經灭絕了。雅科布·格林把他們算做哥特人，这无疑是正确的。

最后，第六个部落是希列維昂人，这包括丹麦島和大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分类非常确切地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現的日耳曼方言的分类。我們不知道有哪些不屬於哥特語、弗里西安—低地薩克森語、法兰克語、高地德意志語或斯堪的那維亞語的方言，我們現在仍然可以把普林尼的分类看做是标准的分类。凡是和普林尼的分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各日耳曼部落的注釋中加以考察<sup>①</sup>。

因此，关于日耳曼人向他們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們大致可以这样推断：最早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間的北日耳曼尼亚平原向前移动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們后面但更靠近

<sup>①</sup> 見本卷第 523—538 頁。——譯者注



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們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維昂人，但他們轉向島嶼方面移动。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說的温底尔人），他們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曾經参加过希列維昂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奥南人，他們（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凱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占領了他們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們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sup>①</sup>

## 和羅馬的最初战斗

自凱撒时代以来，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对峙在萊茵河上，从奥古斯都征服了勒威亚、諾里克和班諾尼亚以后，双方又对峙在多瑙河两岸。这时，羅馬在高卢的統治已經巩固；阿格利巴在全国修筑了軍用道路网。要塞建筑了；在羅馬的压迫下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道，通过了大小圣伯納德山口，将高卢和意大利直接联系起来，于是高卢就成了从萊茵河进攻日耳曼尼亚的基地。这项任务和配备在萊茵河的八个軍团，奥古斯都都交给了他妻子前夫的儿子（也許是亲生子？）德魯苏斯。

边境居民之間的不斷摩擦、日耳曼人的侵入高卢、心怀不滿的比利时人和西干布尔人謠傳的或实有的陰謀（按照这个陰謀，西干布尔人要渡过萊茵河去进行全面暴动），都能成为战争的借口。德魯苏斯在比利时首領們的协助下（-12年），在萊茵河三角洲上游

---

① 手稿这里有一个鉛笔字的注：“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軍事制度。”——編者注

紧靠巴达維亞島的地方渡过萊茵河，蹂躪了烏西佩特人的地区和西干布尔人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又乘船向萊茵河下游航行，强迫弗里西安人向他供应步兵后援部队，并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开到埃姆斯河的入海口去征服乔克人。在这里，他的不熟习潮汛的羅馬水手，在退潮时使他的舰队擱淺了。由于比較通曉此事的弗里西安同盟軍的援助，德魯苏斯才能解纜而归。

这第一次的进軍，不过是一种大規模的偵察。第二年（-11年）他开始了真正的侵略。他在利珀河口下面重新渡过萊茵河，征服了住在这里的烏西佩特人，在利珀河上架起了桥梁，侵入西干布尔人的地区。西干布尔人这时正在和卡滕人打仗，因为卡滕人不願加入西干布尔人领导的反对羅馬人的同盟。以后，德魯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佐河的合流处，建筑了一个巩固的兵营（阿利佐），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又渡过萊茵河归去。在这次归途上，他的部队在一个狭谷中受到日耳曼人的襲击，費了很大的勁才幸免于全軍复沒。这一年，“在卡滕人的土地上，快到萊茵河边的地方”<sup>301</sup>，德魯苏斯又建筑了另一个巩固的兵营。

德魯苏斯的第二次进軍，已經是按照一个完整的侵略計劃进行的，从此以后，他就在彻底地遵循这个計劃。他要首先征服的地区，已經相当精确地划了一个范围，这包括易斯卡伏南人的内部地区，直到同凱魯斯奇人及卡滕人的交界处，还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直到埃姆斯河也許直到威悉河的沿海地带。征服沿海地带的基本工作，是由舰队担任的。在南方，阿格利巴創建的、德魯苏斯扩建的美因茲成了作战基地，在它的邻近，我們應該可以找到那建筑“在卡滕人土地上”的要塞（这个要塞，最近人們认为就是霍姆堡附近的扎耳堡）。从这里起，美因河下游流进了韦特劳和兰河上游

之間的開闊地帶，占領這個地帶，就能把易斯卡伏南人和卡滕人分開。在進攻陣地的中心，利珀河所橫貫的平原，尤其是利珀河和魯爾河之間的平坦高原，是羅馬主力軍的最適當的作戰綫，占領了這個地方，他們就能把要征服的地區分成兩個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時也就把布魯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分离開來。從這個陣地出發，他們就可以在左翼和艦隊採取共同行動，在右翼用從韋特勞開來的軍隊孤立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在正面可以阻擋凱魯斯奇人。阿利佐堡壘是這個作戰綫上極鞏固的據點。它的位置，離利珀河發源地不遠，不是在阿耳梅河流入利珀河處帕德波恩附近的埃耳森，就是在最近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羅馬要塞的利普施塔特的近旁。

第二年（—10年），卡滕人看到了共同的危險，終於和西干布尔人聯合了起來。但是德魯蘇斯進攻他們，至少把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征服了。可是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到冬季以後，因為第二年（—9年）春天，德魯蘇斯再度進攻他們，並且一直推進到蘇維匯人的地區（顯然也到了紹林吉亞人的地區，根據弗洛爾和奧羅修斯的說法，還推進到當時尚住在厄爾士山脈以北的馬可曼尼人的地區），然後攻擊凱魯斯奇人，渡過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後才退兵。他蹂躪了所有經過的地方，可是到處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歸途中，他還沒有達到萊茵河就死了，那時他30歲。

我們在上面已經引用過狄奧·卡西烏斯的記載，這裡再引斯維托尼烏斯的說法作為補充。他說，德魯蘇斯在萊茵河和艾塞耳河之間開了一條運河，利用這條運河，他帶着自己的艦隊，通過弗里西安人的土地和弗累沃（即符利斯特隆，現在是從符利蘭島和特斯黑林島之間的須德海而來的一條航路）而到達北海。根據弗洛

尔的記載，德魯苏斯沿着萊茵河建筑了五十多个堡垒，在波恩架了一道桥，并且加强了麦士河陣綫，这样，不論在高卢人暴动时或日耳曼人侵犯时，都能确保萊茵軍团的陣地。至于弗洛尔胡吹什么威悉河和易北河畔有堡垒和要塞，那純粹是信口雌黃。德魯苏斯在行軍时可能在那里挖过一些工事，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統帅，要他在那些地方駐一个守备兵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毫無疑問，在利珀河沿岸的陣綫上，他建筑了巩固的兵站。他也在陶努斯山脉的通道上建筑了工事。

德魯苏斯在萊茵河方面的后继者提比利烏斯，在下一年（-8年）渡过了萊茵河。日耳曼人都派了和談代表，只有西干布尔人沒有派遣。当时在高卢的奥古斯都表示，只要西干布尔人不派代表，他就拒絕进行任何談判。最后，当西干布尔人也派来了代表，派来了像狄奥所說的“許多可尊敬的人物”的时候，奥古斯都却下令逮捕他們，并把他們监禁在帝国内地各城市中；“他們都由于忧憤而自杀了。”<sup>302</sup> 第二年（-7年），提比利烏斯又率領軍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在这里，除去若干次不重要的騷动以外，已經沒有什么可以鎮压的了。关于这个时期韦萊是这样說的：

“提比利烏斯已經完完全全征服了这个国度（日耳曼尼亚），它同有納稅义务的行省几乎已沒有什么差別。”<sup>303</sup>

这种成功的取得，不仅应当归功于羅馬人的武器和提比利烏斯声誉卓著的外交“机智”，也許还应当特別归功于把日耳曼人移居到羅馬地区萊茵河岸的做法。阿格利巴业已根据永远效忠于羅馬人的烏比人的願望，把他們迁到了科倫附近的萊茵河左岸。提比利烏斯强迫4万西干布尔人迁徙，从而长期摧毀了这一强大部落的抵抗力。

提比利烏斯此后在很長時間內不問一切國事，我們也不知道，在這許多年間日耳曼尼亞發生了什麼事情。在狄奧的片斷記載中，談到了多米齊烏斯·阿赫諾巴爾布斯從多瑙河出發向易北河對岸的進軍。但是此后不久，大約在公元元年，日耳曼人舉行了起義。根據韋萊的說法，羅馬的最高統帥馬可·維尼齊烏斯總的說來成功地進行了這次戰役，甚至為此還獲得了獎賞。雖然如此，提比利烏斯不得不在公元4年，即在他被奧古斯都收為養子后不久，再次渡過萊茵河去重建那搖搖欲墜的羅馬統治。他征服了住在萊茵河近處的堪尼內伐特人和哈圖阿里人，以后又征服了布魯克泰人，並且“爭取到了”凱魯斯奇人。韋萊參加了這一次和下一次的出征，但他沒有對此作更詳細的敘述。暖和的冬天，使羅馬軍團能夠繼續活動到12月；以后，他們就在日耳曼尼亞，大概在利珀河發源處建立了冬季兵營。

次年（公元5年）的進軍，是想征服西部日耳曼尼亞。當提比利烏斯從阿利佐向前推進並在易北河下游打垮了倫巴德人時，艦隊則沿海岸前進，並“爭取到了”喬克人。在易北河下游，陸軍和逆河而上的艦隊會了師。由於這一次出征的得手，按照韋萊的說法，羅馬人在北方的事業似乎已經大功告成了。第二年，提比利烏斯向多瑙河推進，這裡，不久以前在馬羅博杜斯領導下遷移到波希米亞來的馬可曼尼人威脅着國境。馬羅博杜斯在羅馬受過教育，通曉羅馬的戰術，他依照羅馬的榜樣，組織了一支包括7萬步兵和4000騎兵的軍隊。提比利烏斯在多瑙河從正面攻擊這支軍隊，而森提烏斯·薩土爾尼努斯則率領軍團從萊茵河出發，穿過卡滕人的土地去進攻敵人的背面和翼側。這時，在提比利烏斯自己的背后，班諾尼人舉行了起義。軍隊必須撤回，必須重新奪回自己的作

战基地。战争延續了三年。班諾尼人被打敗以后，北日耳曼尼亚的局势已經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能作侵占馬可曼尼人土地的打算了。

德魯苏斯的征服計劃，完全保存了下来。不过要順利执行这个計劃，就必须使陆海部队进軍到易北河边。在对馬罗博杜斯的作战計劃中，閃耀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把国界推进到小喀尔巴阡山、理森山和易北河一直到該河的入海处。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遙远的未来的事，短期內根本不可能实现。沿韦特劳上去，当时羅馬筑垒要点究竟伸展得多远，我們不知道。看来，这条作战綫当时沒有像利珀河沿岸那条更重要的作战綫那样受到重視。但是在这里，羅馬人显然已經在相当大的土地上安居下来。萊茵河右岸自波恩以下的平原，是屬於他們的。魯尔河以北至埃姆斯河对岸直到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交界处的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仍然处在軍队的占領之下。在背后有巴达維人和弗里西安人，当时他們还是忠实的友人；更往西去，是乔克人、凱魯斯奇人和卡滕人，他們在屢次敗北以后，在遭到倫巴德人也遭到的打击以后，可說是相当馴服的。無論如何，在这三个部落里面，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派別，他們认为只有和羅馬結成同盟才能得救。在南方，西干布尔人的武力剛剛被摧毀；他們在利珀河与魯尔河之間和萊茵河平原上的一部分領土已被占領，其余的領土則被羅馬人建立在萊茵河、魯尔河和韦特劳的陣地三面包圍着，而且羅馬队伍大概相当經常地在这里开过。最近查明存在着通往利珀河发源地的羅馬大道，它們經過高聳的山岭，从諾依維特通到济克河，从多伊茨和諾伊斯通到烏培河，至少到达貝尔格和馬尔克的边界。再往前去，是赫蒙杜利人，他們在多米齐烏斯·阿赫諾巴尔布斯的同意下，占領了馬可曼尼人放棄的一部分土地，并和羅馬人保持着和平关系。最后，各

日耳曼部落之間众所周知的紛爭，使人們有理由期待，只要羅馬人再进行几次这样的战斗，就可以按他們的願望把同盟者逐漸变成臣民。

羅馬陣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格山脉一带的土地。羅馬軍团在營壘的长期駐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羅馬人的統治和羅馬人的习俗，用狄奧的話來說，这就使野蛮人“好像轉变过来了”<sup>304</sup>。在这里，圍繞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家談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們的和平的貿易关系，首先加强了外国的統治。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結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烏斯·瓦魯斯被任命为駐日耳曼尼亚軍队总司令。这是一个开始进入衰退的时代的人，萎靡不振，疏忽大意，总想靠他前輩人的月桂冠寻找安逸，尤其渴望利用这些月桂冠来达到自私的目的。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錢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錢人，国家貧穷了。”（韦萊語）<sup>305</sup>

一般說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魯斯还是不肯放手，而且采用了羅馬总督和副总督們久已实践过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日耳曼尼亚被占領的地方变成羅馬的行省，以羅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軍人統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泉。因此，瓦魯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压力把日耳曼人改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們发布命令，像对臣民一样对他們索取金錢”（狄奧語）<sup>306</sup>。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久經考驗的压迫和

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羅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羅馬法强加到日耳曼人身上。

可惜，瓦魯斯和他这个文明傳播者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因为大約經過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羅馬法”的地步。事实上，羅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經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簡直是荒謬的，因为在他們中間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們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傳的風习，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內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羅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辯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們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絕审判的花招，而圍繞着总督的一群辯護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盜——实际上他們也正是一帮强盜。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須放棄他們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話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們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說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侶才在极少的情況下有权毆打他們，他們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場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罰金(Wergeld)来贖罪，他們还慣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現在却要屈服于羅馬扈从的木棍和斧鉞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庫征收賦稅，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賄大开方便之門罢了。

但是瓦魯斯打錯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亞人。他用强加在他們身上的羅馬文明，只使他們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羅馬結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



在威胁着他們，从而促使他們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

瓦魯斯带着他的三个軍团驻扎在日耳曼尼亚，阿斯普雷涅斯带着另外两个軍团驻扎在下萊茵，离核心陣地阿利佐只有五六天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經過长期而周密的准备而突然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謀叛的方法事先就决定了。負責組織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紐斯。

阿尔米紐斯出身于凱魯斯奇人的部落貴族，是似乎在該部落中当卫兵头目的塞吉美尔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羅馬軍队里服务，通曉羅馬人的語言和風俗，在羅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見的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誠似乎不能有絲毫的怀疑。直至襲击的前夕，瓦魯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萊說他

“是一位出自名門，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臉上和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日耳曼人的战役里）他是我們經常的战友；他除享有羅馬公民权外，并已取得羅馬騎士的称号”。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紐斯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一位卓越的統帥。他一經决定要摧毀萊茵河右岸的羅馬人的統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羅馬势力所控制的凱魯斯奇人的軍事貴族，至少要大部分爭取过来；卡滕人、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羅馬羈絆之下的布魯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也要拉来謀反。尽管瓦魯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都还需要時間；在这段時間內，需要使瓦魯斯失去警惕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利用了瓦魯斯对訴訟程序的癖好，并以此狠狠地愚弄了他。

韦萊說道：“日耳曼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謊的，誰要沒有亲身經驗过，对这簡直不能相信。他們在瓦魯斯面前

玩弄一連串捏造的爭訟把戲，時而毫無根據地互相控告，時而对瓦魯斯表示謝意，說他以羅馬人的公道裁決了一切，說他們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聞的紀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經开始減輕，說他們以前慣于用武力解决的糾紛，現在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們把瓦魯斯弄到全然不知警惕的地步，他竟然以为他是在集会場中审理案件的一位城市大法官，而不是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率領軍隊的一位司令官。”<sup>307</sup>

公元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日耳曼人把瓦魯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軍隊，分散他的兵力；由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并不困难的。

狄奧說道：“瓦魯斯并不把它的軍隊，像在敌国所應該做的那样适当地集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兵士一队一队地供給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時而請求派兵防守某一据点，時而請求派兵兜剿盜匪，時而請求派兵护送粮食，运送車队。”<sup>308</sup>

这时，主要謀反人阿尔米紐斯和塞吉美尔却經常在瓦魯斯左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飯。根据狄奧的說法，瓦魯斯当时已經受到警告，可是他的信任是沒有止境的。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魯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誘到凱魯斯奇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魯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军命令时，凱魯斯奇人的另一个首領，大概和阿尔米紐斯家族有世仇的塞格斯特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魯斯还不肯相信他。于是，塞格斯特又向瓦魯斯建議，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紐斯及其他凱魯斯奇人的首領都禁閉起来，然后再出发，說事情的結局会证明誰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瓦魯斯出发以后，謀叛者以集合同盟軍然后同他会师为借口而留在后方的时候，瓦魯斯的信任仍然沒有动搖。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不像瓦魯斯所期待的那样。凱魯斯

奇人的軍隊真的集合了起来。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潰他們自己以前請求派遣来的駐扎在他們那里的羅馬軍隊，然后从側面襲击行軍途中的瓦魯斯。瓦魯斯沿着崎嶇的森林道路前进，因为在这凱魯斯奇人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筑完好的羅馬軍用大道。遭到突然襲击的瓦魯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鼓起了勇气，并且从这时起表现出自己真是個羅馬軍隊的統帥，不过已經太晚了。他命令他的軍隊排成纵队，整頓由妇女、儿童、車輛、馱兽等等組成的龐大的輜重队，并且在这狹窄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所允許的範圍內尽可能保护他們，然后繼續向自己的作战基地前进，这个作战基地我們應該认为就是阿利佐。傾盆大雨使遍地泥濘，阻碍了行軍，常常使过于龐大的輜重队陷于混乱。受到了严重的損失以后，瓦魯斯来到了一个滿布密林的山岭，上面还有一块可以勉强扎营的空地；在这里，还相当有秩序地而且按照条令規定扎了兵营，筑了工事。盖尔馬尼庫斯的軍隊六年以后来到此地时，还清楚地看到这里“三个軍团的工事”<sup>309</sup>。瓦魯斯針對这种情况，下了决心，命令把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車輛和行李都在这里燒掉。第二天，他通过了一片開闊的平原，但又受到非常重大的損失，軍隊陷于更大的混乱，晚上，再也无法有秩序地建立兵营了。盖尔馬尼庫斯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堵半倒的墙和一道淺淺的壕沟。第三天，又走过了林木繁茂的山岭，瓦魯斯和大多数軍事长官在这里丧失了勇气。瓦魯斯自杀了，軍团几乎全部复沒。只有騎兵队，在瓦拉·努蒙尼烏斯的指揮下幸免于难；还有个别的逃亡步兵，像是逃到了阿利佐而保全了性命。阿利佐至少还守住了若干时候，因为日耳曼人还不会进行正規圍攻。稍后，全部或一部分守备部队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惊惶失措的阿斯普雷涅斯，大概只作了一

段短程的行軍去迎接守备部队。布魯克泰人、西干布尔人和一切較小的部落全都起义了，羅馬的統治又被赶到了萊茵河彼岸。

关于这次行軍所經過的地区，有許多爭論。可能性最大的是：交战之前，瓦魯斯在处于豪斯貝尔格与哈默倫之間某处的林特恩盆地；在假装的暴动和第一次襲击发生以后，就向德特莫耳特附近的德倫狹谷退却，这个狹谷形成一条經過奥斯宁格山脉的平坦而寬闊的通道。这是一般的傳統說法，和史料以及由当时战争局势所引起的軍事要求都是符合的。瓦魯斯达到德倫狹谷与否，还不能断定；但騎兵队（也許还有步兵先头部队）的突圍，似乎肯定了这一点。

三个軍团的消灭和整个日耳曼尼亚西部暴动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靂，惊动了羅馬。眼看着阿尔米紐斯就要渡过萊茵河并把高卢煽动起来，另一方面，馬罗博杜斯又要渡过多瑙河，并带动勉强被压服的班諾尼人加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軍。意大利的力量已經枯竭到这种地步，几乎再也不能派出任何軍隊。狄奧說道：在羅馬市民中适于服軍役的年輕人已經很少了，年岁較大的人又逃避当兵，因而奥古斯都就用沒收财产的手段懲罰他們，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最后，皇帝拿已釋放的奴隶及退伍軍人勉强拼凑成一些队伍来保卫羅馬，解除了他的日耳曼人禁卫軍的武装，并把所有的日耳曼人从城中驅逐出去。

但是阿尔米紐斯沒有渡过萊茵河，馬罗博杜斯也沒有想要进攻，因此羅馬可以毫无阻碍地对“背信棄义的日耳曼人”发泄它的憤怒。我們已經看到，韦萊說日耳曼人“十分狡猾，他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謊的”。斯特拉本也这样說。他不知道有什么“日耳曼人的誠实”和“罗曼人的奸險”。恰恰相反。他說克尔特人是“單純

而不做假的”，单纯到“他们在众人眼前毫不防备地急于参加战斗，因而使他们的敌人容易取得胜利”<sup>310</sup>，谈到日耳曼人时他却说：

“不相信他们总是有好处的，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使你大倒其霉，凯鲁斯奇人就是例证，他们破坏了条约，并以伏兵歼灭了三个军团及其统帅瓦鲁斯。”<sup>311</sup>

至于奥维狄乌斯那种愤怒而渴望复仇的诗句，就更不必说了。这简直像是读到了沙文主义最盛行时代的法兰西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对于约克的背信和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附近的叛卖行为<sup>312</sup>，倾吐了他们的怒气。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诚实和遵守条约的忠诚，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凯撒在休战和谈判期间，袭击了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奥古斯都逮捕了西干布尔人的使节，但在他们未来以前，却又拒绝同各日耳曼部落进行任何谈判。一切征服民族都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敌人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说那是背信弃义和叛卖行为。可是，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当然，在德特莫耳特给阿尔米纽斯建立的荒诞的纪念碑，不过是一种幼稚行为，它只有一点好处，诱使路易-拿破仑在阿利塞[—圣雷纳]附近的山上，给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也建立了一个同样可笑和荒诞的巨大纪念碑。然而，有一点还是正确的，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日耳曼人本身是否有很大的好处，能够作许多翻来复去的无益争论，但可以肯定，

沒有这种独立,全部历史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日耳曼人自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几乎純粹是一长串的民族不幸事件(这大部要由他們自己負責),因而最可靠的成績也几乎每次都变成了人民的灾难,但是还應該說,日耳曼人在当时,在他們历史的初期,的确有过好运气。

凱撒用来征服高卢的,是垂死的共和国最后一些有生力量。軍团从馬利烏斯时代起就由招募来的雇佣兵所組成,但毕竟还是完全由古意大利人組成的;这种軍团从凱撒以后确实在消亡下去,正像当时古意大利人自己在那急剧扩大的大地产及其奴隶經營的压迫之下正在消亡下去一样。当时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把15万人,即25个步兵軍团的完整队伍保持住。20年的服役期限并未遵守,服役期滿的老兵被迫无限期地繼續从軍。这是奥古斯都死后萊茵軍团发生兵变的主要原因。塔西佗很清楚地描写了这次兵变,它在反抗与紀律的奇妙結合方面,使人鮮明地想起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兵士在尼德兰的兵变。在这两次兵变中,受君主背約欺騙的軍队表现了坚强的团結。我們看到,在瓦魯斯会战之后,奥古斯都企图恢复那早已廢棄不用的旧的征兵法是怎样沒有結果,他怎样不得不去找那些服役滿期的士兵,甚至去找那些被釋放的奴隶,而这些被釋放的奴隶是他在班諾尼人起义时曾經一度招募过的。以意大利自由农民的子孙来补充軍队,随着意大利自由农民本身的消灭而停止了。每一批新加入軍团的补充兵員的来到,都降低了軍队的素质。不过还必须尽量爱惜这些軍团,爱惜这个勉强維持下去的全部軍事力量的核心,因而輔助部队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他們打仗,在打仗时軍团只用作后备队,因此,在克罗狄烏斯时代,巴达維人已經能够說:行省是用行省的血来征服的。

这种军队对旧日罗马军队的纪律、沉着乃至旧日罗马的战术日益生疏，这种军队日益由行省人民所组成，最后甚至大部分由帝国以外的野蛮人所组成，这样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已经不能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争，很快连较大的攻击战斗也不能进行了。军队的蜕化迫使国家只能进行防御，防御开头还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很快就越来越变成消极的防御，最后，进攻的主动权完全落到日耳曼人手里，他们在从北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不断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突破帝国国界。

当时，甚至为了确保莱茵河战线，也要让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本土上重新领略罗马武装的优越性。为了这个目的，提比利乌斯急忙赶到莱茵河去，以自己作为榜样，并用严峻的刑罚恢复废弛的军纪，将行军部队严格控制到最必要限度，并两次向西部日耳曼尼亚进军（公元10年和11年）。日耳曼人回避决战，罗马人不敢在莱茵河右岸扎下他们冬季的兵营。在阿利佐和在埃姆斯河河口乔克人土地上建筑的工事中，是否冬季也保有常驻的守备部队，关于这一点没有谁谈到过，但可以认为是实有其事的。

14年8月，奥古斯都逝世。莱茵军团既不能在服役期满后退伍，也不能得到军餉，于是他们拒绝承认提比利乌斯，宣布德鲁苏斯的儿子——盖尔马尼库斯为皇帝。盖尔马尼库斯平定了暴乱，恢复了军中的纪律，并且带领他们向日耳曼尼亚进行了塔西佗所描写的三次进军。这里阿尔米纽斯起来和他对抗，并且表现出他是完全可以和他的对手相匹敌的一个统帅。他总设法避免在开阔地区进行决战，尽可能阻碍罗马人的推进，并且只在罗马人不能展开的沼泽地带和狭窄小道上进攻他们。但是日耳曼人并不永远听他的话。好战的热情往往引诱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获

得战利品的渴望，不止一次地使深深落入陷阱的罗马人幸免于难。这样，盖尔马尼库斯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和安格利瓦尔边境墙附近取得了两次毫无战果的胜利，在归途中很费劲地从沼泽地的小路上逃了出来，在弗里西安海岸由于暴风雨和涨潮的缘故，战船和人员受到了损失，最后，在公元 16 年那次出征以后，他就被提比利乌斯召回了。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尼亚腹地的远征，从此便告结束。

但是罗马人深知，只有控制通向对岸的渡口，才能控制河流本身。罗马人决不是消极地撤退到莱茵河后面，而是把他们的防御转移到莱茵河右岸去。那掩护着利珀河下流、鲁尔河及乌培河地区的大群罗马堡垒（这至少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以后的区相对应的）和那从莱茵河修到马尔克伯爵领地边境的军用大道，令人推想到这里建立过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艾塞尔河直至济克河的防御工事，同现在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之间的界线是一致的，只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上有某些出入。这个在七世纪时大概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防御能力的工事体系，或许在莱茵河阻止了当时入侵的萨克森人，这样便划定了他们这一个部落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现在的境界线。近几年来，才在这里有了极重要的发现（由雅·施奈德尔作出的）；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逆莱茵河而上，逐渐建立起了一道罗马的边境墙，这主要是在多米齐安和阿德里安时代建筑的。它从诺依维特附近开始，通过蒙塔包尔高地，向埃姆斯河伸展，在那里越过兰河，在阿道夫塞克附近顺着陶努斯山脉北坡折向西方，包括了韦特劳谷地中的格吕宁根这一极北点，从这里向东南进展，并经哈瑙以南地区直达美因河。从这里起，这道边境墙沿美因河左岸直到米尔腾堡；从此沿着一条只有一个地方有曲折的直线到达霍亨陶芬城堡附近的维尔



騰堡的雷姆斯河。在这里，大概是后来在阿德里安时代繼續修筑起来的边境墙折而向东，經過丁克尔斯比尔、貢岑豪森、埃林根和基普芬堡，并在克耳海姆上方的伊尔恩津克附近达到了多瑙河。在边境墙后面，筑有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較大的要塞作为据点。这样封鎖起来的莱茵河右岸上的这一块土地，至少从美因河往南一带，自从海尔維第人被苏維汇人赶跑以后便一直荒蕪着；根据塔西佗的記載，这里住着高卢的流浪者和匪兵。

这样，在萊茵河边境墙附近和多瑙河一带，逐漸出現了比較安定、比較平靜的局面。战斗与侵襲仍繼續发生，但是双方領土的界綫在几世紀当中沒有变化。

##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耳曼尼亚內地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們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明了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們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許多古代文物。

我們已經看到，在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羅馬人跟日耳曼尼亚內地的貿易几乎等于零。但是我們也看到，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指出了一条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就已利用过的、来自卡尔农特(对着馬尔赫河流入多瑙河的河口)的旧通商道路，这条道路沿着馬尔赫河与奥得河直通到琥珀海岸。这条道路，和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河前进的第二条道路一样，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已經由伊特刺斯坎人使用着，而伊特刺斯坎人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谷地里住过，这已經被許多文物特别是哈耳施塔特出土的文物<sup>313</sup>所证明。高卢人一侵入北部意大利，大概就把这种貿易終止了(約在-400年)(根

据博伊德·道金斯的看法<sup>314</sup>)。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和伊特刺斯坎人发生这种以输入青铜器为主的贸易关系的,一定是在日耳曼人之前就占据了维斯拉河和易北河这一地区的民族,也就是凯尔特人,而日耳曼人的移入正像凯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回流一样,都会使这种贸易关系中断。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断以后,才出现了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沿着德涅斯特河和德涅泊河直通到维斯拉河河口的那条更偏东的通商道路。在勃罗姆堡、埃捷尔岛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古代希腊钱币,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钱币中间,有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许是五世纪在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岛、昔勒尼等地铸造的。

当迁移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的时候,奥得河和易北河沿岸中止不用的两条通商道路一定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在托勒密时代,似乎不仅仅这两条道路,而且还有其他经过日耳曼尼亚的通道也重新利用了起来。在这方面,凡是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土的文物都能接下去加以证明。

卡·弗·维贝尔格<sup>①</sup>把文物作了仔细的比较,在这方面弄清了许多问题,并证明,在公元二世纪,人们又使用了通过西里西亚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那两条通商道路。塔西佗早就提到波希米亚那些

“从我国行省去的战利品包买人和商人(*lixae ac negociatores*),他们由于贪图金钱和忘了祖国而跑到敌人的地区和马罗博杜斯的障地里去”<sup>316</sup>。

赫蒙杜利人也是一样,他们老早就跟罗马人友好,而且按照塔

---

① 《Bidrag till kännedomen om Grekerna och Romarnas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Deutsch von J. Mestorf: 《Der Einfluss der Klass. Völker》 etc., Hamburg, 1867. <sup>315</sup>

西佗的說法，他們在德庫馬特地区<sup>①</sup>和勒威亚直到奥格斯堡自由地进行貿易，当然也把羅馬人的貨物和硬币从美因河上游运到薩利河和韦雷河去。再往前去，在羅馬边境牆附近，在兰河河畔，也显示出有一条通往內地的通商道路的痕迹。

最重要的道路，看来始終是橫貫莫拉維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一条。馬尔赫河（或叫貝奇瓦河）和奧得河的分水岭，是必須翻越的唯一分水岭，它通过了一个辽阔的丘陵地区，海拔在 325 米以下；铁道現在也是从这个地方通过的。从下西里西亚起，展开了北日耳曼尼亚的低平原，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道路，沿着不同方向通往維斯拉河和易北河。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公元二世紀和三世紀的时候，一定經常有羅馬商人居住。在那里，我們不仅发现有玻璃瓮、香料瓶 [Tränenfläschchen] 和刻有拉丁文的骨灰罐（在西里西亚的特雷布尼茨附近的馬塞耳及其他地方），而且还有完整的羅馬人的墓穴，內有放骨灰罐的壁龕（骨灰安放处）（在格洛高附近的納赫耳恩）。在梅克倫堡的瓦林附近，也发现了毫無疑問是羅馬人的坟墓。硬币、羅馬的金屬制品、粘土制的灯等等文物，同样证明了貿易关系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一般地說，整个日耳曼尼亚东部，羅馬的軍隊虽然从来沒有到过，却到处散布着羅馬的硬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上面的商标，往往也可以在羅馬帝国各行省发掘出来的文物上看到。在西里西亚发现的粘土制的灯，和在达尔馬威亚、維也納等处发现的其他的灯有同样的商标。例如在两个青銅器上都有 «Ti. Robilius Sitalcis» 这样的戳記，而其中一个是在梅克倫堡发现的，另一个是在波希米亚发现的；这证明沿着易北河

① 德庫馬特地区 (Dekumatland)，拉丁文是 *agri decumates*，位于今萊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間。——譯者注

有一条通商道路。

但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头几个世纪，罗马的商船也来到了北海。在奥斯特河畔的诺伊豪斯（易北河口）所发现的、属于尼禄到马可·奥里略时代的 344 个罗马银币和一条大概在那里遇难的海船的残骸，都证明了这一点。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海上航线，直通丹麦诸岛、瑞典、哥特兰岛；关于这条航线我们还要作更详细的研究。托勒密和马尔齐安（约在公元 400 年）所说的各个沿海地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能以到过那一带海岸的商人们的报告为根据。这些商人从梅克伦堡沿岸到但泽，并从这里到斯堪的亚。最后，在霍尔施坦、什列斯维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丹麦诸岛及瑞典南部发掘出来的来自罗马的许多其他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离海岸都很近，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很小。

在罗马的这种贸易中，向日耳曼尼亚的武器输入占多大比重，很难判断。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大量武器也可能是战利品，在边境上的罗马当局当然要竭力阻止把武器输送给日耳曼人。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从海道上运去的，特别是运给较远的民族，例如运往基姆布利半岛。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道路而输入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罗马商品，有家用器具、装饰品、化妆品等。家用器具之中，有青铜制的碗、尺子、杯子、容器、烹饪用具、滤器、匙子、剪子、勺子等以及个别的金银制的容器和分布很广的粘土制的灯。青铜或金银制的装饰品有：颈饰、头饰、手镯、指环和同我们的胸针相似的扣子。在化妆品中，我们发现梳子、镊子、耳挖子等，至于那些用途还有争论的物品就不谈了。这些制品，按照沃尔索的意见，大多数都是一世纪时在罗马流行的风尚的影响下产生的<sup>317</sup>。

凱撒时代甚至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和使用这些器具的这个民族之間有很大的差別，纵然可以认为使用这些东西的只是少数豪門巨富。塔西佗所說日耳曼人用以“解餓”的那种“既未細心調制(sine apparatu)也不加調味品”的“簡單食物”<sup>318</sup>，現在則为另一种食物所代替，这种食物在烹飪上已經使用相当复杂的設備，此外还有从羅馬人那里弄来的各种适当的調味品。他們不再輕視金銀器物，出現了以金銀器物裝飾自己的癖好；他們改变了漠視羅馬貨幣的心理，出現了羅馬貨幣流通于日耳曼尼亚全境的情况。至于說到这些化妆品，单单它們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說明这个民族的习俗在开始彻底改变嗎，虽然这个民族我們知道过去已經发明了皂，但他們只懂得用皂来把头发染成黃色。

日耳曼人用什么东西向羅馬商人换取所有这些現金和商品呢，这我們首先可以从古人的报道中得到了解，但这些古人，我們已經說过，几乎使我們一无所知。普林尼說蔬菜、鵝毛、毛織品和皂是羅馬帝国从日耳曼尼亚輸入的物品。但是，这种在边境上剛剛开始的貿易，不能作为衡量以后时代的尺度。我們知道的主要商品是琥珀，但这也不足以說明那样普及于全国的貿易。构成日耳曼人主要財富的家畜，大概是最重要的輸出品，单拿配备在国境上的軍团來說，就对肉类有大量的需要。在約尔南德时代由斯堪的那維亚輸往維斯拉河河口、再由这里輸入羅馬帝国的兽皮和絨毛商品，一定在更早的时代，就从日耳曼尼亚东部的森林中找到了通往羅馬帝国的道路。杂技团中的野兽，維貝尔格认为是羅馬的航海者从北方运来的。但是除了熊、狼、也許还有野牛以外，那里什么也不能弄到，而獅子、豹、甚至熊，却可以比較近便和比較容易地从非洲和亚洲輸入。是不是奴隶呢？維貝尔格最后近乎羞怯地

問道。这大概倒叫他碰对了。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为了和羅馬取得貿易平衡而能够大量从日耳曼尼亚輸出的唯一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全部羅馬大土地占有經濟都靠大規模輸入販賣的战俘来維持，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沒落的共和国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的侵略戰爭中流入意大利的。現在这种現象已經結束。帝国已在固定的国境綫上轉向防禦。从中可以征集大量奴隶的战敗的敌人，在羅馬部队中越来越少。必須向野蛮人购买奴隶。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販賣者的身分出現在市場上嗎？按照塔西佗的記載，日耳曼人早就在出賣奴隶了（“日耳曼尼亚志”第24章），他們彼此之間經常发生戰爭，他們也像弗里西安人那样，在金錢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羅馬人交納貢賦，他們在三世紀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經在波罗的海上航行，并且他們在北海上所进行的远征，从三世紀薩克森人的航行开始到十世紀諾曼人的航行为止，除开进行其他的海盜活动以外，其最直接的目的是主要是猎取奴隶，而且猎取奴隶差不多專門是为了販賣。就是这些日耳曼人，在几世紀之后，不論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或者在他們对斯拉夫人作战时期，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奴隶掠夺者和奴隶販賣者嗎？除非我們认为二世紀和三世紀的日耳曼人全然不同于羅馬人的其他一切邻人，全然不同于三、四、五世紀日耳曼人的后代，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认，他們也大規模地参加了向意大利販賣奴隶的貿易，而这种奴隶貿易，当时被认为是体面的事业，甚至是光荣的事业。这样，那遮掩着当时日耳曼尼亚出口貿易的神秘面紗就脫落下来了。

我們在这里應該回头来談談当时波罗的海上的貿易。在卡特

加特海峡沿岸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罗马文物，但在波罗的海南岸直至里夫兰内地，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丹麦诸岛的南岸及内部地区，在瑞典的南岸和东南岸，在厄兰岛和哥特兰岛，罗马文物却有很多。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属于所谓迪纳里时期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到下面再谈。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统治的初期，也就是说延续到公元 200 年前后。塔西佗已经谈到苏伊翁人，说他们因有桨划船的舰队而强大起来，他们都敬重财富。可见他们大概早就从事海上贸易了。当他们的航海事业首先在波罗的海、厄勒海峡、厄兰海峡以及近海处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冒险到大海上去，企图把博恩霍尔姆岛和哥特兰岛纳入他们的活动圈内。他们在船只的操纵上一定很有把握，所以能够发展繁盛的贸易，而贸易的中心正是在离大陆最远的哥特兰岛。事实上，到 1873 年为止<sup>①</sup>，在这里已找到了 3 200 多个罗马迪纳里银币，而在厄兰岛发现的约有 100，在瑞典大陆不到 50，在博恩霍尔姆岛 200，在丹麦和什列斯维希 600（其中 428 个是在西兰岛的斯拉耶耳塞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对这些遗物的研究表明，在公元 161 年，即马可·奥里略即位的那一年以前，流入哥特兰岛的罗马迪纳里银币是很少的，但从这一年起直到该世纪末，迪纳里银币却大量流入该岛。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一定已经很发达了。至于航海事业以前早就出现这一事实，已为托勒密的记载所证明，根据这个记载，从维斯拉河口到斯堪的亚的距离是 1 200—1 600 斯达第（30—40 地

<sup>①</sup> 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瑞典的异教时代”，德译者梅斯托尔夫，1873 年汉堡版（Hans Hildebrand. «Das heidnische Zeitalter in Schweden». Deutsch von Mestorf, Hamburg, 1873）。

理哩)①。这两个距离,就布累金格的东端和厄兰島或哥特兰島的南端來說,大致都是不錯的,要看是从里克斯赫夫特角量起,还是从紐法尔瓦塞尔或皮耳劳量起。这两个距离,完全跟其他关于沿德意志海岸到維斯拉河口的距离的說法一样,都只能以海員的報道为根据。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这种航行的不是羅馬人,其证明有二:第一,所有羅馬人关于斯堪的那維亚的概念都很模糊;第二,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挪威沒有找到一个羅馬錢币。羅馬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到过基姆布利海角(斯卡晏),他們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无际的海洋,这个地方大概始終是他們直接进行海上貿易的終点。由此可见,当时日耳曼人自己航行于波罗的海,进行貿易,并往斯堪的那維亚运送羅馬的貨幣和羅馬的工艺品。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从三世紀的下半叶起,薩克森人突然从海上襲击高卢和不列颠海岸,他們表現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这必須要长期熟悉大海上的航行。而这一点,薩克森人(这个名詞,我們在这里是指基姆布利半島上的一切民族說的,也就是說还指弗里西安人、盎格魯人、朱特人)只能在波罗的海上得到。这是一个沒有潮水漲落的大內海,西南大西洋上的風暴在北海大为减弱之后方才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伸展得很长的有許多島屿、海灣和海峡的海域,从这一岸航行到那一岸,至多只在很短的时间內看不到陆地,这真像是一个为演习新发展起来的航海术而創造出来的海。属于青銅时代的画着許多桨划船的瑞典岩画,证明这里存在过古代航海事业。这里,在什列斯維希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

---

① 大約 220—290 公里。——編者注



长 70 英尺，寬 8 到 9 英尺的柞木船，該船建造于三世紀初，完全适合于大海航行。在这里，在默默无声中形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使薩克森人和諾曼人有可能日后在大海中实行远征，而且由于这个緣故，日耳曼人直到現在还站在世界一切航海民族的前列。

直到二世紀末，流入日耳曼尼亚的羅馬硬幣，主要是銀迪納里（一个迪納里 = 1.06 馬克）。而且日耳曼人，正像塔西佗告訴我們的，喜欢他們早就熟悉的邊緣为鋸齒形并鑄有双駕馬車花紋的旧硬幣。确实，在古代硬幣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serrati bigatique*<sup>①</sup> 硬幣。这种古幣含銅量只有 5%—10%。图拉真已經下令把 20% 的銅摻到銀幣里去；日耳曼人那时大概沒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从 198 年起将摻入物提高到 50%—60% 的时候，就引起了日耳曼人的憤恨。在文物中，这种后期的劣质迪納里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能看到，羅馬貨幣的輸入当时是中止了。只有在君士坦丁于 312 年規定以金索里达（72 个索里达等于一羅馬鎊純金，即 327 克純金，也就是說，一个索里达 = 4.55 克純金 = 12.70 馬克）为貨幣单位以后，貨幣才又开始輸入，从这时起流入日耳曼尼亚的，更多是流入厄兰島尤其是哥特兰島的，主要是金幣——索里达。这一羅馬貨幣輸入的第二个时期，即索里达时期，就西羅馬硬幣來說，一直繼續到西羅馬帝国的末日，就拜占庭硬幣來說，一直繼續到阿納斯塔西烏斯（死于 518 年）时代。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在瑞典、丹麦諸島发现的，有些是在德国波罗的海海岸上发现的；在德国內地发现的很少。

但是，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及其后继者的鑄造偽幣，还不

---

① 鋸齒形的、有双駕馬車花紋的。——譯者注

能說明日耳曼人和羅馬人之間的貿易为什么突然中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原因之一显然是政治关系。从三世紀初，日耳曼人对羅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 250 年前后，战火燒遍了多瑙河口直到萊茵河三角洲一带。在交战国之間，当然不会有正常的貿易。但是，这种突然发生的全面的持久的进攻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說明。在羅馬的内部关系中，找不到这种說明；恰恰相反，帝国到处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間，还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見，日耳曼人的进攻是由他們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这里，能对此事加以說明的还是出土的文物。

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什列斯維希的两处泥炭沼澤上发掘出了一些极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由哥本哈根的恩格耳哈尔特作过詳細的研究，并且經過許多波折之后，現在存放在基尔博物館。这些文物和其他同类文物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硬币可以相当确切地确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在聚德布腊卢普附近的塔施堡（丹麦語——Thorsbjerg）沼地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 37 枚从尼祿到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时期的硬币。在尼达姆沼地（这是一个淤塞的变成了泥炭沼澤的海灣）出土的另一批文物中，有 34 枚从提比利烏斯到馬克里努斯(218 年)时期的硬币。可見这些文物毫无疑问是公元 220 年到 250 年期間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文物中，不仅有羅馬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許多本地制造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含有铁质的泥炭水中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們令人惊奇地向我們說明了北日耳曼尼亚在三世紀上半叶时的金屬工业、織布业和造船业的情况，而文物上的魯恩文字，也說明了当时使用文字的情形。

这里更使我們感到惊異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紡織物、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套具，都說明这是一个比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高得很多的文化阶段；而尤其使我們惊讶不止的，是本地的金屬制品。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屬的知識，这已为比較語言学所证明。他們也許还有过金屬开采和金屬加工的知識，但是当他們和羅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識。至少在公元一世紀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萊茵河与易北河間有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銅的說明；他們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結論。不錯，塔西佗談到过哥汀人(在上西里西亚?)的采铁，而托勒密也說到他們的邻人魁代人的制造铁器，但这两种人可以从多瑙河沿岸学到冶铁术。由硬币证明是屬于一世紀的文物中，也沒有任何本地制作的金屬品，而只有羅馬的金屬品；如果日耳曼尼亚有自己的金屬加工业，那末大量的羅馬金屬商品怎么还会运到那里去呢？誠然，在德意志也找到过古代的鑄型、未完工的青銅鑄件和青銅鑄件廢品，但都沒有同时发现可以证明其年代的硬币；大概这都是前日耳曼人时代的遺痕，是流浪的伊特刺斯坎人青銅鑄工活动的殘迹。不过，提出关于移来的日耳曼人是否**完全**忘掉了金屬加工这样的問題，是沒有意义的；全部事实都說明，日耳曼人在一世紀的确沒有或者几乎沒有从事金屬加工。

但是，塔施堡沼地出土的文物突然在这里出現，并向我們表明，本地的金屬工业有出乎意料的高度水平。鈕扣、飾有兽头和人头的裝飾用的金屬片、除眼鼻嘴以外把全部面孔掩盖起来的銀盔、用金屬絲編的鎖子甲(这需要付出极端艰苦的劳动，因为金屬絲一定要預先經過錘打，拔制金屬絲是到 1306 年才发明的)和一个金

发箍，至于其他一些不知是否是本地所造的物品，就不在这里列举了。和这些物品相似的，还有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芬宁岛沼地出土的以及也是六十年代初在波希米亚（在哥尔若維策）出土的物品，如飾有人头的豪华的青銅盘、鈕扣和带扣等。这些物品同塔施堡的完全屬於一个类型，因此也必定同屬於一个时代。

从三世紀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屬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們說，到了五世紀末，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单是铁和青銅，就連金銀也經常加工制作了，仿照羅馬錢币鑄造了裝飾用的金片，并对非貴金屬鍍金；还出現了鑲飾、珐琅和細絲工；在形状往往很笨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找到有高度艺术性的、饒有風趣的、只是部分模仿羅馬人的裝飾——这一般主要是指都有一定特殊外形的鈕扣、带扣和胸針說的。在英国博物館里，来自阿速夫海濱刻赤的鈕扣和在英国发现的完全一样的鈕扣同时陈列着；它們可能是同一个作坊的出品。这些制品的風格，虽然往往带有鮮明的地方色彩，但从瑞典到多瑙河下游，从黑海到法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日耳曼人金屬工业的第一期，在大陆上，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告終和普遍地信奉基督教而逐漸結束；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維亚，还維持得稍久一些。

这种工业在六七世紀时在日耳曼人中間傳播得多么广泛，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作为单独的工业部門分离出来，可由“民族法”来作证。铁匠、刀劍鑄造匠、金銀匠常被提到，在“阿勒曼尼法”中甚至还說到經過公家审查(*publice probati*)过的工匠。“巴伐利亚法”对于在教堂、公爵庄园、铁匠鋪和磨坊的盜窃行为課以更多的罰金，“因为这四种建筑物是公用的房子，而且是經常開門的”。按照“弗里西安法”，杀害金匠的杀人罰金要比杀害同一等級的其他

人多四分之一。“薩利克法”規定普通奴隶的价格是 12 索里达,而铁匠奴隶(faber)的价格則为 35 索里达。

关于造船业,我們已經談过了。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船是桨划船;大的是柞木船,要十四对人划桨,小的是用松木做的。桨、舵和水斗还都放在船里。只有在日耳曼人也开始在北海航行以后,他們似乎才从羅馬人和克尔特人那里学会了怎样使用船帆。

制陶业他們在塔西佗时代就已經有了,但还只有手工制陶业。在边界上,即在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边境墙以內,羅馬人有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燒在陶器上的工人名字,证明在这种作坊里面工作的也有日耳曼人。关于陶工旋盘和釉的知識以及更高级的技能,必定通过他們而傳入到日耳曼尼亚。橫渡多瑙河而入侵的日耳曼人,也知道了玻璃制造法;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常常发现玻璃器皿、彩色的玻璃珠和金屬制品上的玻璃鑲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日耳曼尼亚制造的。

最后我們看到,魯恩文字已經得到普遍的傳播和采用。在塔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魯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帶扣。这种魯恩文字,我們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維亚最古的魯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較完善的魯恩文字母,日后便形成了盎格魯撒克逊魯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那維亚占支配地位的北方魯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傳到現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語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語言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淵源于羅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屬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經作了改变。圓形的字母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橫写,这都是为了

适应树木的纖維。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紙或普通紙上写这种有角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們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教、巫术和題詞方面，也許还适用于其他簡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魯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拋棄，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羅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魯恩字母。

最后，日耳曼人在我們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耕作和畜牧上一定也有显著的进步。轉向定居生活使他們不得不这样做；不然，人口就不可能激增，以致在民族大迁徙时期造成人口过剩。原始森林中的許多地段一定已經开垦了出来，从这里大概就产生了处在当时日耳曼人境内的大部分“熟荒地”（即带有古代耕地痕迹的森林地段）。关于这方面的特別证据当然是沒有的。但是，如果普罗布斯約在三世紀末喜欢为他的騎兵挑选日耳曼人的馬，如果不列顛的薩克森地区排挤掉凯尔特人的小黑牛的大白牛，像現在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盎格魯撒克逊人带去的，那末，这就证明在日耳曼人的畜牧和耕作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

我們研究的結論是：日耳曼人从凱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徙（公元 400 年左右）以前，他們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傳播到了他們那里，并为他們运来了羅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羅馬人的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羅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什列斯維希沼地出土的文物，代表这种工业的可以确定其年代的第一阶段；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文物，代表有了更高发展程度的第二阶段。这里有一个特点是，西部各部落显然落

后于内地各部落，尤其落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晚的萨克森人所提供的金属品，质量都低于盎格魯撒克逊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从内地迁来的各部落——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法兰西的勃艮第人。从多瑙河中游沿易北河奥得河前进的那条旧商道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是不容否认的。同时，海岸居民逐渐变成了巧妙的造船家和勇敢的水手；人口数目到处都在急剧增加；被罗马人局限起来的领土再也不够了。首先从遥远的东部发生了寻求土地的各部落的新的迁徙；最后，蜂拥的人群从四面八方，从陆地和海上不可遏止地奔向新的地区。

### 注釋：各日耳曼部落

羅馬軍隊只沿着几条远征的路綫进入过大日耳曼尼亚腹地，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告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我們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只有在完全证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現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們的方式和方法來說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評論者。他們对这个地方缺乏亲身的閱历。斯特拉本认为，羅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誠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經常想起本世紀初的朴素的唯理論，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問；而

很有學問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却企圖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個日耳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圖上精密計算出來的、確定不移的經緯綫網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對當時來說是如何輝煌，但他的關於日耳曼尼亞的地理畢竟是錯誤的<sup>319</sup>。第一，他所利用的資料大半都是不確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錯誤的。第二，他的地圖畫得不對，河流和山脈大半完全畫錯了。他真像一個從未出門的柏林地理學家，在 1820 年前後，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非洲地圖上的空白填補起來，於是就調和了從阿非利加的利奧以來的一切史料，替每一條河每一座山指出確定的走向，替每一個民族指出確切的居處。這種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圖，一定會加深他所利用的材料的錯誤。所以，托勒密把許多民族都弄重復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萊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倫巴德人；他知道兩個波希米亞，一個住着馬可曼尼人，另一個住着拜諾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確地說，日耳曼尼亞沒有城市，但不到 50 年，托勒密卻已經舉出了 96 處帶有名稱的地点。其中有許多名稱，也許是正確的地名；托勒密像是從商人那里搜集了許多資料，這些商人很多當時已經到過日耳曼尼亞東部，而且熟悉了他們到過的那些地方的逐漸固定下來的名稱。虛構的城市錫阿土坦德這個例子，說明其他一些名稱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城市，我們的地理學家大概是在污損的手稿上從塔西佗的«ad sua tutanda»〔“為了保存它”〕這句話中推敲出來的。同時，也有一些異常精確和具有頭等歷史價值的報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確指出倫巴德人（誠然用了拉科巴德人這個錯誤名稱）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維克這兩個地名，今天還可以作為他們的證明。他同樣正確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爾斯高，那里在萊茵河畔諾依維特附近，今天



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最直接的史料仍然是罗马人，特别是那些亲身到过日耳曼尼亚的罗马人。韦莱曾以士兵的身分到过日耳曼尼亚，而且也是以士兵的身分来写作的，他写作的神气，好像是一个 *grande armée* [大軍]的軍官在描写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出征。他的叙述甚至不能使人确定发生战事的地点。这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地区是并不奇怪的。普林尼以騎兵軍官的資格，也曾經在日耳曼尼亚服役，而且訪問过乔克人居住的海岸；他把同日耳曼人进行的全部战争写成了 20 卷书；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資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不但在政治、軍事观点上，而且在理論观点上，对于在一个野蛮地区里所进行的战争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sup>①</sup> 因此，这位罗马的科学百科全书家根据亲身观察写出来的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报道，具有特別的价值。依据传统的說法，塔西佗到过日耳曼尼亚，但是我沒有找到一个证据。不管怎样，他当时只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搜集直接材料。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類彼此协调，并且使它們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經有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巴尔·措伊斯的“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語言

---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編者注

史”<sup>320</sup>。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沒有做到的事情，应当說，利用我們現有的資料也是无法解决的。資料的不足，从这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虛假的輔助性的理論这一事实中看出来；措伊斯以为一切爭論問題的最后結論應該从托勒密的著作中去寻找，虽然誰也沒有像他那样尖銳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錯誤；格林以为推翻羅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應該是在比萊茵河、多瑙河和維斯拉河之間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闊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應該和哥特人及达克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日耳曼人的。不論是措伊斯的或者是格林的假設，今天都已經过时了。

我們打算至少把問題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們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們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詳細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給我們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穩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論如何，这比任何其他の說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們所牽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們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須拒絕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說，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話。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諾南人；他絲毫沒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納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沒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拚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說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沒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維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們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說就垮台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基

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現在，讓我們分別来看看这五个部落吧。

一、Vindili, quorum pars Burgundiones, Varini, Carini, Guttones〔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頓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們，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們說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們当时都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极东部分：哥特人住在維斯拉河河口和河口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說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維斯拉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烏斯（他用汪达尔人的名字来称呼理森山）說，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語言来划分部落，我們就應該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屬於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阿斯认为（正像他对汪达尔人那样）說哥特語的地方<sup>321</sup>。他們以前的居住地点我們一点也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海魯萊人的住处，格林是把这些海魯萊人同斯基尔人和魯吉人一道算作哥特人的。普林尼提到过維斯拉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和哥特人一起住在海濱的魯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波罗的海之間，直到維斯拉河及維斯拉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們不知道。瓦倫人也引起了一些困难。塔西佗把他們和盎格魯人一起列入供奉納塔斯神的七个民族之中；措伊斯已經正确地指出，他們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面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魯人列为苏維汇人，这显然是錯誤的。措伊斯則把这同一位地理学者所写錯的一两个名称，认做是瓦倫人，因

而將他們安置在哈斐爾蘭德，並將他們劃為蘇維匯人。古代“民族法”的記載，簡直把瓦倫人和紹林吉亞人混同了，但法律本身對瓦倫人或盎格魯人都是一樣的。根據上述種種情況來看，瓦倫人應該算是哥特部落還是印格伏南部落，還是一個疑問；不過他們已經完全消失，所以這個問題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二、*Altera pars Ingaevones, quorum pars Cimbri, Teutonicac Chaucorum gentes*〔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利人、條頓人和喬克人〕。

普林尼在這裡首先指出，基姆布利半島及易北河與埃姆斯河之間的沿海地帶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舉出的三種人當中，喬克人毫無疑問是弗里西安人最親近的同族。弗里西安語今天還在北海沿岸、荷蘭的西弗里斯蘭、奧登堡的扎特蘭德和什列斯維希的北弗里斯蘭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卡羅林王朝時代，從辛克法耳海灣（這個海灣現在還是比利時的弗蘭德和荷蘭的西蘭省的分界綫）到濟耳特島和什列斯維希的維道的全部沿海地區，也許在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說的都是弗里西安語；只有在易北河河口兩邊直到海岸，才說薩克森語。

普林尼說的基姆布利人和條頓人顯然是指當時基姆布利半島的居民，可見他們都是屬於喬克—弗里西安語族的。所以我們可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島上的日耳曼人的直系子孫。

誠然，達爾曼（“丹麥史”）<sup>322</sup>曾經斷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五世紀時才從西南方面遷移到半島上來的。但是他沒有替他的論斷提出任何證據，而他的論斷在以後的全部研究中完全沒有為人注意，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可以根据有古代文物留傳到現代和仍然存在的那些方言，来称呼整个語族；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語首先和弗里西安語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印格伏南部落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呢？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日耳曼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薩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部落，这是否正确呢？

我們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凱魯斯奇人算做赫米諾南人，这就对薩克森人作了完全不正确的分类。我們下面就会看到，事实上，我們不能不把薩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基本部落看做是弗里西安—薩克森部落。

这里应当談一談盎格魯人。塔西佗假定地把他們算做苏維汇人，托勒密則肯定地把他們列为苏維汇人。托勒密把他們安置在易北河右岸，倫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見一般还有若干正确成分的話，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倫巴德人。照这样說，盎格魯人从劳恩堡大概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們就在半島上发现了他們，那里保存有他們的名字，他們是从那里，和薩克森人一同迁往不列顛去的。他們的語言是現在盎格魯撒克遜語的組成部分，而且肯定是这种新形成的語言中的弗里西安語的那一部分。不管停留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的或者僻居远处的盎格魯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們把盎格魯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且要把他們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魯撒克遜語的（大部分是弗里西安語式的而不是薩克森語式的）整个元音发音法的形成，盎格魯撒克遜語以后的发展在許多場合同弗里西安方言发展的惊人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弗里西安人。在大陆上的各种方言中，弗里西安語現在和英語最接近。例如，英語中喉音向嚙音的轉變，不是淵源于法語，而是淵源于弗里西安語。英語用  $ch = \check{c}$

代替 *k*, 英語在軟元音前用 *dʒ* 代替 *g*, 这可能淵源于弗里西安語的  
用 *tz*, *tj* 代替 *k*, 用 *dz* 代替 *g*, 而决不可能淵源于法語的 *ch* 和 *g*。

我們應該把朱特人和盎格魯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  
部落, 不管他們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經住在半島上, 或者  
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納塔斯神的一个  
民族——欧多茲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們的名字; 如果盎格魯人  
屬於印格伏南部落, 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  
他部落。这样看来, 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經伸展到奧得河口, 他們和  
各哥特民族之間的空地也許已經住滿了人。

三、*Proximi autem Rheno Iscaevones (alias Istaevones),*  
*quorum pars Sicambri* [紧靠萊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  
易斯泰伏南人), 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 例如瓦茨<sup>323</sup>, 都已經多多少少把易  
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語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  
九世紀中叶以后, 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語文献, 都是用一种和  
古代高地德意志語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 因此格林就认为,  
古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經死亡, 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語所  
代替, 所以他終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語言遺物进行了研究以后, 格林自己也承认:  
古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 它在薩克森方言和高地德  
意志方言之間占据着一个中間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暫時說到这里  
就够了; 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 对于它的比較詳細  
的研究, 必須留待另一次專門的注釋<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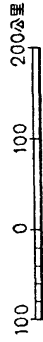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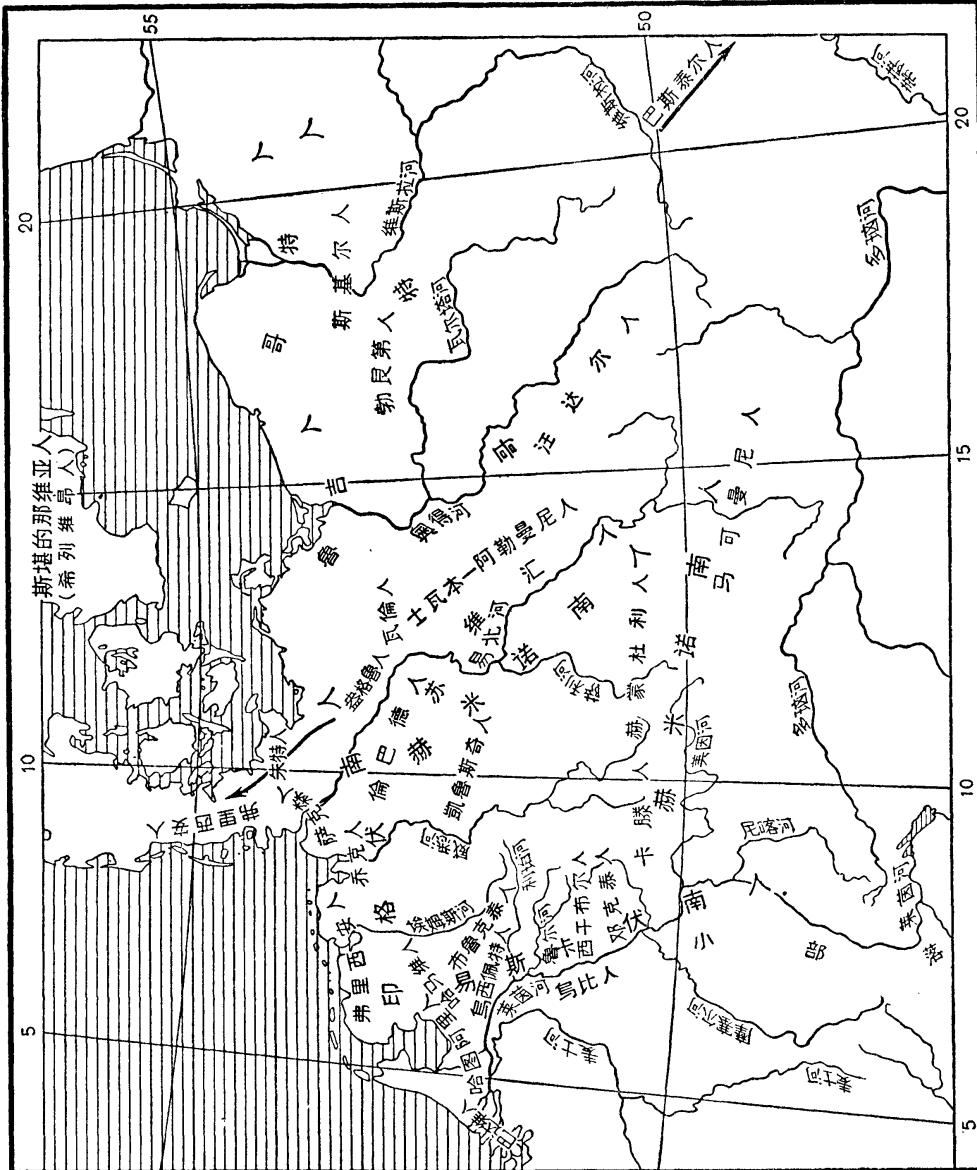
① 見本卷第 564—598 頁。——譯者注

# 日耳曼人移住图

(根据弗·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绘制)

## 各日耳曼部落

- 哥特人 (哥特部落)
- (按普林尼是温底尔人)；
- 斯基尔人
- 鲁吉人
- 勃良第人
- 汪达尔人
- 印格伏南人 (弗里西安-萨克森部落)；
- 弗里西安人
- 半岛上的弗里西安人
- 盎格鲁人
- 朱特人 (欧多兹人)
- 和奈欧人
- 乔克人
- 萨克森人
- 瓦伦人 (?)
- 易斯卡伏南人 (法兰克部落)；
- 乌比人
- 乌西佩特人
- 哈里维人
- 布曼克人
- 西干布人
- 邓克人
- 赫米诺南人；
- 苏维汇人 (伦巴德人、
- 士瓦本-阿勒曼尼人、
- 巴伐利亚-马可曼尼人)
- 赫蒙杜利人 (绍林吉亚人)
- 卡滕人 (黑森人)
- 卡滕部落；
- 巴达维人和
- 哈图阿里人
- 斯堪的那维亚人 (希列维昂人)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基本部落来说，显得太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高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耳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部地区，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其他部落（主要是卡滕人部落）的遗民：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属于法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也许还有特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发展进行了抵抗，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们。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面上，当时拥挤着按日耳曼人的情况来说是很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动向罗马领土移住的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把印格伏南部落的一大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

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进行的研究，将会证明，法兰克人是一个分裂为许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他们用一种分裂为许多土话的特殊方言讲话，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基本部落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基本部落的各民族的情况，雅科布·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这个基本部落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們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四、Mediterranei Hermiones, quorum Suevi, Hermunduri, Chatti, Cherusci [在內地居住的是赫米奧南人，其中有蘇維匯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凱魯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經認為赫米諾南人（他採用了塔西佗的比較正確的寫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蘇維匯人的名稱，按凱撒的說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內的，現在他們開始分化。紹林吉亞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獨立的民族。其他的蘇維匯人還沒有分離出去。我們甚至把最近幾百年來已經消失的許多神秘名稱，看做不可理解的東西而撇開不談，那末這些蘇維匯人還是應該包括下面三個以後出現在歷史上的講高地德意志語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亞人和倫巴德人。倫巴德人我們確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們離開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間；他們這種經過長期鬥爭才能保持下來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們從措伊斯和格林時代以來，同樣也知道巴伐利亞人以馬可曼尼人的名稱居住在波希米亞，而黑森人和紹林吉亞人則住在他們現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鄰接的地區。但是在法蘭克人、黑森人和紹林吉亞人以南，就是羅馬的領土，因此除去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今日的勃蘭登堡軍管區與薩克森王國的這一片土地以外，就沒有其他的地方留給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這裡我們找到了一種蘇維匯民族——色姆諾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這些色姆諾南人可能是同一類人，他們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為鄰，在東北和東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為止，一切都進行得相當順利。但是普林尼卻把凱魯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諾南人，他在這裡肯定犯了錯誤。凱撒已經把凱

魯斯奇人和苏維汇人明确地区別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維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凱魯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間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維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魯人的身上的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倫巴德人之間住滿了凱魯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做出結論，說他們之間有較近的部落亲屬关系；虽然，也許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視其意見的研究者中，沒有一個人把凱魯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個問題：把他們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傳留到我們这个时代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語的特征：日后用 *h* 的地方用 *ch*，例如 *Cherusci*，*Chariomerus*，用 *i* 的地方用 *e*，例如 *Segestes*，*Segimerus*，*Segimundus*。但是，羅馬人从萊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都以法兰克語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們不知道，在七世紀时法兰克人还发 *ch* 音的这个第一輔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一世紀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間都按 *ch* 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軟化为大家所共有的 *h* 音。此外，我們也找不到凱魯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亲屬关系，找不到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凱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烏西佩特人的殘余部分这一事实所表現出来的那种亲屬关系。在瓦魯斯时代被羅馬人占領的并被他們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萊茵河右岸的領土，也是同易斯卡伏南人一法兰克人的領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羅馬的其他堡垒；在凱魯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頂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間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羅馬人所占領；这块羅馬領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凱魯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

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們的內部事務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擺脫了羅馬人長期占領的情況。羅馬人在這個地區遭到強有力的抵抗時，總是暫時地將自己的侵略行為停止在部落的邊界上。凱撒在高盧就是這樣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時人的邊境上，只是當他相信所謂克爾特人的高盧真正可靠以後，才跨過了這條邊境綫。

因此，只能依據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觀點，把凱魯斯奇人和跟他們有最近親屬關係的一些小的鄰民族都劃歸薩克森部落，從而劃歸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凱魯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薩克森語複數所有格和陽性弱變化中的 *a*，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和流行在威斯特伐利亞的 *o* 形成了對照，這個事實也對上述觀點作了說明。這樣一來，一切困難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落一樣，有一塊相當完整的領土，只是赫米諾南部落的倫巴德人，稍微向這塊領土突進了一點。這一部落的兩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魯—朱特人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帶，並且至少占了半島的北部和西部，而薩克森人這一支派，則占据了內部地區，可能當時也已經占据了北耳塞吉亞的一部分，而在此後不久托勒密在那裡第一次提到了 *Saxones* [薩克森人]。

五、*Quinta pars Peucini, Basternae contermini Dacis* [第五部分是和達克人為鄰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爾人]。

我們對這兩個民族所有的一點點知識以及巴斯泰爾人這一名稱形式本身，都說明他們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們看成是一個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過希臘人從多瑙河下游得到有關他們的資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奧得河和維斯拉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識，則是在萊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爾人之間的聯繫。巴斯泰爾人和佩夫金人，都是

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維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有格都有  $\hat{e}$ ，阴性都有  $\hat{o}$  和  $\hat{e}$ ；弱变化阳性都有  $a$ 。现在时（陈述式）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  $a$ ，弱变化阳性也有  $a$ ；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  $d$  或  $dh$ 。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

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复数所有格是  $a$ ，弱变化阳性是  $i$ ，这是从  $a$  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  $s$  变为  $r$ ，复数第一人称保留  $m$ ，第二人称保留  $dh$ ，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  $o$ ；极可能复数所有格也是  $\hat{o}$ ，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

西方(薩利克人的)紀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 *as* 結尾的。根据我們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現在时变化中是互相接近的,它們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語一样,同那些有古老亲屬关系的語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語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現代方言之間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許我們將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許可我們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語形变化形式而沒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紀和我們最古的語言資料編成的时代之間,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許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須提一提第二輔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維亞,古代歌謠的同音法表明,从編成歌謠到用文字写下歌謠这一段时期里,語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語言学家們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弗·恩格斯写于 1881—1882 年

原文是德文

德文是接手稿刊印的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19 卷譯出

## 弗·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sup>324</sup>

###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 土地关系的变革

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紀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终于由于純粹的經濟原因而逐漸沒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再也不能繼續适应經濟上的进步。我們将在下面探討它的衰敗以及最終的灭亡。我們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殘余在今日还繼續存在。

但是,馬尔克制度能够維持这么久,是靠了它的政治意义。它在数百年間曾經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怎么可能这样呢?

最早的公社,我們知道,是包括整个民族的。全部占有的土地当初都屬於整个民族。以后,彼此之間具有較近亲屬关系的一个区的全体居民,成为他們所移住的地方的占有者,而民族本身就只有处置余下来的无主土地的权利了。区的居民又将他們的耕地馬尔克和林地馬尔克让給各个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同样是由近亲組成的),同时也把剩余的土地留給区支配。干村在从原始村的旧馬尔克中分出土地、或立新的移民村时,情形也是一样。

血統聯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繼續发展，这种聯盟愈来愈被人們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現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統親屬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記憶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統聯盟的意識自然保存得較长久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比較牢固的区聯盟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曾經明白地讲到阿勒曼尼人的这种情形。这在“民族法”上，也可以到处看得出来。薩克森人在查理大帝时代还是处在这个发展阶段；而弗里西安人則一直延續到弗里西安的自由丧失的时候。

但是，向羅馬境內的迁徙把区內的血統聯盟也破坏了，而且必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但这也是做不到的。长期的远征，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統聯盟，也是費了很大力气才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羅馬領土上的新区，一开始就成为多少是任意划定的（或者說，是由当地原有的关系所决定的）司法区，或者很快就变成这种司法区。

这样，民族就溶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聯盟之中，而在这些农村公社之間沒有，或者几乎沒有任何經濟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馬尔克都是自給自足的，它們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并且邻近的各个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們之間的交換，便几乎不可能了。这些小的公社的經濟利益誠然都是相同的，但



正因为这样，彼此之間缺乏共同的經濟利益。由于民族是純粹由这样的公社組成的，因而，一个不是从公社內部产生、而是跟它們格格不入地对立着的、并且不断地剝削它們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繼續生存的条件了。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現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時間內交給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現。相反地，在日耳曼人侵占的羅馬領土上，我們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即只对馬尔克負担一定賦役的财产了。我們現在要研究一下，在这种自主地的基础上，一种社会国家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种社会国家制度又怎样——这是常見的历史的恶作剧——最終瓦解了国家，而且在古典的形态之下，消灭了一切的自主地。

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轉化为它的对立物。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羅馬領土上一出現，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羅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貧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的不移的規律；虽然这一規律在近代資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資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讓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時間問題了。

可是，在我們正在考察的这个时代，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

的生产部門。地产及其产品占当时財富的絕大部分。当时存在的各种动产，自然跟随地产之后，同地产一样地日益聚积在同一些人手里。工业和商业在羅馬崩潰时期已經衰落了，日耳曼人的侵略几乎把它們全部摧毀。留下来的一半都由非自由人和外国人經營，并且仍然成为被人輕視的行业。在財產不均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这里逐漸形成的統治階級，只能是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階級，他們的政治統治形式也只能是一种貴族制度。因而，如果我們看到，在这一階級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詐，那末，我們就不要忘記，这种政治手段，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經濟过程。不消說，我們也会常常看到，这种政治手段如何阻撓經濟的发展；这样的事情是相当經常的，而且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把这样的政治手段，朝着相反的方向、或者彼此交錯的方向运用的地方。

这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階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我們知道，就是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羅馬的大土地占有主，他們的田地，大部分由繳納地租(canon)的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耕种。

其次，我們也看到了，王权如何通过侵略战争而在移居的日耳曼人中間成为一种經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如何把旧日的民田变成王室領地，如何把羅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領地。在分割帝国引起的多次內战期間，由于大量沒收所謂造反者的土地，王室領地不断地增加。不过它增加得快，揮霍得也快。因为国王不断贈送土地給教会和私人，給法兰克人和羅曼人，給他的侍从(Antrustionen)和其他的寵幸者。邦君同样也贈送土地給豪族、巨室、地主、官吏和軍事首領所組成的統治階級(这个階級是在內战

中、由于内战的影响开始形成的)，以贿赂他们的支持。罗特<sup>①</sup>无可辩驳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真正的馈赠，赠送的土地成为自由的、世袭的、可以出让的财产，直到查理·马尔泰尔，在这方面才有了转变。

查理掌权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了，但是还远未因此而被宫相的权力所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了屈从于宫相，屈从于和他们同一地位的人。恰恰相反。掌握着整个高卢的，正如爱因哈德所说的，是这些

“暴君，他们到处都想进行统治”（*«tyrannos per totam Galliam dominatum sibi vindicantes»*）<sup>326</sup>。

除去世俗的豪绅显贵以外，主教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攫取了对于周围伯爵领地和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并利用豁免权和教会的牢固组织作他们的护符。随着帝国内部的瓦解，外敌纷纷入侵；萨克森人侵入莱茵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了阿奎丹尼亚。在这种情势之下，仅仅镇压内乱、驱逐外敌，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已受贬抑的豪绅显贵或者把由查理委派去接替他们的后任，跟王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旧日的权力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依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这一种变革是卡罗林王朝的重要事业。这一变革的特点还是在于：选择这一手段，是为了统一帝

---

① 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厄兰根版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Erlangen, 1850] <sup>325</sup>。这是在毛勒以前时期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我在这一章中要多次引用。

国，将豪紳显貴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結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紳显貴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为了弄清查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手段，我們必须先研究一下当时教会的财产状况，因为这是当时土地关系的本质因素，在这里，是不能忽略过去的。

在羅馬时代，教会高卢就已經有了不少的地产，由于在捐稅和其他賦役方面享有重大的特权，这些地产的收入就越加多了。不过，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的。国王們彼此竞赛，看誰給教会捐献的土地、金錢、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希耳佩里克就常常說（見图尔的格雷哥里）：

“看，我們的国庫变得多么空虚！看，我們所有的財物，全都送給教会了！”<sup>327</sup>

在貢特朗（他是教士們的寵儿和奴僕）在位的时候，捐献簡直是漫无止境的。这样一来，被加上謀叛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产，在被沒收以后，大部分变成了教会的财产。

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論貧富，都无节制地向教会捐献。

“神奇地治好了一种真正的或臆想的病痛，实现了一种宿願，例如生了一个儿子，避免了一种危險，都要給圣者发了慈悲的那个教堂进行捐献。在上下层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向教会捐献可以贖罪，所以，經常的慷慨施舍，也就更加必要了。”（罗特，第250頁）

除此以外，还有豁免权，它在接連不断的內战、搶劫、沒收的年月里，保护教会财产，免遭暴力的侵犯。許多小百姓們也都认为把他們的地产让給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繳納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

但是，这一切对虔敬的教士來說，还是不够的。利用万劫不复

的地獄刑罰作威胁，他們可以合法地勒索到愈来愈多的捐獻。查理大帝早在 811 年的亞琛敕令<sup>328</sup> 里，就已經責備他們這一點，并且責備他們

“引誘人們發偽誓，造假證件，借以增加自己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的〉財富”。

他們還詐取不合法的捐獻，因為他們確信，教會除了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还拥有充分的手段，對司法進行欺騙。在六、七世紀，高盧的宗教會議，對於一切反對捐獻給教會的人，幾乎沒有哪一次會議，不是以逐出教會相威脅的。甚至手續上無效的捐獻，也通過這一途徑而變為有效的。有一些僧侶的私人債務，也能賴掉不還了。

“為了繼續喚起人們捐獻的興趣，我們看到，他們採用多么無恥的手段啊！描繪天堂之樂和地獄之苦已經不再見效的時候，他們就從遙遠的地方搬來聖徒的遺骨，舉行巡迴展覽，建造新的教堂；這在九世紀簡直成為一種正式的營業部門了。”（羅特，第 254 頁）“蘇瓦松的聖梅達爾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羅馬費了極多的周折，乞求到聖塞巴斯提安的遺體，並將格雷哥里的遺體也一同偷走。當這兩具遺體放在修道院裏的時候，跑來瞻仰新到的聖者的人是那麼多，他們就像蝗蟲一樣布滿了那個地區，對於求助者，不是一個一個治療，而是成群結隊一起治療。結果是，修道士們只得用升子來量金錢，這樣的升子就有 85 個，修道院的黃金儲藏量達到 900 磅。”（第 255 頁）

欺騙、魔術、死者，特別是聖者的顯靈，都被教會用作騙取財物的手段。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假造證件。

我們還是讓羅特說話吧：“許多宗教界人士大規模地干這種事……這一種營業老早便已開始了…… 這樣的營業規模到底有多大，可以從我們所搜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數目中看出來。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 360 件墨洛溫王朝文書中，約有 130 件絕對是假的…… 蘭斯的欣克馬爾就利用過萊米鳩斯

的假遺囑為他的教會侵佔了許多財產，而這些在真的遺囑里面根本沒有提到過，雖然真遺囑從未遺失，欣克馬爾又清楚地知道前者是偽造的。”

甚至教皇約翰八世也企圖利用一張明知是偽造的文件霸占巴黎附近聖丹尼修道院的產業（羅特，第 256 頁及以下各頁）。

採用捐獻、勒索、欺騙、詐騙、假造證據以及其他帶有刑事犯罪性質的勾當而巧取豪奪來的教會地產，在短短幾世紀間竟然達到了極其龐大的數目，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現在座落在巴黎境界內的聖熱爾門-德-普雷修道院，在九世紀初共有地產 8 000 芒斯或胡菲<sup>①</sup>，根據蓋拉爾的計算，面積計達 429 987 公頃，每年收益 100 萬法郎 = 80 萬馬克<sup>329</sup>。如果每胡菲面積平均以 54 公頃計算，收益以 125 法郎 = 100 馬克計算，那末，在同一時候，聖丹尼、呂克瑟伊和圖爾的聖馬丁諸修道院，每處有地產 15 000 芒斯，面積 81 萬公頃，收益達 150 萬馬克。而這還是矮子丕平沒收教會土地以後的情形！據羅特（第 249 頁）估計，在七世紀末，高盧教會的全部土地，不是少於而是多於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

這些龐大的地產，一部分是交給教會的不自由的佃農耕種的，可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教會的自由佃農耕種的。在不自由的人中間，奴隸(servi)必須向主人提供的賦役在當初是沒有什麼限制的，因為他們並非有權利的人；但是這裡，對於有固定住所的奴隸，似乎不久也在習慣上定出了賦役的標準。與此相反，其他兩種不自由的階級，隸農和半農奴（他們當時在法權地位上究竟有什麼差別，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他們的賦役倒有明確的規定，內容包含一定數目的人工、畜工，還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這是從很久以

---

① 芒斯或胡菲是中世紀農民的份地。——編者注

前保留下来的依附关系。相反，自由人不在公有地上或者他們的私有地上，而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这对日耳曼人來說，却是一件新事情。不待說，日耳曼人在高卢，或者一般地在实行羅馬法的地区，相当經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羅馬人。但是，他們在占地时所关心的，是他們自己不要变做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种。因而，在自由的法兰克人能够变做任何別人的佃农之前，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把占据土地时所获得的自主地丧失了，一个特殊的无地的自由法兰克人階級一定已經形成了。

这个階級是由于地产开始集中而形成的，也是由于引起地产集中的那些原因而形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內战和沒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时勢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轉让給教会。而教会很快又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来鼓励这样的轉让：它不仅让捐献者在繳納代役租的情况下保留他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这以外还租給他一块教会土地。这种捐献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捐献者在生前保有土地使用权，只在他死后土地才成为教会的財產 (*donatio post obitum*)；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而且以后在国王敕令里也明确規定，捐献者从教会得到比捐献的土地多一倍的納租租种地。另一种情况是捐献立即生效 (*cessio a die praesente*)，捐献人根据教会頒发的文件，即所謂暫時租佃契約，得到教会的多两倍的租地 (不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交給他終身耕种的，但也往往只租給他一个較长或較短的时期。无地的自由人階級一經形成，其中便有許多人也参加到这种关系中去。答应給他們的暫時租佃，大概在开头的时候多数是 5 年，可是不久也都变成終身的了。

沒有疑問，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在世俗豪紳显貴們的土地

上，也发生了跟教会土地完全相同的关系；所以在那里，除了不自由的佃农以外，还移来了繳納代役租的自由佃农。早在查理·馬尔泰尔的时代，这类自由佃农的人数想必已經很多了，不然，查理·馬尔泰尔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所完成的土地关系的改革，至少在一个方面，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这种变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第一、为了把帝国的豪紳显貴同王室密切联系起来，王室土地以后就不再贈送給他們了，而是仅仅作为“采邑”授予他們，終生使用；不过这是带有一定条件的，違反这些条件，就以收回采邑相处罚。这样一来，豪紳显貴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第二、为了确保豪紳显貴的自由佃农服兵役，把区的伯爵对移居在他們領地上的自由人的管轄职权部分地轉交給他們，任命他們当这些自由人的“領主”。这两种变革，我們暫時只来考察前一种。

在征服了謀叛的小“暴君”以后，查理便按照旧日的慣例，沒收他們的地产(关于这一点缺乏材料)；但是，当他以后恢复了他們的职位和官爵的时候，便把这些地产的全部或一部，作为采邑重新授予他們。对于倔强的主教們的教会土地，他还不敢冒险这样做；他撤換他們，將他們的职位賜予对他恭順的人；在这些人中，不消說，有許多人除去行过剃发式(*sola tonsura clericus*)以外，是毫无僧侶資格的。这些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現在开始遵照他的命令，將大块的教会土地，暫時出租給俗人。这在过去不是沒有先例的，不过現在是大規模地进行罢了。他的儿子丕平做得彻底得多了。教会沒落了，僧侶受人藐視了，教皇受到倫巴德人的压迫，除了依靠丕平的援助外，再沒有其他的办法了。丕平帮助教皇，协助他扩大教会的統治，給予他种种支持。可是，他取得了报酬，他把絕大



部分的教会土地都合并于王室土地，只給主教和修道院留下为維持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教产还俗，教会是无抵抗地忍受了。勒斯廷的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了这件事，虽然附有保留条件，可是从未执行。这些极其庞大的地产，使得已经涸竭的王室土地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大部用于以后的封賜，而这些封賜事实上不久都采取了一般的采邑形式。

在这里，我們必須指出，教会很快便从这种打击之下恢复起来了。这些上帝的勇士們一清算了不平，便馬上重新开始旧日的那一套办法。捐献又从各个方面源源而来。自由的小农們还处在二百年以来的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們統治下，他們的境况变得更坏了，許多农民都带着自己的房屋土地，投靠主教的曲柄圭杖的庇护。国王們把一部分贓物退还給一些受到特別优待的修道院，把大量王室土地送給另外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日耳曼尼亚的修道院。在虔誠者路易的統治下，教会的貢特朗幸运时代似乎又重新降临了。在修道院的档案里，关于九世紀的捐献的材料，是特別丰富的。

采邑，也就是我們現在打算比較詳細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不就是以后的封地，但已經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生存時間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須重新履行一次授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續。可見，按照以后的說法，采邑在封主死亡时，要归还封主 [Thronfall]，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 [Heimfall]。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大的受采邑者甚至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往往早已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了。在奥頓附近的一个帕

特里西阿克庄园（佩西），由查理·馬尔泰尔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傳，經過四代，直到839年，国王方才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賜給第四代受采邑者的一个弟兄。像这样的例子，在八世紀中叶以后并不少。

在凡是牵涉到沒收财产的場合，封主都可以收回这些采邑。这样的事件，在卡罗林王朝之下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例如，在矮子丕平时的阿勒曼尼亚的暴动，紹林吉亚人的謀叛，薩克森人多次的起义，都不断引起沒收；有的是沒收自由农民的土地，有的是沒收豪紳显貴的庄园和采邑。在虔誠者路易和他的几个儿子統治之下，虽然契約上有相反的規定，但在內战中間，这样的事情仍然不断地发生。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犯罪，也会招致财产的沒收。

除此以外，倘使受采邑者玩忽了他应尽的一般臣民职责，王室也可以收回采邑；例如，濫用豁免权，不交出盜匪，不帶自己的甲冑上陣，不尊重国王的敕諭等等。其次，采邑的授予是附有特殊条件的，倘使違犯这些条件，采邑就可收回；当然，这并不牵涉受采邑者的其他的财产。例如，在旧有的教会土地授出后，受采邑者未向教会繳納应付的租稅（*nonae et decimae* [九一稅和什一稅]①）时，或者是使土地荒蕪了，就要收回采邑；在后一种場合，通常先要給予一年的警告期，以便受采邑者在这个期間可以改进經營，避免沒收的危險，等等。此外，地产的授予，可以附帶一定的服役，而且事实上，当采邑愈益发展为真正的封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就愈多了。不过，这在开头的时候，完全不是必要的；至少，就服兵役說是这样的。有許多采邑，是授予低級僧侶、修道士、教会的或世俗的

---

① 即收获物和其他收入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編者注

妇女的。

最后，也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国王起初授予土地也保留了收回的权利，或者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即作为暂时租佃。从个别的材料和教会的做法看来，这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不久就停止了，因为采邑的授予，在九世纪已经普遍通行。

如上所述，教会过去多半是把土地作为暂时租佃的土地，在一定期间，交给它们的自由佃农耕种，现在得仿照王室的榜样了（我们应该假定，大土地占有主和受采邑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不但也开始采用采邑，而且这种方式竟然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使原有的暂时租佃也变成了终身租佃，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采邑的性质，到了九世纪，暂时租佃差不多全部都已变为采邑了。在九世纪后半期，教会的受采邑者以及世俗豪绅显贵的受采邑者，一定在国家中早已占到重要的地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定成为占有庞大地产的人物，并且成为以后的下层贵族的始祖。否则，有些人的采邑被郎城的欣克马尔无理地夺回的时候，秃头查理也许就不会这样热心地关怀这些人了。

我们看到，采邑已经具有在发展起来的封地里面可以重新看见的许多特征。封主死亡，归还封主；受封者死亡，也归还封主，这对采邑和封地都是一样的。和封地一样，采邑也是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收回的。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以后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内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如果说，以后的封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职田，而且对封地主负有服兵役的义务，那末，

后一种情形在采邑上还未发生，前一种情形也根本不是非有不可的。可是，采邑轉为职田的倾向已經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并且在九世紀，它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了。这种倾向愈发自由地发展，采邑也就愈益发展为封地了。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区制度和軍事制度起初在大地产的影响下、以后在大采邑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而以前的大地产，由于不断的內战和与之相連而来的地产的充公和再度的授予，愈来愈轉化为采邑了。

显然，这一章里談的，只是純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不过是一种暫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現的形态。可是，只有拿这种純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經濟关系的历史表現形态，而罗特的主要功績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屬物中拣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 · 区制度和軍事制度

上面叙述过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旧有的国家制度。它使国家制度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过来影响土地占有关系。我們暫且不談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而在这里先考察一下，新的經濟状况对于旧的人民制度在区和軍事这两方面还保存着的残余发生了什么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我們已經看到，伯爵、公爵們往往充任王室土地的管理人。不过，只是到了九世紀，我們才确凿地看到，某些王室土地同伯爵官职有了这样的联系：在任的伯爵領取这些土地的收入了。从前的名誉官职，現在成了一种由可靠的收入中支

付俸祿的官职了。此外，我們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另一种现象，即伯爵們占有了授予他們个人的王室采邑。这样，伯爵在他的伯爵領地內，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

首先，很明显，伯爵的权威一定受到了在他下面、与他并存的大土地占有主的損害；这些人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在卡罗林王朝初期，对国王的敕諭都常常加以嘲笑，对于伯爵的号令，一定会更加不尊重。他們的自由佃农，仗着有势力的地主的庇护，往往同样忽视伯爵傳喚他們出庭或征召入伍的命令。这正是以授予采邑代替授予自主地的一个原因，也是旧日自由的大地产后来多半逐漸轉变为采邑的一个原因。

单单这样，还不能保证吸引豪紳显貴土地上的自由人履行对于国家的义务。必須紧接着作进一步的变动。在国王看来，必須让大土地占有主們，对于他們的自由佃农在出席法庭、应征入伍以及执行其他傳統的对国家的义务方面，負起責任，正如过去伯爵对其領地內的一切自由居民所負擔的責任一样。而这只有当国王把伯爵对于他們的佃农的一部分权力轉让給豪紳显貴时，方才能够做到。地主或受采邑者，必須把他自己的人提到法庭；就是說，他們必須經過他而被傳喚到案。他必須使他們应征入伍；也就是說，必須要經過他来征集他們；为了能够經常負起對他們的責任，他必須具有領導他們并維持軍事紀律的权力。但是，这以前是，当时还依然是佃农对于国王的服务；处罰抗命者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国王的伯爵；罰款也应归入王室的国庫。

这种改革也要追溯到查理·馬尔泰尔。至少是从他那时起，我們才看到教会显貴亲身上陣的习尚；而这一习尚，按照罗特的看法，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說明，即查理命令主教們帶領他們的佃农

出征,是为了保证后者能够上陣。毫无疑问,世俗的豪紳显貴及其佃农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查理大帝統治之下,这种新制度已經穩固地确立起来,而且已經普遍推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自由佃农的政治地位,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他們过去不管在經濟上怎样厉害地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是同他們的地主平等的,現在他們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屬了。經濟上的屈从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地主成为領主、老爷,佃农成为他的 *homines* [人];“主人”成了“人”的长官。自由人法权上的平等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最下层的“人”的充分的自由,由于世襲地产的丧失早已受到了极大損害,現在他們同不自由人又接近了一步。同时,新的“主人”超出旧日的一般自由的水平也就更多了。新貴族在經濟上已經打下的基础,为国家所承认,成为国家机器中經常起作用的一种飞輪。

除了由自由佃农构成的这种 «*homines*» 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这就是自願跟豪紳显貴們发生服役关系或侍从关系的貧穷的自由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們,都有他們的侍从人員,即所謂随从。当时的豪紳显貴們,也不会沒有侍从人員的。在卡罗林王朝,国王的这些侍从們叫做 «*vassi*»、«*vasalli*» 或者 «*gasindi*»;这些称呼,在古代“民族法”中还是使用于不自由人的,可是現在通例却含有自由的侍从的意义了。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豪紳显貴們的侍从,这样的人,現在已經到处出現,而且在社会和国家中,成为一种人数日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

豪紳显貴是怎样获得这些侍从的,这可以从当日的契約程式中看出来。例如,在一張这样的契約程式(西尔蒙契約程式集第43号)中說:

“众所周知，我无衣无食，所以请求您（主人）开恩，我希望受您的庇护（*mundeburdum*——等于监护）并投靠于您，条件如下：您按照我为您服务的情况和应得的报酬负责供给我衣食；而我只要还活着，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ingenuili ordine*）的样子，听候您的使唤；并且，我终生都不脱离您的权力和保护，一辈子留在您的权力和保护之下。”<sup>330</sup>

这一契约程式充分说明了单纯的、丝毫没有掺杂外来成分的侍从关系如何产生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尤其是说明了一个完全破产的穷人贫困到了极点的情况。给领主当侍从的关系的产生，乃是出于双方自由的协议——所谓自由，乃是罗马的和现代的法学上的自由——它往往跟现代工人为工厂主服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投靠主人，主人接受他的投靠。投靠的仪式用握手和宣誓效忠表示出来。协议是终身的，只有在缔约双方有一方死亡的时候，方能解除。僕从必须负责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任何一种与一个自由人地位不相违背的劳役。为此，主人必须维持他的生活，并酌情给予报酬。土地的转让并不一定要与此相联系，而且事实上也决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有这种联系。

这种关系，在卡罗林王朝，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不但被容忍了，而且受到了直接的鼓励；最后，大概是在 847 年的一道敕令里，把这一点规定为一切普通的自由人的义务，而且由国家监督施行。这样一来，僕从对于主人的这种关系，只有在主人企图杀死他、用棍子打他、强奸他的妻女、或者夺取他的世袭地产的时候，僕从才能单方面地解除（813 年的敕令）。只要僕从从主人那里接受 1 索里达金币的东西，他便被束缚于主人了；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臣僕关系并不一定是跟土地的授予相联系的。这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 816 年的一道敕令里面，不过附加了一条

規定，即当主人企图以非法的方法使僕从陷入不自由地位，或者能够履行答应給僕从的保护而不履行的时候，僕从可以解除这种关系。

在国家面前，現在封君[Gefolgsherr]对他的侍从取得了跟地主或受采邑者对其佃农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他們对于国王依然負有服役的义务；只不过在这里，在国王同其伯爵之間，插进了封君。他叫他的臣僕出席法庭，他征集他們，帶領他們参战，在他們中間維持軍律；他为他們負責，并按照規定标准武装他們。因此，封君对于他的臣屬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处罰权，这就形成了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領主对其臣僕的审判权的起点。

在这两种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中，在臣僕制的形成中，在伯爵(也就是国家)对臣屬，即对佃农和无地侍从(他后来不久称之为«Vassi», «Vasalli», «Homines»)的行政权力轉交給地主、王室領地管理人、受采邑者和封君的这件事中，在国家这样确认并加强主人对臣僕的实际权力的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采邑中业已产生的封地的萌芽，已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国王起，經過大的受采邑者到他們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不自由人，这一种身分等級制度，已成为国家組織中被确认的、在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要素了。国家承认，沒有它的帮助，就不能存在下去。这里当然要說明，事实上是怎样进行这种帮助的。

侍从和佃农的区别，只是在开头为了证明自由人依附关系的双重起源，才有重要的意义。不久，这两种臣僕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区分地合而为一了。大的受采邑者日益接受投靠国王的习尚，即不但成为国王的受采邑者，而且成为国王的臣僕。国王认为叫豪紳显貴、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臣僕亲自对



他举行效忠宣誓，对于他是有利的（“貝坦年鉴”<sup>331</sup>，837年，九世紀較多）。在这里，一般的臣民宣誓与特殊的臣僕宣誓之間的差別，不久也就消失了。于是，所有的豪紳显貴都逐渐变为国王的臣僕了。但是，大土地占有主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級，成为貴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包括于国家組織之中，成为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一种杠杆了。

各个大土地占有主的侍从，也同样地慢慢变为佃农了。除了在老爷的庄园里直接供給膳食（而这也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以外，想要保证侍从們的生活，只能將他們安置在土地上，將土地作为采邑，分給他們，別无其他办法。維持大量具有战斗力的侍从，这在战争連綿不断的时代是豪紳显貴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这些侍从只有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老爷的庄园內的无地僕从由于大批人居住在老爷的土地上而逐渐消失了。

但是，这种新因素愈渗入旧制度，旧制度的基础愈动搖。以前由国王和伯爵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日益让位于一种間接的方法；在普通的自由人和国家之間，出現了領主，自由人通过尽忠的宣誓在人身上愈来愈受領主的束縛。国家机器中最有力的发动机——伯爵，不得不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查理大帝在这里的做法，也和他在其他方面例行的做法一样。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在开头的时候，极力鼓励臣僕关系的擴張，直至独立的小自由人几乎完全消灭为止；但当他看到因此而削弱了他的权力时，他便企图通过国家的干涉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在一个如此有魄力、如此威严的統治者之下，在許多場合，是可能成功的，可是到了他的軟弱无力的后继者統治的时候，在他帮助下造成的事实，以不可阻擋之势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查理所喜爱的方法是派出王室特命全权大臣 (*missi domini*)。有的地方,普通的王室官吏——伯爵——无法控制愈来愈混乱的局面,特使就应当去加以控制(这要从历史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伯爵的地位,使他在行使权力的物质手段方面至少能与其伯爵领地内的豪绅显贵相等。这只有使伯爵同样加入大土地占有主的行列,才能做到,而这又需要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将各个区的若干土地,作为赠予地拨给伯爵官职,由在任的伯爵作为公务来管理这些土地,并取得土地的收入。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档案文件中是非常之多的,并且从八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自九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很普遍了。这样的赠予地,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取之于王室国有土地;正如我们在墨洛温时期所早已看到的情形那样,伯爵和公爵往往成为他们辖境内王室国有土地的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还有这样的契约程式):主教们也把教堂土地捐赠给伯爵官职,自然仍旧保留教堂土地的不可转让权,而采取某种采邑的形式。教会的慷慨是十分出名的,所以在这里,除了由于严重困难是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明的,在邻近的世俗豪绅显贵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教会也只有跟国家权力的残余结为同盟了。

这种同伯爵官职连在一起的附属物 (*res comitatus, pertinentiae comitatus* [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是同授予在任伯爵个人的采邑严格地划分开的。采邑的授予,通常也是很多的;所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官职的伯爵官职,现在却成为收入非常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赠

予地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贈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爭取或者想靠他們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所以，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記載，«quos potuit conciliavit sibi, dans eis abbatias et comitatus ac villas»〔“凡是能够爭取到的人，他都授予他們修道院、伯爵領地和庄园，把他們爭取过来”〕（“貝坦年鑑”，877年）。«honor»〔“榮譽”〕这个名詞，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譽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說的，到了九世紀却具有同采邑一詞完全相同的意义了。于是，像罗特所正确地強調指出的那样（第408頁），伯爵官职的性质，必然也要跟着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了。領主制就其获得公共性质这一点而言，起初是仿照伯爵的官职，被賦予了伯爵的权柄。現在——在九世紀后半期——領主制已經到处盛行，以致伯爵的官职有被压倒的危險，它本身只有日益接受領主制的性质，才能保持它的权力地位。伯爵愈来愈多地、并非沒有成效地篡夺了領主对其所轄区內的居民（pagenses）的地位，而且侵入了他們的私人关系和公务关系。正如其他的“主人們”对待他們邻近的小百姓那样，伯爵也对区内的一些貧困的自由居民威胁利誘，使他們依附于他，充当他的臣僕。伯爵能够如此濫用他的职权这一簡單的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当时殘余下来的普通的自由人要想从王权及其机构那里期待保护，是怎样地不可能，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受尽了各方面的暴力欺凌的这些小自由人，倘使能够找到一个保护人，纵使交出他們的自主地，然后再单单作为采邑收回来，那已經是很幸运了。早在811年的敕令里，查理大帝已經埋怨說，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百戶长，不断地施展司法上的詭計或頻繁地征募兵役，使小百姓們遭到破产，只好把自己的自主地奉送或出賣給他們，穷人們只得为自己的財產被掠夺

而高声喊冤了，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九世紀末的高卢，大部分的自由财产已經轉入教堂、伯爵以及其他豪紳显貴的手中（兰斯的欣克馬尔，869年）。稍后，在若干省份，小自由人的自由地产，甚至完全消灭了（毛勒“概論”第212頁）。随着受采邑者权力的扩大和王权的衰落，采邑逐渐变为世襲，伯爵官职不久也按照习惯变为世襲的了。如果說，在大量的王室的受采邑者之中，我們看到了后来的豪族的萌芽，那末，在这里，我們就看到了从区的伯爵中产生出来的邦君的領土主权的胚胎。

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經这样完全改变以后，以一切自由人服兵役——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为基础的旧軍事制度，在外表上还是照旧不变；只不过在有新的依附关系出現的地方，領主插在他的臣僕和伯爵的中間。可是，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无力負起兵役的重担了。所謂兵役不单包括个人的服役；被征集的人还要負責自己的装备，而且在头半年里伙食也要自备；最后，查理大帝时代連綿不断的战争，使事情超过了极限。負担重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这种負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願将他們剩余的田产，甚至他們自身及其后代，都轉让給豪紳显貴，尤其是轉让給教会。查理把那些自由的尙武的法兰克人弄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們宁願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就行了。在大量的自由人已經全部或大部丧失了他們的地产以后，查理还要坚持实行建立在一切自由人的土地共同和平均占有上面的軍事制度，而且推行到极端的地步，由此产生的結果就是如此。

然而事实强于查理的执拗和野心。旧的軍事制度是无法再維持下去了。以国家經費装备和供养軍隊，在那个几乎沒有貨幣和

商业的自然经济时代，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查理不得不对兵役义务加以限制，以便能够保证兵员的装备和给养。这是在 807 年的亚琛敕令中提出的，当时战争还是限于国境上的战斗，帝国的处境整个来说大致还是安全的。首先，每个王室的受采邑者都要毫无例外地应征；其次，占有 12 胡菲 (mansus [芒斯]) 的人，必须以甲冑武装起来，因而也要骑马出征 («caballarius» [“骑士”])，这个词出现在这同一个敕令里)。占有 3 至 5 胡菲的人，都有出征的义务。每两个占有 2 胡菲的人，每 3 个占有 1 胡菲的人，每 6 个占有半胡菲的人，每次需出兵一人，由其余的人负责装备。完全没有土地但占有价值 5 索里达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 6 人出兵一人，其他 5 人每人出 1 索里达，以资助他。征发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必须全部出征，如战地相离较远，则根据距离远近，将人员数目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查理在这里的用意，显然是想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适应有服兵役义务的人的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生活状况，想救出还能救出的东西。然而，这种让步也无济于事；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在“关于扩军的敕令”里，再度减免兵役的负担。一般认为，这一敕令早于亚琛敕令，但照它的全部内容看，毫无疑问，要晚于亚琛敕令许多年。它把每出兵一人所需的胡菲数，由 3 胡菲提高到 4 胡菲；占有半胡菲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是豁免了兵役，而受采邑者的兵役义务也限制到每 4 胡菲出兵一人。在查理的后继者的统治之下，似乎每出兵一人所需胡菲的最低限度，甚至提高到 5 胡菲。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必须身披甲冑入伍的拥有 12 胡菲的人入伍，像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少是，身披甲冑出阵的命令在敕令里重复了无数次。

于是，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灭了。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早已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僕，由于害怕兵役造成直接的破产，另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当了农奴。这种陷于受奴役境地 [Ergebung in die Knechtschaft] 的过程发展十分迅速，这从当时还位于巴黎郊外的圣热尔門-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記册中可以看出。这本地产登記册是由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在九世紀初編制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修道院的农民中间，有 2 080 戶是隶农，35 戶是半农奴，220 戶是奴隶 (servi)，只有 8 戶是自由人。可是，隶农这个词，当时在高卢，断然是不自由人。一个女自由人同隶农或奴隶通婚，被认为是褻瀆神明 (deturpatam)，她必須受主人的支配 (817 年的敕令)。虔誠者路易下令，要 (普瓦提埃的一个修道院的) «colonus vel servus ad naturale servitium velit nolit redeat» [“隶农或奴隶，不管他願意与否，应当回到他的天然的依附地位”]。他们往往受体罰 (853 年、861 年、864 年、873 年的敕令)，有时获得自由 (見盖拉尔“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記册”)。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按照研究过这些姓名的雅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 (“德意志語言史”第 1 卷)，他们的姓名“几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曼人”。

不自由的人口如此大量的增加，又打乱了法兰克社会的阶级关系。除了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一个特殊等級的大土地占有主們以外，除了他們的自由臣僕以外，現在又出現了一个不自由人的阶级，这个阶级把殘余的普通的自由人日益吸收进去。这些不自由的人，有一部分曾經是自由人，另一部分則是自由人的子女；从三代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起就祖祖輩輩受奴役 [erblicher Knecht-

schaft] 的，占极少数。他们大多数人还并不是从外面偷运来的萨克森人的、温德人等的战俘；相反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和罗曼人。对付这样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已开始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不像对付世袭的或者外来的农奴那样容易了。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受奴役的地位 [Knechtschaft]；连隶农也不免要受到的体罚(853年、861年、873年的敕令)，他们仍然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不自由的人、甚至农民臣僕就发生了多次的叛乱和暴动。查理大帝曾经亲自以极端残暴的方法镇压过兰斯主教管区佃农的一次暴动。虔诚者路易曾在821年的敕令里，说到弗兰德及梅纳比地区（在利斯河上游）奴隶(servorum)的叛乱。848年和866年，曾经对美因兹主教管区的僕从(homines)的暴动进行了镇压。镇压这类叛乱的命令，在779年以后的敕令里一再地重复着。在萨克森的“斯特林加”暴动<sup>332</sup>，一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以后，不自由人的赋役，甚至包括定住的奴隶们的赋役在内，都渐渐地规定出一定的、不许超过的限度。查理大帝在他的敕令里，对此曾作明文的規定。这显然是不自由的大众的这种带威胁性的行动的结果。

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僕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一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 注釋：法兰克方言<sup>333</sup>

对于这种方言，語言学家們开了一个出奇的玩笑。格林认为它已經溶化在法兰西語和高地德意志語中，但新近的研究者們則认为自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起，至翁施特魯特河、薩利河、雷察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經過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兰克方言流行的範圍。甚至像摩里茨·海奈那样的語文学家，竟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篇古福音詩<sup>334</sup> 手稿，編造出一种古代下法兰克語言，而这几乎是一种略带法兰克語色彩的純粹的古代薩克森語，——而布劳涅則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归薩克森語，一部划归尼德兰語<sup>335</sup>。最后，阿尔諾德是把里普利安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摩塞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領，以后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領的，因此，他們說的話也是阿勒曼尼—卡滕語。

首先，讓我們恢复法兰克語言区的实际界限。紹林吉亚、黑森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卡罗林王朝时代曾在《Francia》的名称下并入这个地区，此外就沒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薩尔特、福格耳貝克林山和卡累尔-阿斯坦山以东諸地所說的語言，絕對不是法兰克語。黑森和紹林吉亚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們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紹林吉亚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它的独特的方言。

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語的輔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



作为主要区别标准，才能将这三个語言分支算做法兰克語。但是，我們將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語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們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摩里茨·海奈<sup>①</sup>的所謂古代下法兰克語作一个正确的說明。写于韦尔登而目前存放在牛津的所謂古福音詩的柯頓手稿，根据海奈的意見，应当是古代下法兰克語，因为这个手稿是在韦尔登的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薩克森边境极近。旧的部落边界，今日还是貝尔格区同馬尔克区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間的修道院中，韦尔登的修道院屬於法兰克尼亚，埃森的修道院屬於薩克森。韦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薩克森的村庄紧紧相連；在魯尔河同利珀河之間的平原上，薩克森語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到萊茵河一带。有一部薩克森語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法兰克語的字形——这种情形还远不足以說明抄本上的語言就是法兰克語。除了柯頓的这个古福音詩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簡殘篇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的一首赞美詩譯文的殘稿，他以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語写的；但凱倫（“‘薩利克法’注解”）<sup>336</sup>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譯文是尼德兰語。事实上，这篇譯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語形，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真正的萊茵—法兰克語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語輔音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語和萊茵—法兰克語之間的边

---

① 摩里茨·海奈“古代薩克森語及古代下法兰克語簡明語法”1873年帕德波恩版（《Kleine altsächsische und altniederfränkische Grammatik von Moritz Heyne》. Paderborn, 1873）。

境上，大約是在亞琛和馬斯特里赫特之間的地方譯出的。譯文的語言要比那兩個古福音詩抄本的語言年輕得多。

但是，單單根據柯頓的古福音詩抄本，根據抄本中出現的少量法蘭克語形，就足以肯定法蘭克語和薩克森語的若干基本差別。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現在時直陳式復數的三種人稱的結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樣是以一個前面帶有元音的齒音字母為結尾；古代薩克森語結尾為 *d*，盎格魯撒克遜語為 *dh*，古代弗里西安語為 *th*（這大概也可以代替 *dh*）。例如，在古代薩克森語中，*hebbiad* 的意思是 *wir haben, ihr habt, sie haben*，同樣地，*fallan, garwinnan* 的所有三種人稱，都同樣是 *fallad, winnad*。在這裡，第三人稱使所有三種人稱都從屬於它自己，但應當注意的是，印格伏南語所特有的那種在 *d* 或 *dh* 之前省略了 *n* 的現象，也是所有上述這三種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現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里亞語還保留這種特殊性；在那裡，今天仍然說 *wi, ji, se hebbed* 等等。其他的薩克森方言同西弗里西安方言一樣，已經沒有這種特殊性了；它們的三種人稱是有區別的<sup>①</sup>。

西萊茵的贊美詩，同中部高地德意志語一樣，復數第一人稱結尾為 *m*，第二人稱為 *t*，第三人稱為 *nt*。相反地，柯頓的古福音詩抄本，除了薩克森語形以外，還曾好幾次出現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形式，例如：*tholônd—sie dulden* [他們容忍]，*gornônd—ihr klagt* [你們訴苦]，以及命令式 *mârient—verkündigt* [宣告]，*seggient—sagt* [講]。而這在薩克森語里，則要求 *tholôd, gornôt, mâriad, seggiad*。這些形式，不單是法蘭克的語形，它們甚至直到今日仍然

① 恩格斯在手稿中用鉛筆添了這幾個字：“和第三人稱同第二人稱的區別。” 337

——編者注

是真正的韦尔登方言，貝尔格的地区方言。在貝尔格語里，現在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薩克森語那样以 *d* 結尾，而是像法兰克語那样以 *nt* 結尾。同馬尔克語的 *wi hebbed* 相反，在这里，在边界綫上，却說 *wi hant*，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 *seggient* 相同，这里說 *seient ens—sagt einmal* [讲一讲]。在这里，在貝尔格語里，所有的三种人称的語形完全相同；布劳涅等人根据这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部的貝尔格山区都屬於薩克森語的範圍。这种規則，誠然是从薩克森傳到这里来的，但遺憾的是，它是由法兰克語輸出的，因此，他們所证明的，恰恰是他們应当证明的反面。

在齿音之前省去 *n*，这在印格伏南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場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語中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薩克森語和盎格魯撒克逊語中則流行頗广。例如：*mudh—Mund*, *kudh—Kund*, *us—uns*, *odhar—ein anderer*。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古福音詩的时候，曾有两处把 *odhar* 写成法兰克語形 *andar*。在韦尔登的賦稅登記册上，法兰克語形的姓名 *Reinswind*, *Meginswind* 同薩克森語形的姓名 *Reinswid*, *Meginswid*，彼此交錯着。相反地，在萊茵河左岸的贊美詩中，到处都写的是 *munt*, *kunt*, *uns*，只有在所謂利普西烏斯<sup>338</sup>的注解(摘自这首贊美詩的一种已經失落的手抄本)中，有一处用 *farkutha abominabiles* [可恨的] 代替 *farkuntha*。同样地，在古代薩利克人的文物上，姓名中的 *n* 也到处保存着，例如 *Gund*, *Segenand*, *Chlodosindis*, *Ansbertus* 等等；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在現代的法兰克方言中，*n* 到处都有(貝尔格語中唯一的例外是語形 *os—uns*)。

二、一般用来构成所謂古代薩克森語語法的語言文物，全部

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里亚、閔斯德、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物上的語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語形有某些重大差別，而且同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薩克森語形而保持在恩格倫和奧斯特法利亚的专有名詞中的語形也有某些重大差別。相反地，它同法兰克語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語，却相似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种方言語法的新近研究者科瑟伊恩称它为古代西薩克森語<sup>339</sup>。

因为我們在这种研究中所依据的，差不多只限于拉丁文文献中的专有名詞，所以，西薩克森語和东薩克森語之間的可证实的語形差別，为数并不很多。这种語形差別只限于两种場合，但是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1) 在盎格魯撒克逊語和古代弗里西安語里面，第二格复数的一切变化，都以 *a* 为詞尾。相反地，在古代西薩克森語、古代法兰克語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語中，則都以 *ð* 为詞尾。但是，真正的古代薩克森語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种方言是否在这里真正地背离了印格伏南語的規則呢？

恩格倫和奧斯特法利亚的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 *Stedieraburg*, *Horsadal*, *Winethahûsen*, *Edingahûsun*, *Magathaburg* 和其他許多名称里面，复合詞之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 *a* 为詞尾。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a* 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記册<sup>340</sup>中，就有 *Aningera lô* 和 *Wernerâ-Holthûson* 字样，而 *Osnabrück* 一詞中的 *a*，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2) 法兰克語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語一样，都是以 *o* 結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語以 *a* 結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薩克森語，照例也同样是以 *o* 結尾；可見，也是跟印格伏南語的習慣不同的。但古代薩克森語，却絕不是全部如此。甚至在威斯特伐里

亚, *o* 也并不是沒有例外; 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記册上, 除了 *o* 之外, 还有一系列以 *a* 为詞尾的名字 (*Siboda, Uffa, Asica, Hassa, Wenda* 等等); 在維干德<sup>341</sup> 掌握的帕德波恩的文物中, 几乎都是 *a*, 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有 *o*; 在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里面, *a* 差不多处于独占的地位; 因此, 雅·格林(“德意志語言史”)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結論: 不能不承认, *a* 和 *an* (間接格中的) 是通行于民族各部分之間的原始的薩克森語形。 *a* 之被 *o* 排斥, 也不单限于威斯特伐里亚。十五世紀初叶, 編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安語的阳性名詞, 几乎总是以 *o* 为詞尾: 例如 *Fokko, Occo, Enno, Smelo* 等等, 而不是西弗里西安方言里个别場合依然保留着的早先的 *a*。

由此可以肯定, 西薩克森語同印格伏南語語法規則上的上述两种差別, 并不是薩克森語起初就有, 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影响, 可以很簡單地由这样的事实來說明, 即西薩克森以前本是法兰克的領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要部分退出以后, 薩克森人才越过奥斯宁格山脉和埃格山脉, 逐步地推进到直到今日还仍然是把馬尔克和藻厄兰山同貝尔格和济克兰德划分开来的那条边界綫。落在后面的現在已經跟薩克森人混合起来的法兰克人, 他們的影响就表現在 *a* 被那两个 *o* 所代替; 就是在今天的方言里, 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萊茵—法兰克語言有一种特点流行于魯尔河到摩塞尔河这一帶, 那就是動詞第一人称現在时直陈式的詞尾为 *n*; 在后面是一个元音的情况下, 这一点保持得最好<sup>①</sup>。例如, (在貝尔格語里)

---

① 恩格斯用鉛筆在頁边上写着: 奥特弗里德<sup>342</sup>。——編者注

*dat don ek—das tue ich, ek han—ich habe*。这种动词形式 (*don, han*)，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塞尔河流域，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这种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已经可以看到了，例如 *bidon—ich bitte* [我恳求]，*wirthon—ich werde* [我成为]，虽然并不彻底。在萨利克方言里，没有这个 *n*；在那里，在最古的文献<sup>343</sup>里，已经可以看到 *ec forsacho* [我放棄]，*gelôbo* [我允諾]。尼德兰語也没有这个 *n*。古代西萨克森語，不同于法兰克語的只有一点，即这个 *n* 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即所谓第二弱变化)上面；例如，*skawôn—ich schaue* [我看]，*thionôn—ich diene* [我服务] 等等。在盎格魯撒克逊語和古代弗里西安語里，这个 *n* 是完全不存在的。我們因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即这个 *n* 也是法兰克語在古代西萨克森方言上面留下的遗迹。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方面保留下来的許多专有名詞以及字迹往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注解之外，关于萨利克方言簡直得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但是，凱倫(“‘萨利克法’注解”)已经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确定了在許多场合是正确的、在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而且证明，用以书写这一法典的語言是中尼德兰語和新尼德兰語的直接祖先。不过，这样恢复原状的材料，当然不能直接应用在語法上的。此外，我們还只有一張附录于743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簡短宣誓书式；这大概是在勒斯廷的宗教會議上，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我們一开头就碰见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詞：*ec forsacho—ich entsage* [我放棄]。在法兰克人中間說 *ec* 而不說 *ich*，即在今日，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利尔和卢森堡說 *eich*，在科倫和亚琛說 *ech*，貝尔格一带說 *êk*。虽然书写的尼德兰語有 *ik*，但在民間口語里，尤其在弗兰德，人們

却經常可以聽到 *ek*。在古代的薩利克人名里，例如，*Segenandus*，*Segemundus*，*Segefredus*，一律是以 *e* 代 *i*。

在 *forsacho* 這個詞里面，*ch* 代替了兩個元音之間的 *g*；這也出現在文物上面和其他場合（例如，*rachineburgius*），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從普法爾茨到北海之間所有法蘭克方言的特點。關於法蘭克方言的這兩個基本特徵——即常常以 *e* 代替 *i* 和以 *ch* 代替元音之間的 *g*——我們在分別研究各種方言時，再來分析。

作為以上研究的結果，（人們還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語言史”第一卷末尾對於古代法蘭克語所說的話和以上的研究結果作比較）我們打算提出這樣一個現在未必還會有什麼爭議的論點：法蘭克語早在六世紀和七世紀已經是一種獨立的方言，它是高地德意志語（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語）同印格伏南語（即首先是薩克森語和弗里西安語）之間的一個過渡環節，當時還完全處於哥特—低地德意志語的輔音音變階段。要是這一論點可以成立，那就必須承認，法蘭克人並非由於外部環境而結合起來的不同部落的混合物，而是一個獨立的日耳曼基本部落，乃是易斯卡伏南人，他們雖然在不同的時代吸收了外來的分子，可是具有同化他們的力量。同樣，我們還可以認為以下這點已經證實：法蘭克部落的兩個主要支派，每一個支派早就有了他們自己特有的方言，法蘭克方言已分化為薩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而且區別這些古代方言的許多特點在今天的民間口語中還繼續存在。

---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這些現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

一、薩利克語還繼續生存於兩種尼德蘭方言，即佛來米語和荷蘭語之中，而保持得最純粹的，是在從六世紀起即已成為法蘭克

領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現在已經不再有任何疑問了。自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紀发生的大海嘯，差不多毁灭了整个西兰省，形成了須德海海灣、多拉尔特灣和亚德灣，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間的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古代弗里西安殘存的自由，在附近的封建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烏有了，弗里西安語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灭了。弗里西安語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語，在东部和北部被薩克森語和丹麦語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語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古代弗里西安的西兰省和荷兰，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成了尼德兰人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們在这以前早已成为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标准新尼德兰語，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語的因素、单詞和字形，而这是应该跟法兰克語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薩克森語言又从东面侵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領土和法兰克領土。如果想要划出准确的界綫，那就要作詳細的研究；但是，純粹的薩利克語，只限于比利时說佛来米語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烏得勒支、赫耳德兰和欧佛賴塞耳，但要除去东面的薩克森語地带。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語区和萊茵河以北的薩克森語区之間，薩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綫，在这里还要詳細地确定，关于这点，我們到下面再說。現在，我們首先研究尼德兰語的語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語那样，*i* 为 *e* 所代替，例如，*brenge*—*bringen*，*Kreb*—*Krippe*，*hemel*—*Himmel*，*geweten*—*Gewissen*，*ben*—*bin*，*stem*—*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語里出現得更頻繁：*gewes*—*gewiss*，*es*—*ist*，*selber*—*Silber*，*blent*—



blind。而这在新尼德兰語則为 *gewis, is, zilver, blind*。同样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 *Destelbergen* 和 *Desteld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 *Distel* 叫做 *Destel*。在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語，和里普利安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語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語，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語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輔音的 *m* 或 *n* 之前，以 *o* 代替 *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語和里普利安語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語中，有 *konst, gonst, kond*，同时也有 *kunst, gunst, 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mond—Mund, hond—Hund, jong—jung, ons—uns*。

跟里普利安語不同，长音 *i* (*ij*) 在发音上变作 *ei*，这在中尼德兰語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 *ei* 在发音上不是像在地德意志語里那样 *ei=ai*，而是实际上像 *e+i*，虽然也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 *ej* 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 *ij*，而是 *ei* 的二合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語的 *au* 的，是 *ou, ouw*。

元音交替从語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詞根元音。相反地，在詞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則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 *a* 經 *i* 而变为 *e*；(2)尼德兰語所特有而在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語，正如里普利安語一样，依然有 *hus—Haus* [家]，*brun—braun* [褐色的]，*rum—geräumig* [广阔]，*tun—Zaun* [垣籬]；复数則为 *huse, brune*。新尼德兰語則只有中尼德兰語和里普利安語向所未見的語形，例如，*huis, bruin, ruim*，

*tuin* (*ui* = 高地德意志語的 *eu*)。相反地，以 *eu* 代替短音 *o* (高地德意志語的 *u*)，則已經侵入中尼德蘭語了。例如，*jeughet* 与 *joghet* 同时并存，新尼德蘭語有 *jeugd*—*Jugend* [青年]；*doghet*—*Tugend* [道德]，*dor*—*Tür* [門]，*kor*—*Wahl* [選擇]，而同时还有带 *eu* 的語形；在新尼德蘭語則只有 *deugd*，*keur*，*deur*。这同十二世紀起在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語形——以 *eu* 代替重讀的拉丁語 *o*——，是完全一致的。凱倫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蘭語里，*ei* 是由 *ê* (*ee*) 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态，都是里普利安語以及其他方言所沒有的，是尼德蘭語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alt*，*old*，*olt*，*uld*，*ult* 变为 *oud*，*out*。这种变化，在中尼德蘭語里就已經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 *goudin*，*houde*，*scoude* (*sollte*)，同时也有 *guldin*，*hulde*，*sculde*，因此，这种轉变发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蘭語的特点，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gold*，*hold*，*old*，在那里是 *gowd*，*howd*，*owd*。

說到輔音，尼德蘭語沒有純粹的 *g* (即意大利語、法語或英語的后舌音 *g*)。这个輔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 *gh*，在若干音結合中，它和深后舌音 (瑞士語、現代希腊語或俄語的) *ch* 是沒有分別的。我們已經看到，从 *g* 到 *ch* 的这种轉变，在古代薩利克語中就已經出現了。它也出現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語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薩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閩斯德，也跟在貝爾格語里一样，甚至單詞的开头的 *j*，特別是在外来語里，在某些場合发音也和 *ch* 一样，人們在那里可以听到 *Choseph*，甚至可以听到 *Chahr*

(Jahr)。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詩中 *j*, *g* 和 *ch* 的常常彼此換用和互押頭韻，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單詞的開頭，尼德蘭語有時還保留着 *wr*，例如 *wringen*—*ringen* [扭奪]，*wreed*—*grausam* [殘忍的]，*wreken*—*rächen* [復仇]。在里普利安語里，也有這一方面的殘迹。

從弗里西安語里，採納了將指小詞詞尾 *ken* 軟化為 *tje*, *je* 的辦法，例如，*mannetje*—*Männchen* [小人兒]，*bietje*—*Bienchen* [蜜蜂兒]，*halsje*—*Hälschen* [圍脖兒]，等等。不過，也有保留 *k* 的，例如，*vrouken*—*Frauchen* [愛妻]，*hoeteken*—*Hüttchen* [小屋]。在佛來米語里，至少在民間語言里，*k* 却保留得更好：布魯塞爾的著名的小人兒叫做 *manneken-pis* <sup>344</sup>。可見法國人的 *mannequin*，英國人的 *mannikin*，都是從佛來米語那里借來的。兩者詞尾的復數為 *vroukens*, *mannetjes*。這個 *s*，我們在里普利安語里還會看到。

尼德蘭語同薩克森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那維亞諸方言共同的地方，是元音之間的 *d* 的脫落，特別是兩個 *e* 之間的 *d*，例如，*leder* 和 *leer*，*weder* 和 *weer*，*neder* 和 *neer*，*vader* 和 *vaer*，*moeder* 和 *moer*—*Mutter* [母]。

尼德蘭語的變格顯示着強變化和弱變用語形的完全的混合，而因為在復數時無元音交替，所以尼德蘭語復數的形成，只有在極少的場合，才是與里普利安語或薩克森語一致的，在這裡，也可以看出這種語言的一種極其顯著的特點。

薩利克語和里普利安語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 *er*, *der*, *wer* 等主格標志的脫落，即在尼德蘭語里是 *hij*, *de* (冠詞) 和 *die* (指示代詞)，*wie*。

動詞變位的分析，會使我們跑得過遠。上面講過的，已經足夠

使我們在任何地方將現代的薩利克語言跟其他鄰接的各種方言區別開來。對尼德蘭的民間方言進行更精密的研究，一定還能獲得許多重要的東西。

二、萊茵法蘭克語。我拿這個名稱表示其餘一切的法蘭克方言。我在這裡不照舊的辦法把里普利安語跟薩利克語對立起來，是有充分理由的。

阿爾諾德<sup>345</sup> 就已經注意到：真正的里普利安人是住在一塊比較狹小的地區，其南面境界大體可用兩個同名為萊夫費爾舍伊德的村落（在阿得瑙和什萊登附近）作標志。這一點正確之處在於：這樣一來，就能在語言方面也把純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區，同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日耳曼部落之後或者和他們同時佔據的地區劃分開來。但是，由於“下法蘭克語”這一名稱已經獲得了另外的意義，而且這一名稱還包括了薩利克語，所以，我只好把在薩利克語區和這條界綫之間的地區通用的相近的方言語族，統稱為里普利安語——狹義的里普利安語。

1. 里普利安語 這一方言語族同薩利克語的分界綫，是同荷蘭—德意志的邊境綫決不相符的。相反地，在萊茵河右岸，還有雷斯區的大部分屬於薩利克語的範圍，而在這裡的威塞爾地區，則為薩利克語、里普利安語和薩克森語接觸之處。在萊茵河左岸，屬於薩利克語的，則有克列維和格耳德恩，並且大約延伸到下面這條綫：從萊茵河起，經過克散滕和威塞爾之間，南到符律恩村（在默爾斯之西），並從那裡起，西南到文洛為止；要想劃出更精確的界綫，只有到當地去才行，因為經過了荷蘭多年的管轄，不單在格耳德恩，而且在默爾斯伯爵領地，都有許多帶有薩利克—尼德蘭語形的里普利安的名稱保留在地圖上面。

从文洛地区往上去，麦士河右岸的大部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安語，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綫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薩利克語地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語地区，而后者几乎伸展到馬斯特里赫特附近。带 *heim* (不是 *hem*) 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語所特有的語形 *ich* 的地名，在这里，大量地出現在荷兰領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带 *broich* (荷兰語的 *broek*) 并有輔音音变的地名，例如魯尔蒙特附近的 *Dallenbroich*，以及带 *rade* 的地名 (錫塔特附近的 *Bingelrade*，以及那里的 *Amstenrade*、*Hobbelrade* 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麦士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土地，則完全属于里普利安語范围以内 (拿距离麦士河 9 公里的 *Krützenberg* 同文洛北面的 *Kruisberg* 相比)。甚至在麦士河左岸，在比利时境内名叫灵堡的地方，我也发现，馬宰克附近有 *Kessenich*，麦士河畔有 *Stockheim* 和 *Reckheim*，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 *Gellik*，这就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純粹的薩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同薩克森的界綫，自威塞尔附近向东南延伸，愈往前离萊茵河愈远，在法兰克方面的魯尔河畔繆尔海姆、韦尔登和薩克森方面的埃森之間穿过，直达貝尔格同馬尔克的边界，这条边界綫直至今日，仍然是萊茵省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这条綫直到奥耳珀以南，才同那条边界分离，由此向东，将法兰克語的济克兰德同薩克森語的藻厄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語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是和旧日的阿瓦耳高、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的，并由此西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龙語的領域。这样划定的領域，包含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語在許多方面是和尼德蘭語一致的，不過，中尼德蘭語却較新尼德蘭語跟它更為接近。在里普利安語的發音中，與新尼德蘭語相一致的地方是  $ei = e+i$ ，以 *ou* 代替 *au*；以及 *i* 到 *e* 的轉變，這種轉變在里普利安語和中尼德蘭語里比新尼德蘭語更為徹底；中尼德蘭語的 *gewes, es, blend, selver* (Silber [銀])，即在今日也還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語發音。與此相同而且更為徹底的是，在後面緊跟着輔音的 *m* 或 *n* 之前的 *u*，變為 *o*。例如 *jong, lomp, domm, konst*。如果後面緊跟着的輔音是 *d* 或 *t*，則這個 *d* 或 *t* 在某些方言中就變為 *g* 或 *k*；例如 *honk*—Hund [狗]，複數為 *hōng*；在這裡，*k* 變為濁音 *g*，是受到脫落掉的結尾元音 *e* 的影響。

相反地，里普利安語的元音交替的情形同尼德蘭語有顯明的差別，一般地說，它同高地德意志語是一致的，而在個別的例外場合之下（例如以 *hanen* 代替 Hähne [雄雞]），則同薩克森語一致。

詞首的 *wr* 變為清音 *fr*，這保存在 *fringen*（將布等等中的水擰干）和 *frêd*（即荷蘭語的 *wreed*，意為鍛煉）中。

以 *hê, dê, wê* 代替 *er, der, wer*。

變格處於高地德意志語和薩克森語間的中間地位。以 *s* 構成複數是常見的，但幾乎從來不與尼德蘭語相同；這個 *s*，在當地的高地德意志語上，完全符合於語言發展的過程而變成了 *r*。指小詞詞尾 *ken, chen*，在 *n* 之後變成了 *schen*，如 *männchen*，複數與尼德蘭語相同，也有 *s* (*männches*)。這兩種語形，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洛林。

在 *s, st, d, t* 和 *z* 前的 *r* 被省略了；*r* 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言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則為長音。例如，*hart* 變為 *hatt*

(貝尔格語) 和 *haad* (科倫語)。在这里, 由于南德意志語的影响, *st* 变作 *scht*; 例如 *Durst*, 在貝尔格語里为 *doascht*, 在科倫語里为 *dôscht*。

同样, 由于高地德意志語的影响, 詞首的 *sl*, *szw*, *st* 和 *sp* 都变成了 *schl*, 等等。

像尼德兰語一样, 里普利安語也沒有純粹的 *g*。位于薩利克語边界綫上的一部分方言, 譬如貝尔格方言, 詞首和詞中間的 *g* 也变成了送气音 *gh*, 但比尼德兰語要軟些。其余的方言都有 *j*。在詞尾上, *g* 到处都像 *ch* 那样发音, 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語的 *ch*, 而像軟的萊茵—法兰克語的 *ch*, 发音类似硬化了的 *j*。里普利安語在实质上所具有的低地德意志語的性质, 可由以 *boven* 代替 *oben* 这样一些詞語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輔音, 到处都还处于輔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南方方言中的 *t* 以及詞中和詞尾的 *k*, 有时还有 *p*, 才具有高地德意志語的輔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 *lôten*—*lassen* [放置] 变做 *lôsze*, *holt* [树木] 变做 *holz*, *rîk*—*reich* [富] 变做 *rîch*, *ek*—*ich* [我] 变做 *êch*, *pîpe*—*Pfeife* [笛] 变做 *pief*。但 *et*, *dat*, *wat* 和另外一些詞, 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語輔音音变在三种場合下的侵入, 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語和下法兰克語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 原来是一种由一定的声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方言語族 (并且这在民众意識中現在还认为是相互連在一起的), 現在却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标志把它們分开了。

我說, 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 如黑森、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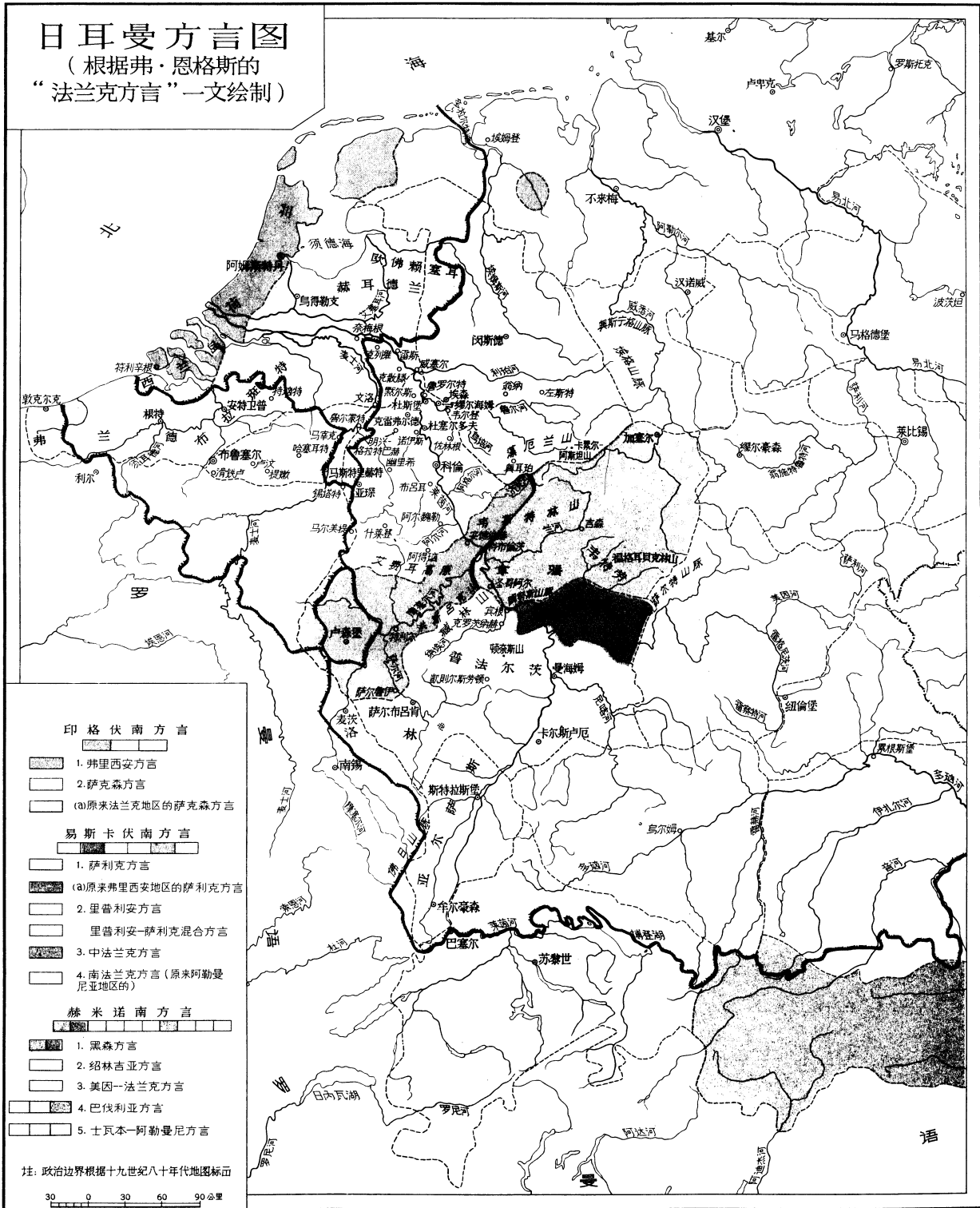
吉亚、上薩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說来，都是处于高地德意志語輔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們所表現出的輔音音变，可能在低地薩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較多一些，但这頂多不过形成地方的差別。相反地，在北海沿岸、麦士河畔以及下萊茵的法兰克方言，却絕无任何的輔音音变，而在阿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則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亚的音变；在这两种类型之間，至少还有三个过渡阶段。由此可見，輔音音变已經侵入独立发展了的萊茵—法兰克語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輔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灭在一个过去存在过的特殊的方言語族的边界上；它也可能死亡在这一方言語族的内部，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相反地，实际构成方言的輔音音变的影响，像下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两个原来就有区别的方言語族的边界上。*schl*, *schw* 等等和詞尾的 *scht*，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語侵入到我們这里来的嗎？而这些——至少是其中的第一批——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里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 *t* 和詞中、詞尾的 *k* 以及 *p* 发生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諸方言已形成了一种穩固的語族。此种变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侵入于該語族的内部，对于这一語族來說，过去和現在都是一种純粹偶然的現象。諾伊斯的方言，同克雷弗尔德方言和明兴—格拉特巴赫的方言，甚至在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的細微之点上也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被称为中法兰克語，一种被称为下法兰克語。貝尔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察之中，一步步地轉变成了西南萊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們却似乎是屬於两个根本不同的方言語族。每一个熟悉这些地区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們很少知道或完全



# 日耳曼方言图

(根据弗·恩格斯的  
“法兰克方言”一文绘制)



## 印格伏南方言

- 1. 弗里西安方言
- 2. 萨克森方言
- 3. (a) 原来法兰克地区的萨克森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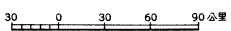
## 易斯卡伏南方言

- 1. 萨利克方言
- (a) 原来弗里西安地区的萨利克方言
- 2. 里普利亚方言
- 里普利亚-萨利克混合方言
- 3. 中法兰克方言
- 4. 南法兰克方言 (原来阿勒曼尼亚地区的)

## 赫米诺南方言

- 1. 黑森方言
- 2. 绍林吉亚方言
- 3. 美因-法兰克方言
- 4. 巴伐利亚方言
- 5. 士瓦本-阿勒曼尼方言

注: 政治边界根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地图标注





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間方言，硬套在他們削足适履地 *a priori* [預先] 虛構出來的特征的框框里去。

這種純粹表面上的區別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呢？結果是，人們把各種南里普利安方言在所謂中法蘭克語的名稱之下，跟其他的方言混雜在一起，而如我們就要看到的那樣，南里普利安方言同這些方言的關係，比同所謂下法蘭克方言是更為疏遠的。可是，另一方面，結果卻留下一條狹長的地帶，人們不知如何去對付它，最後，只得將其中的一片宣稱為薩克森語地區，而將另一片宣稱為尼德蘭語地區，這跟這些方言的實際情形是很不符合的。

我們試舉貝爾格方言為例來看吧，這一方言是布勞涅毫不遲疑地肯定地稱為薩克森語的。這種方言，我們知道，它的直陳式現在時複數三種人稱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法蘭克語的古代形式則為 *nt*。在貝爾格方言里，凡是 *m* 和 *n* 後面緊跟着輔音時，*m* 和 *n* 前的 *u* 一律以 *o* 去代替，按照同一布勞涅的意見，這絕非薩克森語所具有的情況，而是下法蘭克語所特有的現象。上述里普利安語的這一切特征，乃是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所共有的。它在不易察覺之間，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從一個農戶到另一個農戶，變成了萊茵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利亞的邊境上同薩克森方言截然地分開了。在日耳曼尼亞全境，恐怕沒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像這里所看見的這樣突出的語言界綫。語言上的差別是多麼大啊！全部的元音發音法就像是徹底改變了；開口度最寬的 *ai* 直接地與開口度窄的下法蘭克語的 *ei* 對立，正如 *au* 同 *ou* 相對立一樣；在為數甚多的二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沒有一個是相同的；這里的 *sch* 跟日耳曼尼亞其他各處是一樣的，而那邊的 *s+ch* 則與荷蘭相同；這里是 *wi hant*，那邊是 *wi hebbed*；這里的複數使用雙重的形式

*get* 和 *enk*, *ihr* 和 *euch*, 那边則只有 *ji*, *i* 和 *Jü*, *ü*。这里把麻雀 [Sperling] 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語称为 *Môsche*, 那边則用普通的威斯特伐里亚語叫 *Lüning*。至于其他为貝尔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不必談了, 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 也都同样地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国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 是当他所遇到的人們不說方言, 而說他懂得的高地德意志語的时候, 这种高地德意志語, 在我們德国人这里, 在大多数場合之下, 是受到了方言的强烈影响的。可是貝尔格工业地区的所謂薩克森居民和萊茵平原的居民(他們可能是說中法兰克語), 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 *gh*, 在另一方作 *j* 的发音而外, 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 是絕對听不出他們說話的差別的。但是, 貝尔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門, 在烏培河左岸), 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馬尔克的兰格斐特人, 他們在日常講話上所用的本地高地德意志語, 其差別之大, 远远超过赫金豪斯人同科布倫茨人之間的差別, 至于亚琛人或波恩人, 那就更不消說了。

对于萊茵法兰克人來說, 甚至 *t* 和詞尾 *k* 的音变的侵入, 并未造成一种語言分界的印象; 甚至在他們极其熟悉的地方, 他們也不得不先想想 *t* 同 *z*, *k* 同 *ch* 之間的分界綫在哪里, 而当他們越过这个界綫的时候, 两者的发音, 对于他們都是一样地順嘴。由于許多帶有发生音变的 *sz*, *z*, *ch* 和 *f* 的高地德意志單詞侵入于方言之中, 这就显得更容易了。十四世紀的古貝尔格訴訟法典(拉康布累“档案”第一卷第 79 頁及以下各頁<sup>346</sup>) 提供了一种显明例证。在这里, 我們看到了 *zo*, *uiss*(aus [自]), *zween*[两个], *bezahlen*[支付]; 与此相并, 同一文句中还有 *setten*[使坐下], *dat nuttete*(*nützte* [最有用的]); 与 *reicket*(*reicht* [他达到]) 相并, 还有 *Dache*[屋

頂], *redelich* [誠实]; 与 *verkouffen* [出售] 相并, 还有 *upladen* [装上], *upheven* [举起], *hulper* (Helfer [助手])。在第 85 頁上的另一段里, 甚至交錯地出現了 *zo* 与 *tho* (*zu* [到])。簡單地說, 山岳地帶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經常地交錯在一起, 甚至一點也沒有引起書寫人的困惑。像往常一樣, 波及法蘭克領土的高地德意志語輔音音變最後的波浪, 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達到的界綫, 的確是饒有趣味。但是, 這不會是一條方言的界綫; 它不可能將一個自古就具有近親關係的獨立的方言語族彼此分開, 也不能作為借口, 來違反一切語言上的事實, 把那硬用強力撕開的破片劃入關係較為疏遠的語族中去。

2. 中法蘭克語 從上面所講的可以明顯地看出, 我認為中法蘭克語的北面邊界比通常所劃定的邊界要偏南得多。

由於萊茵河左岸中法蘭克地帶在克洛維時代看來曾經被阿勒曼尼人所佔據, 這就使得阿爾諾德有了理由在當地的地名中去找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跡; 並得出結論說: 直至科倫—亞琛這一條綫上, 可以確定在法蘭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 不消說, 這樣的痕跡, 在南方最常見, 往北則愈來愈少。他說, 這些地名表明, 阿勒曼尼人曾經短期推進到科布倫茨和亞琛的境界以外, 並在較長時期之內, 佔領了韋特勞和南部拿騷的地方。因為帶有純粹阿勒曼尼語詞尾的名稱, 如 *ach*, *brunen*, *felden*, *hofen*, *ingen*, *schwand*, *stetten*, *wangen* 和 *weiler*, 這些都是在純粹的法蘭克土地上所絕對看不到的, 而從亞爾薩斯起, 在全部普法爾茨、萊茵黑森和萊茵普魯士, 却到處散布着, 只是愈向北愈少, 愈來愈讓位於主要為法蘭克語詞尾的名稱, 如 *bach*, *berg*, *dorf*, *born*, *feld*, *hausen*, *heim*, *scheid* 等(“德意志的古代”<sup>347</sup>)。

我們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土地上的所謂阿勒曼尼的名称。*brunnen, stetten, felden, wangen* 等詞尾,我在萊曼的地图<sup>348</sup> (应当指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过。*Schwand* 这个詞尾曾見于文威累尔附近的 *Metzelschwand* 庄园,再見于兰德施土尔北面的 *Schwanden*。因此,两处都是在南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們眼下研究的問題是沒有关系的。至于詞尾 *ach*——我們沿着萊茵河可以看到圣哥阿尔附近的 *Kreuznach, Bacharach, Hirzenach*,科布倫茨附近的 *Rübenach* (在施普魯奈尔—門克的分区图<sup>349</sup>上則为 *Ribiniacus*)。 *Andernach* (即羅馬的 *Antunnacum*),以及 *Wassenach*。因为在整个萊茵河左岸,在羅馬时代到处都出現有罗曼語化的凯尔特語詞尾 *acum*; 例如, *Tolbiacum—Zülpich, Juliacum—Jülich*, 貝克海姆附近的 *Tiberiacum—Ziewerich, Mederiacum*; 因此,在大多数場合下,頂多也不过是在語形的選擇上,即以 *ach* 代 *ich*,才显示出阿勒曼尼人的影响。只有 *Hirzenach* (= *Hirschenbach*) 这一个詞毫無疑問是德意志語,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 *Hirzenowe* = *Hirschenau* [鹿的草場],而不是 *Hirschenbach* [鹿的溪]。但是,位于比德里赫和萊茵貝尔格之間、紧邻薩利克边境的 *Wallach*,却如何去解釋呢? 这总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是阿勒曼尼人的村落吧。

摩塞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 *ach*; 例如別恩堡东面的 *Irmnach*, 特利尔附近的 *Waldrach, Crettnach*, 薩尔河畔的 *Mettlach*。在卢森堡有 *Echternach, Medernach, Kanach*; 在洛林,只有在摩塞尔河右岸有 *Montenach, Rodlach, Brettnach*。纵然我們可以承认,所有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們为数也是很少的,而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領土的最南部。

剩下的还有 *weiler*, *hofen* 和 *ingen*, 需要进行比較詳細的研究。

首先, 詞尾 *weiler* 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語, 而是外省拉丁語的 *villarium*, *villare*, 而且在羅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 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之下才能遇到。 *villare* 之德語化为 *weiler*, 并非阿勒曼尼人的特权, 只不过是他們的偏爱, 把这种詞尾大量地使用于新的移住地而已。 仅仅在羅馬的 *villaria* 出現的地方, 法兰克人才被迫把这个詞尾德語化为 *wilare*, 其后又变做 *weiler*, 或者完全把它丢掉不用。 大概他們有时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又采用另一种方法, 同样地, 他們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 *weiler* 称呼新的移住地, 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 从亚琛附近的 *Eschweiler* 以及从 *Ahrweiler* 往北去, 阿尔諾德連一个以 *weiler* 为詞尾的比較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 不过, 地点的現代的意义, 是和問題全然无关的; 事实是, 在萊茵河左岸, 以 *weiler* 为詞尾的地名一直向北几乎延伸到薩利克边界 (*Garzweiler* 和 *Holzweiler*, 距离說尼德兰語的最近的格耳德恩地方还不到 5 英里); 在 *Eschweiler* 和 *Ahrweiler* 这一綫之北, 带有此种詞尾的地名至少也有二十个。 这样的地名, 自然, 最常見于由馬斯特里赫特經幽里希而抵科倫这一条旧日羅馬大道的近处; 其中有两处, 即 *Walwiller* 和 *Nyswiller*, 甚至位于荷兰領土上; 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嗎?

更向南去, 在艾費耳高原, 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沒有, 在馬尔美提地段 (萊曼地图, 第 159 图) 連一个也見不到。 在卢森堡, 这样的名称也很少, 在摩塞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呂克山的脊背上, 也同样地不多見。 相反地, 在摩塞尔上游, 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多, 向东去更多, 从薩尔魯伊向东去, 这个詞尾愈来愈占支配地位。

不过,从这里起,已經开始出現了南法兰克語言,而且,在这里,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領过这一带土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領土上,这些 *weiler*, 跟法兰西为数极多的 *villers* 一样,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

現在我們来研究 *hofen*。这个詞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它出現在整个法兰克,其中包括后来由薩克森人占領的今天的威斯特伐里亚。在萊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 在魯罗尔特附近的 *Wehofen*, 杜斯堡附近的 *Mellinghofen* 和 *Eppinghofen*, 梅特曼附近的 *Benninghofen*, 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 *Eppinghofen*, 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 *Kellinghofen*, 卡斯特罗普附近的 *Westhofen*, 还有 *Wellinghofen*, *Wichlinghofen*, *Niederhofen*, 两个 *Benninghofen*, *Berghofen*, *Westhofen*, *Wandhofen* ——所有这些都在赫耳韦格, 等等。直至異教时代, 在阿格尔河岸还有 *Ereshofen*, 即 *Martis villa* [瑪尔斯城], 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 *Eru* 这一件事, 就足以证明, 說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自称为 *Tiuwâri*, 因之, 不称他們的神为 *Eru*, 而称为 *Tiu*, 以后經過輔音音变, 成为 *Ziu*。

在萊茵河左岸, 說 *hofen* 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語, 就更不行了。在这里, 又有一个 *Eppinghofen* 在克散滕的东南方, 因而, 也許这里已經是屬於薩利克人的了, 从这里向南去, 在全部的里普利安領土上, 除了个别庄园以 *hof* 为詞尾以外, 到处都麇集着 *hofen* 的地名。我們一經踏上薩利克的領土, 那就更糟糕。沿麦士河的两岸, 从法兰西語言的界綫起, 到处都是 *hofen*。为了簡便起見, 我們可



看看西岸。在那里，我們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 7 个 *Op-hoven*，在荷兰有 *Kinckhoven* 等等；在比利时，我們首先看看勒文地段(萊曼地图，第 139 图)吧。这里有湯格恩附近的 *Ruykhoven*，*Schalkhoven*，*Bommershoven*，*Wintershoven*，*Mettecoven*，*Hels-hoven*，*Engelmanshoven*，哈塞耳特附近的 *Zonhoven*，*Reekhoven*，*Konings-Hoven*；更往西去，有 *Bogenhoven*，*Schuerhoven*，*Nieuwenhoven*，*Gippershoven*；圣特罗伊登附近的 *Baulershoven*；极西处，在提耳蒙(提楠)的东面和东北面，有 *Gussenhoven* 和 *Droenhoven*。在特瑙特地段(第 120 图)至少有 33 个 *hoven*，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領土以內。再向西南去，*hove* (第三格詞尾 *n* 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語言的边界綫上：从尼諾夫(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語化了的 *hove*)附近的 *Heerlinkhove* 和 *Nieuwenhove* 起(这中間，大約还有 10 个，我都略去了)，到迪克斯莫伊德附近的 *Ghyverinckhove* 和 *Pollinckhove* 以及法屬弗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 *Volkerinckhoveo*。*Nieuwenhove* 出現了三次；这就证明这一詞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还有許多以 *hof* 为詞尾的个别的庄园。由此可見，所謂 *hofen* 专屬於阿勒曼尼語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最后，談談 *ingen*。用 *ing*，*ung* 来表示同一的起源，这对整个的日耳曼民族都是共同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所以这一詞尾，在各处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詞尾，用第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詞尾結合起来；例如，明登附近的 *Wolvaradingahusun*，英格兰的 *Snotingaham* (諾定昂)。有时，这一詞尾的复数即可单独构成地名；例如，荷兰弗里斯兰省的 *Flissinghe* (符利辛根)，*Phladirtinga* (符拉尔丁根)，*Crastlingi* 和古代

薩克森的 *Grupilinga*, *Britlinga*, *Otlinga*。这些名称,現在大多数都已还原为第三格,并且以 *ingen* 为詞尾,而 *ing* 則很少見。大多数的部落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語形;阿勒曼尼人似乎偏爱后一种,至少就目前說是这样。寥拉赫近处的 *Rümmingen*, 从前(764年)叫做 *Romaninchova*, 所以,士瓦本的 *ingen*, 許多都是出于較近的起源的(蒙奈“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第213頁<sup>350</sup>)。瑞士的 *kon* 和 *kofen*, 差不多都是由 *inghofen* 縮写而成的;例如, *Zollinchovon*—*Zollikofen*, *Smarinchowa*—*Schmerikon*, 等等。参看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的历史地图集”<sup>351</sup>。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現。但是这样的名称也同样出現在法兰克人、薩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間,因此,一看到有些地名带有 *ingen* 的詞尾,馬上便断定那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就未免太大胆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 *ingas* (复数第一格)和 *ingum*, *ingon* (复数第三格)这样的名称,从些耳德河到易北河,不論在弗里西安人或薩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即在今日,在全部下薩克森 *ingen* 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里亚,单是在魯尔河两岸,翁納—左斯特—綫以南,除开 *ingsen* 和 *inghausen* 不算,至少可以找到12个 *ingen*。只要是在法兰克領土上面,我們到处都可以找到以 *ingen* 为詞尾的地名。

在萊茵河右岸,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萊茵河畔有 *Wageningen*, 艾塞耳河畔有 *Genderingen* (在这里,我們將一切可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除去);在貝尔格地区有 *Huckingen*, *Ratingen*, *Ehingen* (紧接着,在薩克森的領土上,有 *Hattingen*, *Sodingen*, *Ummingen*), 韦尔登附近有 *Heisingen* (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佗的

*Silva Caesia* [凱西亚森林], 可見已很古远), *Solingen*, *Husingen*, *Leichlingen* (在分区图上則为 *Leigelingen*, 可見已有上千年之久), *Quettingen* 以及济克河畔的 *Bödingen* 和 *Röcklingen*, 另有两个以 *ing* 为詞尾的地名尙未計算在內。萊茵布罗耳的 *Hönningen* 以及維德河一带的 *Ellingen*, 构成了同萊茵河、兰河、迪耳河各地之間的联系, 在这里, 至少也有 12 个 *ingen*。再往南去找就沒有意义了, 因为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期的地方, 已經从这里开始了。

在萊茵河左岸, 在荷兰的奈梅根的上面有 *Millingen*, 克散滕下面有 *Lüttingen*, 萊茵貝尔格下面还有一个 *Millingen*, 其次还有 *Kippingen*, *Rödingen*, *Höningen*, *Worringen*, *Fühlingen*, 都在科倫的北面, 在布呂耳近处有 *Wesselingen* 和 *Köttingen*。从这里起, 以 *ingen* 为詞尾的地名, 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費耳高原, 这样的地名很少; 在法兰西語言边界綫上的馬尔美提, 我們看到有 *Büllingen*, *Hünningen*, *Mürringen*, *Iveldingen*, *Eibertingen*, 它們成了在卢森堡以及在普魯士和洛林境內的摩塞尔河上游为数极多的 *ingen* 的过渡。另一条連結綫, 則順着萊茵河及其沿岸谷地 (阿尔河地区——7 到 8), 最后又沿着摩塞尔谷地走向特利尔上面一带去; 在这里 *ingen* 占到支配的地位, 不过, 首先是結尾为 *weiler* 的名称, 然后是結尾为 *heim* 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瓦本的 *ingen* 分开了。因此, 如果我們按照阿尔諾德的要求, “在情况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一切情况”<sup>352</sup>, 我們就要做出这样的結論: 德意志境內摩塞尔河上游地带的 *ingen*, 是法兰克人的, 不是阿勒曼尼人的。

当我們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語的語言界綫开始,

在薩利克語的領域探尋 *ingen* 的時候，我們立即就會更加明白，我們在這裡是無須借助於阿勒曼尼人的。在麥士河西岸的馬宰克近處有 *Geystingen*，再向西去，在布雷附近有 *Gerdingen*。其次，倘使我們再拿第 139 圖勒文地段來看，我們就會看到在湯格恩、聖特羅伊登及哈塞耳特，有 *Mopertingen*, *Vlytingen*, *Rixingen*, *Aerdelingen*, *Grimmersingen*, *Gravelingen*, *Ordange* (而不是 *Ordingen*), *Bevingen*, *Hatingen*, *Buvingen*, *Hundelingen*, *Bovelingen*, *Curange*, *Raepertingen*, *Boswinnigen* 和 *Wimmertingen*, 等等。最西部，離勒文不遠的地方有 *Willebringen*, *Redingen*, *Grinningen*。在這裡，聯繫似乎中斷了。可是，當我們走進那個目前在講法蘭西語、而在六到九世紀之間兩種語言在進行鬥爭的地區，我們就可以發現，從麥士河起有整整一個法蘭西語化了的 *ange* 的地帶；這一語形，在洛林和盧森堡同 *ingen* 相對應；自東向西走，有 *Ballenge*, *Roclange*, *Ortrange*, *Lantremange*, *Roclange*, *Libertange*, *Noderange*, *Herdange*, *Oderinge*, *Odange*, *Gobertang*, *Wahenges*；再稍向西去有伐佛爾附近的 *Lowvrenge* 和滑鐵盧附近的 *Revelinge*，它們跟 *Huysinghen* 和 *Buisinghen*，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魯塞爾西南、自哈耳到格腊蒙這條語言分界綫上的二十多個 *ingen* 之群的前哨聯繫起來了。最後，在法屬弗蘭德有 *Gravelingen*, *Wulverdinghe* (就是古代薩克森的 *Wolvaradinges-hûsun*)，*Leubringhen*, *Leulinghen*, *Bonninghen*, *Peuplingue*, *Hardinghen*, *Hermelinghen*；在聖奧梅爾附近直到布倫後面，有 *Herbinghen*, *Hocquinghen*, *Velinghen*, *Lottinghen*, *Ardinghen*，所有這些，同在同一地區為數極多的以 *inghem* (—*ingheim*) 為詞尾的地名，是有顯著的區別的。

由此可見，阿爾諾德認為是阿勒曼尼人所專有的 3 個詞尾，已

經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人的詞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中法兰克領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經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的移住，这种企图必須认为已經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东南部，曾經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諾德从阿勒曼尼人轉而談到卡滕人。除开真正的里普利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占据了Ripuarria（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領土，也就是我們称为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萊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这样地惊人而惹人注意，如果說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地，只要我們假定一下，移住者把他們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那样，那末，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sup>353</sup>

要反对这个論点，理由是很少的。而說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在整个的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地方的移住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們在这里所見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結論，就更少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巴达維人、堪尼內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早就跟易斯卡伏南人結合在一起了。那末，他們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初两世紀之間，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紹林吉亚人，才同其余的赫米諾南人联系起来的；一方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凱魯斯奇人，另一方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还有羅馬人。后来統一成为阿勒曼尼人的赫米諾南各部落，是从日耳曼尼亚內部出来的；这些部落同卡滕人在数世紀之間被紹林吉亚人及其他的民族所隔斷，因此

同他們的关系要比他們同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疏远得多，因為他們和法兰克人有數百年之久的戰友情誼，將他們結合在一起了。因此，卡滕人的參加該地的占領，是沒有懷疑的余地的。而不把里普利安人算在里面，這一點倒是可疑的。這只有在這裡沒有出現里普利安所特有的地名時，才能認為是被證實了的。但事實却正相反。

在阿爾諾德舉出的那些作為法蘭克語所特有的詞尾之中，*hausen* 是法蘭克人、薩克森人、黑森人和紹林吉亞人所共有的；*heim* 在薩利克語里讀做 *ham*；*bach* 在薩利克語和下里普利安語里讀做 *beek*；在其他詞尾之中，只有 *scheid* 在實際上是特殊的。它是里普利安語所特有的，正如 *ich*, *rath* 或 *rade* 和 *siepen* 那樣。其次，兩種法蘭克方言所共有的還有 *loo* (*loh*)，*donk* 和 *bruch* 或 *broich*（薩利克語——*broek*）。

*Scheid* 只出現在山上，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嶺的地方。法蘭克人在整個威斯特伐里亞的藻厄蘭山，都留下了這個詞尾，一直達到黑森的邊境，在這裡，它只作為山地的名稱出現，東面直到科爾巴赫。在魯爾河，與古代法蘭克語的 *scheid* 相對應的是經過薩克森語改造的詞尾 *schede*，例如，*Melschede*, *Selschede*, *Meschede*；在這裡，同時還有 *Langscheid*, *Ramscheid*, *Bremscheid*。在貝爾格地區常見的這種詞尾，在萊茵河右岸直至韋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再往南就沒有了。相反地，在萊茵河左岸，不消說，只有到了艾費耳高原才開始出現 *scheid*<sup>①</sup>；在盧森堡，這種地名至少有 21 個；在霍赫

① 在平原上，我只有在比利時靈堡的哈塞耳特東面找到了 *Waterscheid*，而在這裡，如上所述，我們已經看到有顯著的里普利安語的混合物了。[見本卷第 575—576 頁。——編者注]

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臧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语尾 *schied*。这两种语形并列向南，越过纳埃河直达佛日山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顿奈斯山西面有 *Bisterscheid*，在凯则尔斯劳顿附近有 *Langenscheid*，在霍赫施派耶尔南方有 *Breitscheid* 高原，在比奇附近有 *Haspelscheid*，吕特策耳施泰因北面有 *Scheidwald*；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多农山北坡的 *Walscheid*，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更要偏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语形还有 *ich*，它跟 *ach* 一样，都是从同一个哥特语词根 *ahva*—Wasser [水] 来的；正如 *Tiberiacum* 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 *acum* 德语化了，在分区地图上写做 *Civiraha*，现在则为 *Ziewerich*。在莱茵河右岸，这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 *Meiderich* 和 *Lirich* 是最靠北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 *Biebrich*。在莱茵河左岸的平原上，从威塞尔河对岸的 *Büderich* 起，到处有这个词尾；经过艾费耳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但在 *scheid* 和 *roth* 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臧林山和纳埃河地方消失了。相反地，在这个地方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利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 12 个；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 *Törnich* 和 *Merzig* (*Messancy*—*ig* 的写法毫未改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塞尔河以西有 *Soetric*, *Sentzich*, *Marspich*, *Daspich*；以东有 *Kintzich*, *Penserich*, *Kemplich*, *Destrich*, 两个 *Kerprich*, *Hibrich*, *Helsprich*。

詞尾 *rade*、*rad*、萊茵河左岸的 *rath*，也远远超出了它們古代里普利安故乡的境界。它布滿了全部的艾費耳高原和摩塞尔河中下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 *scheid* 和 *schied* 混合起来的同一地方，在萊茵河两岸，除 *rad* 和 *rath* 之外，也同样出現了 *rod* 和 *roth*，这也同样起源于黑森語。只有在萊茵河右岸，在韦斯特林山，*rod* 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山北面为 *rath*，山南面則通例为 *roth*。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 *siepen*，音变为 *seifen*。这个詞的詞义是指有急流的小谷，現在也到处都是依然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萊茵河左岸，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境界并不远，在右岸，它出現在尼斯特尔河的韦斯特林山，还出現在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澤芬）附近。

研究其他的詞尾，会使我們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怎样，自宾根沿萊茵河溯流而上，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領土，并且在凡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 *heim*，我們都可以宣称，那不是卡滕人的，而是里普利安人的。它們的故乡不是黑森，因为在那里，它們很少出現，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而是薩利克和科倫周圍的萊茵平原，因為它們在这里出現的次數，跟其他里普利安語所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因而，这一研究的結果是說明，里普利安人絕對沒有因黑森人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費耳高原附近，恰恰相反，甚至整个中法兰克領土都为他們所占据了。而且，他們向西南方发展到摩塞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納埃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語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同里普利安語的关系，远比东方——特別



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前者可以认为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語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語的繼續。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語音变的侵入。不单是若干清輔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較少数的单詞,而不涉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輔音 [*Medien*] 开始音变,这种音变造成中德意志語和南德意志語中的 *b* 和 *p*, *g* 和 *k*, *d* 和 *t* 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 *b* 和 *p*, *d* 和 *t*, *g* 和 *k* 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是在法兰西人主要地理解为 *accent allemand* [德意志音調] 的地方,才会使低地日耳曼人开始感觉到第二个輔音音变在德意志語言中所撕开的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穿过济克河同兰河之間,阿尔河同摩塞尔河之間。与此相应,中法兰克方言在詞首有一个 *g*,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而在詞中和詞尾,則 *g* 的发音等于軟化的 *ch*。此外,北方方言的 *ei* 和 *ou*,則又轉变为 *ai* 和 *au*。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語的特征:在所有薩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中, *Bach* [小溪]——即未經輔音音变的 *Beek*——是阴性的。这也至少适用于中法兰克方言西部的絕大部分。正如尼德兰和下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 *Bäche* [小溪,复数] 一样,卢森堡的 *Glabach* (*Gladbach*, 尼德兰語——*Glabeek*) 也是阴性。相反地,少女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詞:从巴門起,經過特利尔,人們不但說 *das Mädchen*, *das Mariechen*, *das Lisbethchen*, 而且还說 *das Marie*, *das Lisbeth*。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繪制的地图上,在洛林的福尔巴赫附近标着一个 «*Karninschesberg*» (*Kaninchenberg*) [兔儿山]。可見,也就是我們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語的那个指小詞詞尾——*schen*, 复数为 *sches*。

从摩塞尔河同納埃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兰河以南的

丘陵地带起，一种新的方言語族开始了。

3. 南法兰克語 这一片地带，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关于这些部落的亲屬关系和語言，我們是一无所知的)，而在这片地带内，也有較强烈的卡滕人的混血种，这是我們所乐于承认的。但是我們无须重述，在这里，地名上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不重要的里普利安因素，特别是在萊茵平原上。語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这是同时还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这里，我們又遇到了这样一事实，即所有法兰克人在发音上，除将詞中間和詞尾的 *g* 讀做浊音 *ch* 外，簡直沒有其他办法<sup>①</sup>。在那里，人們說 *Vöchel* [鳥]，*Flechel* [連枷]，*geleche* (*gelegen* [便利])，*gsacht*—*gesagt* [說过]，*licht*—*liegt* [躺下] 等等。跟一般的法兰克語一样，單詞中間的 *b* 由 *w* 代替。例如，*Bûwe*—*Buben* [小孩]，*glâwe*—*glauben* [相信](但說 *i glâb*)，*bleiwe* [停留]，*selwer*—*selbst* [自己]，*halwe*—*halbe* [一半]。輔音的音变，远不如看来那样彻底。特别是在外来語中，甚至发生輔音的逆轉音变，即詞首的清輔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 *t* 变 *d*，*p* 变 *b*。詞首的 *d* 和 *p* 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語的阶段，如 *dûn*—*tun* [做]，*dag* [白天]，*danze* [跳舞]，*diir* [門]，*dot* [死的]。但在 *r* 之前，則不发生这样的音变，例如 *trinke* [飲]，*trage* [携带]；*pauff*—*Pfaff* [教

① 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卡·克·納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普法尔茨方言詩”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Fröhlich Palz, Gott erhalt's! Gedichte in Pfälzer Mundart», von K. G. Nadler. Frankfurt a. M., 1851)。

士], *peife* [烟斗], *palz*—*Pfalz* [行宫], *parre*—*Pfarrer* [神甫]。但是因为 *d* 和 *p* 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語中的 *t* 和 *pf*, 所以在外来語上, 詞首的 *t* 逆轉为 *d*, 詞首的 *p* 逆轉为 *b*。例如 *derke*—*Türke* [土耳其人], *dafel*—*Tafel* [宴席], *babeer*—*Papier* [紙], *borzlan*—*Porzellan* [磁器], *bulwer*—*Pulver* [火药]。其次, 普法尔茨方言不許元音之間有清輔音; 在这一点上, 只有丹麦語同它是一致的。例如, *ebbes*—*etwas* [少許], *labbe*—*Lappen* [布片], *schlubbe*—*schlupfen* [滑入], *schobbe*—*Schoppen* [酒杯], *Peder*—*Peter*, *dridde*—*dritte* [第三], *rodhe*—*raten* [劝告]。只有 *k* 是一个例外: *brocke*, *backe*; 但在外来語上則有 *g*, 例如 *musigande*—*Musikanten* [音乐家]。这也是后来由于輔音的逆轉音变而傳播起来的一种低地德意志語語音阶段上的遺迹<sup>①</sup>; 仅仅是由于 *dridde*, *hadde* 沒有发生輔音音变, *Peter* 才能够变为 *Peder*。因而, 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語的 *t* 也受到了同样公平的待遇。 *halde*—*halten* [握], *alde*—*alte* [老] 等詞中的 *d*, 也同样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語的阶段上。

虽然普法尔茨方言在低地德意志語上面已經印上了确定的高地德意志語的全部痕迹, 但它所接受的高地德意志語的輔音音变, 却远未达到那怕是我們的标准語上所保持的那种程度。恰恰相反, 普法尔茨方言, 却借它的輔音逆轉音变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語的音变的程度, 高地德意志音变是从外面侵入普法尔茨方言的, 直至今日, 在这种方言之中, 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 指出一个常被誤解的現象是适当的, 这就是, 方言中的浊輔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語音变的那些日耳曼人, 常把 *d* 和 *t*,

① 恩格斯用鉛筆在頁边上寫着: “同奧特弗里德相符”。——編者注

*b* 和 *p*, 甚至 *g* 和 *k* 的发音混同了。这种混同, 只要在每人說他自己的方言时, 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地, 如剛才所述, 例如普法尔茨人, 他在这一点上的区分是那样严格, 以致当他說外来語的时候, 为了使它們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 甚至对外来語实行輔音的逆轉音变。仅仅因为标准德意志語的 *t* 同他的 *d* 相对应, 他就把外来語詞首的 *t* 变成 *d*, 因为标准德意志語的 *pf* 同他的 *p* 相对应, 于是就把外来語的 *p* 变成 *b*。在其他的南德意志方言中, 只要人們說他們自己方言的时候, 清輔音也是很少发生混淆的現象。其中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輔音音变規則。但是, 一讲标准語或外国話, 情形便不同了。想对这种語言运用当地方言輔音音变規則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无意識的), 跟想正确地讲出这种新語言的企图, 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 写出来的 *b* 和 *p*, *d* 和 *t*, 丧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 因而, 也就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例如, 白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sup>354</sup> 中抱怨說, 法兰西人不能区别 *b* 和 *p* 的发音, 因为他們頑固地认为, 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 *Perne*) 头一个字母是 *p*。

不过, 还是回头来談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語的音变可說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 而在直至今日依然不过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而且絕未达到标准語的語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則远远超过了它, 一般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的某种阶段)——仅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普法尔茨方言所具有的主要是法兰克語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 一般地說, 音变是更加彻底的, 因而就把普法尔茨方言的所謂主要是黑森語的性质, 縮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人的境界上, 在留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間, 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

意志語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除去地名以外,还有两种一般法兰克語的特征可以证明他們的存在,这就是在单詞中間,以法兰克語的 *w* 代替 *b*, 单詞中間和末尾的 *g* 发音为 *ch*。除此以外,个别相符的情况还有許多。普法尔茨方言中的 *Gundach*—*guten Tag* [您好],一直通行到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 «*ein gewisser Mann*» [某一个人] 說成 *ein sichrer Mann* [可靠的人],在整个尼德兰則說成 *een zekeren man*。把 *Handschuh* [手套] 叫做 *Handsching*, 这是和里普利安語的 *Händschen* 一致的。甚至在 *Ghannisnacht* (*Johannisnacht*) 中,以 *g* 代 *j*, 也是里普利安語的現象,而且像我們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閔斯德。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連尼德兰人也在內)所共有的 *baten* (*bessern, nützen* [改善,有用],从 *bat*—*besser* 来),也通行于普法尔茨。例如, *'s badd alles nix*—*es hilft alles nichts* [那全沒用处]; 在这里,甚至 *t* 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語那样音变做 *tz*, 而是像普法尔茨語那样,变为在元音之間的浊輔音 *d*。

弗·恩格斯写于 1881—1882 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7 年第 1 版第 16 卷第 1 部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法兰克方言” 1935 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



注 釋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 注 釋

- 1 这是弗·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28 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 1875 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 年 3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 1875 年 5 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 1911 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 2 卷中（《Aus meinem Leben》，Teil 2, Stuttgart, 1911）。——第 3 页。

- 2 指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 4 页。
- 3 德国人民党 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

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傳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贊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4頁。

4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該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常被逮捕，該报編輯部成員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內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該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从該报創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經常帮助編輯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4頁。

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4頁。

6 指的是哥达綱領草案的下列各項：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 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決議案的直接的立法；3. 实行普遍軍事訓練，以人民軍隊代替常备軍，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問題；4. 廢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結社和集会的法律；5. 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費訴訟。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費教育。2. 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4頁。

- 7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積極參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組織;1867—1868年米·巴枯寧參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動的初期,同盟企圖利用工人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聲稱通過建立“歐洲聯邦”可以消除戰爭,以此在群眾中散布荒謬的幻想,誘使無產階級放棄階級鬥爭。——第5頁。
- 8 斐·拉薩爾“工人讀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版第5頁(F. Lassalle. «Arbeiterlesebuch», Frankfurt am Main, 1863, S. 5)。拉薩爾在這一頁上援引了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這是他在小冊子“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答復”1863年蘇黎世版第15—16頁(«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 S. 15—16)上的提法。——第6頁。
- 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3—978頁〕。——第6頁。
- 10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冊子“拉薩爾的建議”1873年不倫瑞克版(«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第6頁。
- 11 指“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461—504頁)。——第7頁。
- 12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寧在他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導言中所說的話,該書第一卷于1873年在瑞士出版。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寧這本書的綱要中揭露了巴枯寧提出的責難是毫無根據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民主週報”(«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國工人的報紙;該報用這個名稱從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萊比錫出版,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從1868年12月起,該報成為奧·倍倍爾領導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最初該報受到人民黨的小資產階級

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該报开始同拉薩尔派进行斗争,宣傳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創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該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見注4)。——第8頁。

- 13 卡·馬克思的著作“哥达綱領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論的根本問題的发展的重大貢獻,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給了爱森納赫派的領導(給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草案的批評意見,这些意見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綱領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領導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說明。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綱領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給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綱領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緩和某些最尖銳的地方。收集在本版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1頁。

- 14 指作者亲自校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的法文譯本,这一譯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14頁。

- 15 指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它是由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編輯部所屬的該党的出版社于1875年在萊比錫出版的。——第14頁。

- 1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頁。——第24頁。

- 17 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編哈賽尔曼諷刺地称为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該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薩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結德国統治階級的政策,反映了拉薩尔派領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該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場上,一貫反对国际的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們所进行的仇視总委员会的活动。——第25頁。

- 18 馬克思指的是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論;文章同时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較謹慎了:它在背棄国际”。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26頁。

- 19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問題对現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斯堡版第144—161、180頁(«*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論。——第27頁。

- 20 “工場”(«*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編輯部由工人代表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29頁。

- 21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給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魯士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糾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34頁。

- 22 指国际总委员会1875年5月16日的关于在費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會議的机密通告。这个文件应当使国际的成員对即将正式解散組織这一点作好准备。——第36頁。

- 23 指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該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納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在倫敦的德国人支部。倫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第36頁。
- 24 “人民报”（《*La 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編的意大利报纸，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72—1873年是国际的支部的机关报。尽管“人民报”有某种不彻底性，它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給了报纸很大帮助，1871—1873年和1877—1879年为該报撰稿并且同編輯恩·比尼亚米經常通信。1882年，在“人民报”周圍形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独立政党——工人党。对該报的評述見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一文（本卷第110—114頁）。——第37頁。
- 25 这是恩格斯于1876年1月22日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紀念会上的演說。出席會議的有数十人——波兰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主持會議的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委員瓦·符卢勃列夫斯基。恩格斯的演說是用德語发表的，几天以后，他把法語稿給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大概是为了譯成波兰文。——第39頁。
- 26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倫出版，总編輯是馬克思。参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

弗·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萊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萊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特别加紧了。

“新萊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萊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给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39页。

- 27 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写于1876年2月。恩格斯的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33年。——第41页。
- 28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43页。
- 29 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自己的盟友、海格立斯的儿子泰列夫的军队交战起来。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矛枪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

- 癩。——第 51 頁。
- 30 歐·杜林“国民—社会經济学教程，兼論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 1873 年柏林版第 263、264 頁 (E. Dühring. «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Berlin, 1873, S. 263, 264)。——第 52 頁。
- 31 据傳說，科累卓是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婭”前面說这句话的。——第 52 頁。
- 32 是指 1872 年普魯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廢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傳統的世襲領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公社选举社长、在地方行政长官下面設立按等級选举的专区議會，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階級。同时，容克地主們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职务，实际上保持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权力。——第 53 頁。
- 33 “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 1876 年 6—11 月間为威·李卜克內西主編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威·沃尔弗的傳略。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第一卷献給他作为紀念。馬克思曾經打算亲自来写沃尔弗的傳記。他为沃尔弗傳記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 1959 年“近代史和現代史”杂志第 4 期第 105 頁)。但是，馬克思的打算沒有实现，因为他当时沒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資料。
- 除了傳記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萊茵报”所写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題的文章在 1849 年 3 月和 4 月間刊載在报纸上。发表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萊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統計材料对农民受剝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繪，并要求把地主以贖金形式从农民那里盜走的 10 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在讀者中間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將登載这几篇文章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費散发給农民。



- 在 1886 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Abdruck aus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März—April 1849. 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Hottingen-Zürich, 1886）一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許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內容的几章。——第 61 頁。
- 34 指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5—1846 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識形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11—640 頁）。——第 63 頁。
- 35 联邦議會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組成，会址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議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第 65 頁。
- 36 “蠱惑者”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 1819 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會議的決議对德国知識分子中間那些在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內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組織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統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对“蠱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 1830 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 65 頁。
- 37 弗·罗伊特“獄中生活”載于“罗伊特文集”萊比錫和維也納版第 4 卷（F. Reuter. «Ut mine Festungstid». In: «Reuters Werke», Bd. 4, Leipzig und Wien）。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 1863 年 12 月 30 日給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問題杂志”1957 年第 6 册第 1244—1245 頁（《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eft 6, 1957, S. 1244—1245）上。——第 65 頁。
- 38 弗·沃尔弗本人在 1863 年 12 月 30 日給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魯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違反出版法的起訴理由。——第 67 頁。
- 39 指警官維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

陰謀” 1853 年柏林版第 1 册、1854 年柏林版第 2 册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該書的第一册敘述了工人運動的“歷史”(它是警察的指南), 在它的附錄中轉載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有聯繫的人的“黑名單”以及他們的履歷表。——第 67 頁。

- 40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是僑居布魯塞爾的德國政治流亡者創辦的; 1847 年 1 月創刊, 1848 年 2 月停刊。起初, 該報的方針是以它的編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調和民主營壘的各種派別這種意圖決定的。從 1847 年夏天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戰友在該報發表文章以後, 報紙就日益成了宣傳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 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並對該報的方針開始發生直接影響, 1847 年最後幾個月, 他們實際上已經掌握了該報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下, 該報成了形成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第 68 頁。
- 41 德意志工人協會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對居住在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而於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戰友們的領導下, 協會成為公開的聯合在比利時的德國革命無產者的中心, 並跟佛來米和瓦隆工人俱樂部保持了直接的聯繫。協會的優秀分子參加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布魯塞爾支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的活動由於比利時警察當局逮捕和驅逐了它的成員, 在 1848 年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之後不久就停止了。——第 68 頁。
- 42 科倫民主協會 於 1848 年 4 月成立; 它的成員除了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外, 還有工人和手工業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協會, 目的是影響加入該協會的無產階級分子並促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堅決行動。馬克思積極參加協會的領導工作。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萊茵

- 报”其他編輯人員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會議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資產階級的賣國政策，譴責柏林議會和法蘭克福議會的立場不堅定的決議。1849年4月，馬克思及其擁護者採取實際行動着手創立無產階級政黨后，就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斷絕組織聯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70頁。
- 43 指1848年8月26日丹麥和普魯士簽訂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戰爭的停戰協定。從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起義開始的對丹麥的戰爭，是德國人民爭取德國統一的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德國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魯士政府，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不得不參戰。但是，普魯士的統治集團實際上在作戰中實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馬爾摩簽訂了停戰協定。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在1848年9月批准這個停戰協定的決定，引起了抗議的怒潮并導致法蘭克福的人民起義，后来由於普魯士軍隊和奧地利軍隊的援助，這次起義遭到了鎮壓。1849年春天，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戰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魯士和丹麥簽訂了和約，这就使丹麥有可能擊敗國內的起義者。——第70頁。
- 44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開的普魯士國民議會稱為“協商議會”（«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開這個議會的目的是“同國王協商”制定憲法。議會把這個公式作為自己行動的基礎，從而就放棄了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第70頁。
- 45 沃爾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間在加里西亞爆發的烏克蘭農民的起義，當時在克拉科夫恰好爆發了民族解放的起義。奧地利當局利用階級矛盾，使加里西亞的起義農民和準備援助克拉科夫的波蘭小貴族之間發生衝突。農民起義由解除小貴族起義隊伍的武裝開始，后来形成大規模地搗毀地主莊園的行動。奧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貴族的起義運動以后，又鎮壓了加里西亞的農民起義。——第75頁。
- 46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國革命期間民主共和派給資產階級立憲派起的綽號。——第84頁。
- 47 “煽動者”（Wühler）是1848—1849年間德國資產階級立憲派對民主共和派的稱呼。——第99頁。

- 48 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ome I—II, Paris, 1870—1871），第2卷第161頁。——第102頁。
- 49 从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夫人燕妮·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經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105頁。
- 50 后备軍——武装部队的組成部分，它是由年齡較大的应征人員（27岁到32岁）組成的。他們在正規軍服滿現役和規定的預备期限后，即被編入后备軍。后备軍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魯士实行；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軍各部队只进行几次集訓；在战时后备軍則应当担負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第108頁。
- 51 指的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323—452頁），該文于1874年譯成德文在不倫瑞克出版，題为：«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謀”]。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譯文的校訂工作。——第110頁。
- 52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巴枯宁1872年4月5日給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該信和同盟的其他文件一起公布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第十一部分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451—452頁）。——第111頁。
- 53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簡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自1872—1878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每月出两期，从1873年7月起每星期出一期，主編是吉約姆。——第113頁。
- 54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 Handel und Gewerbe*) 是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倫出版的日報。該報是萊茵一些對普魯士專制制度抱有對立情緒的資產階級代表創辦的。該報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爾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卡·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為該報編輯之一。“萊茵報”也發表了弗·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擔任編輯期間，該報具有日益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政府當局對“萊茵報”進行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後來把它封閉了。——第 115 頁。
- 55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盧格。僅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過第一期雙刊號。其中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35 頁)。這些著作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民主主義最終地轉到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雜誌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盧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 116 頁。
- 56 恩格斯指的是法國政府在普魯士政府的壓力下於 1845 年 1 月 16 日下達的將馬克思和“前進報”某些撰稿人驅逐出法國的命令。——第 116 頁。
- 57 “十字報”(《*Kreuz-Zeitung*》) 是“新普魯士報”(《*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的別名(因報頭上印有後備軍的十字章圖樣)，是一家德國日報。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宮廷奸黨和普魯士容克的喉舌。——第 118 頁。
- 58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 1849 年 12 月創辦、1850 年 11 月停刊的雜誌。它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的機關刊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報”的繼續。該雜誌從 1850 年 3 月至 11 月底總共出了 6 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 兩期合刊)。雜誌在倫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

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紐約，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人中間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书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約·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論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办。——第118頁。

- 59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該报由著名的美国新聞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輝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該报站在进步的立場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該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繼續了10年以上。为“紐約每日論壇報”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約恩格斯写的。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馬克思停止了撰稿，因为当时編輯部內主張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了，并且报纸的編輯部也离开了进步立場。——第119頁。
- 60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倫敦用德文出版。該报是作为倫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創办的。从第2号起，該报就在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不久馬克思就成了該报的事实上的編輯。在“人民报”上曾刊載过馬克思为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給馬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評論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許多文章。該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該报因缺乏資金而停刊。——第119頁。
- 61 見注48。——第119頁。
- 62 指1873年的席卷了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經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

刻。——第 123 頁。

- 63 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是在該杂志于 1877 年 10 月登載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紀事”第 10 期，“时評”第 320—356 頁)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資本論”的錯誤的解釋。馬克思的信沒有寄出，是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 1884 年 3 月 6 日的信一起寄給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員維·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 1886 年“民意道报”第 5 期上发表。在俄国，馬克思的这封信于 1888 年 10 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 126 頁。
- 64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I, Hamburg, 1867, S. 763. ——第 126 頁。
- 65 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設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諾威—柏林版第 I—III 册 (A. Haxthause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 I—III, Hannover—Berlin, 1847—1852)。——第 126 頁。
- 66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81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18 頁〔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1 頁〕)。——第 126 頁。
- 67 K. Marx. «Le Capital». Paris, [187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28 頁) 这一段引文和第 23 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別，是因为馬克思援引的“資本論”第 1 卷是根据 1875 年的法文版，而俄譯本第 23 卷是根据 1890 年的德文第 4 版〔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05 頁〕。——第 130 頁。
- 68 指 1866 年 5 月 7 日在柏林發生的謀刺俾斯麥未遂一事。——第 132 頁。
- 69 恩格斯指的是争取法兰西共和国反对保皇勢力的斗争，其中包括 1876

- 年选举以后保皇党集团和众議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之間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于是在法国确立了議會制共和国。——第 133 頁。
- 70 1877 年在美国，工人階級同企业主的斗争已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 年 7 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綫(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紐約中央铁路)减低工資 10%而引起的，只是由于政府軍隊和資產階級的武装队伍的帮助，罢工才被鎮压下去。——第 133 頁。
- 71 指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第 134 頁。
- 72 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写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 1876—1900 年出版的。1931 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Die Gesellschaft》Jahrg. 8, Bd. II)发表，用俄文在“階級斗争”杂志第 6—7 期上发表。——第 135 頁。
- 73 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 137 頁。
- 74 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 1870 年 9 月 1—2 日进行的，以德軍胜利和麦克馬洪指揮的法軍投降而告結束。法軍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潰。——第 139 頁。
- 75 指无政府主义者 1877 年占領意大利貝內万托省的小城列亭諾的那次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鎮压下去了。——第 142 頁。
- 76 諷刺話，是根据这样一个傳說：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縫，向下院提出控訴书，头一句話是：“我們，英国的人民。”——第 145 頁。
- 77 指新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La Emancipacion》)揭露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馬德里联合会的“解放报”編輯委員于 1872 年 7 月 8 日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新馬德里联合会的組織工作和活动。新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傳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傳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階級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



- 报“解放报”撰稿。——第 145 頁。
- 78 “抗議报”（《O Protesto》）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 1875 年起开始在里斯本出版。——第 146 頁。
- 79 指 1875 年 10 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爾維亞）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第 149 頁。
- 80 根据 1872 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 153 頁。
- 81 指 1863—1864 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 157 頁。
- 82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发行。——第 159 頁。
- 83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915 年在柏林出版。——第 159 頁。
- 84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的简称。该报是普魯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从 1851 年至 1871 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 159 頁。
- 85 “先驅”（《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的机关刊物；1866 年至 1871 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編是約·菲·貝克尔。该杂志总的說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有系統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 159 頁。
- 86 指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于 1878 年 5 月 31 日在福克斯頓城（英国）附近的加来海峡因同“威廉国王号”輪船冲撞而沉沒。——第 160 頁。
- 87 卡·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写于 1878 年 7 月初，是对叛徒豪威耳在“十九世紀”杂志发表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答复，因为该文对国际的历史和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虛伪的断言。杂志編輯部拒絕刊登馬克思的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于 1878 年 8 月 4 日在“世俗紀事”（《The Secular Chronicle》）杂志第 3 期上发表。该杂志具有无神論—共和傾向，編輯哈·罗当时是国际会员。

这篇文章的德譯文登在 1901—1902 年“新时代”(«Neue Zeit») 第 1 卷第 1 期第 585—589 頁。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意。馬克思这篇文章的俄譯文第一次发表在 1933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1 期上。——第 163 頁。

- 88 見“十九世紀”第 4 卷第 19 頁，1878 年 7—12 月，倫敦。

“十九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 是英国自由派的月刊；从 1877 年至 1900 年用这个名称在倫敦出版；从 1900 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紀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从 1951 年起則用“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 名称出版。——第 163 頁。

- 89 豪威耳把 1865 年 9 月 25—29 日召开的倫敦代表會議称为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會議工作的有总委员会委員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代表會議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 and 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議程。由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倫敦代表會議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組織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163 頁。

- 90 馬丁的信在 1865 年 10 月 14 日“世紀报”上发表。

“世紀报”(«Le Siècle») 是从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164 頁。

- 9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0—22 頁。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22—29 日之間写的。11 月 22 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林肯，祝賀他再度当选总统。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于 1864 年 11 月 29 日經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由美国駐倫敦公使亚当斯轉交給林肯总统。1865 年 1 月 28 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該信于 1 月 31 日在总委员会會議上宣讀，并在 1865 年 2 月 6 日“泰晤士报”上刊載。正如馬克思在給威·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林肯給他收到的各团体的賀信的回信中，只有給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賀信”。——第 165 頁。

- 92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是米·巴枯宁在 1868 年創建的組織。

同盟的盟員宣布无神論、階級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綱領。他們否认工人階級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資產階級无政府主义的綱領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請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組織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員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組織，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鎮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別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建立的工人階級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絕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約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165頁。

- 9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17頁。——第166頁。
- 94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倫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馬克思参加了該报編委会；从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編輯。該报刊載过关于总委员会會議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該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領袖們的妥协政策，該报在选举改革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針，实际变成了激进資產階級的机关报。——第166頁。
- 9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90頁。——第167頁。
- 96 見卡·馬克思給“每日新聞”編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2—403頁)。——第167頁。
- 97 地主議會是1871年法国国民議会的卑称。該議會成員多半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农村选区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議會的630名議員中大約有430名保皇党人。
- 1871年底，这个国民議會着手調查巴黎公社事件，調查材料发表时名为“議会对3月18日起义的調查报告”1872年凡尔賽版第1—3卷(«*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 T. I—III, Versailles, 1872)。——第167頁。

- 98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9頁)。——第167頁。
- 99 这里和上面讲的是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敗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鎮压手段。在許多国家里,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在1872年3月公布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博尼法西奧的通令中,要求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对国际采取共同行动。德奧两国皇帝于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月在薩尔茨堡会晤时,也专门商討过共同对付国际的問題,这两次会晤是由俾斯麦同奧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約定的。——第168頁。
- 10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9年9月17—18日写的通告信虽然是寄給奧·倍倍尔的,但作者却是指定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領導的,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給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領袖中間内部傳閱”。弗·伊·列宁(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把他們对党內出現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場的叙述叫做“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內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領袖們发出一个通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0頁)。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9月中拟定的。9月17日馬克思一回到倫敦,他們两人就立即共同討論这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
- 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2年卷第23册上。——第172頁。
- 101 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它是卡·赫希柏格(用的是路德維希·李希特尔这个笔名)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該杂志共出3册。——第172頁。
- 102 “灯籠”(«Die Laterne»)杂志是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一种諷刺性周刊;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施行时,曾批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

机会主义倾向；該杂志从 1878 年 12 月 15 日至 1879 年 6 月 29 日在布魯塞尔出版，由卡·希尔施主編。——第 175 頁。

103 “自由”(«*Freiheit*»)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一种德文周报，由約·莫斯特 1879 年創辦于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評莫斯特和他主編的報紙发表无政府主义的言論。后来，該报在比利时(1882 年)和美国(1882—1910 年)出版。——第 178 頁。

104 “前进报”(«*Vorwärts*»)是 1876 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 1876 年 10 月起在萊比錫出版。1878 年 10 月，該报因頒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停刊。——第 181 頁。

105 这篇文章是由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合写的，載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 年苏黎世版第 1 年卷第 1 册第 75—96 頁上。——第 182 頁。

106 指 3 月 18 日柏林的街垒战，它为德国 1848—1849 年的革命奠定了始基。——第 185 頁。

107 指 1878 年 10 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187 頁。

108 “未来”(«*Die Zukunft*»)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从 1877 年 10 月至 1878 年 11 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該杂志的出版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批評了該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

“新社会”(«*Die Neue Gesellschaft*»)是 1877—1880 年在苏黎世出版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杂志。——第 188 頁。

109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 1880 年 2 月底，在“平等报”(«*Égalit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 1877 年萊比錫出版的魯·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濫設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77)一书中的事实。

“平等报”(«*L'Égalit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 1877 年由

- 茹·盖得創辦,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該报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号),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在1886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191頁。
- 110 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載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辯論速記报告”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會議,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頁(«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78, Bd. I, Berlin, 1878, S. 70, 125)。——第191頁。
- 111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銀行,創辦于1852年。*Crédit M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貸的中介和濫設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創立)。該銀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 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1867年,該銀行破产,1871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 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馬克思专门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資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頁)。——第193頁。
- 112 指勒洛在他的1877年不倫瑞克出版的“費拉得尔菲亚来信”(«Briefe aus Philadelphia». Braunschweig, 1877)一书中的見解。——第194頁。
- 113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85—294頁)。——第200頁。
- 11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弗·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論”中的三章編成的。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中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第三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題发表在法

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評論”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譯本的基础。1883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頁上标的是1882年）。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譯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傳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論”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論”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201頁。

115 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G. W. F. Hegel.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Werke, 2. Aufl., Bd. IX, Berlin, 1840）。——第206頁。

116 按照卢梭的理論，人們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們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約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約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約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論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約論，或政治权利的原則”（«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發揮。——第206頁。

117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們是十七世紀英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貧民阶层的利益，他們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傳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07頁。

118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烏托邦”（1516年

出版)和托·康帕內拉“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07頁。

- 119 恐怖时代 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倫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08頁。

- 120 指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09頁。

- 121 “一个日内瓦居民給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門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沒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時間。恩格斯用的版本是:G. 雨巴“圣西門。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門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 Hubbard. «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 Paris, 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門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傅立叶的第一部大作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紀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檢查,在扉頁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萊比錫)。

新拉納克(New Lanark)是苏格兰拉納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紡厂,創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圍形成一个小鎮。——第209頁。

- 122 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門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給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話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頁和第135頁上。——第212頁。

- 123 恩格斯指“昂·圣西門給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話。这些信載于昂·圣西門的論文集“实业,或为貢獻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



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議論”1817年巴黎版第2卷(H. Saint-Simon. «L'industrie, 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 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 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 T. II, Paris, 1817)。这些話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頁上。——第212頁。

- 124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門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論欧洲社会的改組，或論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 («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 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見” («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 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頁，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內容則刊在第68—76頁。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魯士等国)的同盟国軍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侖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侖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島。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 是指拿破侖恢复帝制的短暫時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島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敗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12頁。

- 125 1815年6月18日，拿破侖的軍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頓指揮的英荷联軍和布呂歇尔指揮的普魯士軍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預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魯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侖帝国的崩潰。——第212頁。

- 126 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論”中已經得到了发

揮，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論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論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1, p. 195—196）。——第 213 頁。

- 127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統一的理論”第 1 卷和第 4 卷；“全集”1843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78—79 頁和 1841 年巴黎版第 5 卷第 213—214 頁（Ch. Fourier.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I et IV; Oeuvr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1843, p. 78—79 et t. V, Paris, 1841, p. 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見沙·傅立叶“經濟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全集”1845 年巴黎版第 6 卷第 27—46、390 頁（Ch. Fourier.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27—46, 390）。該书的第一版于 1829 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1, p. 202。——第 213 頁。

- 128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35。——第 213 頁。

- 129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1, p. 50 et suiv. ——第 213 頁。

- 130 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 年倫敦版（R. Owen.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第 216 頁。

- 131 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 月 18 日、4 月 12 日和 19 日、5 月 3 日”1823 年都柏林版（R. Owen.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on the 18th March, 12th April, 19th April and 3rd May». Dublin, 1823)。——第 216 頁。

- 132 1815 年 1 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 1815 年 6 月欧文的倡議提出的法案到 1819 年 7 月才被議會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調整棉紡厂劳动的法律禁止 9 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 18 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 12 小时，規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間休息作为早飯和午飯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 217 頁。
- 133 1833 年 10 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倫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顛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門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 1834 年 2 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徑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計劃遭到了失敗。由于受到資產階級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該联盟于 1834 年 8 月宣告解散。——第 217 頁。
- 134 指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創立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換市場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第一个这样的市場是罗伯特·欧文于 1832 年 9 月在倫敦創办的，存在到 1834 年年中。——第 217 頁。
- 135 蒲魯东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做了組織交換銀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銀行 (Banque du peuple) 于 1849 年 1 月 31 日在巴黎成立。銀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紙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 4 月初宣告关闭。——第 217 頁。
- 136 德·狄德罗的对話“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 1762 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經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譯成德文于 1805 年在萊比錫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 1821 年 (实际上是 1823 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軼文集”(«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一书中。——第 219 頁。

- 137 科学发展的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是指紀元前三世紀到公元七世紀的时期,这个名称是由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經濟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得到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許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 220 頁。
- 138 “聖經”,“馬太福音”第 5 章第 37 节。——第 221 頁。
- 139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說,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 *nebula* ——霧)发展而来的,他在 1755 年科尼斯堡和萊比錫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論,或根据牛頓原理論述宇宙的結構和机械起源的嘗試”(«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 abgehandelt». Königsberg und Leipzig, 1755) 中闡述了这一假說。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說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 [1796] 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說”第 1—2 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I—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796]) 中得到了闡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編好而在死后出版的該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說是在該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釋中加以闡述的。——第 223 頁。
- 14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322—515 頁[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371—620 頁]。——第 230 頁。
- 141 指欧洲各大国之間为爭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場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 和 1672—1674 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間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紀末,在它手中已經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貿易。——第 234 頁。
- 142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資本論”第一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 第2版第23卷第445頁和第498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29—530頁和第595—596頁〕。——第236頁。
- 14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3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3—564頁〕。——第236頁。
- 14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0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13頁〕。——第236頁。
- 145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頁 (Ch. Fourier. 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393—394)。——第237頁。
- 146 *Seehandlung* (海外貿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魯士成立的貿易信用公司。該公司享有許多重要的國家特權,它給予政府巨額貸款,實際上起了政府的銀行老板和財政方面的經紀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為普魯士國家銀行。——第239頁。
- 147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對這個口號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見馬克思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第四節和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信(本卷第30—35頁和第3—10頁)。另見列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4節和第四章第3節(“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頁和第426—429頁)。——第242頁。
- 148 這裡關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全部財富的材料引自羅·吉芬的報告“近來聯合王國的資本積累”。這個報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統計學會宣讀的,發表在1878年3月號倫敦“統計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上。——第244頁。
- 149 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舉行。——第245頁。
- 150 “關於‘哲學的貧困’”的短文是馬克思於1880年3月底寫成的,載於1880年4月7日法文報紙“平等報”第2種專刊第12號上,作為編輯部對該報發表“哲學的貧困”一文的引言。

这篇短文的手稿第一次刊登在“年鉴”杂志上1958年米兰版第1年卷第204—205頁上(《Annali》, Anno I, Milano, 1958, p. 204—205)。——第248頁。

- 151 比·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第248頁。

- 152 “經濟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法国自由派的經濟学杂志,1841—1943年間在巴黎出版。——第248頁。

- 153 是指“論蒲魯东”一文,这篇文章是馬克思因蒲魯东逝世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施韦澤的請求于1865年1月24日写成的,刊载于1865年2月1、3、5日該报第16—18号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頁)。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該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至1865年約·巴·施韦澤任該报編輯,当时編輯中还有威·李卜克內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澤寄来的該报办报綱領,其中沒有包含拉薩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沒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他們就同意給“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但是在1865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停止为該报撰稿,因为同施韦澤存在着原則性的意見分歧。——第249頁。

- 154 “工人調查表”是馬克思应“社会主义評論”杂志的出版人边·馬隆(他在1880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蓬勃高漲的影响下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請求,在1880年4月上半月編写成的。“調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評論”上(沒有署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社会主义評論”杂志編輯部为发表“調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資產階級共和政府)都还不敢对法国

工人階級的狀況做認真的調查。可是，關於農業危機、金融危機、工業危機、商業危機和政治危機的調查卻有多少啊！

英國政府的官方調查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丑惡行徑的揭露，以及由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許可的工作日限制為 10 小時，關於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國資產階級更加害怕由於進行公正和系統的調查而帶來的危險。

我們希望也許我們能促使法國共和政府仿效英國君主政府的榜樣，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所作所為及其罪行進行廣泛的調查；因此我們利用自己的一點有限的款項，試圖為這件事作出一個開端。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鄉工人的支持。他們懂得：只有他們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們所忍受的災難；只有他們，而不是上帝派來的拯救者，才能堅決地採取有效措施來對付他們遭受的社會災害。我們也期望得到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者的幫助，既然他們想進行社會改革，那就應該願意準確而清楚地了解工人階級這個未來正是屬於它的階級進行工作和活動的條件。

這些勞動委託書是社會民主派為了準備社會革新所應該作的第一件事。

下面列舉的一百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回答問題時必須寫明所答問題的順序號碼。不一定要回答全部問題，但我們建議儘可能回答得具體和詳細些。回答問題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沒有得到特別許可將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應寫明，以便在必要時進行聯繫。

請將答复寄交巴黎近郊聖克魯羅伊亞爾街 28 號‘社會主義評論’雜誌負責人累克呂茲先生。

問題將進行分類，以便為專題著作提供材料。這些專題著作將刊登在‘社會主義評論’上，以後還將出版單行本。”——第 250 頁。

- 155 弗·恩格斯的小冊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導言是馬克思在 1880 年 5 月 4—5 日左右寫的。在小冊子中導言是由恩格斯這一著作的法文本譯者拉法格署名的。在新近發現的手稿中發現有馬克思給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說，導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後寫的，請拉法格“在詞句上加修飾，但是不要修改內容”。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導言是作為附錄刊印的。——第 259 頁。

156 “社会主义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後來成為可能派的倍·馬隆創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會主義的刊物,後來是激進派和合作派的刊物;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兩地出版,從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八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該雜誌撰稿。——第 259 頁。

157 弗·恩格斯“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 259 頁。

158 “北極星報”(《*The Northern Star*》)是英國的一種週報,憲章派的機關報;1837年創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從1844年11月起在倫敦出版。該報的創辦人和主編是非·奧康瑞爾,在四十年代喬·哈尼也做過該報的主編。從1843年至1850年該報登載過恩格斯的一些論文和短評。

“新道德世界和理性社會的報紙”(《*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週報,1834年由羅·歐文創辦,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從1841年10月起在倫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為該報撰稿。——第 260 頁。

159 這一時期的事件詳見恩格斯的著作“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頁)。——第 260 頁。

160 1879年在馬賽舉行的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上成立法國工人黨以後,以茹·蓋得為首的一批法國社會主義者決定請求(通過保·拉法格)馬克思和恩格斯幫助制訂工人黨的競選綱領草案。1880年5月蓋得抵達倫敦,在那里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訂了法國工人黨綱領。綱領分為理論部分和實踐部分(或稱最低綱領)。綱領的理論部分導言是馬克思對蓋得口授的。至於綱領其餘的一部分,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給伯恩施坦的信中曾談到它:“接下去就討論綱領的其他內容,在這裡我們提出了某些增減。”



綱領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后来(1880年7月10日)又发表于“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和“社会主义評論”(1880年7月20日)。

下面援引的最低綱領是根据“平等报”刊載的：

#### **“A. 政治方面：**

1. 廢除一切出版法、集会法和結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工資計算簿这种登記工人阶级的办法和法典中有关使工人处于和雇主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条文。

2. 取消宗教經費并将‘认为不能出让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給国家(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体的工商业企业。

3. 普遍武装人民。

4. 公社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察机构。

#### **B. 經濟方面：**

1. 星期一为每周休息日，换言之，即頒布一項禁止业主要求工人在星期一上工的法律。——通过立法限制成年人的工作日为8小时。——禁止私营企业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而14岁至18岁的工作日通过立法限制为6小时。

2. 法律規定按当地的食物价格每年确定一次最低工资。

3. 男女工人的工資平等。

4. 由国家和公社代表的社会負担全体儿童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費用。

5. 取消雇主对工人互助会、保險会管理的任何干涉，重新恢复純粹由工人管理。

6. 业主对不幸事故的责任，应由雇主提交保证金来保障，其比例与他現有工人数量和企业工作的危險性相称。

7. 工人参加制訂各个不同車間的专门規則，取消被雇主据为已有的任意規定对工人罰款或尅扣工資的权利(1871年4月27日巴黎公

社法令)。

8. 修改一切涉及公共財產(銀行、鐵路、礦場等等)收歸國有的契約并由一切國家企業的在業工人經營國家的企業。

9. 廢除一切間接稅, 并把一切直接稅改為收入在 3 000 法郎以上和遺產在 20 000 法郎以上的累進稅。”——第 264 頁。

161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封也有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納簽名的公開信, 是 1880 年 11 月 29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 1830 年波蘭起義紀念會上宣讀的。紀念會是由波蘭“平等”雜誌(«Równość»)編輯部召開的。參加紀念會的約有 500 名社會主義者, 他們是各民族的代表, 其中有波蘭人、俄羅斯人、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紀念會是在國際團結和各國勞動人民在反對資本鬥爭中的目的和任務一致的口號下進行的。——第 265 頁。

162 1846 年 2 月在波蘭國土上醞釀了爭取波蘭民族解放的起義。起義的主要發起人是波蘭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埃·鄧波夫斯基等人)。由於貴族分子的叛變和起義領導人被普魯士警察逮捕, 總起義遭到了破壞, 僅在個別地區舉行了革命發動。只有在 1815 年以來就歸奧地利、俄國和普魯士共管的克拉科夫, 起義者才在 2 月 22 日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民族政府, 該政府發表了廢除封建義務的宣言。

鄧波夫斯基代表了農民和城市下層羣眾的利益, 他在克拉科夫起義時制定的綱領中, 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義的要求, 也反映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要求(將土地分給無地者, 成立國家的或“社會的”工廠來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各種計劃)。克拉科夫的起義在 1846 年 3 月初被鎮壓下去。1846 年 11 月, 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簽訂了將克拉科夫合併給奧地利帝國的條約。——第 266 頁。

163 指 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在倫敦召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了大會的工作。——第 266 頁。

164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 1881 年 2 月 16 日來信的回信, 是 1881 年 3 月 8 日寫的。查蘇利奇代表較遲加入“勞動解放社”的同志們, 請求馬克思談談他對俄國歷史發展的前景, 特別是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命

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談到卡·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該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問題及农村公社問題的爭論中所起的作用。她說：“你比誰都清楚，这个問題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們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們經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見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爭辯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繼續說——你对这个問題的見解是多么引起我們的注意，假如你能說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應經過資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論的看法，給我們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馬克思在准备給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綜合起来，就是一个內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綜合性概述。給查苏利奇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載于本卷“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部分(第 430—452 頁)。——第 268 頁。

- 165 是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 268 頁。
- 166 K. Marx. «Le Capital». Paris, [1875], p. 31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26 頁和第 728 頁〔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03 頁和第 905 頁〕。文中的差別見注 67)。——第 268 頁。
- 16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772 頁〔參看“資本論”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963 頁〕(文中的差別見注 67)。——第 268 頁。
- 168 出席 1881 年 3 月 21 日在倫敦举行的大会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塞爾維亞的社会主义者。俄罗斯革命者、民粹派列甫·加特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成立了斯拉夫人革命俱乐部。——第 270 頁。
- 169 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決定 1881 年 3 月 1 日在彼得堡刺杀了皇

帝亚历山大二世。——第 270 頁。

170 指 1878 年俾斯麦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80 年春，非常法的有效期又延长了 5 年。——第 270 頁。

171 本文是恩格斯替“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恩格斯从 1881 年 5—8 月是該报的撰稿人。这些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差不多每星期有一篇作为社論定期地刊登出来。由于該报的总的机会主义方針恩格斯不得不停止撰稿。

“劳动旗帜报”(*The Labour Standards*) 是一家英国周报，是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 年在倫敦由乔·希普頓編輯出版。——第 273 頁。

172 这里是指 1824 年議會廢除了不准建立任何工人組織并进行活动的禁止結社法。但是 1825 年通过的結社法，或者說工人联合法，极其严格地限制了工会的活动。例如，仅仅是进行爭取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的鼓动，就被认为是“强迫”和“暴力”，并按刑事罪論处。——第 273 頁。

173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 1873 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約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許多場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訴訟程序是根据所謂“正义法”进行的。——第 277 頁。

174 这里指的是在爱尔兰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的不滿，这种不滿的产生是由于格萊斯頓政府試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們对租佃者的专橫行为，从而使爱尔兰农民脱离在爱尔兰已經展开的革命斗争。1881 年的土地法案限制了大地主从租地上赶走租佃者的权利，如果后者按时繳納租金；租金額 15 年不变。虽然 1881 年的法令使大地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土地卖给国家，而且規定的租金仍然非常高，但是英国的土地占有主仍然阻撓法令的通过，力图在爱尔兰保持不受限制的統治。——第 282 頁。

- 175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項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項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滿21岁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选人的财产資格限制，发給議員薪金。1839、1842和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书都被議會否決了。——第284頁。
- 176 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革。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法律，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資格限制，在那里，租佃者的财产資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繳納12英鎊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賃者，以及在該地居住滿一年并繳納房租10英鎊以上的住戶，都有选举权。1867年改革的結果，英国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第285頁。
- 177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論者坚持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論者的宣傳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領導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紡織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論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則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87頁。
- 178 指1858年撤銷东印度公司以后，印度轉归不列顛国王直接管轄。——第288頁。
- 179 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輸入粮食的所謂 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之間的斗争，結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廢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費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結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產階級的利潤。——第289頁。
- 180 反谷物法同盟 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于1838年創立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廢除所謂的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自由貿易的口号曾被同盟广泛用来进行所謂工人和工业家利益一致的蠱惑性的宣傳。1846年廢除谷物法后，同盟就不存在了。——第289頁。

- 181 見注 174。——第 306 頁。
- 182 1881 年土地法案的施行(这个法案于 1881 年 8 月成为法律),引起了爱尔兰租佃者的反抗。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出军队去强迫抗拒繳納租金的租佃者迁走。——第 308 頁。
- 183 英国議会在十九世紀曾經数次通过 高压法 (coercion bills) 来鎮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別的全权。——第 309 頁。
- 184 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英国議會議員約翰·狄龙当时关在监牢里这一情况。——第 309 頁。
- 185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 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迈克尔·戴維特于 1879 年建立的群众性組織。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貧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資產階級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議。但是土地同盟的領袖們采取不彻底的动搖的立場,而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帕涅尔等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結为爭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也就是爭取在不列顛帝國的範圍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土地同盟于 1881 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第 310 頁。
- 186 見托·卡萊尔“过去和現在”1843 年倫敦版第 361—369 頁(《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 p. 361—369) 和“当代評論。第一篇。現时代”1850 年倫敦版第 42 頁(《Latter-Day Pamphlets. № 1.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50, p. 42)。——第 312 頁。
- 187 恩·恩格尔“从技术和統計說明蒸汽时代”1881 年柏林第 2 版 (E. Engel. 《Das Zeitalter des Dampfes in technisch-statistischer Beleuchtung》. 2. Aufl., Berlin, 1881)。正文中的表格是恩格斯根据恩格的书的第 178、180、182—184 頁上的統計材料制出的。——第 313 頁。
- 188 指 1831 年为英国下院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

- 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为工业資产階級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會的大門。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軍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受了自由資产階級的欺騙而沒有获得选举权。——第 316 頁。
- 189 恩格斯指的是 1881 年 10 月 27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 30 多万張选票。——第 320 頁。
- 190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82 年 1 月 21 日写成的。格·瓦·普列汉諾夫发起进行这一版的准备工作。和馬克思、恩格斯有亲密关系的彼·拉甫罗夫，直接請求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1882 年 1 月 23 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序言原文寄給了他。該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 1882 年 2 月 5 日“民意”杂志上。“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諾夫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 1882 年在日內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 該序言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 1882 年 4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 号上，是根据“民意”杂志上的俄文序言翻譯的。1890 年恩格斯重新发表了 1882 年的原文，并把它編入“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序言。——第 325 頁。
- 191 日期說得不确切，这一版是在 1869 年出版的。——第 325 頁。
- 192 “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 1857 年至 1867 年用俄文出版；1868 年至 1869 年該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 年前在倫敦出版，以后在日內瓦出版。——第 325 頁。
- 193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納。——第 326 頁。
- 194 恩格斯的“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 1882 年 4 月下半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鮑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鮑威尔关于新約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統

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結論。所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場上，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

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1883)和“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327頁。

- 195 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詞，用为印欧語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用語是根据十九世紀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統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現在已經陈旧了。在現代資產階級著作中，“雅利安人”一詞是指印欧語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言。——第327頁。
- 196 对于新約的批評見布·鮑威尔的下列著作：“約翰福音史”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 Bremen, 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萊比錫版第1—2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I—II, Leipzig, 1841)及該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者和約翰的福音史批判”1842年不倫瑞克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 Braunschweig, 1842)。——第327頁。
- 197 克·哥·維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編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注釋批判研究”1838年德勒斯頓和萊比錫版(Ch. G. Wilke. «Der Urevangelist oder exegetisch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ß der drei ersten Evangelien». Dresden und Leipzig, 1838)。——第328頁。
- 198 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論：“經過批判整理的耶穌傳”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d. I—II, Tübingen, 1835—1836)。——第328頁。
- 199 恩格斯指海涅的諷刺詩“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見文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輕的浪蕩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第329頁。



- 200 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第2版第4卷第222—224頁(H. Ewald.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bis Christus». 2. Ausg., Bd. 4, Göttingen, 1852, S. 222—224)。——第330頁。
- 201 指聖經之一“約翰启示录”。——第330頁。
- 202 指佩特罗尼烏斯的“薩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財的被釋放的奴隶特里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331頁。
- 203 雅·菲·法耳梅賴耶尔“摩里亚半島中世紀史”1830年施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第227頁(J. Ph.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Th. I,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30, S. 227)。——第332頁。
- 204 “白厅評論”(«The Whitehall Review»)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876年至1929年在倫敦出版。——第337頁。
- 205 “紐約人民报”(«New-York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出版的日报,从1878年至1932年在紐約出版。——第339頁。
- 206 F. Engels.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0。——第345頁。
- 207 Fr. Engels. «Soc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ève, 1882。——第345頁。
- 208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时期出版的一种周报,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倫敦出版。馬克思和为該报撰稿的恩格斯都反对过該报的錯誤,帮助該报在自己的篇幅中貫徹党的无产阶级的路綫。——第345頁。
- 20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頁。——第347頁。
- 210 刊登在1882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弗·恩格斯的文章“品特是怎样造謠的”,发表时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在这篇文章前面,編

輯部写了下面的話：“我們的一位最杰出的德国同志写了一篇題为品特是怎样造謠的文章……”。——第 348 頁。

- 211 恩格斯指的是使工人階級的状况急剧恶化的經濟蕭条所引起的法国罢工运动，其中有孟索-累明事件。受尽矿主殘酷压迫的孟索-累明的煤矿工人起来反对矿主。1882年10月“北德总汇报”刊登了許多像恩格斯所描述的报道这些事件的通訊。——第 348 頁。

- 212 这里指的是 1882 年 7 月 4 日在維也納布置的一次警察挑衅事件。为了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制造一个訴訟案，控告他們为党搞經費而进行謀杀，发生了暗中安排好的搶劫梅尔施塔林格尔鞋匠的事件。

1882 年 8 月 29 日“北德总汇报”第 401 号上，登載了把这一謀杀事件同社会民主党牽連在一起的通訊。——第 349 頁。

- 213 1882 年 10 月 21 日“北德总汇报”第 493 号。——第 349 頁。

- 214 “馬尔克”一文是恩格斯于 1882 年 9 月中到 12 月上半月写的，它是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小册子的附录。本文部分利用了恩格斯研究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收集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些研究，載于本卷“遺稿”部分。1883 年本文轉載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并印成单行本。在恩格斯生前，“馬尔克”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起用德文出了 4 版。

本卷中所載的“馬尔克”一文，是根据恩格斯审阅过的德文第四版“社会主义的发展”(1891)譯出的。1892 年，“馬尔克”也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附录由爱·艾威林譯成英文出版，恩格斯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馬克思在閱讀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曾对該文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談到这篇論文时写道：“‘馬尔克’这篇附录，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中傳播某些有关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的基本知識而写成的。当这个党的影响几乎已經扩大到了全体城市工人，因而需要去爭取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了。”——第 351 頁。

- 215 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題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紀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馬尔克制度、农戶

- 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論”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德国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戶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9—1871)。——第353頁。
- 216 恩格斯指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的著作“高卢战記”。这里讲到的事实,載于第4册第22章。——第353頁。
- 217 “帝国法”是中央政权頒布的中世紀日耳曼帝国的全帝国法律。見这些法律的最完备的汇编之一:“H. E. 恩德曼博士根据1372年手稿(同其他手稿校訂过)并附有注釋的帝国法”1846年加塞耳版第244頁(«Das Keyserrecht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1372 in Vergleichung mit andern Handschriften und mit erläuternden Anmerkungen herausgegeben von Dr. H. E. Endemann». Cassel, 1846, S. 244)。恩格斯引用的材料載于“关于森林法”部分。——第354頁。
- 218 “民族法”(即所謂野蛮人法,拉丁文为 *Leges barbarorum*, 德文为 *Germanische Volksrechte*, 是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部落于五至七世紀在过去西羅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領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这部民族法是五至九世紀之間制定的。——第356頁。
- 219 “里普利安法”是一个古代日耳曼部落——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法兰克人于四至五世紀居住在萊茵河和麦士河之間。

- “里普利安法”，是研究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社会制度的主要材料。“里普利安法”第八十二节(表 A)和第八十四节(表 B)。談到了耕地的私人占有制。見最完備的版本之一：“里普利安和法兰克—哈瑪維法”1883年汉諾威版第104頁(«Lex Ribuarica et lex Francorum Chamavorum». Hannoverae, 1883, p. 104)。——第357頁。
- 220 恩格斯指1878年4月15日頒布的各种林木盜竊法(«Gesetz, betreffend den Forstdiebstahl»),該法律規定,未經警察的特別允許不准采集草、野果和磨菇。——第359頁。
- 221 指陪審員法庭。这种法庭于1848年革命以后在許多德意志邦內建立,自1871年以后則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審員)組成,和过去的陪審員不同,他們参与了全部审判,不仅是确定罪行,而且規定处罰方法。法庭成員是从統治階級的代表中特別挑选出来的。——第360頁。
- 222 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該帝国是一个暫时的不巩固的軍事行政联盟。843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間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領土,包括現代法国的大部分領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萊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德国的核心)交給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間的地帶則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362頁。
- 223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战争,是各欧洲国家集团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它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斗争形式。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派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以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陣营。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邦君,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的國家;捷克、丹麦、瑞士、荷兰共和国和許多經過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國家會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德意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場所,是战争参加者的軍事掠夺和侵略野心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結束,簽訂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約,該和約巩固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第366頁。

- 224 *Code civil* 是拿破侖第一的民法典，这个法典也曾在法国人占領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萊茵省归并普魯士以后，这个法典在該省繼續有效。——第 367 頁。
- 225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魯士軍隊在耶拿近郊的潰灭，迫使普魯士向拿破侖的法国投降，这表明了霍亨索倫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 367 頁。
- 226 “正义报”（《*La Justice*》）是法国的周报，激进党的机关报，从 1880 年至 1930 年在巴黎出版。在 1880—1896 年期間，領导該报的是报纸的創办者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謂“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綱領而反映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第 370 頁。
- 227 “馬賽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 年 12 月至 1870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該报經常刊載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燕妮·馬克思所写的一些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文章刊登在 1870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馬賽曲报”第 71、79、89、91、99、113、118 和 125 号上（共 8 篇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70—700 頁）。——第 370 頁。
- 228 新喀里多尼亚島 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島屿，那里的气候对人的身体极其有害，是巴黎公社社員的流放地。——第 371 頁。
- 229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的报纸，該报于 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报发表过文章。馬克思从 1844 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該报的編輯工作，該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該报对普魯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銳的批評。根据普魯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內閣于 1845 年 1 月下令把馬克思及該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員驅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 375 頁。
- 230 关于敖德薩大学的学生希望向馬克思墓献花圈的消息，載于 1883 年 4 月 1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7 号。根据他們的要求，花圈的題詞应

- 为：“献给‘資本論’的作者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締造者卡尔·馬克思。他的学生和拥护者敖德薩大学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敬挽。”——第 381 頁。
- 231 指侨居苏黎世的斯拉夫各国青年組成的“斯拉夫”同盟。——第 381 頁。
- 232 紐約中央劳动联合会是紐約各工会的联合会，于 1882 年产生，在八十年代是群众性的工人組織，联合了白人和黑人以及美籍和外籍工人。领导这个中央劳动联合会的是社会主义者，他們认为，为了有效地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需要工人阶级的工会組織，又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組織。——第 384 頁。
- 233 恩格斯 1883 年 4 月 18 日給范-派頓的信是用英文写的。——第 385 頁。
- 234 恩格斯提到 1845 年时指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态”这部著作中叙述的他和馬克思的观点(該书写于 1845—1846 年)(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385 頁。
- 23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90—491 頁。——第 385 頁。
- 236 恩格斯指的是小册子：約翰·莫斯特“資本和劳动。对卡尔·馬克思‘資本論’一书的通俗概述”(J. Most.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这本小册子于 1873 年在克姆尼次出版。——第 386 頁。
- 237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 年米兰版(A. Loria. «La rendita fondiaria e la sua elisione naturale». Milano, 1880)。——第 386 頁。
- 238 指的是小册子：阿·洛里亚“意大利經濟学家的价值理論”1882 年博洛尼亚版(A. Loria. «La teoria del valore n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Bologna, 1882)。——第 387 頁。
- 239 指阿·洛里亚“卡尔·馬克思”一文，載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 1883 年羅馬版第 2 集第 38 卷第 7 章，第 509—542 頁(«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ser. 2, vol. 38, fas. 7, Roma, 1883, p. 509—542)。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論性杂志,从1866年至1878年在弗罗倫薩出版,每月一期,从1878年至1943年在羅馬出版,每月两期。——第387頁。

- 240 “对一頁‘公社史’的意見”是恩格斯在讀完法国新聞記者、共和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普·利沙加勒所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年布魯塞尔版(《*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Bruxelles, 1876)一书后,于1877年2月初写成的。1877年2月9日,該书作者在复信中感謝恩格斯在信中就軍事事務所发表的“卓越意見”。恩格斯的“意見”一文在1933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利沙加勒的著作是在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該书揭露了法国統治階級的反民族政策,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創建巴黎公社中,在公社历史中的作用。馬克思称該书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馬克思认为該书对无产阶级政党來說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而大力促进該书用德文出版。——第391頁。

- 241 指国防政府代表梯也尔(当时他没有参加政府,但是实际上却起着政府秘密领导人的作用)和俾斯麦在凡尔賽举行的停战談判。1870年10月30日巴黎知道了談判的消息。对于即将簽訂的、被资产阶级政府說成是法国的莫大幸福的这一卖国停战协定,巴黎群众表示十分憤慨。梯也尔談判的消息和麦茨的投降,都推动了10月31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俾斯麦利用法軍指揮部在談判期間的毫无准备,在贏得了時間以后,就中断了談判。——第391頁。

- 242 指汉涅金的匿名出版的著作“‘麦茨之战’作者的軍事思想和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見解”1871年美因茲版第185—186頁(《*Militärische Gedanken und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der Jahre 1870 und 1871 vom Verfasser des «Krieges um Metz»*》. Mainz, 1871, S. 185—186)。——第

392 頁。

243 自由射手 (法文 francs-tireurs), 即志願游擊隊員。他們分成小股隊伍, 參加抗擊敵軍對法國的侵犯。自由射手隊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與反法同盟作戰時期, 當敵軍侵入法國時建立起來的。

1867 年, 法國開始組織自由射手協會。在普法戰爭爆發, 普魯士軍隊侵入法國領土以後, 協會會員根據專門的指令拿起了武器。當法國正規軍被擊潰並被困於各要塞的時候, 自由射手部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第 392 頁。

244 讲的是 1796—1797 年拿破侖在意大利作戰時, 法軍包圍曼都亞一事。——第 393 頁。

245 弗·埃爾拉赫“1870—1871 年普法戰爭期間。一個瑞士軍人的觀察與思考”1874 年萊比錫—伯爾尼版第 230 頁 (F. Erlach. «Aus dem französisch-deutschen Kriege 1870—1871. Beobachtungen und Betrachtungen eines Schweizer-Wehrmanns». Leipzig—Bern, 1874, S. 230)。——第 393 頁。

246 實際資料是恩格斯從威·勃魯美的“從色當戰役至戰爭結束時德軍的軍事行動”(«Die Operationen der deutschen Heere von der Schlacht bei Sedan bis zum Ende des Krieges»)一書中取得的。該書第一版和第二版於 1872 年在柏林出版。——第 394 頁。

247 “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馬克思 1879 年下半年—1880 年 11 月在倫敦寫的, 收在他 1879—1881 年的筆記中。馬克思的這一著作批評的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一卷。國民經濟的一般性的或理論性的學說, 第 1 部分: 基礎”1879 年萊比錫和海得爾堡第 2 版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I. Allgemeine oder theoreti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Th. I. Grundlegung». 2. Ausg.,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9)。馬克思在批評瓦格納歪曲“資本論”中闡述的價值理論時, 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 並加以具體化。馬克思的“評論”前面有他所編的



五十四种书目,这些书目是从瓦格納书上所列的参考书中引来的。

“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于1930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5卷上。——第396頁。

- 248 卡·亨·劳“国民經济学說的原理”1847年海得尔堡第5版第63頁(K. H. Ra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5. Ausg., Heidelberg, 1847, p. 63)。——第398頁。
- 24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0頁)。——第399頁。
- 250 指尼·季別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資本理論的最新补充和解釋”1871年基輔版。——第400頁。
- 251 阿·謝夫萊“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別是对經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1870年杜宾根版(A. Schäffle. «Kapitalismus und Socialismu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eschäfts- und Vermögensformen». Tübingen, 1870)。——第402頁。
- 252 指謝夫萊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一书。——第402頁。
- 253 阿·謝夫萊“社会机体的結構和生命”1875—1878年杜宾根版第1—4卷(A. Schä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örpers». Bd. I—IV, Tübingen, 1875—1878)。——第402頁。
- 254 K. H. Rau.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8. Ausg., I. Abt.,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68, S. 88。——第404頁。
- 255 “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自由派的政治經濟評論,1844—1943年在杜宾根出版,中有間斷。1875年5月31日洛貝尔图斯給瓦格納的信,曾載于上述杂志第34卷阿·瓦格納的“略論洛貝尔图斯-亞格措夫”(«Einiges

- von und über Rodbertus-Jagetzow»)一文中。——第411頁。
- 256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36 (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8—39頁)。——第412頁。
- 257 馬克思所指的注釋載于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頁)。——第413頁。
- 258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15 (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頁)。——第413頁。
- 259 V. Rost. «Deutsch-Griechisches Wörterbuch». Abt. I, A—L, Göttingen, 1829, S. 359. ——第416頁。
- 260 恩·舒耳采“哥特語辭典”[1848年]馬格德堡版第411頁(E. Schulze. «Gothisches Glossar». Magdeburg, [1848], S. 411)。——第416頁。
- 261 阿·威曼“實用中部高地德意志語辭典”1838年克韋德林堡和萊比錫版第634—635頁(A. Ziemann. «Mittelhochdeutsches Wörterbuch zum Handgebrauch». Quedlinburg und Leipzig, 1838, S. 634—635)。——第417頁。
- 262 K. Marx. «Das Kapital». 2. Aufl., Bd. I, Hamburg, 1872, S. 171 (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00頁)。——第418頁。
- 263 馬克思在这里和在上面引證的是1872年在漢堡出版的“資本論”第2版第1卷(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98頁)。——第422頁。
- 264 魯·耶林“羅馬法在其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精神”1874年萊比錫第3版第2部第2冊第234—259頁(R. 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3. Aufl., Th. II, Buch II, Leipzig, 1874, S. 234—259)。——第423頁。
- 265 托·图克和威·紐馬奇“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貨幣流通状况。这是从1792年到現在为止的价格史的第五和第六两卷”1857年倫敦版第5卷第1部。“論1847—1856年的粮食价格”(T. Tooke and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two volumes; forming the fifth and sixth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V, London, 1857, Part I. «On the prices of corn from 1847 to 1856»)。——第426頁。
- 266 A. Böckh.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Bd. I, Buch I, Berlin, 1817, S. 84—107。——第426頁。
- 267 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50亿賠款对德国社会經济状况影响的結果。——第427頁。
- 268 圣彼得的迪納里——羅馬教皇每年向天主教徒征收的捐稅（最初是在圣彼得节日向每戶征收迪納里）。至今仍为羅馬教廷用于进行反动的天主教宣傳的重要收入来源。——第429頁。
- 269 A. Cournot. «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Paris, 1838, p. 7。——第429頁。
- 270 見注166。——第430頁。
- 27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1—772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3頁〕（文中的差別見注67）。——第430頁。
- 27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經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年倫敦版第552頁(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 p. 552)。——第432頁。
- 273** 亨·薩·梅恩“东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倫敦版 (H. S. Maine.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London, 1871)。——第433頁。
- 274**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薩姆尼特战争时期，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羅馬軍隊，并且强迫他們通过“牛軛”。这被认为是对战敗軍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語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436頁。
- 27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0—771頁(參看“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2頁)(文中的差別見注67)。——第442頁。
- 276** 1785年4月21日頒发的給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权利和利益的文件中反映了叶卡特林娜二世建立行会組織的意图，文件中包括詳細确定行会組織的手工业特別条例。各城市手工业者必須在行会中登記，禁止非行会手工业。——第443頁。
- 277** 卡·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記”一文大概的写作日期是1881年底—1882年。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了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許多著作。“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札記”与专门研究俄国資料的其他手稿不同，馬克思不是写在筆記本上，而是写在单頁紙張上，其中有題目和章节，标明数字和字母。除了引用收集在許多筆記中的材料外，还引用已經系統化了的实际資料，对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問題作出最重要的結論。馬克思的手稿于1952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2卷上。——第453頁。
- 278** 馬克思引自本人的讀書筆記，其中有閱讀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时所作的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頁)。——第453頁。

- 279 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萊比錫版)(«Die ländliche Verfassung Russlands». Leipzig, 1866)一书的讀書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52年俄文版第12卷第36—37頁)。——第453頁。
- 280 馬克思在此处和下面都是引自他根据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沒有收信人的信”写的“关于俄国廢除农奴制問題”这篇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1卷第18—20頁)。——第454頁。
- 281 舒瓦洛夫和帕斯凱維奇一方面贊成农民的人身解放，同时希望为地主保留全部土地，而使农民只有权使用份地以代替賦役。——第454頁。
- 282 馬克思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的讀書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2卷第110—114頁)。——第455頁。
- 283 馬克思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狀況”第1卷(1862年萊茵河岸波恩版)和阿·阿·戈洛瓦乔夫“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1872年圣彼得堡版)二书的讀書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2卷第29—35頁和第115—117頁)。——第457頁。
- 284 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狀況”(1868年萊茵河岸波恩版)第4卷一书的讀書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2卷第35—36頁)。——第458頁。
- 285 引自尤·埃·揚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統計調查的試驗”(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讀書筆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1卷第139—148頁)。——第458頁。
- 286 “修訂稅制最高委员会报告书”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3册第1部分第6—7頁。  
馬克思所引的数字是用計算的方法得来的。——第464頁。
- 287 这里引证的是尤·埃·揚松的“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統計調查的試驗”(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第466頁。

**288** 弗·恩格斯的“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手稿，同和它有关的“法兰克时代”手稿一样，是在1881—1882年按照統一計劃完成的巨著。恩格斯拟訂的“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計劃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多年专门研究日耳曼尼亚和西欧历史的結果。

“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根据手稿后面所附的恩格斯的最初計劃来看，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四章。第二部分作者打算列为第一部分的“注釋”——史料学、民族学和語言学性质的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計劃有了改变。例如，在第一章結尾，恩格斯写道：“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軍事制度。”手稿中没有这一章。显然，恩格斯把这一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軍事制度”）中去了。本文第二部分只有第二章。恩格斯在計劃中标题为“法兰克方言”的第三章，被他移到关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去了。

各章的順序以及第四章的标题，是編輯部根据恩格斯的計劃拟定的。——第478頁。

**289** 威·博·道金斯“不列顛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紀的地位”1880年倫敦版(W. B. Dawkins. «Early Man in Britain and his place in the tertiary period». London, 1880)。——第478頁。

**290** 見注195。——第480頁。

**291** 指1878年12月21日魯·微耳和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會議上的报道。見“民族学杂志”1878年柏林版第10卷(«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d. X, Berlin, 1878)发表的“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社辯論”1878年年卷第418—424頁(«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Jahrg. 1878, S. 418—424)。——第480頁。

**292** 指沙弗豪森在德国人类学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道，該会在1877年9月24—26日在康斯坦察举行。見“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报道”1877年慕尼黑版第11期(«Correspondenz-Blat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 und Urgeschichte» № 11, München, 1877)。——第 480 頁。
- 293 关于皮提亚斯旅行記的資料,恩格斯引自約·列列韦尔的著作“馬賽的皮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魯塞尔版(«Pythéas de Marseille et la géographie de son temps». Bruxelles, 1836)。——第 482 頁。
- 294 卡·弥倫霍夫“德国考古学”1870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479 頁(K. Müllenhoff. «Deutsche Altertumskunde», Bd. I, Berlin, 1870, S. 479)。——第 483 頁。
- 295 普卢塔克“比較傳記”。艾米利烏斯·保罗傳第 12 章。——第 483 頁。
- 296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 55 卷第 10 章。——第 484 頁。
- 297 凱撒“高卢战記”第 4 卷第 1 章和第 6 卷第 22 章。——第 486 頁。
- 298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 7 卷第 1 章。——第 488 頁。
- 299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489 頁。
- 300 凱龙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 4 卷第 14 章。——第 491 頁。
- 301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 54 卷第 33 章。——第 494 頁。
- 302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 55 卷第 6 章。——第 496 頁。
- 303 凱尤斯·韦萊·帕特庫耳“羅馬史”二卷本,第 2 卷第 97 章。——第 496 頁。
- 304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 56 卷第 18 章。——第 499 頁。
- 305 凱尤斯·韦萊·帕特庫耳“羅馬史”二卷本,第 2 卷第 117 章。——第 499 頁。
- 306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 56 卷第 18 章。——第 499 頁。
- 307 这一段話和上一段話,恩格斯引自凱尤斯·韦萊·帕特庫耳的“羅馬史”第 2 卷第 118 章。——第 502 頁。

- 308 狄奧·卡西烏斯“羅馬史”第56卷第19章。——第502頁。
- 309 恩格斯引自塔西佗的“編年史”(«Annales»)第1卷第61章。——第503頁。
- 310 斯特拉本“地理學”第4卷第4章。——第505頁。
- 311 斯特拉本“地理學”第7卷第1章。——第505頁。
- 312 約克將軍，曾在1812年在俄國指揮拿破侖軍隊的普魯士輔助軍，1812年12月30日他同俄國指揮部訂立了陶羅根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他必須在兩個月內不參加對俄軍的軍事行動。  
1813年10月16—19日，當俄、奧、普、瑞士聯軍同拿破侖第一的軍隊在萊比錫戰鬥的時候，在拿破侖軍隊中作戰的薩克森軍，突然在戰鬥方酣時轉到敵人方面，并掉轉炮口打法國人。——第505頁。
- 313 指哈耳施塔特古墓，該墓在1846年在奧地利西南部哈耳施塔特城附近發現，因而稱為哈耳施塔特文化(約公元前1000—500年)。——第509頁。
- 314 威·博·道金斯“不列顛的原始人”1880年倫敦版第466—472頁(W. B. Dawkins. «Early Man in Britain». London, 1880, p. 466—472)。——第510頁。
- 315 卡·弗·維貝爾格“希臘人和羅馬人通過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1861年耶夫勒版(C. F. Wiberg. «Bidrag till Kännedomen om Grekerna och Romarnas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och om de nordiska Handelsvägarne». Gefle, 1861)。約·梅斯托爾夫從瑞典語譯成德語為：“古典民族通過商業對北方各國的影響”1867年漢堡版(«Der Einfluss der klassischen Völker auf den Norden durch den Handelsverkehr». Hamburg, 1867)。——第510頁。
- 316 塔西佗“編年史”第2卷第62章。——第510頁。
- 317 耶·雅·阿·沃爾索“當時文獻中的北方各國古代史”。德譯者約·梅斯托爾夫，1878年漢堡版(J. J. A. Worsaae. «Die Vorgeschichte



- des Nordens nach gleichzeitigen Denkmäler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J. Mestorf. Hamburg, 1878)。——第 512 頁。
- 318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23 章。——第 513 頁。
- 319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第 2 卷和第 3 卷中，談到了日耳曼尼亚。——第 524 頁。
- 320 指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 年慕尼黑版 (K. Zeuss. «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 München, 1837) 和雅·格林“德意志語言史”1848 年萊比錫版第 1—2 卷 (J.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d. I—II, Leipzig, 1848)。——第 526 頁。
- 321 凱撒城的普罗科皮阿斯“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 8 卷(“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 4 分册第 5 章第 5 节。——第 527 頁。
- 322 F. C. Dahlmann. «Geschichte von Dänemark», Bd. I, Hamburg, 1840, S. 16. ——第 528 頁。
- 323 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1878 年基尔版第 1—8 卷 (G. Waitz.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1—8, Kiel, 1844—1878)。——第 530 頁。
- 324 “法兰克时代”是弗·恩格斯在 1881—1882 年写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沒有发表过。同“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一样，本文也是研究日耳曼尼亚历史的专门著作的一部分(見注 288)。——第 539 頁。
- 325 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紀的采邑制度史”1850 年厄兰根版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 Erlangen, 1850)。——第 543 頁。
- 326 爱因哈德“查理大帝生平”第 2 章。——第 543 頁。
- 327 恩格斯引用的是图尔的格雷哥里的著作“法兰克人史”第 6 册第 46 章 («Historia Francorum»)。——第 544 頁。

- 328** 敕令——中世紀早期(八到九世紀)国王的立法詔书和命令。亚琛敕令指出了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大規模夺取农民土地的事实，它是关于法兰克王国历史的最重要資料之一。——第 545 頁。
- 329** 恩格斯列举的这些数目字摘自九世紀編制的圣热尔門-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記册(地产、人口、收入登記册)。这个登記册第一次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盖拉尔做了一些注釋出版的，名为：“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記册” 1844 年巴黎版第 1—2 卷 (《Polyptyque de l'abbé Irminon》，t. I—II, Paris, 1844)。——第 546 頁。
- 330** 契約程式——是把各种各样有关財產和其他性质的契約和协定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的具体文书的标准样式。流傳到現在的几本契約程式集，使我們能够了解六世紀末至九世紀末法兰克王国各地区的社会經濟关系。
- 恩格斯引用的这个契約程式是收在名为“西尔蒙通俗叙述的图尔契約程式集”(《Formulae Turonenses vulgo Sirmondicae dictae》)这个集里的。恩格斯显然是从上述罗特的书中第 379 頁上引来的。——第 555 頁。
- 331** 指关于卡罗林帝国历史的重要文字資料之一——“貝坦年鉴”(《Annales Bertiniani》)。这个年鉴因法国圣貝坦修道院而得名。它包括了 830—882 年这段时期，分为三部分，都是不同的作者所写。貝坦年鉴是列在著名的“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从书中出版的。——第 557 頁。
- 332** 斯特林加(直譯是：“古法之子”)是 841—842 年在薩克森发生的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薩克森人(半农奴)反对法兰克貴族和薩克森貴族的暴动，暴动者力求恢复封建社会以前的旧习俗。——第 563 頁。
- 333** “法兰克方言”——恩格斯写于 1881—1882 年；在关于法兰克时代的手稿和“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提綱的草稿中，恩格斯把这个研究著作叫做“注釋”。但是，“法兰克方言”有完全独立的科学意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語言学的范例。

“法兰克时代”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1935 年第一次

由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文章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并列刊印。——第 564 頁。

- 334** 古福音詩是古代薩克森語言文学的文献(屬九世紀);是把福音书大大压縮了和日耳曼化了的轉叙本;古福音詩的作者,据推測是魯尔河岸韦尔登的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

古福音詩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有两个,一个是慕尼黑手稿(屬九世紀),一个是柯頓手稿(因古代文物搜集者英国人柯頓而得名),屬十到十一世紀。手稿的名称是德国語言学家施梅累尔在 1830 年加的,直譯是:“救主”。古福音詩第一次是在 1866 年由摩里茨·海奈出版。——第 564 頁。

- 335** 威·布劳涅“法兰克方言和高地德意志輔音音变的研究”,載于“德意志語言文学史資料”杂志,1874 年薩利河岸哈雷版第 1 卷(W. Braune. «Zur kenntnis des fränkischen und zur hochdeutschen lautverschiebung».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Bd. I, Halle a/S., 1874)。——第 564 頁。

- 336** 亨·凱倫“‘薩利克法’注解和薩利克法兰克人的語言。德意志語言史”1869 年海牙版(H. Kern. «Die Glossen in der Lex Salica und die Sprache der salischen Franke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n». Haag, 1869)。——第 565 頁。

- 337**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在盎格魯—弗里西安方言和薩克森方言中,第三人称复数直陈式由于第三人称詞尾中齿音前的 «n» 脫落,而同第二人称相同。这种相同大概就是上述两种方言中所有三种人称現在时直陈式复数之間的差別消失的起点。——第 566 頁。

- 338** 指对尼德兰語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西烏斯从贊美詩逸稿(九世紀)中抄下的不清楚的詞的注解。利普西烏斯注解由摩里茨·海奈发表在 1867 年帕德波恩出版的“古代低地德意志小文献”(«Kleinere altniederdeutsche Denkmäler». Paderborn, 1867)中。——第 567 頁。

- 339** P. J. 科瑟伊恩“古代西薩克森語語法”1883 年海牙版(P. Cosijn.

- 《Altwestsächsische Grammatik》. Haag, 1883)。——第 568 頁。
- 340 指弗雷肯霍斯特修道院賦稅登記冊(九到十一世紀初)。——第 568 頁。
- 341 指十到十一世紀的帕德波恩文件，——德国历史学家保尔·維干德在 1831—1832 年出版的地方法文献，載于他所出版的第 5 卷“威斯特伐里亚历史和考古学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skunde Westphalens》)和第 2 第 3 两卷“威斯特伐里亚的帕德波恩和克尔佛两个公爵領地地方法”(《Die Provinzialrechte der Fürstenthümer Paderborn und Corvey in Westphalen》)。——第 569 頁。
- 342 指魏森堡的修道士奥特弗里德在 863 和 871 年之間做的对福音书的轉述。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是古代德意志文字的最初文献之一。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的語言被认为是萊茵—法兰克方言的南部土語之一。——第 569 頁。
- 343 指八世紀末或九世紀初的手稿，是洗礼誓(《Taufgelöbnis》)的程式。——第 570 頁。
- 344 指布魯塞尔的古老噴泉中的小孩雕像，是十七世紀佛来米的雕塑家杜肯努阿的作品。——第 575 頁。
- 345 威·阿尔諾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53 頁(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53)。——第 576 頁。
- 346 “下萊茵历史档案”1831 年杜塞尔多夫德·約·拉康布累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 篇(《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Niederrheins》. Hrsg. von T. J. Lacomblet, Abt. I, Bd. I, Heft I, Düsseldorf, 1831)。——第 582 頁。
- 347 威·阿尔諾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40—141 頁(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40—141)。——第 583 頁。
- 348 指起初为丹·哥·萊曼后来为其他一些人出版的地图，名为“萊曼所編日耳曼尼亚、瑞士、东法兰西、比利时、尼德兰和波兰的地形特別图”

格洛高版 («Reymann's topographische Spezial-Karte von Deutschland, Schweiz, Ostfrankreich, Belgien, Niederlande und Polen». Glogau)。地图分为若干正方形(地段),以主要居民点为名,因此,恩格斯在往下的引证中,提到了地段的名称和号碼。——第 584 頁。

- 349 “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經過泰·門克博士重新修改的卡·馮·施普魯奈尔博士的常用地图的第 3 版。1880 年哥达版 («Hand-Atl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3. Aufl. von Dr. K. v. Spruner's Hand-Atlas, neu bearbeitet von Dr. Th. Menke, Gotha, 1880)。

恩格斯在自己这一研究著作中各处引用的地理資料,主要是摘自三十二图(Deutschland's Gaue. II [德意志区 II])。——第 584 頁。

- 350 弗·約·蒙奈“七世紀末以前的巴登地方古代史”。第 1 卷:“上萊茵边区的羅馬人”1845 年卡尔斯卢厄版(F. J. Mone. «Urgeschichte des badischen Landes bis zu Ende des siebenten Jahrhunderts». Bd. I: «Die Römer im oberrheinischen Gränzland», Karlsruhe, 1845)。——第 588 頁。

- 351 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小历史地图集”1873 年苏黎世版(F. Beust. «Kleiner historischer Atlas des Kanton Zürich». Zürich, 1873)。——第 588 頁。

- 352 威·阿尔諾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41 頁(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41)。——第 589 頁。

- 353 威·阿尔諾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 年哥达版第 156 頁(W. Arnold.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 S. 156)。——第 591 頁。

- 354 路·白尔尼“巴黎来信”1832 年汉堡版第 1—2 分册;1833—1834 年巴黎版第 3—6 分册(L. Börne. «Briefe aus Paris». 1.—2. Theile, Hamburg, 1832; 3.—6. Theile, Paris, 1833—1834)。——第 598 頁。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5年3月—1883年5月)

### 1875

- 1875年3月—1876年** 恩格斯繼續写 1873 年已經开始的“自然辯证法”一书。他写这本著作的目的，是对理論自然科学的成就作辯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批判自然科学領域內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1875—1876 年他写完了两章(“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写了許多筆記和片断。
- 3月18—28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薩尔派)这两个德国工人組織准备合并，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奥·倍倍尔的信中，以他个人和馬克思的名义，尖銳地批判了妥协性的綱領草案，批判了綱領草案中拉薩尔派教义的整个体系、关于国家問題的机会主义論点和放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观点。
- 4月28日** 馬克思給亲自校訂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写了跋。
- 5月5日** 馬克思寄給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給爱森納赫派整个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批評意見，后来这些批評意見被称为“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的这一著作，給拉薩尔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論证并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

- 政和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說，科学地預見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規律，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 5月8日** 馬克思通知俄国革命者彼·拉·拉甫罗夫，他已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同俄国通信的秘密地址。
- 5月20日—8月** 馬克思作了多次計算，以便說明剩余价值率同利潤率的差別。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以后成为“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章(“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
- 6—12月** 馬克思同拉甫罗夫經常見面，并和他通信。
- 6—9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美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有关这些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消息。
- 6月18日** 馬克思特別重視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莫·特劳白关于制造人造細胞的試驗；在給拉甫罗夫的信中，他指出这种試驗对解釋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 6月21日** 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同总委员会(会址已迁往紐約)經常保持着联系。这时他接到总委员会关于在費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會議的机密通告，这些通告是要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各个支部散发的。
- 8月初** 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修訂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約·莫斯特所著“資本和劳动”一书，准备出第二版。該书是对“資本論”第一卷的通俗概述，于1876年在克姆尼次(卡尔·馬克思城)出版，1878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譯本。
- 8月12日左右** 馬克思离开倫敦，到卡尔斯巴德(卡罗維发利)治病。
- 8月13—14日左右** 馬克思赴卡尔斯巴德途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逗留；

- 他訪問民主派的“法蘭克福報”編輯部，並同編輯列·宗內曼進行長談。
- 8月13日** 恩格斯向紐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提出報告，說明他分送關於在費拉得爾菲亞召開國際代表會議的機密通告所採取的措施和有關歐洲國家國際支部的情況。
- 8月15日—9月11日** 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治病。和俄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經常見面。  
警察對馬克思實行了秘密監視。
- 8月下半月—9月22日左右** 恩格斯在蘭茲格特休養。
- 9月11日** 馬克思在離卡爾斯巴德返回途中，去布拉格會見德國民主派政論家麥·奧本海姆。
- 9月20日** 馬克思返回倫敦。
- 9月20日以後—10月** 馬克思又開始緊張地研究政治經濟學，特別是花費許多時間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在閱讀1875年柏林出版的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代表人物尤·費·薩馬林、亞·伊·柯舍列夫、康·德·卡維林的書籍時，馬克思做了詳細的札記。
- 10月9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國際米蘭支部的領導人恩·比尼亞米的一項建議，在他所出版的“社會主義叢書”中刊印一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 10月11日和12日** 恩格斯在給白拉克和倍倍爾的信中聲明，他和馬克思像以前一樣對哥達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抱否定的態度，但是他們不準備公開反對這個綱領，因為工人是把它作為共產主義的綱領來理解的，因為他們希望真正的共產主義宣傳在工人中獲得成功。
- 10月15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強調必須密切注視俄國的



- 事态,因为俄国人民群众的处境、俄国政府的政策和革命运动的状况,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将是第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
- 10月下半月—11月6日** 恩格斯同夫人因家庭事务去海得尔堡。他顺便在雷瑙逗留,会见了自己的熟人化学家鲍利。在返回途中,去宾根和科伦,并經奥斯坦德返回倫敦。
- 11—12月** 馬克思研究了有关农业化学(尤其对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农业的化学基础”一书做了詳細的摘要)、物理学、政治經濟学的专著,特别是有关土地問題的专著。閱讀了伊·伊·帕特拉夫斯基的“1700—1762年俄国金融市場”一书和恩格尔加尔特的“俄国农业問題”一文,同时研究了俄国总參謀部于1871年出版的“軍事統計汇编”第四編,并做了詳細的札記。
- 11月12日** 恩格斯根据拉甫罗夫的請求,讀了拉甫罗夫于1875年9月15日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讀后,恩格斯写信給拉甫罗夫,說出自己对达尔文学說的态度,揭穿了资产階級达尔文主义者的反科学立場,并对拉甫罗夫本人提出一些批評意見。
- 11月末** 馬克思亲自校訂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最后一分册出版。在該书的跋中,馬克思指出“資本論”法文版和原文版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馬克思将法文版最后一分册寄給許多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出版“資本論”俄文版的发起人和譯者格·亚·洛帕廷、尼·弗·丹尼尔逊,以及拉甫罗夫和柯瓦列夫斯基。
- 1875年12月—1876年2月** 馬克思研究从俄国丹尼尔逊那里得到的10卷“征稅委员会报告”和“省农民事务厅意見汇编”;他打算在最后校訂“資本論”第三卷时能利用他所做的筆記。
- 12月17日** 馬克思通知拉甫罗夫說,由于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

篇幅很大，他不能发表他編写的法文版主題索引。

## 1876

- 1月22日** 恩格斯在倫敦举行的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紀念会上发表演說。恩格斯这篇演說于2月15日登在拉甫罗夫在倫敦出版的“前进报”上。
- 2月** 恩格斯写“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魯士燒酒”一文，文中揭露了普魯士的容克是德国一切反动力量的堡垒。該文載于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并出了单行本。
- 2月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創立三十六周年紀念大会上发表演說。馬克思在发言中，強調了德国第一批无产階級組織特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則。
- 2月中** 馬克思研究“資本論”第三卷的問題时，写了一段不长的說明：“級差地租和地租仅只是合并在地內資本的利息”。后来恩格斯把这段說明編入“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四章。
- 3—5月** 馬克思研究了馬·施萊登、約·兰克和路·海尔曼的許多生理学著作。
- 4月初** 馬克思收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創始人之一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信中介紹了工人运动的成就，并說有必要在美国工人中傳播“共产党宣言”。为此，他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审閱一下海·迈耶尔的“共产党宣言”原有譯本。
- 4月4日** 馬克思写信給左尔格，說他为了写作“資本論”，打算研究美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貸方面的資料，并請他寄一些有关这些問題的书目。

- 5—6月 馬克思研究公社所有制形式；讀了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的著作。
- 5月20日左右—6月中 恩格斯在兰茲格特休养。
- 5月24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原巴黎公社委員、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列·弗兰克尔从布达佩斯寄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些关于匈牙利土地所有制的資料。
- 5月24—26日 考慮到德国小資产階級思想家欧·杜林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黨員中間得到流行，影响日益扩大，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必須在报刊上批判杜林的观点。
- 5月28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拟定了他批判杜林的著作的大綱和性质。
- 5月底—8月底 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辯证法”的写作，并着手为批判杜林的观点收集材料。为此，他讀了杜林的以下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社会經济学教程”、“国民經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 6—11月 恩格斯写“威廉·沃尔弗”一文，这是一位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的生平事业概述。沃尔弗傳作为一組文章于7月1日到11月25日連載在威廉·李卜克內西主編的社会主义杂志“新世界”上。
- 6月中—6月30日左右 恩格斯由于家庭事务呆在海得尔堡。
- 7月18—23日 馬克思看望正在布萊頓治病的妻子。
- 7月24日—9月1日 恩格斯在兰茲格特休养。
- 8月16日—9月15日 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

- 1876年9月—1877年1月初 恩格斯写“反杜林論”第一編(“哲学”)。这組文章发表在1877年1月3日至5月11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
- 9月16—22日 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返回倫敦途中,在布拉格拜訪了奥本海姆,在列日拜訪了原国际俄国支部积极活动家尼·伊·吳亭。
- 1876年9月23日—1877年8月 馬克思和白拉克通信,談出版普·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問題。馬克思认为傳播这一著作是党的一件重要事情,他亲自校訂該书譯文。
- 10月21日 馬克思事先通知拉甫罗夫,有一批俄国反动文人准备在倫敦出版杂志,向英国人介紹俄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拉甫罗夫把馬克思这封信的摘要,刊登在11月1日的“前进报”上。
- 11月初 馬克思将有关格萊斯頓政策的材料寄給英国激进主义者查·科勒特,以供“外交評論”(«Diplomatic Review»)利用。
- 11月20日 恩格斯在給德国无产階級革命家約·菲·貝克尔的信中,表示了他和馬克思的共同意見,即国际的全体积极活动家应该努力的不是恢复以前的国际組織,而是建立和巩固各国群众性的工人党。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定的科学工作,以加强无产階級运动的理論方面。
- 12月 馬克思讀格·汉森、費·德梅利奇、奧斯特罗日欽斯基-烏提舍諾維奇关于公社所有制的著作、弗·卡尔德納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和 L. 克雷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較”。
- 12月上半月 馬克思經常同柯瓦列夫斯基会晤。

- 12月18日** 恩格斯在給他的弟弟海·恩格斯的信中，分析了在巴尔干造成的形勢，并得出俄土战争不可避免的結論。
- 12月21日** 恩格斯在給約·菲·貝克尔的信中，批判了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以及工联領袖在自由資產階級面前的諂媚行徑，报告了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情况，轉达了7月在費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国际代表會議所通过的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

## 1877

- 1—12月** 馬克思繼續研究俄国改革后經濟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情况，特別是俄国的土地关系。除其他著作外，还閱讀了亚·伊·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1—2卷，米·瓦·涅魯切夫的“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巴·亚·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 1月9日** 恩格斯把“反杜林論”关于哲学的第一編的最后一部分寄給李卜克內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发表。
- 2—3月初** 馬克思指示英国記者原国际會員馬·巴里，要他撰文揭露格萊斯頓的对外政策。巴里的文章于3月初在一些保守派的报纸上发表。
- 2月初** 恩格斯写了“对一頁‘公社史’的意見(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并把它寄給該书的作者利沙加勒。
- 2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給比尼亚米，談到德国1877年的选举情况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恩格斯的信在2月17至18日米兰举行的上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讀，2月26日在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发表。

- 2月20日左右—  
3月14日左右 恩格斯因妻子生病居住在布萊頓。
- 3月5日 馬克思把“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十章第一部分寄給恩格斯，这一部分批判了杜林对政治經濟学史的看法。
- 3月6—14日之間 恩格斯按照馬克思的建議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該文叙述了意大利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情况，指出这一切为建立意大利工人党創造了前提。該文发表在3月16日的“前进报”上。
- 3月16日 馬克思請拉甫罗夫編写关于俄国訴訟和行政处分的綜合材料，以便把这份材料轉給爱尔兰人下院議員凱·奧克萊里，让他在議會中发言时利用。拉甫罗夫滿足了馬克思的請求。
- 3月底 馬克思又开始整理“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
- 5—12月 恩格斯在俄土战争时期記錄了俄国軍队的員額和部署。
- 6—8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論”第二編(“政治經濟学”)。这組論文先后发表于7月27日至12月30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 6—7月 恩格斯写了“1700—1870年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一文。
- 6月中 根据白拉克的請求，恩格斯为“人民历书”写了卡尔·馬克思傳略。傳略于1878年发表。
- 7—8月 馬克思閱讀了俄国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伊·伊·考夫曼的著作“价格波动論”、“論貨幣和信貸学說”第一分册和卡·克尼斯的著作“貨幣。貨幣基本学說論”。
- 7月4日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

- 7月11日—8月28日 恩格斯同患病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
- 7月23—29日左右 馬克思常同从巴黎来会見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見面。希尔施告訴馬克思有关法国政治經濟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状况的許多事实。
- 1877年8月—  
1878年4月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論”第三編(“社会主义”)。这組論文先后发表于1878年5月5日至7月7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 8月8日 馬克思把“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十章的第二部分寄給恩格斯。  
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諾伊恩阿尔(德国)治病。
- 9月5—21日左右 恩格斯和妻子在苏格兰休养。
- 9月27日左右 馬克思回到倫敦。  
馬克思写信告訴左尔格，他正在根据俄国原文資料研究俄国的局勢，說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革命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
- 10月19日 馬克思把“資本論”第一卷手稿寄給左尔格，以便譯成英文，并指出在准备出美国版的时候对正文應該作哪些修改。美国版沒有出成。
- 10月19日和23日 馬克思在給左尔格和白拉克的信中，評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指出該党由于同拉薩尔派、杜林派，同上层階級出身的人妥协而开始“发出霉味”，尖銳地批評了“未来”杂志和出版該杂志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出錢买进”社会民主党的卡·赫希柏格。馬克思指出，該杂志的主要傾向，是以“正义”等等詞句偷換唯物主义的認識。馬克思也批評了“前进报”編輯部，因为該編輯部让一些对理論一窍不通的、同无产階級的

- 階級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占用篇幅。
- 1877年11月—  
1878年7月**  
約11月
- 馬克思进行“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章的付印准备工作。
- 馬克思写信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对俄国政論家和文艺批評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作了答复。馬克思在信中就俄国是否能繞过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說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封信沒有寄出。該信于1886年在日内瓦发表，1888年又在俄国的合法报刊上发表。
- 11—12月**
- 馬克思研究了罗·欧文的一系列著作。
- ## 1 8 7 8
- 1878—1882年**
- 馬克思努力地系統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拉克魯瓦、馬克費林、欧勒、波茨等人的論文，做了許多專門筆記。在代数学中或在(当时人們所理解的)有限量分析中，馬克思研究了分析无穷小的概念和运算的基本数学原形。繼續钻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研究并摘录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格等人的著作。写了微分史大綱。
- 1878年初**
- 恩格斯写了“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后来他把該文編入“自然辯证法”。
- 1月11日**
- 恩格斯在給貝克尔的信中，对組成瑞士工人党表示滿意；他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中的錯誤。
- 1月12日**
- 恩格斯在給比尼亚米的信中，分析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別关切俄国业已成熟的革命形勢所造成的国内时局。比尼亚米于1月22日在“人民



- 报”上发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摘要。
- 2月4日和11日** 馬克思就东方問題写信給李卜克內西。李卜克內西在3月初出版的“論东方問題”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中，刊載了这些信的摘要。
- 2月9日左右** 馬克思得到希尔施自巴黎寄来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希尔施談到出版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困难，并請恩格斯为該报写稿。
- 2月中—3月中** 恩格斯写了“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說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证明无政府主义教条和策略的失败，以及国际政治路綫的完全胜利；国际所奠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原则，仍然在各国业已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得到贯彻。該文在紐約社会主义报纸“劳动旗帜”3月3、10、17、24和31日这五期上发表。
- 3月底—5月** 馬克思閱讀了考夫曼的“銀行业的理論与实践”，做了詳細的摘要，同时写了自己的大量意見。
- 4月15—20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內西会面。
- 5—6月初**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論”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初稿。后来恩格斯把这个初稿当做“自然辯证法”的材料（“‘反杜林論’旧序。論辯证法”）。
- 5月21日—5月底** 馬克思为了写作“資本論”，摘录了从美国收到的“劳动統計局第一年度报告”。
- 5月底—6月** 馬克思繼續加紧对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閱讀了朱克斯、約翰斯頓、科佩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 6月11日**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論”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定稿。
- 6月12日和27日** 馬克思給“每日新聞”和“法蘭克福报”編輯部写了声明，揭露俾斯麦的信徒洛·布赫尔。声明于6月13日

- 和 29 日发表。
- 7月初** 馬克思写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揭露豪威耳虛假的論断，強調指出，世界各国正在組織的工人階級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團結的偉大思想。該文发表于 8 月 4 日的“世俗紀事”杂志。
- 7月8日左右** 萊比錫出版了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論”）的第一个单行本，該书一方面批評了杜林的“观点”，同时又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 7月19日** 馬克思收到左尔格的来信，該信报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的活动，闡述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和总的政治形势。
- 8月** 恩格斯在写成了“反杜林論”以后，打算着手系統整理“自然辯证法”的材料，为此他拟訂了这一著作的总計劃草稿。
- 9月4—14日** 馬克思在馬耳韦思治病。
- 9月12日**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逝世。
- 10—11月** 馬克思为了写“資本論”，閱讀了保·罗特、A. 奇孔奈、卡·迪·休里曼、L. 柯薩、查·A. 曼、A. 沃克等人关于銀行和貨幣流通史的著作，做了摘記，并写了批評意見。
- 10月底** 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經被通过，建議李卜克內西在瑞士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
- 11月上半月** 馬克思从住在倫敦的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資本論”在俄国报刊中引起爭論的消息。

- 11月15日和28日** 馬克思在給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資本論”第一卷中的一些修改意見，說明这些修改在准备出版新的俄文版本时必须加以考虑，并請他注意美国在国内战争結束后壟断組織的增长和英国的工业危机。
- 11月下半月—12月** 馬克思写作“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土地关系史料，其中有汉森、斯·亚契尼的著作，有“1870年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年度报告”，还閱讀了許多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
- 11月26日左右** 恩格斯从定期秘密前往俄国回来的洛帕廷那里，得到了有关俄土战争結束后俄国国内状况和革命民粹派活动的消息。
- 1878年12月—1879年1月** 馬克思繼續仔細地研究金融和銀行业，做了大量摘录和筆記，閱讀了奧·吉斯特-达貝尔、約·路·萊伊、雅·維·崩訥、約·加西奧等人的著作。
- 12月** 馬克思閱讀了奧·卡斯帕里和艾·杜布瓦-雷蒙关于萊布尼茨的著作以及笛卡儿关于物理和数学的論文。

## 1 8 7 9

- 1—12月** 馬克思繼續进行政治經濟学的研究工作，特別是研究俄国和美国的文献資料。
- 2月底** 馬克思閱讀了他請丹尼尔逊編写的关于过去十五年中俄国財政和財政政策的状况的介紹。
- 3月16日以后** 馬克思閱讀柯瓦列夫斯基发表在俄国科学和文学政治杂志“言語”上的“評保加利亚宪法草案”一文。
- 3月21日** 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了題为“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一文，向意大利工人介紹德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和俄国革命的成熟。該文发表于3月30日。

- 不迟于4月** 馬克思接到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得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当时他正在积极为建立法国工人党而斗争，他在信中声明同意馬克思的观点，向馬克思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会见馬克思。
- 4月** 馬克思在給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出自己对重农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的看法（在評論尼·伊·卡列也夫的“十八世紀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問題”一书的时候）。
- 4月10日** 馬克思在給丹尼尔逊的信中，解釋延期出版“資本論”第二卷的理由，說明欧洲和美洲經濟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并談到铁路的发展及其对資本积聚、对外貿易增长和人民群众状况的影响。
- 6—7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准备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中央机关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 6月中—9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批評莫斯特领导的“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場，批評莫斯特在他編輯的“自由”周报上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全部活动，特別是攻击該党对国会讲坛的利用。
- 6月中—8月初** 馬克思和恩格斯讀了德国保守派政論家魯·迈耶耳的“德国政界的濫設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該书在德国被列为禁书，是作者送給他們的），并做了摘录和札記。后来，恩格斯写“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时利用了这些筆記。
- 6月17日** 恩格斯在給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英国工联放棄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并把他們的全部活动局限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的罢工斗争。
- 1879年下半年—  
1880年11月** 馬克思对已出版的阿·瓦格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經濟的一般性的或理論性的学說”一书

- 提出批評意見。馬克思表述并发展了“資本論”中所闡述的一系列价值論原理。
- 8月** 馬克思从美国收到馬薩諸塞劳动局局长萊特寄来的1874—1879年的报告和左尔格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馬薩諸塞劳动局的統計資料。
- 8月初** 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寄来的附有地方自治局統計資料的关于俄国財政和农业状况的詳細报道。
- 8月4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說他和馬克思拒絕为准备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因为該报将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机会主义集团领导，将成为党内小資产階級分子的喉舌。
- 8月5—27日左右**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8日左右—9月17日左右** 馬克思在澤稷島和兰茲格特疗养。
- 8月14日左右** 馬克思讀了威·卡尔頓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一书；在8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該书及其作者的評价。
- 不早于9月** 恩格斯写“自然辯证法”中的“辯证法”这一章。
- 9月9日** 恩格斯写信通知馬克思关于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内容，其中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合写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其无产階級的階級立場自行招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运动应当具有完全和平的和改良的性质，领导这个运动的应当是資产階級（“有教养的”）分子。恩格斯建議立即反对机会主义者。
- 9月10日** 馬克思收到恩格斯关于赫希柏格集团活动的报道以后，回信表示贊同立即反对这个集团。

- 9月17日** 馬克思回到倫敦。
- 9月17—18日** 恩格斯以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給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寫了一封通告信，信中抗議領導方面對黨內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領導的機會主義派別採取調和主義的態度，尖銳地批評自從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以後，黨內出現的機會主義的動搖性。為了保衛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堅定性，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消除機會主義分子對黨和黨機關報的任何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糾正了自己的立場，打擊了機會主義者。
- 9月19日** 馬克思寫信告訴左爾格，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以及對發表無政府主義言論的莫斯特的態度，並把他和恩格斯通函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一事通知左爾格。
- 大約1879年10月—1880年10月** 馬克思為了專門研究地租問題和整個土地關係問題，仍然十分注意有關公社的資料和文獻。他閱讀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過程和結果”，做了關於公社的性質、關於公社在各時代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經濟作用的詳細摘記。  
馬克思編寫了“印度歷史大事記”(664—1858年)。他特別注意英國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歷史。馬克思所搜集的實際資料，主要是取自 R. 澤韋耳的著作“從古代至 1858 年消滅尊嚴的東印度公司止的印度歷史分析”和蒙·埃耳芬斯頓的著作“印度史”。
- 10月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美國收到工人運動活動家泰·庫諾的來信，請求他們影響住在美國的德國社會黨人，因為他們對美國工人運動採取了宗派主義的立場。
- 11月14日和24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尖銳地批評了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帝國國會中所作的抹殺社會民主黨任務的階級

性质的发言,以及他們在保护关稅問題上的模糊立場。为此,恩格斯規定了社会民主党議員在資产階級議會中必須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則,即不投票贊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統治的任何措施,并且发展了关于无产階級政党的一系列原則性的論点。

**1879年底—1880年初**

馬克思閱讀了尼·伊·柯斯托馬罗夫的“历史专题論文和研究”。閱讀时做了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摘录,并加了評注。

## 1880

**1880—1881年**

恩格斯写“自然辯证法”一书中的三章(“运动的基本形态”、“运动的量度。——功”和“潮汐摩擦”)以及一系列的札記和片断。

**1—12月**

馬克思写“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他重新写第二卷的第三編。馬克思閱讀了政治經济学(关于土地所有制,地租、农业和財政問題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1—3月上半月**

为了宣傳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法格的請求,把“反杜林論”一书中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及第三編的第一、二两章)改編成独立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用法文(由拉法格翻譯)发表在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的“社会主义評論”杂志上,后来又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

**2月底**

恩格斯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报”写“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揭露俾斯麦政府的所謂“社会措施”(实行关稅率 and 把全部铁路集中到帝国政府手中)的真正实质。文章于3月3日和24日在該报上发表。

- 1880年3月底—  
1881年6月初** 馬克思常常受到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加特曼的訪問。
- 3月底** 馬克思为“平等报”发表他的著作“哲学的貧困”写前言。前言作为編輯部的按語，发表在4月7日的报纸上。
- 4月上半月** 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請求，編写“工人調查表”，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条件。“調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評論”上，后来又单独印了25 000份，在全法国散发。
- 5月初** 在恩格斯住所和盖得举行了會議，盖得是为了討論法国工人党的綱領而来到倫敦的。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参加了这次會議。馬克思給法国工人党綱領写出了理論性的导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整个綱領的制訂工作，該綱領发表在6月30日的“平等报”、7月10日的“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和7月20日的“社会主义評論”上。11月，这个綱領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
- 5月4—5日左右**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版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的著作和馬克思的导言于5月底出版。
- 5月21日以后** 馬克思校訂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宣言”一文的原稿。
- 6月27日** 馬克思在給荷兰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多·紐文胡斯的信中，支持他准备用荷兰文通俗地叙述“資本論”第一卷的意图。
- 7月22日和8月5日** 恩格斯在答复俄国社会活动家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布魯柯娃的請求时，答应帮助她寻找关于英美技工学校的书籍，向她介紹了英国国民教育的情形，叙述了



- 西欧和俄国的手工业状况，也叙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組合解体的情况。
- 8月—9月13日** 馬克思全家住在兰茲格特；会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約·斯温頓，和他談論了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情况。
- 8月中—9月19日** 恩格斯在兰茲格特和布里德林頓休养。
- 8月24日左右**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俄国統計学家和經濟学家尼·阿·卡布魯柯夫那里，收到他本人的著作“土地私有主經濟概論”。
- 約9—11月** 馬克思閱讀俄国自由主义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在俄国科学政治文学杂志“欧洲通报”上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并且在頁边上記下了自己的意見。
- 9月12日** 馬克思在答复丹尼尔逊請他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論述俄国改革后的經濟的文章时，建議丹尼尔逊自己发表他所收集的有关俄国改革后經濟发展的統計材料，并且同意丹尼尔逊利用馬克思給他信中的內容。馬克思在信中分析了英国經濟危机的特点，指出在农业危机的影响下农民情况的恶化。
- 9月底** 馬克思、恩格斯和前来倫敦的李卜克內西討論党内問題，特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从李卜克內西那里，他們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組織改組，这种改組为改善党的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可能。
- 1880年10月—約  
1881年5月** 馬克思数次会見英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亨·海德門（他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行为的文章，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对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提出了建議。
- 1880年10月—  
1881年3月** 馬克思繼續写“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大量官方文件(藍皮书)和关于美国經濟发展的文献。

- 10月3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希尔施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談到准备在里昂出版“解放报”（《Émancipation》），談到破坏法国工人党統一的边·馬隆及其支持者（可能派）的立場。
- 11月4日** 馬克思請求紐約的斯温頓在美国筹集經費，援助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受害者。
- 11月5日** 馬克思向左尔格介紹了法国和德国工人党的状况，談到必須給在受殘酷迫害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經濟援助。馬克思还提到“資本論”在俄国所获得的成就，評述了民粹主义的政党——“民意党”和“平分土地”。馬克思請求左尔格供給他关于加利福尼亚經濟状况的內容丰富的材料，以便研究在那里飞快进行的生产的資本主义集中的过程。
- 11月6日**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写信給馬克思，对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其他科学著作的意义以及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关心，給予高度的評价，并且請求馬克思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英美輿論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特别是帮助列·加特曼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 11月27日** 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弗·列斯納联名給 11 月 2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紀念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大会寄去了一封賀信，信中希望波兰人民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联合行动。該信用波兰文于 1881 年在日内瓦发表。
- 12月初** 为了会見馬克思而从日内瓦来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亚·莫罗佐夫两次訪問了馬克思。他向馬克思介紹了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情况，“土地和自由党”分裂的原因，并且代表“民意党”請求馬克思对在日内瓦印行“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一事給予合作。

- 12月9—16日左右 倍倍尔、伯恩施坦及以后来的保·辛格尔抵达倫敦,会见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党的事务和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 1880年底 馬克思閱讀米·叶·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的作品“芒烈波避难所”。他特別注意地主和农民之間的关系和俄国农村中階級斗争的表现。

## 1881

- 1881—1882年 恩格斯研究德国史,收集資料并写研究著作“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著作,在科学地闡明日耳曼民族和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在他生前未曾发表。作者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在概述日耳曼人的氏族和日耳曼人国家的形成的有关章节中,曾經部分地利用了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反映在恩格斯于1882年年底所写的“馬尔克”这一著作中。

恩格斯写了“自然辯证法”中的两章(“热”和“电”)和許多短評及片断。

- 1—6月 馬克思研究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經济发展的資料汇编、专题論著和研究著作。閱讀了亚·伊·斯克列比茨基、阿·阿·戈洛瓦乔夫、斯卡尔金、尤·埃·揚松、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和其他书刊,并做了笔记。在重新研究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沒有收信人的信”的基础上,馬克思写了这些信的内容概要,題为“关于俄国廢除农奴制問題”。
- 1月 馬克思受到俄国經济学家尼·伊·季別尔教授和尼·阿·卡布魯柯夫教授的訪問。
- 1月中—2月 馬克思从紐文胡斯收到“資本和劳动”(对“資本論”第

- 一卷的概述)一书以后,开列該书再版时应该更动的地方。
- 2月18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維·伊·查苏利奇的信,她在信中以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請求馬克思談談对俄国社会經济发展前景的看法,特别是对俄国农民公社命运的看法。
- 2月19日** 馬克思在給丹尼尔逊的信中,以俄国为例,分析了資本主义农业的停滞性质和收成的周期性問題、铁路建設同英美国債制度的关系問題以及資本主义生产积聚的增长問題;談到印度的状况,英国統治階級对印度国民財富和人民的惊人剝削。
- 2月底—3月初** 馬克思根据查苏利奇的請求,概括他所研究的有关俄国农民公社的資料,写了回信的四个草稿,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集体形式及其在俄国实现的条件的結論。
- 3月—約4月** 馬克思讀 P. F. 阿里索夫的小册子“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和米·彼·德拉哥馬諾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殘暴屠杀”,并写了批語。
- 3月8日** 馬克思寄信給查苏利奇,談到他所研究的資本主义发展的理論的意义,談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起点。
- 3月12日** 恩格斯在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路綫表示滿意,指出应当如何利用編輯部得到的資料,以提高在地下工作的党的領導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情緒。
- 3月2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向斯拉夫人为紀念巴黎公社十周年在倫敦举行的大会写信表示祝賀。
- 4—5月** 馬克思讀亨·乔治的“进步和貧困”一书,在給斯温頓和左尔格的信中,說明該书在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掩飾下企图挽救資本家的統治。

- 4月8—11日左右 馬克思十分注視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組織者和参与者——安·伊·热里雅鮑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等人的案件。
- 4月11日 馬克思在給女儿燕·龙格的信中，說謀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組織者是一些“普通的、能干的、勇敢的”人。对沙·龙格在激进派的报纸“正义报”上写关于格莱斯頓的爱尔兰土地法的文章作了指示，說明格莱斯頓对爱尔兰的政策是对大地主有利的剝夺政策和暴力政策。
- 1881年5月—  
1882年2月中 为了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問題，馬克思对摩尔根“原始社会”一书写了一份非常詳尽的摘要，并附有自己的許多評語和結論，还讀了其他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述，其中包括亨·梅恩、魯·佐姆、太勒以及其他等人的作品，并且做了摘录和評注。
- 5月1—2日 恩格斯开始为英国工联在倫敦出版的周报“劳动旗帜报”撰稿。他写了一篇題名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的文章，5月7日在該报发表。这一篇和以后各篇，都沒有署名而是作为社論刊登的。
- 5月15—16日 恩格斯写“雇佣劳动制度”一文。該文发表在5月21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5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写“工联”一文，号召英国工人不要局限于維持一定水平的工資，而要继承宪章运动的战斗傳統，建立自己的階級政治組織，使无产階級爭得政治統治权。該文发表在5月28日和6月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6月 馬克思研究美国大工业的发展，除其他資料外，还閱讀了波士頓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中关于“美孚油公司”、美国絲織工业和童工等方面的文章。
- 6月初 馬克思同海德門断絕了一切关系，后者为了达到沽名

- 釣譽的野心家的目的，想成为觉醒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領，而同馬克思接近并自称为馬克思的学生。决裂的直接原因，是海德門那本希望成为他所建立的民主党人联盟的綱領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从“資本論”上抄来的(却没有提到馬克思的名字)，其中对馬克思主义作了极严重的歪曲。
- 6月4日** 馬克思收到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罗·班納的信，該信通知他苏格兰社会主义者代表會議即将召开，并請求他和恩格斯在組織社会主义党方面給予指示。
- 6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了“对法国的通商条約”、“两个模范地方議會”、“美国的食物和土地問題”这三篇論文；文章刊登在6月18、25日和7月2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6月底—7月20日左右** 馬克思和妻子在伊斯特勃恩。
- 7月初** 恩格斯写“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資理論”一文；該文刊登在7月9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7月中** 恩格斯写“工人党”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这两篇文章，号召英国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利用德国工人阶级在政府和警察經常迫害的条件下繼續順利进行斗争的經驗。两篇文章都发表在7月23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7月26日—8月16日** 馬克思和妻子、女儿燕妮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
- 7月28日—8月22日** 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頓沙洲(約克郡)。
- 7月底—8月上半月** 馬克思写关于土地私有制、手工业、行会、財政和法国农民在1789—1794年革命前夜的状况的笔记，做爱·弗略里的“1789年三級會議的选举”一书的摘录。
- 7月底** 恩格斯写“棉花和铁”一文；該文刊登在7月30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約8—9月** 馬克思对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史和处境感到很大兴趣,从 G. 馬尼的“爪哇”、約·菲尔的“印度和錫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两部著作中做了許多摘記,并加了評注。
- 8月1—2日** 恩格斯写“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該文使英国工人阶级得出一个結論,即沒有資本家阶级,他們自己能够把国家的生产力管理得很好;該文发表在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 8月3日和8日之間** 馬克思在巴黎;会見拉甫罗夫和希尔施。
- 8月8日和9日** 馬克思从拜訪他的法国社会党人沙·雅克拉尔和利沙加勒那里,得知关于法国政治事件和工人党状况的消息。
- 8月10日和15日** 恩格斯在給“劳动旗帜报”編輯乔·希普頓的信中声明,由于該报的机会主义趋向,他不再为該报撰稿。
- 8月17日** 馬克思回到倫敦。
- 8月17—18日** 恩格斯研究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給他的信中,对他发现的微分法給予很高的評价。
- 約8月底—9月** 馬克思开列他所有的俄国书籍和資料清单(主要是关于1861年后俄国社会經济发展的),題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資料”。閱讀并摘录埃·雷·于克的“中华帝国”一书。
- 10月13日左右—12月上半月** 馬克思患重病。
- 10月24日左右** 馬克思收到汉堡出版者奧·迈斯納准备出“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的建議。
- 10月25日** 恩格斯把他和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法国工人党内以馬隆和布魯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詳細告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伯恩施坦;清楚地

- 說明馬克思在国际无产階級运动中的領導作用。
- 11月30日** 恩格斯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在估价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例行选举时指出，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心轉到大工业城市是件好事情。
- 12月2日** 馬克思的妻子燕妮·馬克思逝世。
- 12月4日** 恩格斯写紀念燕妮·馬克思的悼文，該文发表在 12 月 8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2月5日** 恩格斯在燕妮·馬克思安葬时发表墓前悼詞；該悼詞发表在 12 月 11 日“平等报”上。
- 12月29日** 馬克思前往英国南部海岸文特諾尔(威特島)疗养。
- 約1881年底—1882年底** 馬克思研究世界通史。研究的成果，是“編年大事記”这一著作，該著作扼要評述了欧洲的历史事件(从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七世紀)。馬克思最注意的，是封建制度瓦解和資本主义发展时期現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資產階級为确立自己的階級統治而进行的斗争。
- 在編写“編年大事記”时，馬克思所利用的实际材料主要取自施洛塞尔的十八卷本“世界通史”，其次是博塔和科貝特的著作，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凱利的“俄国史”，賽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以及其他資料。馬克思的手稿共有 4 个筆記本，約 105 印張。
- 1881年底—1882年** 馬克思写“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記”，这是有系統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研究的关于俄国的資料和文献的开始。繼續研究美国資本主义发展的資料。

## 1882

- 1—12月** 馬克思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俄国社会經濟关系方



面的文章,閱讀瓦·伊·謝美夫斯基的“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的农民”第一卷,安·伊薩也夫的“俄国的劳动組合”,格·米訥伊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农村土地公社”,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等书籍。

- 1月16日** 馬克思返回倫敦。
- 1月21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格·瓦·普列汉諾夫翻譯的“共产党宣言”俄譯本写序言。2月5日該序言的俄譯文发表在“民意”杂志上。
- 1月25日** 恩格斯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所謂“領袖”作了評述,揭示了造成他們的机会主义的原因,指出同他們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工人群众是党的最可靠的支柱。
- 2月5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庫諾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在群众性的工人組織劳动騎士团成員中順利进行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宣傳的情况。
- 2月9—16日** 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見到阿尔及尔去治疗,中途在阿尔让台大女儿处停留。
- 2月10日** 恩格斯在給貝克尔的信中指出,尽管国际停止活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各国工人党之間的联系而仍然保持着;恢复国际时机尚未成熟。
- 2月中** 馬克思在巴黎同盖得、加·杰維尔和霍·梅薩会晤,同他們討論法国工人党的状况。
- 2月20日—5月2日** 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馬克思常与当地民事法庭法官費默(他曾被波拿巴放逐)会晤,从他那里了解了对阿尔及尔阿拉伯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制度的情况。

- 4月10日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校样后，把它寄给拉甫罗夫。“宣言”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种于5月底在日内瓦出版。
- 4月下半月 恩格斯写“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科学地阐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该文载于5月4日和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5月2日 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离阿尔及尔经马赛和尼斯赴蒙特卡罗，在那里住一个月。
- 5月3日 恩格斯写“论美国资本的积聚”一文，该文发表在5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5月14日 恩格斯同德国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会晤，向辛格尔说明他和马克思对保护关税、铁路国有化和和其他类似措施的看法，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超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1882年6月—  
1883年1月 马克思研究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 6月3日左右 恩格斯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
- 6月3—5日 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顺路在坎恩停留三天。
- 6月6日—8月22日 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并在此进行了一个疗程；马克思常同拉法格会晤。
- 6月20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告诉左尔格，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作了评述。
- 6月21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答应他和马克思支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告知倍倍尔法国工人党内部发生分裂。
- 7月25日 恩格斯通知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

- 納，說他和馬克思允許赫普納在美国用鉛版翻印他們的著作。
- 7月31日** 恩格斯对拉甫罗夫寄来俄文版“共产党宣言”表示謝意。
- 8月2日** 馬克思在巴黎的梅薩那里同杰維尔、盖得和拉法格会晤。
- 8月11日—9月8日** 恩格斯在亞馬斯海濱休养。
- 8月23—27日** 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洛桑。
- 8月27日—9月25日** 馬克思住在斐維。
- 9—10月** 馬克思閱讀亞·尼·恩格尔加尔特的“1872—1882年十一封农村来信”一书，并在頁边作了批語。
- 9月初** 恩格斯把“布雷的牧师”一詩从英文譯成德文，并写关于該詩对德国的政治意义的說明；譯文和对該詩的說明載于9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 9月12日** 恩格斯在給卡·考茨基的信中，表述了他对殖民地問題的看法，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后对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的政策的观点。
- 9月14日** 恩格斯着手进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的准备工作。他决定为該版写一篇关于馬尔克的專門論文，以便让社会民主党了解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而使党注意到把农业工人和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必要性。
- 9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 恩格斯为了写作“馬尔克”，又重新閱讀毛勒的著作：“馬尔克制度、农戶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論”和“日耳曼尼亚的馬尔克制度史”，做了摘录，并加了評注；把毛勒的資料同其他材料加以比較。

- 9月21日** 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准备工作后，写該版序言。該著作于1882年底問世。
- 9月26日** 在离开瑞士之前，馬克思在日内瓦訪問約·菲·貝克尔。
- 9月28日—10月初** 在回倫敦途中，馬克思在阿尔让台住了几天。
- 10—11月** 馬克思研究原始文化史，閱讀并摘录了約·拉伯克的“文明的开始和人的原始状况”一书；了解英国在埃及的財政政策；閱讀迈·乔·馬耳霍耳的“埃及的財政”和艾莫斯的“对埃及人的掠夺”等著作，并写提要。
- 10月20日** 恩格斯在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的信中，談到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对資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階級政党的发展和党内两种傾向——革命傾向和机会主义傾向的斗争做了一系列总结。
- 10月28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評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說明了他对可能发生的无产階級革命进程的观点，分析了法国工人党内部的事件。
- 1882年10月30日—1883年1月12日** 馬克思住在文特諾尔。他在从事“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 10月30日—11月3日** 恩格斯力求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定期交换报纸，以使每个編輯部都能正确認識德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 10月底** 恩格斯写“品特是怎样造謠的”一文，揭穿了俾斯麦的报纸“北德总汇报”对社会民主党的毀謗，該文刊載在11月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11月** 馬克思密切注視馬·德普勒所作的电能远距离傳送的

- 試驗,要恩格斯也注意这些試驗并征詢恩格斯的意見;閱讀 L. 奧斯皮塔利埃的“电的基本应用”一書。
- 11月4日** 恩格斯在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的信中宣称,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拟議的修改党綱的运动是不适时宜的(在廢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前)。
- 11月11—23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国工人党状况交換了意見,对盖得和拉法格在同可能派的斗争中所犯的策略上的錯誤进行了批評。
- 11月23日** 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打算很快就写完“自然辯证法”,他时断时續地写这部极其重要的理論著作已将近十年(在此期間已写完 10 章和近 170 个札記和片断)。
- 12月8日** 馬克思通过恩格斯,建議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揭穿瓦格納—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普魯士国家矿場对待工人的材料作为开端。
- 12月上半月** 恩格斯写完“馬尔克”一文,并在付排前寄給馬克思校审。
- 12月17日** 馬克思閱讀“馬尔克”手稿,在給恩格斯的信中,他对該文給以很高的評价。“馬尔克”作为 1883 年 4 月出版的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发表,該文于同年(3—4 月)轉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現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标题出版了单行本。

### 1 8 8 3

- 1月12日** 馬克思获得自己女儿燕妮·龙格于 1 月 11 日去世的消息后返回倫敦;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 1月13日** 恩格斯写紀念馬克思女儿的悼文：“燕妮·龙格（馬克思）”。悼文刊載在1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2月8日和10日** 恩格斯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解釋交易所在資本的集中和积聚方面的作用。
- 3月1日** 恩格斯在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的信中，指出电能对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最終消灭城乡对立的巨大意义。
- 3月14日(2时45分)** 卡尔·馬克思逝世。
- 3月14—15日** 恩格斯把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內西、倍倍尔、貝克尔和左尔格等），說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損失。
- 3月17日** 卡尔·馬克思安葬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了墓前悼詞，說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理論遗产和实际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
- 3月18日左右** 恩格斯写“卡尔·馬克思的葬仪”一文，該文发表在3月2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4—5月** 恩格斯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着手整理馬克思遺留下来的文献和手稿；閱讀“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繼續进行馬克思做过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 4月28日和5月12日** 恩格斯写“卡尔·馬克思的逝世”一文，报道了馬克思的后期生活和世界各国发来的电唁。該文发表在5月3日和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人名索引

### 三 画

万德比尔特, 威廉·亨利 (Vanderbilt, William Henry 1821—1885)——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第 337 頁。

口吃者路易二世 (Louis II, le Bègue 846—879)——867年起为阿奎丹国王, 法兰克国王 (877—879)。——第 559 頁。

### 四 画

韦莱 (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 (Gaius Velleius Paterculus 公元前 19—公元 31)——罗马历史学家; 曾参加远征日耳曼尼亚、班诺尼亚和达尔马威亚。——第 496、497、499—501、504、525 頁。

牛頓, 伊薩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偉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古典力学的創始人。——第 223、224 頁。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意大利政論家, 加里波第领导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 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的編輯。——第 107 頁。

丹尼尔遜, 尼古拉·弗兰策維奇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

1918)(笔名尼古拉—遜 Николай-он)——俄国经济学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曾与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 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二、三卷譯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譯的)。——第 474、477 頁。

戈克, 阿曼特 (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聞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6 頁。

戈洛瓦乔夫, 阿列克塞·阿德里安諾維奇 (Головачев, Алексей Адрианович 1819—1903)——俄国社会活动家和自由派政論家; 特维尔省农民解放委员会活动家之一; 曾参加拟定廢除农奴制草案, 草案的很大一部分成为 1861年2月19日“法令”的基础。“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俄国铁路事业史”以及其他著作的作者。——第 457—459 頁。

毛勒, 格奥尔格·路德維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社会制度的研究者; 在研究中世纪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 353、433、448、560 頁。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魯士元帅, 反动的軍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魯士軍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魯士总參謀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參謀长(1871—1888),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 393—394 頁。

巴貝夫, 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 (真名为弗朗斯瓦·諾埃尔 François-Noël)——法国革命家, 杰出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平均派”密謀的組織者。——第 207 頁。

巴特比, 昂塞尔姆·波利卡尔普(Batie, Anselme-Polycarpe 1828—188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1871 年国民議會議員, 奥尔良党人; 人民教育部部长(1873), 1876 年起为參議員。——第 133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8、13、110—112、134、141、143、165、325、385 頁。

## 五 画

汉澤曼, 大卫(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資本家和銀行家, 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 1848 年 3—9 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 实施同反动派妥協的叛賣政策。——第 115、193 頁。

古耳德, 杰伊(Gould, Jay 1836—1892)——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 337 頁。

甘必大, 萊昂(Gambette,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 資產階級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員(1870—1871), 各省武装反抗普魯士的組織者; 內閣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第 392—394 頁。

圣西門,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2、223、347 頁。

加勒特, 約翰·約克(Garrett, John York 1820—1884)——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 銀行家。——第 338 頁。

皮提亚斯(Pytheas 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腊旅行家和天文学家; 公元前 325 年左右曾航行到欧洲西北海岸。——第 483、488 頁。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 442 頁。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国际的积极會員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86 頁。

兰斯科伊, 謝尔盖·斯切潘諾維奇(Ланской,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87—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保守分子, 內务大臣(1855—1861); 参加过 1861 年实行的农民改革。——第 455 頁。

尼祿(Nero 37—68)——羅馬皇帝(54—68)。——第 332—333、512、518 頁。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 俄国皇帝(1825—1855)。——第39—40、157、265頁。
- 白拉克, 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爱森納赫派的領袖之一, 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 反对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分子, 但还不够彻底。——第6、10、13、110、172、190頁。
- 白尔尼, 路德維希(Börne,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論家和批評家, 激进的小資产階級反对派的卓越代表人物之一; 写有向德国人民介紹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 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598頁。
- 龙格, 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3—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新聞工作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和巴黎公社委員, 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会主义派別——可能派。——第370、376頁。
- 龙格, 燕妮(Longuet, Jenny 1844—1883)——卡尔·馬克思的大女儿, 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370—371、382頁。
- 卢梭, 让·雅克(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資产階級思想家。——第206、208、219頁。
- 卢格, 阿尔諾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資产階級激进派,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領袖之一; 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16、259頁。
- 瓦拉·努蒙尼烏斯——見努蒙尼烏斯·瓦拉。
- 瓦茨, 格奥尔格(Waitz, Georg 1813—1886)——德国資产階級的中古史学家。——第530頁。
- 瓦格納, 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庸俗的資产階級經濟学家, 政治經濟学中所謂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396—404、407—415、418、419、421—423、425、428、429頁。
- 瓦魯斯(普卜利烏斯·昆提利烏斯·瓦魯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 公元前53左右—公元前9)——羅馬政治活动家和統帥, 叙利亞总督(公元前7), 后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公元7—9), 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陣亡。——第499—505、535頁。
- 卡莱尔, 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 历史学家, 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場批判英国資产階級, 追随托利党; 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208、312頁。
- 卡罗林王朝——法兰克王朝, 751年起統治法兰西(到987年)、日耳曼尼亚(到911年)和意大利(到887年)。——第528、539、543、550、553、554、555、564頁。
- 卡尔多尔夫, 威廉(Kardorff, Wilhelm 1828—1907)——德国政治活动家, 国会议員(1868—1907); “自由保守”党(“帝国党”)創建人之一, 保护关税派, 支持俾斯麦的对內和对外政策。——第43、51—52、54、56—57頁。
- 弗路朗斯, 古斯达夫(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員,

- 1871年4月被凡尔賽分子野蛮杀害。——第371頁。
- 弗洛尔(魯齐烏斯·安奈·弗洛尔)(Lucius Annäus Florus 二世紀)——羅馬历史学家,“梯特·李維論七百年來戰爭概要前后书”的作者。——第495—496頁。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編輯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員。——第117頁。
- 弗兰克尔,列奧(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飾匠;巴黎公社委員,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71—1872),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6頁。
-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將軍,普魯士反动軍閥的主要代表之一,1848年11月普魯士反革命政变和驅散普魯士国民議会的参加者。——第70頁。
- 弗里布尔(Fribourg, E. E.)——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魯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領導人之一,1871年出版敌視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第165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魯士国王(1797—1840)。——第115、239、265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魯士国王(1840—1861)。——第39頁。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魯士官員,政論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左翼;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第159—162頁。
- 布劳涅,泰奧多尔·威廉(Braune, Theodor Wilhelm 1850—1926)——德国日耳曼語文学家,写有許多德語史方面的著作。——第564、567、581頁。
- 布朗基,阿道夫(Blanqui, Adolphe 1798—1854)——法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和經濟學說史家,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代表人物。——第248頁。
- 布朗基,奧古斯特(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許多秘密社团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曾多次被判徒刑。——第260頁。
- 布莱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历任自由党内閣大臣。——第302、312頁。
-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柏林大銀行經理,俾斯麦的私人銀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顧問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經紀人。——第193、197頁。

## 六 画

- 安(Ann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第341頁。
-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

- 英国国王(1714—1727)。——第342頁。
- 西尔蒙, 雅克(Sirmond, Jacques 1559—1651)——法国历史学家, 耶稣会教徒, 中世紀初期文献的出版者之一。——第555頁。
- 华盛顿, 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的总司令(1775—1783); 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第265頁。
- 迈厄特, 休·贾奇(Jewett, Hugh Judge 1812左右—1898)——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 百万富翁, 好几家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美国国会议员。——第338頁。
- 迈耶尔, 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保守党人, 洛贝尔图斯傳記的作者, 以及“第四等級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濫設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第419頁。
- 考斯丘什科, 塔杰烏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 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265頁。
- 吉芬, 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财政问题专家; “统计协会通报”发行人(1876—1891), 貿易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第244頁。
- 吉约姆, 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組織者之一,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13頁。
-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偉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222、234、335、346、372、374頁。
- 达尔曼,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写有丹麦史和德国史方面的著作。——第528頁。
- 毕舍, 菲利浦(Buchez, Philippe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6、29頁。
- 毕洛夫-庫梅洛夫, 恩斯特·哥特弗利德·格奥尔格(Bülow-Cumm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1775—1851)——德国反动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普魯士容克的代言人。——第76頁。
- 托倫, 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魯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1871年国民議会议员,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賽分子, 被开除出国际; 后为参議員。——第164頁。
- 托勒密, 克罗狄烏斯(Ptolemaeus, Claudius 二世紀)——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 and 地理学家, 宇宙的地球中心說的創立者。——第509—510、512、515、519、524—527、529、535、536頁。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代的偉大思想家, 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 奴

- 隶主階級的思想家。——第219、401頁。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155—157、272、440、453、455、457、459、468頁。
-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hilo of Alexandria 約公元前20—公元54) ——亚历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第328—330頁。
- 伊林沃思 (Illingworth, A.) ——1881年英国議會議員。——第287頁。
- 伊尔米农 (Irminon 約死于826年) ——法国圣热尔門-德-普雷修道院院长 (812—817)。——第562頁。
- 伊壁鳩魯 (Epikouros 約公元前341—270)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論者。——第334頁。
- 列斯納，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6、267、379頁。
- 列奧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 ——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68頁。
-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者民主派的領袖之一。——第266、483頁。
- 艾內恩，恩斯特 (Eynern, Ernst 1838—1906)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商业家，1879年起为普魯士下院議員，民族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的殘忍敌人。——第346頁。
- 艾瓦德，格奥尔格·亨利希 (Evald, Georg Heinrich 1803—1875) ——德国东方学家，聖經的研究家和評論家。——第330頁。
- 多里沙尔，罗侖茲 (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1790年) ——科倫警官 (1819—1847)；檢查“萊茵报”的书报檢查官。——第115頁。
- 多米齐安 (梯特·弗拉維·多米齐安) (Titus Flavius Domitian 51—96) ——羅馬皇帝 (81—96)。——第508頁。
- 多米齐烏斯·阿赫諾巴尔布斯 (魯齐烏斯·多米齐烏斯·阿赫諾巴尔布斯)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 死于25年) ——羅馬軍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一世紀初曾数次远征日耳曼尼亚。——第484、497、498頁。
- 米凱尔，約翰 (Miquel, Johann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186頁。
- 米勒斯，茹尔·伊薩克 (Mirès, Jules-Isaac 1809—1871) ——法国銀行家和几家報紙的所有人。——第197頁。
- 米尔斯，达賴厄斯·奧格登 (Mills, Darius Ogden 1825—1910) ——美国銀行家，百万富翁。——第337—338頁。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俄国社会学家、政論家和文学批評家，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維護者；“俄国紀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編輯之一。——第126、129、130頁。

## 七 画

秃头查理 (Charles le Chauve 823—877) ——西法兰克王国国王 (840—877), 法兰克皇帝和意大利国王 (875—877)。——第 551 頁。

肖萊馬, 卡尔 (Schorlemmer, Karl 1834—1892) ——德国大有机化学家, 辩证唯物主义者, 曼彻斯特的教授;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79 頁。

君士坦丁 (Constantin 274 左右—337) ——罗马皇帝 (306—337)。——第 328、517 頁。

利普西烏斯, 尤斯图斯 (約斯特·利普斯) (Lipsius, Justus (Joost Lips) 1547—1606) ——尼德兰大語文学家, 拉丁語学家, 曾在耶拿、科倫、卢汶、来頓等地任教授。——第 567 頁。

劳, 卡尔·亨利希 (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398、404、407、410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115 頁。

努蒙尼烏斯·瓦拉 (Numonius Vala 死于公元 9 年) ——昆提利烏斯·瓦魯斯的次帅, 曾指揮騎兵, 在条多堡森林羅馬人潰敗逃跑时陣亡。——第 503 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 ——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作家和文学批評家。——第 129 頁。

麦基佛 (MacIver, D.) ——柏肯海德的英国議會議員 (1881 年)。——第 287

頁。

麦凱, 約翰·威廉 (Mackay, John William 1831—1902) ——美国企业家和銀行家, 銀矿主。——第 337 頁。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师,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关在普魯士监狱, 1846—1847 年为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为“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61、63—70、72—80、83—85、87、88、90—93、96—99、101—106 頁。

沃尔索, 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 (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1821—1885) ——丹麦考古学家, 曾证明存在青銅时代; 写有斯堪的那維亚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74—1875 年任教育大臣。——第 512 頁。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 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65)。——第 260 頁。

沙弗豪森, 海尔曼 (Schaaffhausen, Hermann 1816—1893) ——德国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480 頁。

伯克, 奥古斯特 (Böckh, August 1785—1867) ——德国語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古希腊羅馬經濟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426 頁。

伯恩施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881—1890); 叛徒, 恩格斯逝世后大肆修正馬克思主义学說。——第 175、177、178、181 頁。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貝特 (Bornstedt, Adelbert 1808—1851) ——德国政論家, 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編輯(1847—1848), 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年3月被开除出盟。——第 260 頁。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 ——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經濟学家, 反动的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代表; 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結合在一起; 是个形而上学者。——第 51、263、345 頁。

杜諾瓦耶, 沙尔 (Dunoyer, Charles 1786—1862) ——法国庸俗經濟学家和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第 248 頁。

杜克罗,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 (Ducrot, Auguste-Alexandre 1817—1882) ——法国將軍; 1872—1878年間参加旨在推翻共和制度的保皇党人密謀。——第 133 頁。

李希特尔——見赫希柏格。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6、280、400、421 頁。

李卜克內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国际会員; 国会議員(1867年起); 德国

社会民主党創建人和領袖之一; 在某些問題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調和主义立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10、13、172—179、349、377 頁。

狄龙, 悉尼 (Dillon, Sidney 1812—1892) ——美国百万富翁, 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 338 頁。

狄龙, 約翰 (Dillon, John 1851—1927)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爱尔兰全国土地同盟领导人之一, 1880年为英国議会议員; 八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獄。——第 309 頁。

狄奥·卡西烏斯(卡西烏斯·狄奥·科克策揚) (Cassius Dio Coccejanus 約 155—235) ——羅馬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元老院貴族的代表人物, 曾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八十卷的“羅馬史”。——第 484、496—499、502、504、527 頁。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的領袖,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人物, 无神論者, 法国革命資产階級的思想家之一。——第 219 頁。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 ——杰出的古希腊演說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馬其頓派的領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416 頁。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Karl 1841—1900)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聞工作者, 好几家社会民主党報紙的編輯; 1879年夏天居留巴黎, 并在那里宣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 172—181 頁。

希罗多德 (Herodotos 約公元前 484—425) ——古希腊历史学家。——第 416、481 頁。

- 希耳佩里克一世 (Chilperic I 死于 584 年) —— 墨洛温王朝的紐斯特里亚 (法兰克国家的一部分) 国王 (561—584)。——第 544 頁。
- 希尔德布兰 (Hildebrann 八世紀) —— 法国奥頓附近的帕特里西阿克 (佩西) 庄园主。——第 550 頁。
- 希尔德布兰德, 汉斯·奥拉弗 (Hildebrand, Hans Olof 1842—1913) —— 瑞典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和古錢学家, 写有瑞典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第 515 頁。
- 貝塞麦, 亨利 (Bessemer, Henry 1813—1898) —— 英国发明家, 曾发明新的經濟炼鋼法。——第 196、426 頁。
-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 見迪斯累里·本杰明。
- 貝列尔或貝列拉, 艾米尔 (Péireire, Émile 1800—1875) —— 法国銀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議員; 1852 年与其弟伊薩克·貝列尔一起創辦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第 193、197 頁。
- 貝列尔或貝列拉, 伊薩克 (Péireire, Isaac 1806—1880) —— 法国銀行家, 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議員; 1852 年与其兄艾米尔·貝列尔一起創辦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第 193、197 頁。
- 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 —— 德国政論家和历史学家, 拉薩尔分子, 后来加入爱森納赫派;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14 頁。
-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 德国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国际在瑞士和德国的支部組織者, 国际倫敦代表會議 (1865) 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驅” 杂志的編輯 (1866—1871);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159 頁。
- 貝克尔, 海爾曼·亨利希 (“紅色貝克尔”)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 —— 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 5 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70 頁。
- 克洛維一世 (Clovis I 465—511) —— 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 (481—511)。——第 583 頁。
- 克倫格耳 (Krengel) ——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涅辛村村长 (在东普魯士)。——第 75 頁。
- 克拉左門 (小亞細亞) 的阿那克薩哥拉 (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左右—428) —— 古希腊哲学家, 唯物主义者。——第 205 頁。
- 克虜伯, 阿尔弗勒德 (Krupp, Alfred 1812—1887) —— 德国大工业家, 供应欧洲許多国家火炮和其他軍火的軍事冶金工厂厂主。——第 195、196 頁。
- 克罗克, 查理 (Crocker, Charles 1822—1888) —— 美国铁路企业主, 百万富翁。——第 337 頁。
- 克罗狄烏斯 (Claudius 公元前 10—公元前 54) —— 羅馬皇帝 (41—54)。——第 506 頁。
- 克呂澤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 —— 法国政治活动家, 国际會員, 追随巴枯宁派, 里昂和馬賽革命起义 (1870) 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委員，軍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鎮壓后流亡比利時。——第166頁。

克呂格爾，丹尼爾·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Krüger, Daniel Christian Friedrich 1819—1896）——德國法學家和外交家，1873年為漢堡和萊梅的聯邦參議會議員。——第54、55頁。

## 八 画

門克，亨利希·泰奧多爾（Menke, Heinrich Theodor 1819—1892）——德國地理學家，曾改編施普魯奈爾的“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圖集”。——第584頁。

彌倫霍夫，卡爾·維克多（Müllenhoff, Karl Viktor 1818—1884）——德國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德國古跡、神話和中世紀德意志文學的研究者。——第483頁。

季別爾，尼古拉·伊萬諾維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著名的俄國經濟學家；俄國第一批馬克思經濟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他不懂唯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質，一直站在激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上。——第400頁。

波拿巴，約瑟夫·沙爾·保爾，拿破侖親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日羅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侖第三的堂弟；在第二共和國時期是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的議員；1854年任克里木法軍師長，1859年奧意法戰爭中任軍長；綽號普隆-普隆和紅色親王。——第119頁。

佩特羅尼烏斯（凱尤斯·佩特羅尼烏斯·

仲裁人）（Gaius Petronius Arbitrarius 死于66年）——羅馬作家，據說是“薩蒂里孔”這部小說的作者，小說中描繪了尼祿統治時期羅馬社會的腐化。——第331頁。

林耐，卡爾（Linné, Karl 1707—1778）——杰出的瑞典自然科學家，植物和動物分類法的創始人。——第224頁。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國國家活動家，共和黨創建人之一，美國總統（1861—1865）；美國內戰時期在人民群眾的影響下實現了許多重要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這些改革意味著轉而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戰爭；1865年4月被奴隸主的好細刺殺。——第165頁。

法夫爾，茹爾（Favre, Jules 1809—1880）——法國律師和政治活動家，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國防政府和梯也爾政府的外交部長（1870—1871），曾同德國進行關於巴黎投降及簽訂和約的談判，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167、391頁。

法耳梅賴耶爾，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國歷史學家和旅行家。——第332頁。

帕斯凱維奇，費多爾·伊萬諾維奇（Паскевич,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23—1903）——侍從武官長，反動分子，1859年起為“關於解除農奴制依附關係的農民法令”草案編纂委員會委員。——第454、457頁。

帕麥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國國家活動家，初為托利黨人，1830年起為輝



- 格党領袖之一，依靠該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內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70、119頁。
- 图克，托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追隨古典政治經濟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的貨幣論。——第426頁。
- 图拉真（馬可·烏尔皮·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 53—117）——羅馬皇帝（98—117）和統帥。——第517頁。
- 图尔的格雷哥里（格雷哥里·弗洛倫修斯）（Grégoire de Tours (Gregorius Florentius) 538—594）——图尔的主教（573年起）；“法兰克人史”一书的作者，該书是研究五至六世紀法兰克人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第544頁。
- 欣丁頓，科利斯·波特爾（Hintington, Collis Potter 1821—1900）——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第337頁。
- 欣克馬尔（Hinkmar 830—882）——郎城（法国）主教。——第551頁。
- 欣克馬尔（Hincmar 806左右—882）——845年起为兰斯城（法国）大主教，“貝坦年鑑”第三部分（861—882年）的作者。——第545、560頁。
- 罗特，保尔·魯道夫（Roth, Paul Rudolph 1820—1892）——德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写有許多关于西欧封建制度起源問題的著作。——第543、544、545、546、552、553、559頁。
- 罗伊特，弗里茨（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所謂地方色彩派的代表，用低地日耳曼方言写作，1833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徒刑，1840年遇赦。——第65頁。
- 罗赫納，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約生于182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細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員（1864—1867和1871—1872），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79頁。
-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聞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員，巴黎公社被鎮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八十年代末轉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陣营。——第370頁。
- 罗伯斯比尔，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腦（1793—1794）。——第112頁。
- 罗斯特，瓦倫亭·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Rost, Valent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0—1862）——德国語文学家，“希德辞典”編者。——第416頁。
- 罗斯托夫策夫，雅柯夫·伊万諾維奇（Ростовцев,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1803—1860）——俄国国家活动家，侍从武官长，1857年起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后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員，1859年起为“关于解除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草案編纂委员会主席。——第456—457、468頁。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卡尔·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第370、371頁。

-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 ——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法国工人党的創建人之一, 杰出的馬克思主义宣傳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 267、345、370、371、379 頁。
- 拉薩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 律師, 1848—1849 年曾参加萊茵省的民主运动, 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 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創建人之一; 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 5、6、9、14、17、18、25—29、159、183、192、248、346 頁。
- 拉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 ——法国詩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温和的資产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1848 年任外交部长, 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39、387 頁。
-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 (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 ——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摆脱康德独立地发展了并且精确地证明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說。——第 223、346 頁。
-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維奇 (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 ——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論家, 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哲学上是实证論者; 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前进”杂志(1873—1876)和“前进报”(1875—1876)編輯。——第 377、380、384 頁。
- 拉克布累, 德奧多·約瑟夫 (Lacomblet, Theodor Joseph 1789—1866) ——德国历史学家, 杜塞尔多夫档案室主任; 原系法国人。——第 583 頁。
- 阿德里安(普卜利烏斯·艾利烏斯·阿德里安)(Publius Ælius Hadrianus 76—138) ——羅馬皇帝(117—138)。——第 509 頁。
- 阿格利巴(馬可·維普薩尼亞·阿格利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公元前 63 左右—12) ——杰出的羅馬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公元前 21 年起是奧古斯都的共同执政者。——第 493—496 頁。
- 阿里奧維斯特 (Ariovist 公元前一世紀) ——日耳曼族苏維汇人的酋长, 曾抗击凱撒。——第 484、485 頁。
- 阿納斯塔西烏斯一世 (Anastasios I 430 左右—518) ——拜占庭皇帝 (491—518)。——第 517 頁。
- 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約 332—400) ——羅馬历史学家, “历史”一书的作者, 該书包括公元 96 至 378 年的羅馬历史。——第 540 頁。
- 阿非利加的利奧 (哈桑·伊本-穆罕默德·阿尔-瓦贊 (Leo Africanus (Al-Hasan ibn Mohammed al-wazzan) 1495 或 1496—約 1550) ——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 游历过北非、中非和西亚, 所著“非洲游記”一书內有地理学上重要的材料。——第 524 頁。
- 阿斯特, 威廉 (Astor, William 1829—1892) ——美国百万富翁, 大铁路企业主。——第 338 頁。
- 阿斯普雷涅斯(路齐烏斯·諾尼烏斯·阿斯普雷涅斯)(Lucius Nonius Asprenas 約公元前 28—公元 30) ——羅馬国家活动家和統帥, 曾参加对日耳曼人

- 的历次战争。——第 501、503 頁。
- 阿尔伯特(Albert 1828—1902)——薩克森国王(1873—1902)。——第 107 頁。
- 阿尔諾德, 克里斯托弗尔·弗里德里希·威廉(Arnold, Christophorus Friedrich Wilhelm 1826—1883)——德国法学史、国民經济史和文化史专家; 著有“德意志的古代”。——第 564、576、583、585、589—593 頁。
- 阿尔米紐斯或阿尔明(Arminius 公元前 17—公元 21)——日耳曼族凱魯斯奇人的酋长, 曾领导各日耳曼部落抗击羅馬人, 并于公元 9 年在条多堡森林击潰了他們。——第 501—505、508 頁。

## 九 画

- 范·派頓, 菲力浦(Van Patten, Philipp)——美国資产者, 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1876 年起是合众国工人党全国書記, 而自 1877 年起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書記; 1883 年兼职逃跑, 当了国家官員。——第 384 頁。
-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4—216、259、347 頁。
- 耶林, 魯道夫(Jhering, Rudolf 1818—1892)——德国資产階級法学家, 大資产階級观点的体现者, 曾领导資产階級法律学派的“实证”和“实用教条”派別。——第 423、426 頁。
- 洪堡, 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大学者, 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116、319、322 頁。
- 柯頓, 罗伯特·布魯斯(Cotton, Robert Bruce 1571—1631)——英国古代手稿、书籍、錢币等的搜集家; 柯頓图书馆的創建人, 該館于不列顛博物館創立时(1753)被轉贈博物館。——第 565、566 頁。
- 革拉苏(馬可·李奇尼烏斯·革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 115 左右—53)——羅馬政治活动家和統帥, 公元前 71 年鎮压了斯巴达克起义; 曾两次任执政官。——第 484、489 頁。
- 济貝耳, 亨利希(Sybel, Heinrich 1817—1895)——德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民族自由党人, 所謂小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許多著作充滿着反动的普魯士主义和沙文主义气味。——第 346 頁。
-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奧波特(Jottrand, Lucien Le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論家, 四十年代是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布魯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 68 頁。
- 品特, 艾米尔(Pindter, Emil)——普魯士樞密顧問, 1865 年起为編輯, 1872 年起为政府报纸“北德总汇报”的主編。——第 348 頁。
- 品德尔, 尤利烏斯·海尔曼(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 1805 年)——普魯士官吏,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任西里西亚总督, 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右派。——第 80 頁。
- 迪耳克, 查理·温特沃思(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自由党激进派領袖之一, 外交副大臣(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882—1885)。——第 287 頁。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

- 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曾任首相(1868和1874—1880)。——第285頁。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107、140、270、308、310頁。
- 威斯特华倫,路德維希·馮(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政府顧問,燕妮·馬克思夫人的父亲。——第319、322頁。
- 勃魯美,卡尔·威廉·海尔曼(Blume, Karl Wilhelm Hermann 1835—1919)——普魯士將軍和軍事著作家;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394頁。
-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伯爵,普魯士將軍,普魯士反动內閣的首腦(1848—1850)。——第96頁。
- 柏拉图(Plato 約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416頁。
- 柏修斯(Perseus 公元前212—166)——最后一个馬其頓国王(公元前179—168)。——第483頁。
- 柏西阿斯(奧魯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羅馬諷刺詩人,曾斥責当时羅馬社会的墮落風气,斯多葛派哲学的追随者。——第333頁。
- 科累卓(Correggio 約1489或1494—1534)(真名为安东尼奥·阿勒格里 Antonio Allegri)——著名的意大利写生画家。——第52頁。
- 科布頓,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議會議員。——第299—302、312頁。
- 科瑟伊恩(Cosijn, P. J.)——荷兰語文学家,日耳曼語专家。——第568頁。
- 哈賽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1844年)——拉薩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領袖人之一,1871—1875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9頁。
- 哈森克莱維尔,威廉(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1871—1875年是拉薩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第3、9頁。
- 哈克斯特豪森,奧古斯特(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普魯士官員和作家,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殘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126頁。
- 查理曼(Carloman 715—755)——法兰克宮相查理·馬尔泰尔的长子;奥斯特拉西亚、阿勒曼尼亚和紹林吉亚的执政者(741—747)。——第570頁。
- 查理大帝(Charlemange 742左右—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第360—362、540、543、544、545、548、549、554、555、557、559—563頁。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第340頁。
- 查理·馬尔泰尔(Charles Martel 688

- 左右—741)——法兰克宫相, 715年起是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第543、548、550、553頁。
- 查苏利奇, 維拉·伊万諾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家, 后来轉到孟什維克立場。——第268、269、430、446、447頁。
- 洛克, 約翰(Locke,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 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第220頁。
- 洛克菲勒, 約翰·戴維遜(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石油大王, 美国财政寡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第337頁。
- 洛里亚, 阿基尔(Loria, Achille 1857—1926)——反动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經濟学家, 马克思主义的贗造者。——第386頁。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約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396、411、412、413、417、419、420頁。
- 約克, 汉斯·大卫·路德維希, 瓦滕堡伯爵(York 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1830)——普魯士將軍, 1821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第505頁。
- 約尔丹(Jordanis 約生于500年)——哥特历史学家, “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一书的作者。——第513頁。
- 約尔南德——見約尔丹。
- 約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 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70、102、103頁。
- 約翰(Johann 1801—1873)(笔名斐拉雷特 Philaret)——薩克森国王(1854—1873), 曾翻譯过但丁的作品。——第115頁。
- 約翰八世(Johann VIII)——羅馬教皇(872—882)。——第546頁。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警官, 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倫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維尔穆特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陰謀”一书。——第67頁。
-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Karl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改良主义者,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編者之一; 曾批評过马克思主义, 八十年代退党。——第177、179頁。
- 施韦澤, 約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薩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阻撓德国工人加入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年他同普魯士当局的勾結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182頁。
- 施佩耶尔, 卡尔(Speyer, Karl 生于1845年)——細木工, 六十年代为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書記, 1872年起为倫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后为美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36頁。

施奈德尔, 雅科布 (Schneider, Jacob 1818—1898) ——德国考古学家, 写过許多德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 508 頁。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人物之一; “耶穌傳”的作者; 1866 年以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28 頁。

施滕策尔, 古斯达夫·阿道夫 (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第 99 頁。

施普魯奈尔·馮·麦茨, 卡尔 (Spruner von Merz, Karl 1803—1892) ——德国历史学家和制图家, 曾編过許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許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584 頁。

## 十 画

虔誠者路易 (Louis le Pieux 778—840) ——法兰克皇帝 (814—840)。——第 549、550、558、562、563 頁。

宾茨, 卡尔 (Binz, Karl 1832—1913) ——杰出的德国医生和药理学家, 波恩药理学院的創办人 (1869)。——第 47 頁。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偉大的德国作家。——第 59 頁。

貢特朗 (Gontran 525—593) ——勃艮第国王 (561—593)。——第 544、549 頁。

俾斯麦, 奧托 (Bismark, Otto 1815—1898) ——公爵, 普魯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魯士容克的代表; 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62), 普魯士首相 (1862—

1871), 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統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878)。——第 9、25、57、132、139、140、159—161、168、170、171、179、180、182、185、191、194—198、200、239、290、304、308—310、343、348—350、359、360 頁。

倍倍尔, 奧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第一国际會員; 国會議員 (1867 年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但是, 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錯誤, 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 3、8、9、10、13、172、310 頁。

哥尔茨男爵, 泰奧多尔 (Goltz, Theodor, Freiherr von der 1836—1905) ——德国农学家; “德意志帝国农业工人状况”一书的作者。——第 53 頁。

倫納德, 安得列阿斯 (Renard, Andreas 1795—1874) ——伯爵, 西里西亚地主, 反动分子。——第 84 頁。

庫尔諾, 安都昂·奧古斯丹 (Cournot, Antoine-Augustin 1801—1877) ——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 政治經濟学中主观主义流派的前輩之一; 在他的“財富理論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企图用数学方法来为資本主义制度辯护。——第 429 頁。

爱因哈德 (爱金哈特) (Einhard (Eginhart) 770 左右—840) ——法兰克历史編纂学家, 查理大帝傳記的作者。——第 543 頁。

- 埃尔拉赫, 弗兰茨 (Erlach, Franz 1819—1889) ——瑞士軍官, 軍事著作家;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时期为駐德国大本营观察員。——第 393 頁。
- 茹柯夫斯基, 尤利·加拉克提昂諾維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 ——俄国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論家; 国家銀行行長, 他在“卡尔·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一书”一文中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攻击。——第 126 頁。
-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偉大的德国革命詩人。——第 111、329 頁。
- 海奈, 摩里茨 (Heyne, Moritz 1837—1906) ——德国日耳曼語文学家, 写有許多德語史方面的著作, 出版过古德語和哥特語文獻; 格林兄弟主編的第一部德語史辭典的編纂者之一。——第 564、565、575 頁。
- 烏朗特, 路德維希 (Uhland, Ludwig 1787—1862) ——德国浪漫主义詩人;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屬于中間派左翼。——第 101、103 頁。
- 烏尔卡尔特, 戴維 (Urquhart, David 1805—1877) ——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仇俄分子; 曾揭露帕麦斯頓和輝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 159 頁。
-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杰出的德国語文学家和文化史家, 写有許多德国語言史、法學史、神話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1852 年与其弟威廉·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語辭典”。——第 492、525—530、531、532、536、563、564、569、571、588 頁。
- 格萊斯頓, 罗伯特 (Gladstone, Robert 1811—1872) ——英国商业家, 資產階級慈善家, 威廉·格萊斯頓的堂弟。——第 32 頁。
- 格萊斯頓,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的拥护者, 十九世紀下半叶为自由党領袖; 曾任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56、287、310、370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11、239、288、367、393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的孫子, 第二共和国總統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31、102、119、153、154、312、505 頁。
- 拿破侖亲王 (普隆-普隆) ——見波拿巴, 約瑟夫·沙尔·保尔。
- 納瓦罗 (Navarro, J. D.) ——美国百万富翁。——第 338 頁。
- 納德勒, 卡尔·克利斯提安·哥特弗利德 (Nadler, Karl Christian Gottfried 1809—1849) ——德国詩人, 用普法尔茨方言写作。——第 596 頁。
- 納集莫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諾維奇 (Назим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02—1874) ——俄国將軍, 維爾納軍事總督和格罗德諾、明斯克和柯夫諾的總督 (1855—1863)。——第 455 頁。
- 恩格尔, 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 ——著名德国統計学家, 1860—1882 年任柏林普魯士王国統計局局長。

- 第 315 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8、13、36、37、39、63、69、71、100、105、116、117、171、190、234、248、259、260、263、345—347、353、374、377、380、384—387、492、525、584 頁。
- 恩格耳哈爾特, 赫爾維希·康拉德·克里斯提安 (Engelhardt, Helvig Conrad Christian 1825—1881) ——丹麥考古學家, 弗倫茲堡北部古物博物館館長。——第 518 頁。
- 特羅胥, 路易·茹爾 (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 ——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 奧爾良黨人, 侵占阿爾及利亞 (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戰爭 (1853—1856) 和意大利戰爭 (1859) 的參加者, 國防政府的首腦, 巴黎武裝力量總司令 (1870 年 9 月—1871 年 1 月), 背叛地破壞城防, 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第 391、394 頁。
- 特耳克, 卡爾·威廉 (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3)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拉薩爾派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第 3、9 頁。
- 特賴奇克, 亨利希·馮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 ——德國反動的历史學家和政論家, 1886 年被任為普魯士國家的历史編纂家, 德意志帝國國會議員 (1871—1888), 反動的普魯士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和德國向外擴張政策的思想家和宣傳家。——第 346 頁。
- 特森多爾夫, 海爾曼·恩斯特·克利斯提安 (Tessendorf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1—1895) ——普魯士檢察官, 1873 年為柏林市法院法官; 1885 年為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長, 迫害社會民主黨人的組織者。——第 108 頁。
- 馬可·奧里略·安敦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21—180) ——羅馬皇帝 (161—180), 斯多葛派哲學家。——第 512、515 頁。
- 馬丁, 博恩·路易·昂利 (Martin, Bon-Louis-Henri 1810—1883) ——法國資產階級历史學家, 多卷的“法國史”作者, 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 共和黨人; 1876 年起為參議員。——第 164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之一, 1864 年成立國際時企圖置國際於自己影響之下, 1871 年反對巴黎公社和國際, 阻礙意大利獨立工人運動的發展。——第 146 頁。
- 馬布利, 加布里埃爾 (Mably, Gabriel 1709—1785) ——卓越的法國社會學家, 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第 207 頁。
- 馬利烏斯, 凱尤斯 (Marius, Gaius 公元前 156 左右—86) ——羅馬統帥和國家活動家, 曾任執政官 (公元前 107、104—100、86)。——第 483、506 頁。
- 馬羅博杜斯 (Maroboduus 死于 41 年) ——日耳曼族馬可曼尼人的酋長 (公元前 8—公元 19), 在萊茵河沿岸地區建立了日耳曼部落聯盟, 曾與羅馬作戰。——第 486、497、498、504 頁。
- 馬爾齊安 (Marcianus 約五世紀) ——希臘地理學家, 曾撰寫北海沿岸的游記。——第 512 頁。
- 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國教士, 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化的地主



- 貴族的思想家，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人，宣傳仇視人類的人口論。——第5、27頁。
- 馬克里努斯 (Macrinus 164—218) ——羅馬皇帝(217—218)。——第518頁。
- 馬克思，卡爾 (Marx, Karl 1818—1883) (傳記材料)。——第5—10、13、14、39、63、69、100、115—126、163、165、167、190、227、228、230、235、248、249、259、260、268、319—323、372—388頁。
- 馬克思，燕妮 (父姓是馮·威斯特華倫 geb. von Westphalen) (Marx, Jenny 1814—1881) ——卡爾·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實朋友和助手。——第116、319—323、372、374、381頁。
- 馬克思，愛琳娜 (杜西) (Marx, Eleanor (Tussy) 1855—1898) ——卡爾·馬克思的小女兒，英國和國際工人運動活動家，1884年起為愛·艾威林的妻子。——第380、383頁。
- 馬克思，弗蘭契斯卡 (Marx, Franziska 1851—1852) ——馬克思的女兒。——第319、323頁。
- 馬克思，埃德加爾 (“穆希”) (Marx, Edgar (Musch) 1847—1855) ——馬克思的兒子。——第319、323頁。
- 馬克思，亨利希·格維多 (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 ——馬克思的兒子。——第319、323頁。
- 十一 画**
- 威曼，阿道夫 (Ziemann, Adolf 1807—1842) ——德國語文學家，日耳曼學家，寫有許多德語史方面的著作。——第417頁。
- 笛卡兒，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 ——傑出的法國哲學家，二元論者，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第219頁。
- 梯也爾，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 ——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國家活動家，奧爾良黨人，內務大臣 (1832、1834)，首相 (1836、1840)，政府首腦 (內閣總理) (1871)，共和國總統 (1871—1873)，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150、154、391頁。
- 措伊斯，約翰·卡斯巴爾 (Zeuß, Johann Kaspar 1806—1856) ——德國語言學家，曾編寫過克爾特語的詳細的比較著作。——第525—528、532頁。
- 莎士比亞，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偉大的英國作家。——第9、166頁。
- 培根，弗蘭西斯，維魯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 ——傑出的英國哲學家，英國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自然科學家，歷史學家。——第220頁。
- 培倫溫特-湯普遜——見湯普遜。
- 勒洛，弗蘭茨 (Reuleaux, Franz 1829—1905) ——德國學者，德國機械論學派的創始人，1876年為參加費拉得爾菲亞國際展覽會的德國政府專員。——第194頁。
- 勒南，厄內斯特·約瑟夫 (Renan, Ernest-Joseph 1823—1892) ——法國宗教史學家，唯心主義哲學家，因寫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167、327頁。
- 莫爾，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 ——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職業是鐘表匠；正義者同盟領導人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1848年7—9月是科倫工人聯合會主席，1849年巴

- 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城战役中牺牲。——第 71 頁。
- 莫斯特，約翰 (Most, Johann 1846—1906)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1878 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流亡英国；1880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1882 年侨居美国，繼續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傳。——第 272、384、385、386 頁。
- 基恩，詹姆斯·罗伯特 (Keene, James Robert 1838—1913) ——美国金融家，百万富翁。——第 338 頁。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116 頁。
-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德国古典哲学創始人，唯心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213、223、346、347 頁。
- 康普豪森，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 ——德国銀行家，萊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領袖之一；1848 年 3—6 月任普魯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39、115 頁。
- 曼托伊費尔，爱得文 (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 ——男爵，德国將軍，1873 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軍軍长，后为第一軍团和南方軍团司令，駐法国的德国占領軍总司令 (1871—1873)。——第 394 頁。
- 曼托伊費尔，奥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魯士国家活动家，貴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 (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72、73、96 頁。
- 盖布，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工党 (爱森納赫派) 党员；1872 年起为党的财务委員；德意志帝国国会議員 (1874 年起)。——第 13 頁。
- 盖拉尔，本杰明·阿德姆·沙尔 (Guérard, Benjamin-Edme-Charles 1797—185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許多法国中古史方面的著作。——第 546、562 頁。
- 盖尔馬尼庫斯 (尤利烏斯·凱撒·盖尔馬尼庫斯) (Julius Cæsar Germanicus 公元前 15—公元 19) ——羅馬統帥，曾数次远征日耳曼人。——第 489、503、507 頁。
- 朗姆，海尔曼 (Ramm, Hermann)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75 年为“人民国家报”編委。——第 10 頁。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第 27、396 頁。
- 朗凯斯特，雷伊 (Lankester, Rey 1847—1929) ——英国学者，生物学家。——第 379 頁。
- 梅恩，亨利·詹姆斯·薩姆納 (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 ——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作为印度省督所屬参事室参事 (1862—1869) 和印度事务国家秘书处参事室参事 (1871 年起)，积极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第 433、

448 頁。

梅薩-伊-列奧姆帕特, 霍賽(Mesa y Leompert, José 1840—1904)——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 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組織者之一,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1—1872), “解放报”編委(1871—1873), 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1872—1873), 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 西班牙的第一批馬克思主义宣傳者之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創始人之一(1879), 曾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譯成西班牙文。——第 36、377 頁。

梅特涅, 克雷門斯(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239 頁。

梅斯托尔夫, 約翰娜(Mestorf, Johanna 1829—1909)——德国历史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考古方面的著作, 翻譯了許多斯堪的那維亞考古学家的著作。——第 515 頁。

## 十二画

揚松, 尤利·埃杜阿尔多維奇(Ян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3)——俄国进步的統計学家和經濟学家, 彼得堡大学教授, 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統計处处长(1881年起); 写有許多統計学理論和統計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458—462、466、469 頁。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207、209、212、213、235、237、238、347 頁。

敦克尔, 弗兰茨(Duncker, Franz 1822—1888)——德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119 頁。

閔采尔, 托馬斯(Münzer, Thomas 1490左右—1525)——偉大的德国革命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陣营的領袖和思想家; 他宣傳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 207 頁。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銀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 年曾多次任財政大臣, 后任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 193 頁。

湯普逊, 托馬斯·培倫涅特(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 庸俗的經濟学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302 頁。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辯证法; 德国資產階級思想家。——第 205、206、213、219、223—226、327、346、347 頁。

斐拉雷特——見約翰。

森提烏斯·薩土尔尼努斯(Sentius Saturninus 一世紀)——羅馬統帥, 曾参加远征日耳曼人。——第 497 頁。

費尔, 詹姆斯·格萊安(Fair, James Graham 1831—1894)——美国資本家和政治活动家, 屬於共和党, 1881—1887 年为参議員。——第 338 頁。

費希特, 約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 客观唯心主义

- 者。——第 347 頁。
- 提耳登, 賽米爾·琼斯 (Tilden, Samuel Jones 1814—1886)——美国政治活动家, 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法学家, 紐約州州长 (1874—1876)。——第 338 頁。
- 提比利烏斯 (Tiberius 公元前 42—公元 37)——羅馬皇帝 (14—37)。——第 332、496、497、507、518 頁。
- 菲利浦二世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 (1556—1598)。——第 506 頁。
- 菲勒克, 路易 (Viereck, Louis 1851—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領袖之一; 1884—1887 年为帝国国会议員; 1896 年侨居美国, 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 175、176、179、181 頁。
- 菲尔德, 賽勒斯·威斯特 (Field, Cyrus West 1819—1892)——美国百万富翁, 在美国和英国之間鋪設水底电訊电纜的大西洋电訊公司的创办人。——第 338 頁。
- 舒尔采, 恩斯特 (Schulze, Ernst)——德国語文学家。——第 416 頁。
- 舒瓦洛夫, 彼得·巴甫洛維奇 (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生于 1824 年)——伯爵, 彼得堡省貴族会会长 (1851—1863), 准备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貴族委员会主席; 在編纂委员会中维护設法“解放”无地农民的大土地貴族的利益。——第 454、457 頁。
- 舒瓦洛夫, 彼得·安得列也維奇 (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827—1889)——伯爵, 俄国將軍和外交家, 宪兵长官和皇帝办公厅第三厅厅长 (1866—1873), 駐英大使 (1874—1879)。——第 168 頁。
- 萊宾, 茹尔 (Lépine, Jules)——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書記。——第 377 頁。
- 萊曼, 丹尼尔·哥特洛普 (Reymann, Daniel Gottlob 1759—1837)——德国制图家, 德国和邻国的特种地形图的編制者。——第 584、585、587 頁。
- 萊昂哈特, 格尔哈特·阿道夫·威廉 (Leonhardt, Gerhard Adolf Wilhelm 1815—1880)——德国法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汉諾威司法大臣 (1865—1866) 和普魯士司法大臣 (1867—1879)。——第 360 頁。
- 普林尼 (凱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羅馬博物学家, “博物志” (三十七卷) 的作者。——第 416、489—492、509、513、525—530、532—536 頁。
- 普富尔, 恩斯特 (Pfuel, Ernst 1779—1866)——普魯士將軍, 反动軍閥的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 3 月为柏林卫戍司令, 5 月曾指揮鎮压波茲南起义, 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兼陸軍大臣。——第 70 頁。
- 普赫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Puchta, Georg Friedrich 1798—1846)——德国法学家, 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代表。——第 423 頁。
-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約 46—125)——古希腊作家, 道德論者, 唯心主义哲学家, 古希腊和羅馬的杰出活动家傳記的作者。——第 483 頁。
- 普罗布斯 (馬可·奧里略·普罗布斯) (Marcus Aurelius Probus 232—282)——羅馬皇帝 (276—282)。——第 522 頁。

- 凱倫, 揚·亨德里克(Kern, Johan Hendrik 1833—1917) ——荷兰著名語文學家、東方學家和梵文學家。——第 565、570、574 頁。
- 凱撒(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Gaius Julius Cæ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羅馬統帥, 國家活動家和作家; 著有“高盧戰紀”一書。——第 329、353、355、433、448、478、482—490、493、505、506、513、522、531—535 頁。
- 凱撒里亞的普羅科皮阿斯(Procopius of Cæsarea 五世紀末——約 562) ——拜占庭最著名的史學家; 曾以維利薩里統帥顧問和秘書的身分參加了許多軍事遠征, 他在“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戰爭史”(八卷)中描寫了這些遠征; 他反映了不滿查士丁尼皇帝的專制政策的奴隸主貴族的觀點。——第 527 頁。
- 凱澤爾, 麥克斯(Kayser, Max 1853—1888)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帝國國會議員(1878 年起), 屬於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右翼。——第 179—181 頁。
- 凱特利里伯爵, 艾米爾(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 ——法國反動的政治活動家; 1870 年任巴黎警察局長(9—10 月), 後領導組織布列塔尼新編的地方武裝力量; 上加龍省省長(1871), 1871 年 4 月在土魯斯鎮壓過公社。——第 371、393 頁。
- 斯密, 亞當(Smith, Adam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 400 頁。
- 斯隆, 賽米爾(Sloan, Samuel 1817—1907) ——美國百萬富翁, 鐵路企業主。——第 338 頁。
- 斯拉格(Slagg) ——1881 年為曼徹斯特的英國議會議員。——第 287 頁。
- 斯坦福, 利蘭德(Stanford, Leland 1824—1893) ——美國政治活動家和鐵路企業主, 百萬富翁; 屬於共和黨;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1861—1863); 參議員(1885—1891)。——第 338 頁。
- 斯巴達克(Spartakus 死於公元前 71 年) ——羅馬角鬥士, 公元前 73—71 年古羅馬最大一次奴隸起義的領袖。——第 332 頁。
- 斯卡爾金(葉列涅夫, 費多爾·巴甫洛維奇的筆名)(Еленев, 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 (Скалдин) 1828—1902) ——俄國作家和政論家, 六十年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 聞名的“在劣等僻壤和在首都”一書的作者。——第 453、455、458—462、466 頁。
- 斯特拉本(Strabon 約公元前 63—公元 20) ——古希臘最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第 488、489、504、523 頁。
- 斯賓諾莎, 巴魯赫(別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 1632—1677) ——杰出的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 無神論者。——第 219 頁。
- 斯維托尼烏斯(凱尤斯·斯維托尼烏斯·特蘭克維路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約 70—160) ——羅馬歷史學家, 寫了一部“十二凱撒傳”(從尤利烏斯·凱撒到多米齊安), 主要內容盡屬皇帝的私生活。——第 495 頁。
- 斯克列比茨基, 亞歷山大·伊里奇(Скреби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27—1915) ——俄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 “皇帝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的農民狀況”的作者。——第 468 頁。

## 十三画

塔西佗(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約 55—120)——羅馬最著名的史学家和羅馬帝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編年史”的作者。——第 332、355、356、433、448、478、486、489—492、500、506、507—515、517、519、521—527、530、532、535、588 頁。

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 714—768)——法兰克宮相(741—751),卡罗兰王朝的第一个国王(751—768)。——第 546、548—550 頁。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第 340 頁。

微耳和,魯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細胞病理学的奠基人,写有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第 480 頁。

雷姆克,哥特利勃(Lemke, Gottlieb 1844 左右—1885)——倫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 374 頁。

道斯,戴維(Dows, David 1814—1890)——美国金融家,百万富翁。——第 338 頁。

道金斯,威廉·博伊德(Dawkins, William Boyd 1837—1929)——著名的英国学者,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写有关于欧洲原始居民方面的著作。——第 478、510 頁。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

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属于左派;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佣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誣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102、103、119 頁。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殘酷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 308、310 頁。

蒙克,查理(Monk, Charles 生于 1824 年)——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合并主义者,議会議員(1859 和 1865—1885)。——第 287 頁。

蒙奈,弗兰茨·約瑟夫(Mone, Franz Joseph 1796—1871)——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語文学家,写有許多关于德国和尼德兰的历史和古代文献方面的著作。——第 588 頁。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 29、32、322 頁。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路透,保罗·尤利烏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倫敦路透通訊社的创办人(1851)。——第 159 頁。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許多国家中設有銀行。——第 337 頁。

塞涅卡(魯齐烏斯·安涅烏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 4 左右—公元 65)——羅馬哲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所謂新斯多葛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倫理学学說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

过影响。——第 328、330—332 頁。

塞吉美尔 (Segimer 一世紀)——日耳曼族凱魯斯奇人的酋长, 阿尔米紐斯的父亲。——第 501、502 頁。

塞格斯特 (Segestes 一世紀)——日耳曼族凱魯斯奇人的酋长, 拥护羅馬人。——第 502 頁。

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魯齐烏斯·塞普提米烏斯·謝維路斯)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46—211)——羅馬皇帝 (193—211) 和統帥。——第 515、517、518 頁。

奧艾爾, 伊格納茨 (Auer, Ignaz 1846—1907)——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改良主義者; 職業是鞍匠, 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 多次被選為國會議員。——第 13 頁。

奧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讓·巴蒂斯特·德 (Aurett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法國將軍, 教權主義者, 普法戰爭時期任盧瓦爾軍團司令, 1871 年 3 月任巴黎國民自衛軍司令; 1871 年國民議會議員。——第 392—394 頁。

奧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 14)——羅馬皇帝 (公元前 27—公元 14)。——第 329、484、486、493、496、497、504—507、512、514、516 頁。

奧羅修斯, 保羅 (Orosius, Paulus 約 380—420)——羅馬歷史學家, 原系西班牙人; 世界史概要“反多神教徒七書”的作者。——第 495 頁。

奧頓諾凡·羅薩, 耶利米 (O'Donovan Rossa, Jeremy 1831—1915)——愛爾蘭芬尼亞社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1865 年被捕, 被處無期徒刑, 1870 年獲特赦, 不久就僑居美國, 在那里領導

芬尼亞社; 八十年代脫離政治生活。——第 370 頁。

奧爾洛夫, 阿列克塞·費多羅維奇 (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公爵, 俄國軍事和國家活動家, 外交家, 曾任國家參議院議長和大臣委員會主席 (1856 年起), 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委員和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主席, 殘暴的農奴主。——第 455 頁。

奧維狄烏斯 (普卜利烏斯·奧維狄烏斯·納佐) (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 43—約公元 17)——杰出的羅馬詩人。——第 505 頁。

奧倫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蘭總督 (1672—1702), 英國國王 (1689—1702)。——第 341 頁。

#### 十四画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第 27、228、415 頁。

豪威耳, 喬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國工聯改良派領袖之一, 職業是泥水匠; 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1864—1869), 工聯不列顛代表大會議會議員會書記 (1871—1875)。——第 163—168 頁。

蒲魯東, 比埃爾·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國政論家, 經濟學家 and 社會學家, 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第 7、116、217、248、249 頁。

赫德爾, 麥克斯 (Hödel, Max 1857—1878)——萊比錫的幫工; 1878 年謀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 政府借此實行了反

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160、167 頁。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偉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論家和作家; 1847 年侨居国外, 在倫敦建立了俄国自由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文集和“钟声”报。——第 126 頁。

赫希柏格, 卡尔(Höchberg, Karl 1853—1885)(笔名路·李希特尔 L. Richter)——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 富商的儿子; 1876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 创办了許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杂志, 并供給經費。——第 172、178—180、182 頁。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約公元前 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 辯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219 頁。

維干德, 保尔(Wigand, Paul 1786—1866)——德国法学家, 写有許多关于西日耳曼各地区的法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569 頁。

維利希, 奧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 因政治信仰退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 1850 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險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3 年侨居美国, 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站在北軍方面。——第 260 頁。

維耳克, 克利斯提安·哥特洛普(Wilke, Christian Gottlob 1786—1854)——德国神学家, 曾从事圣經語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第 328 頁。

維多利亞(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 215 頁。

維貝尔格, 卡尔·弗雷德里克(Wiberg, Carl Frederik 1813—1881)——瑞典历史学家, 写有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 510、513 頁。

維尼齐烏斯, 馬可(Vinicius, Marcus)——羅馬統帥, 执政官, 曾参加班諾尼亚和日耳曼尼亚的战争。——第 497 頁。

維尔穆特(Wermuth)——汉諾威警察厅长,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 与施梯伯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第 67 頁。

維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 死于公元前 46 年)——高卢領袖, 高卢人反对羅馬統治总起义的首領(公元前 52—51)。——第 505 頁。

## 十五画

墨洛温王朝——五世紀末至八世紀中叶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第 362、539、543、547、552、554、558 頁。

摩萊里(Morelly 十八世紀)——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第 207 頁。

摩爾根, 路易斯·亨利(Morgan, Louis Henry 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 人种学家, 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432 頁。

摩爾根, 爱得文·丹尼逊(Morgan, Edwin Denison 1811—1883)——美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属于共和党, 1858—1862 年任紐約州州长, 1863—1869 年为参議員。——第 338 頁。

德穆特, 海倫(Demuth, Helene 1823—1890)——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383 頁。



德普勒, 馬賽尔 (Deprez, Marcel 1843—1918) ——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 研究远距送电問題。——第 351 頁。

德魯苏斯 (尼祿·克羅狄烏斯·德魯苏斯) (Nero Claudius Drusus 公元前 38 左右—9) ——羅馬統帥; 于公元前 12—9 年率領軍隊远征日耳曼人。——第 493—498、507 頁。

德爾布呂克, 馬丁·弗里德里希·魯道夫 (Delbrück, Martin Friedrich Rudolf 1817—1903) ——普魯士和德意志國家活動家; 自由貿易的擁護者, 1876 年以前是俾斯麥的親信之一; 國會議員 (1878—1881), 曾反對俾斯麥的保護關稅政策。——第 54、56 頁。

## 十六画

穆爾, 賽米爾 (Moore, Samuel 1830 左右—1912) ——英國法學家, 國際會員, 曾與艾威林一起將“資本論”第一卷和“共產黨宣言”譯成英文,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87 頁。

霍賽·梅薩-伊-列奧姆帕特——見梅薩-伊-列奧姆帕特。

鮑威爾,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之一, 資產階級激進主義者; 1866 年後為民族自由黨人; 寫有許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第 327、328、330、331 頁。

諾布尔, 約翰 (Noble, John 1827—1892) ——英國政治活動家, 自由貿易論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擁護者; 寫有許多關於財政問題的著作。——第 300—302 頁。

諾比林, 卡爾·愛德華 (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 ——德國無政府主義者; 1878 年謀刺威廉一世未遂, 政府借此實行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第 160、167 頁。

## 十七画

賽治, 拉塞爾 (Sage, Russell 1816—1906) ——美國百萬富翁, 鐵路企業主, 美國國會議員 (1853—1857)。——第 338 頁。

謝夫萊, 阿爾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 ——德國庸俗的經濟學家 and 社會學家, 宣傳放棄階級鬥爭并鼓吹資產者和無產者進行合作。——第 396、399、402、403、422 頁。

## 十八画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德國工人運動初期的著名活動家, 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理論家之一; 職業是裁縫。——第 217 頁。

##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 五 画

印格或印哥——古代德國神話中曼努斯 (相傳為日耳曼人始祖) 的三個兒子中

的一個。——第 526 頁。

### 八 画

易斯克或易斯科——古代德國神話中曼

努斯（相傳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第 526 頁。

宙斯——古希腊神話中最高神。——第 332 頁。

拉撒路——“新約全書”“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第 332 頁。

阿特乃——見雅赫維。

阿波罗——古希腊神話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 329 頁。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馬“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51 頁。

## 九 画

耶和华——見雅赫維。

神学家約翰——聖經中“启示录”一书的傳說中的作者。——第 330、335 頁。

## 十 画

唐·吉訶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第 346 頁。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中的人物。——第 346 頁。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殘酷的高利貸者，他根据借据上的条約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債的債戶割下一磅肉。——第 9 頁。

納塔斯——据塔西佗說，是古日耳曼人的女农神。——第 527、530 頁。

埃卢（蒂烏、齐烏）——古日耳曼人的战神。——第 587 頁。

## 十一 画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創始人。——第 328、329、330、331 頁。

曼努斯——据塔西佗說，是古日耳曼人信奉的图伊斯科神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即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相傳由他們三人产生了三个主要的日耳曼部落——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諾南人。——第 526 頁。

## 十二 画

雅赫維（耶和華）——犹太教中的主神。——第 330 頁。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众神那里盜走了火，帶給人們；宙斯把他鎖縛在山巔，令鷹啄食他的肝臟，以示懲罰。——第 236 頁。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盜，他把旅客誘来后强使躺臥床上，若比床长則砍足，短則拉长。——第 581 頁。

## 十四 画

瑪門——希腊神話中的財神；在基督教經文中，瑪門是惡魔，是好利貪財的化身。——第 317 頁。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話中的火神，打铁业的保护神。——第 236 頁。

赫明或赫明諾——古代德国神話中曼努斯（相傳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第 526 頁。

## 期 刊 索 引

### 二 画

- “十字报”（《Kreuz-Zeitung》）——見“新普魯士报”。
- “十九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倫敦出版。——第163、168頁。
- “人民报”（《Das Volk》）——倫敦出版。——第119頁。
- “人民报”（《La Plebe》）——洛迪、米兰出版。——第37、109、112、113、134、171頁。
-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不倫瑞克出版。——第125頁。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萊比錫出版。——第4、14、41、263頁。

### 三 画

- “工場。工人自編的劳动階級机关刊物”（《L'Atelier, organe spécial de la classe laborieuse, rédigé par des ouvriers exclusivement》）——巴黎出版。——第29頁。

### 五 画

- “未来”（《Die Zukunft》）——柏林出版。——第188頁。
- “平等报”（《L'Égalité》）——第200、249、264、324頁。

- “正义报”（《La Justice》）——巴黎出版。——第370、373頁。
- “白厅評論”（《The Whitehall Review》）——倫敦出版。——第337頁。
-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萊比錫出版。——第8頁。
-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里子、倫敦出版。——第259頁。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出版。——第26、161、348—350頁。
- “世紀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164頁。
- “世俗紀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The Secular Chronicle, And Record of Free-thought Progress》）——倫敦出版。——第169頁。

### 六 画

- “先驅”（《Der Vorbote》）——日內瓦出版。——第159頁。
- “灯笼”（《Die Laternen》）——布魯塞爾出版。——第175、178—179、181—182頁。
- “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90頁。
- “自由”（《Freiheit》）——倫敦出版。——第178、272、386頁。

“自由通訊”(《*Liberale Correspondenz*》)  
——第350頁。

## 七 画

“抗議報”(《*O Protesto*》)——里斯本出版。——第146頁。

“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倫敦出版。——第159—162、167、272、308、380頁。

“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紐約出版。——第135頁。

“劳动旗帜報”(《*The Labour Standard*》)——倫敦出版。——第276、279、286、291、292、295、298、299、303、307、310、314、318頁。

“社会主义評論”(《*La Revue socialiste*》)——里昂、巴黎出版。——第201、258、259、345頁。

“社会民主党人報”(《*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249頁。

“社会民主党人報”(《*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倫敦出版。——第321、336、339、344、345、349、350、371、374、379—381、388頁。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苏黎世出版。——第172、182頁。

## 八 画

“国民報”(《*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159頁。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見“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

“法兰克福報和商報”(《*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第4、162頁。

## 九 画

“钟声”(《*Kолокол*》)——倫敦、日內瓦出版。——第325頁。

“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杜宾根出版。——第411、417頁。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報”(《*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第162頁。

“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第43、55、115頁。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佛罗倫薩、羅馬出版。——第387頁。

“前进報”(《*Bneped!*》)——倫敦出版。——第40頁。

“前进報”(《*Vorwärts!*》)——巴黎出版。——第375頁。

“前进報”(《*Vorwärts*》)——萊比錫出版。——第114、160、162、181、263頁。

## 十 画

“馬賽曲報”(《*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370頁。

“紐約人民報”(《*New-Yorker Volkszeitung*》)——第339頁。

“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第119、375頁。

## 十二 画

“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74、159、161、162頁。

“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見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倫出版。——第115、319、322、375頁。

### 十 三 画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見  
“柏林政治和学术問題王国特权报”。

“經濟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巴黎出版。——第248頁。

“新社会”（《*Die Neue Gesellschaft*》）——  
苏黎世出版。——第188頁。

“新世界”（《*Die Neue Welt*》）——萊比錫  
出版。——第61、79頁。

“新时代”（《*Die Neue Zeit*》）——斯图加  
特出版。——第11頁。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118頁。

“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  
見“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里子、倫敦出版。  
——第259頁。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倫出版。——第39、69、71、74、76、78、79、83、85、88、90—93、99、103、117、118、260、375頁。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倫敦、漢堡出版。  
——第260頁。

### 十 五 画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116、259頁。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68、117、260、375頁。

## 地名索引\*

## 二 画

- 丁斯拉肯——第 586 頁。  
丁克尔斯比尔——第 509 頁。

## 三 画

- 上巴門（烏培河谷—上巴門）——第 582 頁。  
士瓦本——第 365、521 頁。  
凡尔賽——第 394 頁。  
土里——第 394 頁。  
土拉省——第 470 頁。  
大西洋——第 265、291 頁。  
大圣伯納德山口——第 493 頁。  
小亚細亞——第 482 頁。  
小喀尔巴阡山——第 498 頁。  
小圣伯納德山口——第 493 頁。

## 四 画

- 牛津——第 565 頁。  
云納河——第 394 頁。  
太晤士河——第 291 頁。  
不来梅——第 49 頁。  
不倫瑞克——第 44、107、110、138 頁。  
扎耳堡——第 494 頁。  
扎特兰德——第 528 頁。

- 比奇——第 593 頁。  
比德里赫——第 584 頁。  
比利牛斯山脉——第 370—371、479、543 頁。  
文洛——第 576、577 頁。  
文特諾尔——第 382 頁。  
文威果尔——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点。  
——第 584 頁。  
日内瓦——第 159、164、165、265、345 頁。  
日内瓦湖——第 382 頁。  
日德兰半島——第 483、488 頁。  
什萊灣——第 487 頁。  
什萊登——第 576 頁。  
什列斯維希——第 483、512、516 頁。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第 107、138、365、515 頁。  
厄兰島——第 515—517 頁。  
厄兰海峡（卡耳馬海峡）——第 515 頁。  
厄勒海峡（松德海峡）——第 515 頁。  
厄尔士山脉——第 485、495 頁。  
韦尔——第 392 頁。  
韦尔登——第 564、565、567、577、588 頁。  
韦尔切利——第 484 頁。  
韦雷河——第 511 頁。  
韦特劳——第 494、498、508、583 頁。  
韦斯特林山——第 592、594 頁。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編者注

巴登——第100、104、117、367、588頁。  
 巴黎——第7、36—37、69、70、100、116—  
 118、151—154、177、193、209、212、259、  
 270、319—320、322、345、370、371、375、  
 377、380、391—394、546、562頁。  
 巴門——第596頁。  
 巴門—愛北斐特——見愛北斐特—巴門。  
 巴塞爾——第119頁。  
 巴德高——第524、532頁。  
 巴涅尔-德-呂雄——第371頁。  
 巴伐利亞——第100、365、367、521、543  
 頁。  
 巴德維克——第524頁。

## 五 画

平茲省——第470頁。  
 左斯特——第588頁。  
 叶加特林諾斯拉夫省——第462頁。  
 漢堡——第49、50、55、56、67、107、118、  
 119、138、260、309、510、515頁。  
 汉諾威——第44、46、97頁。  
 皮蒙特——第114頁。  
 皮耳劳(巴耳提斯克)——第516頁。  
 卢森堡——第570、584、585、589、590、  
 592—595頁。  
 卢瓦尔河——第392頁。  
 尼諾夫——第587頁。  
 尼斯特河——第594頁。  
 北海——第483、488、491、495、507、512、  
 514、516、521、523、528、536、571、580  
 頁。  
 北布拉班特——第572頁。  
 北耳宾吉亞(霍尔施坦)——第487、536  
 頁。  
 加龙河——第481頁。  
 加特契納——第326頁。  
 加利福尼亚——第376頁。

瓦林——第511頁。  
 瓦瑟河——第394頁。  
 瓦尔塔河——第527頁。  
 瓦拉几亞——第521頁。  
 圣哥阿尔——第584頁。  
 圣奥梅尔——第587、590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270、380、  
 384、454頁。  
 圣特罗伊登——第587、590頁。  
 兰河——第492、494、508、511、589、593、  
 595頁。  
 兰格斐特——第582頁。  
 兰德施土尔——第584頁。  
 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澤芬)(施瓦耳巴赫  
 浴場)——第594頁。  
 卡累尔-阿斯坦(阿斯坦)山——第564  
 頁。  
 卡尔农特——第509頁。  
 卡尔斯巴德(卡罗維发利)——第381頁。  
 卡斯特罗普(卡斯特罗普-劳克塞耳)——  
 第586頁。  
 卡特加特海峽——第483、514—515、516  
 頁。  
 弗里希-加弗——第491頁。  
 弗里斯兰省——第528、587頁。  
 弗兰德——历史区。——第528、563、570、  
 587、590頁。  
 弗兰肯施坦——第64頁。  
 弗雷肯霍斯特——第568、569頁。  
 布雷——第340、341頁。  
 布雷(在灵堡)——第590頁。  
 布倫——第590頁。  
 布呂耳——第589頁。  
 布达佩斯——第149頁。  
 布魯塞尔——第63、67—69、114、116、  
 117、147、259—260、266、319、322、375、  
 575、590頁。

布列塔尼——第 118 頁。  
 布累金格——瑞典的一个地区。——第 516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64—66、99、101、105、138、308 頁。  
 布莱得弗德——第 287 頁。

## 六 画

华沙——第 265 頁。  
 迈納——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第 332 頁。  
 地中海——第 481 頁。  
 伐佛尔——第 590 頁。  
 汝拉山区——第 143 頁。  
 伏尔姆斯——第 485 頁。  
 达尔馬威亚——第 511 頁。  
 伊尔恩津克——巴伐利亚的一个居民点。——第 509 頁。  
 米兰——第 114 頁。  
 米尔騰堡——第 508 頁。  
 艾塞耳河——第 495、508、588 頁。  
 艾費耳高原——第 585、589、592—594 頁。  
 色当——第 139 頁。  
 色雷斯——第 484、489 頁。  
 色雷斯半島——第 482 頁。  
 亚琛——第 565、566、570、583、585、589 頁。  
 亚德灣——第 572 頁。  
 亚尔薩斯——第 57、365、583 頁。  
 西兰島——第 515 頁。  
 西兰省——第 528、572 頁。  
 西西里島——第 480、510 頁。  
 西里西亚——第 52、64、69、73、74、78、79、81—84、93—96、98、99、192、363、365、510、519、527 頁。  
 多农山——第 593 頁。

多瑙河——第 353、481—486、488、493、497、504、509、518—520、523、526、537、564 頁。  
 多伊茨——第 498 頁。  
 多尔斯滕——第 586 頁。  
 多拉尔特灣——第 572 頁。

## 七 画

灵堡——第 577、592 頁。  
 但澤(格但斯克)——第 512 頁。  
 劳恩堡——第 529 頁。  
 別恩堡——第 584 頁。  
 努瓦荣——第 394 頁。  
 佐林根——第 138、381 頁。  
 沙特尔——第 392—394 頁。  
 佛日山脉——第 593 頁。  
 那不勒斯——第 51、142 頁。  
 汪达尔山——見巨人山。  
 伯罗奔尼撒——第 332 頁。  
 吕特策耳施泰因(拉-普提特-比埃尔)——第 593 頁。  
 苏道(阿德利格-苏道)——第 525 頁。  
 苏格兰——第 214 頁。  
 苏黎世——第 104、172—178、589 頁。  
 麦茨——第 391、394 頁。  
 麦士河——第 485、496、572、577、580、586、590 頁。  
 杜斯堡——第 586 頁。  
 杜尔克海姆(杜尔克海姆浴場)——第 72 頁。  
 辛克法耳——第 528 頁。  
 辛比尔斯克省——第 470 頁。  
 利珀河——第 492—498、508、523、531、565 頁。  
 利斯河——第 563 頁。  
 利伏諾——第 51 頁。  
 利普施塔特——第 495 頁。



克列維——第 576 頁。  
 克散滕——第 576、586、589 頁。  
 克萊德河——第 291 頁。  
 克拉科夫——第 266 頁。  
 克耳海姆——第 509 頁。  
 克雷弗尔德——第 580 頁。  
 里海——第 481 頁。  
 里昂——第 225 頁。  
 里夫兰——第 515 頁。  
 里奧哈——第 51 頁。  
 里普利安——历史区。——第 577、578 頁。  
 里克斯赫夫特角——第 516 頁。  
 貝尔格——第 498、565、569、570、574、577、580 頁。  
 貝尔格区——第 46—48、356 頁。  
 貝尔格地区——第 588、592 頁。  
 貝奇瓦河——見馬尔赫河。  
 貝克海姆——第 584 頁。  
 貝薩拉比亚——第 467 頁。

## 八 画

图尔——第 392、546 頁。  
 刻赤——第 520 頁。  
 易北河(拉巴河)——第 44、49、53、58、98、484、487、489—491、495—498、509、512、519、523—524、528、529、532、588 頁。  
 芬宁(芬)島——第 520 頁。  
 林特恩——第 504 頁。  
 昔勒尼——古希腊在非洲北部海岸的殖民地。——第 510 頁。  
 彼得堡——見圣彼得堡。  
 直布罗陀——第 480 頁。  
 些耳德河——第 588 頁。  
 帕德波恩——第 495、565 頁。  
 奈木尔——第 394 頁。

奈梅根——第 589 頁。  
 羅馬——第 131、167、331—334、340、342、423、426、497、498、500、504、505、512、513、518、545 頁。  
 罗马尼亚——第 146 頁。  
 明登——第 587 頁。  
 明兴-格拉特巴赫——第 580 頁。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99、100、596 頁。  
 法兰克尼亚——历史区。——第 365、508、543、564 頁。  
 波河——第 482 頁。  
 波洪——第 195 頁。  
 波恩——第 47、115、496、498、582 頁。  
 波士頓——第 119 頁。  
 波茲南——第 45、52、77 頁。  
 波罗的海——第 483、491、492、512、514—517、527 頁。  
 波美拉尼亚——第 45、52、76、77、365 頁。  
 波尔多——第 51、370、371 頁。  
 波尔图——第 146 頁。  
 波希米亚——見捷克。  
 波希米亚(捷克)森林——山脉。——第 485 頁。  
 阿得璠——第 576 頁。  
 阿速夫海——第 520 頁。  
 阿格尔河——第 586 頁。  
 阿利埃省——第 293 頁。  
 阿瓦耳高——历史区。——第 577 頁。  
 阿道夫塞克——第 508 頁。  
 阿勒曼尼亚——历史区。——第 550 頁。  
 阿姆斯特丹——第 564、599 頁。  
 阿奎丹尼亚——历史区。——第 543 頁。  
 阿耳梅河——第 495 頁。  
 阿耳特馬尔克——历史区。——第 52 頁。  
 阿尔河——第 564、589、595 頁。  
 阿尔让台——第 370、382、383 頁。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第 382 頁。  
 阿尔卑斯山脉——第 8、479—482、504 頁。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第 466 頁。

## 九 画

耶拿——第 367 頁。  
 幽里希——第 585 頁。  
 临克宾——第 483 頁。  
 柯夫諾省——第 455 頁。  
 洪斯呂克山——第 586、593 頁。  
 欧佛賴塞耳——第 572 頁。  
 洛林——第 57、579、584、589、590、593—595 頁。  
 洛迪——第 37 頁。  
 美因河——第 482、485、494、509、511 頁。  
 美因茲——第 494 頁。  
 柏林——第 53、69、70、107、108、115、119、134、137、159、176、185、192、193、245、270、308、309、313、327、349、424、429 頁。  
 柏肯海德——第 287 頁。  
 迪耳河——第 531、589 頁。  
 迪克斯莫伊德——第 587 頁。  
 施特廷(茲杰辛)——第 49 頁。  
 施佩薩尔特——第 564 頁。  
 施魏德尼茨(斯維德尼察)——第 64 頁。  
 勃艮第——第 521 頁。  
 勃兰登堡——第 44、45、52、70、76、77、363、365、487、511、532 頁。  
 勃罗姆堡(貝德哥什)——第 510 頁。  
 勃腊尼博尔(勃兰登堡)——第 487 頁。  
 济克河——第 492、498、508、531、589、595 頁。  
 济克兰德——第 569、577 頁。  
 济克馬林根——第 103 頁。  
 济耳特島——第 528 頁。

哈瑙——第 508 頁。  
 哈耳(哈雷)——第 590 頁。  
 哈默倫——第 504 頁。  
 哈塞耳特——第 587、590、592 頁。  
 哈斐尔兰德——第 528 頁。  
 科倫——第 69—72、99、115、117、118—119、260、496、570、583、585、589、594 頁。  
 科芒特里——第 293 頁。  
 科布倫茨——第 582、583、584 頁。  
 科尔巴赫——第 592 頁。  
 科尔貝克(科洛布热克)——第 75 頁。  
 威悉河——第 489、491、494、495、502、523、535 頁。  
 威特島——第 382 頁。  
 威尔士——第 317 頁。  
 威尼斯——第 114 頁。  
 威塞尔——第 485、576、577、593 頁。  
 威斯特伐里亚——第 138、192、356、508、536、566、568、569、577、580、581、586、588 頁。

## 十 画

宾根——第 594 頁。  
 根特——第 143、147、573 頁。  
 高卢——第 332、433、448、481—484、490、493、496、504、506、536、542—547、560、562 頁。  
 涅辛(涅任)——第 75 頁。  
 热那亚——第 51 頁。  
 茹瓦尼——第 394 頁。  
 敖德薩——第 381、384 頁。  
 班諾尼亚——历史区。——第 493 頁。  
 郎卡郡——英国的一个郡。——第 282、317、574 頁。  
 郎布耶——第 394 頁。  
 貢比臬——第 394 頁。

貢岑豪森——第 509 頁。  
 翁納——第 588 頁。  
 翁施特魯特河——第 564 頁。  
 夏龙(馬尔納河岸夏龙)——第 391 頁。  
 夏托登——第 392 頁。  
 納埃河——第 593—595 頁。  
 納赫耳恩——第 511 頁。  
 倫敦——第 3、10、13、36、67、104、107、  
 117—120、132、159、160、162、163、166、  
 170、193、260、266—268、272、285、291、  
 319—322、326、347、371、375、380、382、  
 383、387、388 頁。  
 倫巴第——第 114 頁。  
 爱丁堡——第 196 頁。  
 爱北斐特——第 260 頁。  
 爱北斐特—巴門——第 46、107、308 頁。  
 哥特兰島——第 512、515—517 頁。  
 哥本哈根——第 518 頁。  
 哥尔若維策——第 520 頁。  
 庫耳米埃——第 393 頁。  
 庫尔維耳——第 392 頁。  
 庫爾斯克省——第 470 頁。  
 恩吉安——第 382 頁。  
 恩格倫——第 568 頁。  
 恩格尔斯——第 525 頁。  
 恩格尔斯高——第 524 頁。  
 烏培河——第 498、508、582 頁。  
 烏培河谷——第 46 頁。  
 烏得勒支——第 572 頁。  
 烏尔利希施坦——第 44 頁。  
 紐約——第 36、118、193、296、337、384  
 頁。  
 紐倫堡——第 107、138 頁。  
 紐沙特尔——第 113 頁。  
 紐法尔瓦塞尔(新港)——第 516 頁。  
 特璫特——第 587 頁。  
 特利尔——第 115、319、322、570、584、

589、595 頁。  
 特利尔专区——第 433、448 頁。  
 特斯黑林島——第 495 頁。  
 特雷布尼茨——第 511 頁。  
 馬賽——第 481、482 頁。  
 馬宰克——第 577、590 頁。  
 馬德里——第 36 頁。  
 馬斯特里赫特——第 566、577、585 頁。  
 馬尔克——第 498、508、565、569、577 頁。  
 馬尔摩——第 70 頁。  
 馬尔赫(摩拉瓦)河——第 509、511 頁。  
 馬尔美提——第 585、589 頁。  
 格丹(烏丹)——第 394 頁。  
 格腊蒙——第 590 頁。  
 格洛高(格沃古夫)——第 511 頁。  
 格律德——第 525 頁。  
 格耳德恩——第 576、585 頁。  
 格吕宁根——第 508 頁。  
 格布尔河(馬里乍河)——第 484 頁。  
 格罗斯特——第 287 頁。  
 格罗德諾省——第 455 頁。  
 埃森——第 195、196、568、577 頁。  
 埃克斯——第 483 頁。  
 埃林根——第 509 頁。  
 埃耳森——第 495 頁。  
 埃布罗河——第 51 頁。  
 埃德尔河——第 487 頁。  
 埃利佐河——第 494 頁。  
 埃姆斯河——第 492—494、498、507、508、  
 523、528、531 頁。  
 埃格山脉——第 569 頁。  
 埃捷尔(薩烈馬)島——第 510 頁。  
 埃弗利亚——历史区。——第 577 頁。

## 十 一 画

捷克——第 149、169、483、486、497、509、  
 511、524、532 頁。

崩高——历史区。——第 577 頁。  
 梁贊省——第 470 頁。  
 理森山(克尔科諾舍山)——第 482、484、  
 498、527、564 頁。  
 紹林吉亞——第 365、564 頁。  
 陶努斯山脉——第 492、496、508、594 頁。  
 莫斯科——第 380、381、384 頁。  
 莫拉維亞——第 511 頁。  
 基尔灣——第 487 頁。  
 基普芬堡——第 509 頁。  
 梅特曼——第 586 頁。  
 梅克倫堡——第 67、97、107、511、512 頁。  
 勒文(魯文)——第 587、590 頁。  
 勒威亞——历史区。——第 493、511 頁。  
 勒斯廷(埃斯廷)——第 549、570 頁。  
 曼特——第 392 頁。  
 曼都亞——第 386、393 頁。  
 曼海姆——第 100、310 頁。  
 曼彻斯特——第 105、214、259、263、287、  
 299 頁。  
 符律恩——第 576 頁。  
 符利兰島——第 495 頁。  
 符利辛根——第 587 頁。  
 符拉尔丁根——第 587 頁。

## 十二画

斐維——第 382 頁。  
 閔斯德——第 44、568、574、599 頁。  
 湯格恩——第 587、590 頁。  
 須德海——海灣。——第 495、572 頁。  
 提耳蒙(提楠)——第 587 頁。  
 琥珀海岸——第 482、483、509 頁。  
 敦基尔欣(敦克尔克)——第 564、599 頁。  
 費拉得尔菲亞——第 36、37、194 頁。  
 凱則尔斯勞頓——第 593 頁。  
 鄂斯納布魯克——第 569 頁。  
 黑海——第 481、507、520、523 頁。

黑森——第 564、584、592、594、598 頁。  
 喀山省——第 469 頁。  
 喀尔巴阡山脉——第 486、537 頁。  
 博让西——第 392、393 頁。  
 博洛尼亞——第 142 頁。  
 博恩霍尔姆島——波罗的海上的島嶼。  
 ——第 515 頁。  
 斯卡晏——第 516 頁。  
 斯图加特——第 103、104 頁。  
 斯特拉斯堡——第 485 頁。  
 斯拉耶耳塞——第 515 頁。  
 斯摩棱斯克省——第 462 頁。  
 普魯士——第 39、40、45、46、50—53、57、  
 58、59、64—66、72、76—78、81、88、97—  
 100、119、158、171、197、270、310、365、  
 367、482、584 頁。  
 普魯士薩克森——第 44 頁。  
 普瓦提埃——第 562 頁。  
 普罗凡斯——第 483 頁。  
 普法尔茨——第 72、365、571、583、584、  
 596—599 頁。  
 普里格尼茨——第 529 頁。  
 萊茵河——第 353、354、357、363、364、  
 367、480、484—488、491—498、501、  
 504、507—509、518、519、523—526、  
 531—536、565、567、570、572、576、577、  
 583、584、595 頁。  
 萊茵省——第 76—78、97、118、508、577  
 頁。  
 萊茵高——第 365、531 頁。  
 萊茵普魯士——第 192 頁。  
 萊茵布罗耳——第 589 頁。  
 萊茵貝尔格——第 584、589 頁。  
 萊茵普法尔茨——地区。——第 355 頁。  
 萊比錫——第 119、138、178、263、309、  
 345、505 頁。  
 萊夫費尔舍伊德——第 576 頁。

## 十三画

- 滑铁卢——第 212、590 頁。  
 頓奈斯山——第 593 頁。  
 楓丹白露——第 394 頁。  
 新喀里多尼亚島——第 371 頁。  
 塞納河——第 394 頁。  
 塞尔維亞——第 149 頁。  
 蒙塔包尔——第 508 頁。  
 蒙特卡罗——第 382 頁。  
 福尔巴赫——第 595 頁。  
 福格耳貝克林山——第 564 頁。  
 塔尔瑙(塔尔努夫)——第 64 頁。  
 塔姆沃思——第 287 頁。  
 塔夫利达省——第 462 頁。  
 雷斯——第 576 頁。  
 雷姆斯河——第 509 頁。  
 雷察特河——第 564 頁。  
 奧諾——第 394 頁。  
 奧頓——第 550 頁。  
 奧得河——第 509、510、511、523、527、  
 530、532、536 頁。  
 奧耳珀——第 577 頁。  
 奧尔良——第 391、392 頁。  
 奧尔丹——第 317 頁。  
 奧登林山——第 356 頁。  
 奧格斯堡——第 510 頁。  
 奧斯特河——第 512 頁。  
 奧斯特法利亞——历史区。——第 568、  
 569 頁。  
 奧斯宁格山脉(条多堡森林)——第 499、  
 504、535、569 頁。

## 十四画

- 臧林山——第 593 頁。  
 寥拉赫——第 588 頁。  
 豪斯貝尔格——第 504 頁。

- 聚德布腊卢普——第 518 頁。  
 赫尔松省——第 462 頁。  
 赫金豪斯——第 582 頁。  
 赫耳韦格——第 586 頁。  
 赫耳德兰——尼德兰的一个省。——第  
 572 頁。  
 維道——第 528 頁。  
 維德河——第 589 頁。  
 維也納——第 40、70、134、149、511 頁。  
 維斯拉河——第 491、510、511、513、515、  
 516、526、527、536 頁。  
 維尔納省——第 455 頁。  
 維尔騰堡——第 100、508—509 頁。  
 維埃尔宗——第 392 頁。  
 維拉庫布勒(韦利集-維拉庫布勒)——法  
 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93 頁。

## 十五画

- 慕尼黑——第 70 頁。  
 摩塞尔河——第 355、564、569、570、584、  
 585、589、593—595 頁。  
 摩納哥公国——第 382 頁。  
 魯貝——第 292 頁。  
 魯尔河——第 492、495、498、508、531、  
 565—569、577、588、592 頁。  
 魯尔蒙特——第 577 頁。  
 魯日伊策——第 44 頁。  
 魯罗尔特——第 586、593 頁。  
 德勒——第 394 頁。  
 德勒斯頓——第 107、118、137、308、310  
 頁。  
 德涅泊河——第 510 頁。  
 德涅斯特河——第 510 頁。  
 德特莫耳特——第 504、505 頁。

## 十六画

- 默尔斯——第 576 頁。

錫塔特——第 577 頁。  
 霍布根——第 386 頁。  
 霍姆堡(霍姆堡浴場)——第 494 頁。  
 霍尔施坦——第 512 頁。  
 霍赫施派耶尔——第 593 頁。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 355、592—593、  
 594 頁。  
 諾定昂——第 587 頁。  
 諾里克——历史区。——第 493 頁。  
 諾伊斯——第 498、580 頁。  
 諾伊豪斯——第 512 頁。  
 諾依維特——第 498、508、524 頁。  
 諾特豪森——第 44 頁。  
 諾夫哥罗德省——第 463、470 頁。

### 十七画

繆尔海姆——第 577 頁。

### 十八画

薩利河——第 511、564 頁。  
 薩克森——第 52、107、137、192、508、  
 532、564、565、569、577、578、588  
 頁。  
 薩馬拉省——第 470 頁。  
 薩拉托夫省——第 470 頁。  
 薩尔河——第 584 頁。  
 薩尔堡——第 593 頁。  
 薩尔茨堡——第 168 頁。  
 薩尔魯伊——第 585 頁。  
 薩尔布吕肯——第 138 頁。  
 薩尔茨維德尔——第 319、322 頁。

### 二十画

漢厄兰山——第 569、577、592 頁。

##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一文中 引用的拉丁文地名

### A

*Aerdelingen*——第 590 頁。  
*Ahrweiler*——第 585 頁。  
*Amstenrade*——第 577 頁。  
*Andernach*(*Antunnacum*)——第 584 頁。  
*Aningera-lô*——第 569 頁。  
*Ardinghen*——第 590 頁。

### B

*Bacharach*——第 584 頁。  
*Ballenge*——第 590 頁。  
*Baulershoven*——第 587 頁。  
*Benninghofen*(*Benninghof*)——第 586 頁。

*Berghofen*——第 586 頁。  
*Bevingen*——第 590 頁。  
*Biebrich*——第 593 頁。  
*Bingelrade*(*Bingelraede*)——第 577 頁。  
*Bisterscheid*(*Bisterschied*)——第 593 頁。  
*Bödingen*——第 589 頁。  
*Bogenhoven*——第 587 頁。  
*Bommershoven*——第 587 頁。  
*Bonninghen*——第 590 頁。  
*Boswinningen*(*Boswinning*)——第 590 頁。  
*Bovelingen*——第 590 頁。  
*Breitscheid*——第 593 頁。  
*Bremscheid*——第 592 頁。  
*Brettnach*——第 584 頁。

*Britlinga*(*Brietlingen*)——第 588 頁。  
*Büderich*——第 593 頁。  
*Buisingen*——第 590 頁。  
*Büllingen*——第 589 頁。  
*Bwingen*——第 590 頁。

## C

*Crastlingi*(*Krassum*)——第 587 頁。  
*Crettnach*——第 584 頁。  
*Curange*——第 590 頁。

## D

*Dallenbroich*——第 577 頁。  
*Daspich*——第 593 頁。  
*Destelbergen*——第 573 頁。  
*Desteldonck*——第 573 頁。  
*Destrich*——第 593 頁。  
*Droenhoven*——第 587 頁。

## E

*Echternach*——第 584 頁。  
*Edingahûsun*(*Edemissen*)——第 568 頁。  
*Ehingen*——第 588 頁。  
*Eibertingen*——第 589 頁。  
*Ellingen*——第 589 頁。  
*Engelmanshoven*——第 587 頁。  
*Eppinghofen*——第 586 頁。  
*Ereshofen*(*Ereshoven*)——第 586 頁。  
*Eschweiler*——第 585 頁。

## F

*Flissinghe*(*Vlissingen*)——第 587 頁。  
*Fühlingen*——第 589 頁。

## G

*Garweiler*——第 585 頁。  
*Gellik*——第 577 頁。

*Genderingen*——第 588 頁。  
*Gerdingen*——第 590 頁。  
*Geystingen*——第 590 頁。  
*Ghyverinckhove*——第 587 頁。  
*Gippershoven*——第 587 頁。  
*Gobertang*——第 590 頁。  
*Gravelingen*(*Gravelines*)——第 590 頁。  
*Grimmersingen*——第 590 頁。  
*Grinningen*——第 590 頁。  
*Grupilinga*——第 588 頁。  
*Gussenhoven*——第 587 頁。

## H

*Hardingen*——第 590 頁。  
*Haspelscheid*(*Haspelschiedt*)——第 593 頁。  
*Hatingen*——第 590 頁。  
*Hattingen*——第 588 頁。  
*Heerlinkhove*——第 587 頁。  
*Heisingen*——第 588 頁。  
*Helshoven*——第 587 頁。  
*Helsprich*(*Hilsprich*)——第 593 頁。  
*Herbinghen*——第 590 頁。  
*Herdange*——第 590 頁。  
*Hermelinghen*——第 590 頁。  
*Hibrich*——第 593 頁。  
*Hirzenach*(*Hirschenbach*)——第 584 頁。  
*Hirzenowe*(*Hirschenau*)——見 *Hirzenach*。  
*Hobbelrade*——第 577 頁。  
*Hocquinghen*——第 590 頁。  
*Holzweiler*——第 585 頁。  
*Höningen*——第 589 頁。  
*Hönningen*——第 589 頁。  
*Horsadal*(*Roßtal*)——第 568 頁。  
*Huckingen*——第 588 頁。  
*Hundelingen*——第 590 頁。  
*Hünningen*——第 589 頁。

*Husingen*——第 589 頁。  
*Huysinghen*——第 590 頁。

## I

*Irmenach*——第 584 頁。  
*Iveldingen*——第 589 頁。

## J

*Juliacum*——第 584 頁。  
*Julich*——見 *Juliacum*。

## K

*Kanach*——第 584 頁。  
*Karninschesberg (Kaninchenberg)* ——第 595 頁。  
*Kellinghofen*——第 586 頁。  
*Kemplich*——第 593 頁。  
*Kerprich*——第 593 頁。  
*Kessenich*——第 577 頁。  
*Kinckhoven*——第 587 頁。  
*Kintzich*——第 593 頁。  
*Kippingen*——第 589 頁。  
*Konings-Hoven*——第 587 頁。  
*Köttingen*——第 589 頁。  
*Kreuznach*——第 584 頁。  
*Kruisberg*——第 577 頁。  
*Krützenberg*——第 577 頁。

## L

*Langenscheid*——第 593 頁。  
*Langscheid*——第 592 頁。  
*Lantremange*——第 590 頁。  
*Leichlingen(Leigelingon)*——第 589 頁。  
*Leubringhen*——第 590 頁。  
*Leulinghen*——第 590 頁。  
*Libertange*——第 590 頁。  
*Lirich*——第 593 頁。

*Lottinghen*——第 590 頁。  
*Louvenge*——第 590 頁。  
*Lüttingen*——第 589 頁。

## M

*Magathaburg*——第 568 頁。  
*Marspich*——第 593 頁。  
*Martis villa*——第 586 頁。  
*Mederiacum(Brück)*——第 584 頁。  
*Medernach*——第 584 頁。  
*Meiderich*——第 593 頁。  
*Mellinghofen*——第 586 頁。  
*Melschede*——第 592 頁。  
*Merzig(Messancy)*——第 593 頁。  
*Meschede*——第 592 頁。  
*Mettecoven*——第 587 頁。  
*Mettlach*——第 584 頁。  
*Metzelschwand*——第 584 頁。  
*Millingen*——第 589 頁。  
*Montenach*——第 584 頁。  
*Mopertingen*——第 590 頁。  
*Mürringen*——第 589 頁。

## N

*Niederhofen*——第 586 頁。  
*Nieuwenhove*——第 587 頁。  
*Nieuwenhoven*——第 587 頁。  
*Noderange*——第 590 頁。  
*Nyswiller*——第 585 頁。

## O

*Odange*——第 590 頁。  
*Oderinge*——第 590 頁。  
*Ophoven*——第 587 頁。  
*Ordange(Ordingen)*——第 590 頁。  
*Ortrange*——第 590 頁。  
*Otlinga(Öttingen)*——第 588 頁。



## P

- Penserich*——第 593 頁。  
*Peuplingue*——第 590 頁。  
*Phladirtinga(Vlaardingen)*——第 587 頁。  
*Pollinchove*——第 587 頁。

## Q

- Quettingen*——第 589 頁。

## R

- Raepertingen*——第 590 頁。  
*Ramscheid*——第 592 頁。  
*Ratingen*——第 588 頁。  
*Reckheim*——第 577 頁。  
*Redingen*——第 590 頁。  
*Reekhoven*——第 587 頁。  
*Revelinge*——第 590 頁。  
*Rixingen*——第 590 頁。  
*Roclange*——第 590 頁。  
*Roclenge*——第 590 頁。  
*Röcklingen*——第 589 頁。  
*Rodlach*——第 584 頁。  
*Rödingen*——第 589 頁。  
*Rübenach(Ribintacus)*——第 584 頁。  
*Rümmingen (Romaninchova)*——第 588 頁。  
*Ruykhoven*——第 587 頁。

## S

- Schalkhoven*——第 587 頁。  
*Scheidwald*——第 593 頁。  
*Schuerhoven*——第 587 頁。  
*Schwanden*——第 584 頁。  
*Selschede*——第 592 頁。  
*Sentzich*——第 593 頁。  
*Silva Caesia*——第 589 頁。

- Smarinchowa (Schmerikon)*——第 588 頁。  
*Snotingaham(Nottingham)*——第 587 頁。  
*Sodingen*——第 588 頁。  
*Soetrich*——第 593 頁。  
*Solingen*——第 589 頁。  
*Stedieraburg(Steterburg)*——第 568 頁。  
*Stockheim*——第 577 頁。

## T

- Tiberiacum*——見 *Ziewerich*。  
*Tolbiacum*——見 *Zülpich*。  
*Törnich(Toernich)*——第 593 頁。

## U

- Ummingen*——第 588 頁。

## V

- Velingen*——第 590 頁。  
*Vlytingen*——第 590 頁。  
*Volkerinckhove*——第 587 頁。

## W

- Wageningen*——第 588 頁。  
*Wahenges*——第 590 頁。  
*Waldrach*——第 584 頁。  
*Wallach*——第 584 頁。  
*Walscheid*——第 593 頁。  
*Walwiller*——第 585 頁。  
*Wandhofen(Wandhoven)*——第 586 頁。  
*Wassenach*——第 584 頁。  
*Waterscheid (Waterscheyd)*——第 592 頁。  
*Wehofen*——第 586 頁。  
*Wellinghofen*——第 586 頁。  
*Wernerâ-Holthûson*——第 568 頁。  
*Wesselingen*——第 589 頁。  
*Westhofen*——第 586 頁。  
*Wichlinghofen*——第 586 頁。

*Willebringen*——第 590 頁。  
*Wimmertingen*——第 590 頁。  
*Winethahûsen*——第 568 頁。  
*Wintershoven*——第 587 頁。  
*Wolvaradingahusun*——第 587 頁。  
*Worringen*——第 589 頁。  
*Wulverdinghe (Wolvaradinges-hûsun)*——

第 590 頁。

## Z

*Ziewerich (Civiraha)*——第 584、593 頁。  
*Zollinchovon (Zollikofen)*——第 588 頁。  
*Zonhoven*——第 587 頁。  
*Zûlpich*——第 584 頁。

## 度量衡和货币名称表

### 重 量

1 磅	453.592 克	1 夸特	12.700 公斤
1 普特	16.38 公斤		

### 长 度

1 斯达第(古希腊长度)	約 192 米	1 里(1872 年以前的 德意志里)	7 420 米
1 里(古罗马长度)	約 1 472.5 米	1 俄里(旧俄长度)	1 066.78 米
1 里(英国法定长度)	1 609 米		

### 面 积

1 俄亩(旧俄面积)	1.92 公頃	1 平方尺	929 平方厘米
1 胡菲(古德意志面积)	20—40 摩尔根	1 平方里(德意志平 方里)	5.063 平方公里
1 摩尔根(普鲁士摩尔根)	25.532 公亩		

### 容 量

1 奥姆	約 150 升	1 舍费耳(普鲁士容量单位)	約 54.9 升
1 奥克斯霍夫特	約 200—240 升	1 俄石(旧俄容量单位)	209.91 升
1 夸脱	1.15 升	1 夸特(英国容量单位)	約 291 升

### 货 币

1 美元 = 100 分	1 辨士 = 4 法寻
1 法朗 = 100 生丁	1 卢布 = 100 戈比
1 基尼(英国金币) = 21 先令	塔勒(古德意志银币)
1 英镑 = 20 先令	格罗申(中古世纪后期的一种铸币)
1 先令 = 12 辨士	

##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至 1883 年 5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馬克思在本卷的“哥达綱領批判”一文中，較之过去的“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的重要原理，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本卷第 31 頁）。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論”（列宁）考察了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一次概括地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按照劳动分配消费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卷第 23 頁）。

恩格斯在“給奥·倍倍尔的信”中精辟地論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批判了机会主义“自由国家”口号的超阶级性质，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暫时的机关，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

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本卷第7頁）。列宁曾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頌为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最精彩的論述之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著中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指出馬克思因創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資本主义的秘密，遂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本卷第227頁），从此它“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階級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間斗争的必然产物”（本卷第226頁）；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生产資料变为公共財產”（本卷第247頁），“无产階級的历史使命”就是“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本卷第247頁）。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門”（本卷第263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內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綱領，这个綱領主張取消工人政党的階級性和革命性，放棄階級斗争，一味追求“走合法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机会主义“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場，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資產階級作斗争，而是企图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順受，并且承认懲罰是罪有应得”（本卷第187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他們明确地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視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认为它是現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

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本卷第 189 頁）。

在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幾篇文章中強調指出，對於參加工人政黨的其他階級分子，“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本卷第 189 頁），“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本卷第 284 頁）。在黨內鬥爭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說，必須堅持原則，決不可“拿原則來做買賣”（本卷第 14 頁）。

\*                     \*                     \*

本卷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九卷（1961 年出版）翻譯或校訂的。其中“給奧·倍倍爾的信”、“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文章，是根據 1953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德文版第二卷譯校的，譯校時參考了俄、英等譯文和有關的中文譯本。“馬爾克”、“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歷史”、“法蘭克時代”等文章，是在劉瀟然的譯本的基礎上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 年德文版第 19 卷重新校訂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一文是在張廣達等譯校本的基礎上校訂的。恩格斯在“勞動旗幟報”上發表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僱傭勞動制度”、“工聯”等十一篇文章，譯校時參考了劉瀟然和吳文燾的譯本。其他文章都是按照俄文版譯校的，有的參考了德文原文。本卷增加了一個“度量衡和貨幣名稱表”，以便讀者查閱。

參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岑鼎山、孫岷、姜其煌、畢克、楊興銳、謝寧、王治平、張慕良、宋洪訓、張企、宋書聲、顧錦屏、陸梅林、周亮

---

勛、荣敬本、陈立敬、董荣卿、彭卓吾、夏新英、盛同、周秀凤、蔡愷民、洪佩郁、刘丕烈、郑厚安、毕世良等。参加资料工作的有钱文干、郭值京、馮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